

19世纪初俄国文学的新旧语体之争

耿海英

(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 200444)

摘要:19世纪初的俄国有一场关于新旧语体的论争,非常类似于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白之争。论争一方以希什科夫为代表,坚持俄语的旧斯拉夫语体系,反对引入西方特别是法国的新语言新词汇新概念,且认为这不仅是语言问题,更是保存民族性问题;另一方以卡拉姆辛和茹科夫斯基为代表,倡导并在创作中实践语言革新,减少旧斯拉夫语的使用,简化语法,引入外来语等。前者支持者集中于“俄语爱好者对话”社,后者形成“阿尔扎马斯”文学社。两派均希望以自己的主张为原则,实现统一的俄语文学语言;而普希金融合了“高级语体”与“低级语体”,“古典”与“现代”风格,逐步实现了现代俄语语言的统一,因而被冠以“现代俄语语言之父”,从而使其后世作家将俄国文学带向了世界文学的高峰。

关键词:新旧语体;论争;“俄语爱好者对话”社;“阿尔扎马斯”文学社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4.01.001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4)01-0001-10

19世纪初,俄罗斯文学生活的特点是古典主义的瓦解不断加深,以及对其艺术遗产的激烈争论。有研究者喜欢将这一现象的原因归结于18世纪末的种种事件——在资本因素影响下开始的贵族地主与农奴关系的瓦解;贵族地主阶层和“第三阶层”对这种社会关系变化广泛的参与;农民阶层骚动与不满的威胁,这在当时的俄国是人们再真实不过的感觉——认为所有这些“异质”现象导致了前一个时代文学主导风格的衰落和瓦解。这种社会、政治层面的变动是否可以直接导致文学思潮的更替,其中可能需要更多环节的细致论证,才可以下结论。不过,社会的重大变革,总会带来对文化观念的冲击,带来大众对文化需求的变化。对这种变化,作家是最敏感的人群。从现象上来说,这一时期俄国的绝大多数作家确实是拒绝了古典主义精心培育的东西——庄严而冷酷的规范,它小心翼翼地将“高级艺术”与服务于“可鄙的乌合之众”利益的“可鄙艺术”区分开来;文学逐渐走向大众化、平民化,或曰

民主化,文学的民主化伴随着语言的民主化。在这一过程中,不以身份而论的各界人士参与到一场关于新旧语体的论争中——非常类似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文白之争。这场争论主要在两个社团之间展开,即“俄语爱好者对话”社(以下简称“对话”社)和“阿尔扎马斯”文学社。

一、两种语体主张

不过,最初这场关于语体的争论始于1802—1803年,当时既没有“对话”社,也没有“阿尔扎马斯”社。

在1800年代初期,卡拉姆辛写了《为什么在俄罗斯天才作家如此少》(1802)等几篇文章,他认为俄罗斯人无法在口语中表达某些心理和哲学上的微妙之处,也无法准确清晰地表达他们的经验;而在法语中,他们很容易传达类似的感受。因此,卡拉姆辛记述了当时贵族语言生活中的一个典型现象——双语现象。受过教育的俄罗斯人说和写法语比俄语更

收稿日期:2023-12-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俄国《现代人》杂志研究(1836—1866)”(17AWW005)

作者简介:耿海英(1964—),女,江苏邳州人,文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俄罗斯语言文学研究与翻译30余年。

容易,包括普希金在内的许多作家也承认这一点。一些诗人(如维亚泽姆斯基)首先用法语写诗,然后将它们翻译成俄语。但是我们知道,在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上,正是作家(作者)帮助同胞思考和说话。俄罗斯文学语言的不发达伤害了爱国者卡拉姆辛的民族自豪感。他梦想俄语能像法语一样丰富。因此,卡拉姆辛对法国文化的关注与高卢主义(即极度追捧法国)狂热毫无关系。那么,必须做些什么才能使俄语与世界上伟大的语言相提并论?卡拉姆辛认为,文学语言必须成为口语语言,即开明的、受过教育的阶层的语言;需要在说的时候就像在写,在写的时候就像在说。正是在这一点上,法语以其精确的词语使用和清晰的语法规则,应该被作为典范。卡拉姆辛讲道:“法语语言全在书本中(其中所有的颜色和阴影,就像在绘画中一样),而俄语只是部分地做到了这一点:法国人写作已经像说话一样了,而俄罗斯人言说许多事物还需要努力做到像有才能的人写作那样。”^{[1]217-219}只有这样,当以说话的方式写作时,就会有更好的语言。卡拉姆辛及卡拉姆辛派认为,为了消除文学语言(亦即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有必要使书面语和口语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便在文学语言的“中间”风格的基础上“消除书面语”并形成“中间语言”。

卡拉姆辛不仅比其他人更早地认识到这种语言改革的必要性,而且在创作中加以实践,他引入了许多以西欧语言(尤其是法语)为词源形成的外来词和新词,简化了俄语语法(即本文称为的“新语言”或“新语体”),果断地减少了教会斯拉夫语的使用(即本文称为的“旧语言”或“旧语体”)。后者尤其激怒了卡拉姆辛的反对者,即遭到海军上将希什科夫(А. С. Шишков)^①的强烈反对,他撰写长篇论文《论俄语的新旧语体》(1803年。现所见的是1813年的版本,正文436页,加上补充内容,共628页)回应了卡拉姆辛的这几篇文章。

就卡拉姆辛文章的所有主要论点,希什科夫都与之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如果说卡拉姆辛认为吸收西方的新词汇、新概念对俄罗斯是必要的,那么希什科夫则捍卫俄罗斯文化免受外国影响,并宣称俄罗斯必须保持自身的完整性,不受法国和西方意识形态和文化的侵蚀。在希什科夫看来,这项任务旨在保护民族的价值观和神圣性免受西方“异己的”的腐败思想的影响。他认为,一个发动雅各宾派恐怖、摧毁君主制、拒绝宗教的国家,是一个破坏者的国家;它没有任何积极的、创造性的原则,因此,它的哲学、文学和整个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只有负面的意义,

只能播下暴力、抢劫和无信仰的种子。在他看来,法国哲学只不过是“狄德罗派、让-雅克派、伏尔泰派和其他被称为哲学家的人的疯狂思辨”^{[2]146};世上有多么“愚蠢的无知”,他们就有多么盲目和错误;那些“最新出现的哲学家们向人民传授那些堕落的道德,其恶果在流血之后至今依然在法国筑巢”^{[3]423}。因此,“有必要非常谨慎地阅读法语书籍,以免道德的纯洁性在这片极其危险的大海中被石头绊倒……”^{[3]369}而法国文学,在他看来是“费解的闲话”^{[4]93},法语“又贫乏,又枯燥”^{[4]11},它包含许多由无序和血腥革命创造的词——诸如“断头台”之类,我们俄罗斯人能想出这些词吗?^{[4]203}这是一片贫瘠的土地,无法孕育出任何伟大的东西。这种外来文化正在强行闯入俄罗斯文化,歪曲和破坏纯洁而原始的民族基础。由此他得出结论,俄罗斯不应该吸收错误的欧洲启蒙文化,而应该保存和保护自己的过去。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摆脱法国的有害影响。

如果说卡拉姆辛渴望向前,那么希什科夫是向后回望,梦想着回到过去,复活宗法道德、习俗和古代语言,他对未来或现在都不满意,这是对“发展”的乌托邦式希望。为了使俄罗斯文化运动向后扭转,希什科夫转向了当时日常生活中不再使用的教会斯拉夫语,他提倡这一书面语,并抗议它与口语的融合,最重要的是,反对书面语消解在口语中。希什科夫反驳卡拉姆辛说,拉辛的语言“不是每个人都会说的语言,否则每个人都是拉辛”^{[4]159}。也就是说,书面语就是书面语,不可能变成每个人都使用的口语。他又说,用罗蒙诺索夫的语言说话“并不羞愧”^{[4]159}。也就是说,现今依然像罗蒙诺索夫那样使用崇高语体,并没有什么害臊的,而非必须使用新语言、新语体。

希什科夫认为,统一的文学语言的基础不应该是口语,不应该是“中间”风格,而首先是教会书籍的语言,即书写这些书的斯拉夫语。他写道:“(教会)斯拉夫语,是俄语的根源和基础;它赋予俄语财富、智慧、力量、美。”^{[4]90}在他看来,与法语的土壤不同,斯拉夫语的土壤是肥沃的,富有生命的,它渊博,丰富,有力;斯拉夫语中没有世俗文学,这是教会文化的语言;如果说法国世俗作家的作品已经败坏了道德,那么“我们依然坚守在罗蒙诺索夫及其同时代人之前,坚守着我们以前的神曲、圣书,对上帝的沉思,对基督徒职责和信仰的思考,这信仰教导人类温顺和平地生活”^{[4]102-103}。法国精神生活的书籍无法与俄罗斯的书籍相提并论:“法国人无法像我们那样从自己的书籍中汲取如此多的营养:其中

文体雄伟简洁、有力、丰富；把它们与法国书进行比较，你立刻就会发现这一点。”^{[4]140}

希什科夫认为，在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之后，欧洲思想家和作家的作品流进俄罗斯，出现了新的习俗（“我们学会了跳米诺维茨舞”^{[4]160}），出现了自己的世俗作家；正是从那时起，道德开始恶化；贵族应该为和谐遭到破坏负责；而人民（整个民族的非贵族部分——平民、农民、商人）保留了民族的习俗和道德，因为他们是在纯粹的俄语识字、俄语书籍和自己的习俗中长大。由此，希什科夫得出结论，除了书面语之外，统一的文学语言基础如果说有口语成分，那也应该是民间口语，即在民间传说中，在平民、农民和商人的语言中（俗语和按俄语特点创造的词语）常见的那些单词、表达方式和短语，而非来自西欧的新词汇。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希什科夫一方面主张使用教会斯拉夫语作为书面语，另一方面主张口语中应当使用真正俄罗斯民族的原始语言——“亲娘语言”，这是他对抗卡拉姆辛将教会斯拉夫语简化，并接受外来语等新概念、新词语，进而形成书面语与现代口语（我们这里用“新口语”命名）融合的主张。

这样，卡拉姆辛和希什科夫虽然都认为有必要形成统一的文学语言，并将这一语言的创造理解为具有全民族和国家意义的问题。但是，卡拉姆辛坚持将书面语与“新口语”接近起来，提议将文学语言建立在“中间”风格的基础上；希什科夫则提倡一种崇高风格和俄语口语即“亲娘语言”风格。他们都深信，基于各自提出的语言原则的文学将有助于所有阶层人民在共同的民族土壤上团结起来。另一方面，希什科夫在《论俄语的新旧语体》（1803年）中为了捍卫教会斯拉夫语元素对俄语的合法性，直接将这一元素与俄语画上等号。后来阿·赫·瓦斯多科夫^②在自己的论著《斯拉夫语言论》（1820）中从纯粹语言学角度证明了这种断言的荒谬性。但希什科夫并没有将与卡拉姆辛的争论限制在语言学框架内：他的另一个目的是证明，卡拉姆辛以及与之相关的“某个反对斯拉夫语言的特殊作家团伙”^{[5]182}，是反民族的，任何缩小教会斯拉夫语在文学语言中的应用范围的企图都是对俄罗斯“民族”原则的背叛，并将直接导致“雅各宾主义”和“丢失信仰”。希什科夫在一般文学问题上的立场补充了其关于俄语性质的陈述：他与后来成立的“对话”社的其他成员一起，主张古典主义文学是未来俄罗斯文学潮流唯一的走向。这些论点不仅有文学性质，同样有政治性质。这样就形成了针锋相对

的两种主张。

二、“俄语爱好者对话”社

为了以自己的理念教育未来的年轻作家，希什科夫决定创建一个社团。在正式社团创建之前，活动的方式是举行一些对话性的会议。在会议上，由那些在生活和文学经验方面睿智而可敬的长者为有前途的新手作家提供建议。会议的核心参与者有Г. Р. 杰尔查文（会议的庄严性和重要性因在他的家中举行而得到强调），希什科夫，穆拉维耶夫（М. Н. Муравьев），克雷洛夫，高列尼雪夫—库图佐夫（П. И. Голенищев—Кутузов），希林斯基—希赫马托夫公爵（С. А. Ширинский—Шихматов），沙霍夫斯科伊（А. А. Шаховской）公爵^③等。

正式的文学社团“俄语爱好者对话”成立于1811年2月11日，其执行理事按照职责分工由四人担任：希什科夫、杰尔查文、赫沃斯托夫（А. С. Хвостов）^④、扎哈罗夫（И. С. Захаров）；成员包括希赫马托夫公爵，沙霍夫斯科伊公爵，斯图尔扎（А. С. Стурдза），戈尔恰科夫（Д. П. Горчаков）公爵，利沃夫（П. Ю. Львов），格拉科夫（Г. В. Гераков），马林（С. Н. Марин）等。“对话”社中这些最活跃的参与者清单表明，古典主义最热烈的拥护者正是这些身居高位的宫廷—贵族艺术的庇护者。除他们之外，还有格涅季奇（Н. И. Гнедич），卡捷宁（П. А. Катенин），格里鲍耶多夫（А. С. Грибоедов），曲谢尔贝克尔（В. К. Кюхельбекер）及其他著名作家。“对话”社出版有自己的杂志《俄语爱好者对话读物》（1811—1816）。不过，按照Г. А. 古柯夫斯基的看法，“对话”社是“一个努力的，但却是笨拙的，实质上也是浪漫主义的学生”^{[6]10}。希什科夫所宣扬的民族浪漫主义思想，对18世纪的哲学怀有敌意，并希望教会的基础上恢复民族特征，这都在卡捷宁、格里鲍耶多夫，甚至十二月党诗人的作品中得到回应。甚至在“对话”社成立之前，不认同卡拉姆辛的感伤主义（其中有对西欧文学的模仿）和新浪漫主义原则（即后来普希金式的浪漫主义，这些原则是在从欧洲语言翻译和改写的基础上形成的）的一些作家就加入了希什科夫的行列，与卡拉姆辛的主张展开论争。其中最一贯和最有才华的是诗人、剧作家沙霍夫斯科伊公爵。1805年，针对卡拉姆辛派，他创作了戏剧《收割不久的田地》；后来，1808年，他在自己的刊物《戏剧导报》上发表了几篇讽刺文章，其中指责现代抒情诗人的主题肤浅、眼泪太多、人为地夸张情感。他坚决反对充斥着俄罗斯

舞台的“科策布们的”^⑤感伤情节剧。不久,希什科夫又出版了一部新著作《拉哈普的两篇文章翻译与译者注释》(1809年),其中他发展了自己1803年那篇著名论文的思想。

就这样海军上将希什科夫领导起了“旧文学”或曰“高级艺术”信徒的阵营——他的《论俄语的新旧语体》迅速成为所有古典主义艺术追随者的信仰告白。后来在希什科夫思想引领下成立的社团“俄语爱好者对话”,一直存续到1816年。

这个“旧文学”信徒的中心遭到两个社团的反对,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古典主义。其中最早的同时也是政治倾向最显著的社团是“俄罗斯文学爱好者民间协会”(以下简称“民间协会”),它是1801—1826年间(中间有间断)圣彼得堡的一个文学团体。其第一阶段是由И. П. 普尼^⑥领导着。其成员包括波布加耶夫(В. В. Попугаев)、勃伦(И. М. Борн)等诗人。“民间协会”的文学作品继承的是拉季舍夫的思想传统。它的左翼——最先进的一翼,积极争取人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和消灭“不公正”。普尼的以保尔·昂立·霍尔巴赫的名言“正义是所有社会美德的基础”为题词的诗歌《正义颂》,在当时都是了不起的思想倡导。

在国内政治领域,“民间协会”的诗人积极争取废除审查制度,如普尼的政论文《俄罗斯启蒙运动的试验》(1804)和戏剧《作家与审查员之间的谈话》(1805),还有,唯物主义主题,对神秘世界观的抗议,以及为恢复人类个性而进行的斗争,在普尼的诗歌《人》中也得到表达。他在这首诗里是在与杰尔查文著名的宗教颂歌《上帝》争论。在所有对现存秩序的抨击中,“民间协会”的诗人遵循了此前拉季舍夫的道路。尽管这些诗人中没有谁能与拉季舍夫反抗社会的尖锐程度、对专制严厉抨击的力度相比,但不应低估他们活动的重要性,他们是拉季舍夫事业的继承人,架起了从拉季舍夫通往十二月党人政治诗歌的桥梁,我们知道,雷列耶夫就是“民间协会”的积极成员,普尼和他的小组十五年前就在该协会活动了。不过,尽管这些诗歌具有公民主题,写作风格却也还没有摆脱古典方式,诗歌的古风阻碍了他们诗歌的文学效果;另一方面,拉季舍夫诗人群的思想倾向,在自己的贵族圈大多数读者看来似乎过于极端。由于他们的激进主义和其诗歌独特的文学风格,“民间协会”的诗人们在与“对话”派的文学论争中扮演了次要角色,居首要地位的是卡拉姆辛的追随者。

卡拉姆辛不仅在文学领域有许多追随者,甚至

在杂志和批评界也有一批追随者,出现了一批卡拉姆辛式杂志。卡拉姆辛的《莫斯科杂志》成了他们的榜样——他在杂志上不仅给读者提供有益的作品,同样提供饶有趣味令人愉快的内容。卡拉姆辛式杂志主要在莫斯科出版,其杂志栏目主要有《美文学》和《文学批评》。他们捍卫感伤主义,捍卫卡拉姆辛和他的“新语体”。为“美丽读者”服务——这是П. И. 马卡洛夫(П. И. Макаров)的《莫斯科水星》(1803年)、В. В. 伊兹梅洛夫^⑦的《爱国者》(1804年)、М. Н. 马卡洛夫(М. Н. Макаров)的《为了可爱的人杂志》(1804年)等杂志的特征,它们主要是女性杂志,也为孩子服务。其中最重要的是独特的批评家和杂志人П. И. 马卡洛夫的《莫斯科水星》,它是一份月刊(1803年办刊一年后因马卡洛夫去世而停刊),杂志栏目有《杂咀》《俄罗斯文学》《外国文学》《公告》《时尚》,其中批评占多数版面,一半甚至更多的版面都是评论文章。总共一年的杂志上,刊登了超过500篇批评文章和评论,而且大多数都出自出版人自己之手。马卡洛夫的批评文章给当时人们留下印象的有:关于茱丽斯^⑧和安娜·拉德克利夫^⑨的小说的评论(第1、3期),关于伏尔泰的中篇小说(第2期),关于感伤主义诗人И. И. 德米特里耶夫的严肃认真的分析文章(第10期),特别是还有与希什科夫尖锐论争的文章《评论著〈论俄语的新旧语体〉》(第12期)。这些文章表明,马卡洛夫是一位坚定的文学语言革新的支持者,一位出色的卡拉姆辛的后继者,感伤主义的具有实践意义的捍卫者。

针对什希科夫1803年的论著、沙霍夫斯科伊公爵的戏剧和讽刺文章,以及什希科夫1809年的新著《拉哈普的两篇文章翻译与译者注释》等的攻击,卡拉姆辛支持者的耐心是有限的,他们决定作出回应。除了П. И. 马卡洛夫的《评论著〈论俄语的新旧语体〉》外,诗人巴丘什科夫的幽默诗歌《莱特河畔的幽灵》^⑩(1809年)描绘了消失在“忘川河”中的那些模仿古典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1810年,达什科夫(Д. В. Дашков)在《花圃》杂志上发表了与希什科夫的《拉哈普的两篇文章翻译与译者注释》同名文章,批评希什科夫,质疑希什科夫关于教会斯拉夫语等同俄语的断言,他论证说,教会斯拉夫语只是语体上的“辅助”手段之一。按照达什科夫的说法,希什科夫是一位业余语言学家,他的理论是凭空臆造的。在同一期中出现В. Л. 普希金^⑪的《致В. А. 茹科夫斯基》的信,其中,他感到被希什科夫冒犯了,他不接受对自己反爱国主义的指责:

我爱我的祖国,我懂俄语,

但我不把特列季雅科夫斯基与拉辛相

提并论。

1811年达什科夫又撰写《关于回应批评的最简单方法》,而在A. E. 伊兹梅洛夫^⑫的《冥府谈话》(1811)中同样讽刺了尚古人士对逝去的时代的论说。B. B. 伊兹梅洛夫则积极揭露希什科夫“民族性”言论的乌托邦性质。还有瓦西里·普希金的讽刺喜剧《危险邻居》(1811年),其中讽刺沙霍夫斯科伊的诗句——“正直的天才到处都会找到捍卫者”——已经成为名言。而A. E. 伊兹梅洛夫创作的《史诗—抒情—喜剧—由若干独立片段组成的赞美诗》《斯拉夫人谈话中的歌手》(1813年)、维亚泽姆斯基公爵的讽刺短诗等,都嘲笑古典主义模仿者的诗歌尝试,使得“老旧派”及这一倾向参与者,如毫无才华的涂鸦狂赫沃斯托夫、库图佐夫、格拉科夫和希林斯基—希赫马托夫等人名誉扫地。沃伊科夫(A. Ф. Воейков)的《疯子之家》(1814年)在这场反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这本小册子针对古典主义无能者的刻薄讽刺,在对古旧派的攻势中发挥了显著作用。

希什科夫的团队对此也并非没有回应。沙霍夫斯科伊公爵在1815年创作喜剧《风骚的教训,或利佩茨克天然矿物水^⑬》(这是一部模仿法国小说《卖弄风情的女人》的喜剧作品),他讽刺嘲笑了文学改革的拥护者,其中诗人菲亚尔金的形象就是讽刺茹科夫斯基的。针对B. Л. 普希金的《危险邻居》,觉得受到侮辱的沙霍夫斯科伊公爵1815年还写了喜剧《被盗的皮大衣》,在剧中嘲笑B. Л. 普希金的那点小才华和雕虫小技,以及他对俄罗斯文学微不足道的贡献。

三、“阿尔扎马斯”社

1815年9月23日,沙霍夫斯科伊的喜剧《风骚的教训,或利佩茨克天然矿物水》在圣彼得堡小剧院举行首演。在剧中,有泪流满面、无比感伤的诗人菲亚尔金的形象,其诗句模仿了茹科夫斯基的诗歌《阿喀琉斯》(也暗示了茹科夫斯基的诗歌《斯维特兰娜》)。演出时茹科夫斯基和他的所有朋友都去观看,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沙霍夫斯科伊要在剧中进行攻击。就在那时,他们决定共同行动,成立一个文学社团并出版杂志。杂志后来没有出版,该文学社团即“阿尔扎马斯”社。

“阿尔扎马斯”社是一个相对封闭、好友们的文学圈子,它联合了文学中相对于古典主义新出现的

“卡拉姆辛倾向”的拥护者,它成立的目的是与文学中以希什科夫为首的“俄语爱好者对话”的古旧趣味和传统斗争。“阿尔扎马斯”文学社成立于1815年10月,成员有文学家、政治和社会活动家等,如:В. А. 茹科夫斯基、К. Н. 巴丘什科夫、Ф. Ф. 维格尔、А. Ф. 沃伊科夫、П. А. 维亚泽姆斯基公爵、П. И. 马卡洛夫、Д. В. 达维多夫、С. П. 日哈列夫、М. Ф. 奥尔洛夫、А. С. 普希金、В. Л. 普希金、А. И. 屠格涅夫、Н. И. 屠格涅夫、С. С. 乌瓦罗夫、Д. Н. 布鲁多夫、Д. В. 达什科夫等。

朋友们每周六都会聚集在布鲁多夫家里,在那里读书,宣读自己的作品。如果说在“对话”社的聚会上朗读的诗歌大多以抒情兼史诗式的赞美诗和英雄史诗为特色,那么在“阿尔扎马斯”社里多是室内诗歌(像室内音乐一样)——题诗、诙谐的献诗,其中“机智”与“胡言乱语”混合在一起。在“阿尔扎马斯”社的活动中多为闲谈,他们与“俄语爱好者对话”的争论具有明显的俏皮特征,该协会的终身秘书茹科夫斯基被一致认为是“小丑之王”,这源于对手对他的诗歌的攻击;所有成员都有取自茹科夫斯基诗歌的幽默的绰号:茹科夫斯基—斯韦特兰娜(茹科夫斯基有诗《斯韦特兰娜》),维亚泽姆斯基—阿斯摩太(最强大、最高贵的恶魔之一。欲望、嫉妒、仇恨、复仇、和毁灭的魔鬼),Н. 屠格涅夫—沃里克(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怪物,他的身体已经长满了管道和贮槽网络),А. 屠格涅夫—伊奥利亚竖琴,М. Ф. 奥尔洛夫—莱茵河,巴丘什科夫—阿喀琉斯,布鲁多夫—卡珊德拉,乌瓦罗夫—老妇人,Ф. Ф. 维格尔—伊维克的鹤^⑭,Д. 达维多夫—亚美尼亚人,年轻的普希金—蟋蟀(才华横溢的普希金的绰号。年轻的普希金乐观,开朗,健谈,随口就能押韵。主要是,蟋蟀是一种原产于北非的物种,与普希金祖先的故乡吻合),他的叔叔В·普希金—乳酪饼。这些绰号不仅取自茹科夫斯基诗歌的标题,还取自茹科夫斯基诗歌的细节,如:“蟋蟀”来自《斯韦特兰娜》,达什科夫的绰号“楚”来自诗歌《柳德米拉》的感叹词,这些受到论争对方的特别嘲笑,但它们都极其准确地定义了这些天才人物,永远留在了他们的文学遗产中。

该社的命名、论战的风格和内容,都源于布鲁多夫1815年创作的一部讽刺剧本《隔板后面的梦呓》,并注明由“博学之人协会”出版(当然是讽刺多为科学院院士的“对话”人),它针对的是一再攻击卡拉姆辛派、嘲笑茹科夫斯基的沙霍夫斯科伊及其喜剧《风骚的教训,或利佩茨克天然矿物水》

(1815)。剧本情节是这样:其中描绘了一个虚构的文学社团“文学之友协会”。这个被命运遗忘在“忘川河”的“协会”在远离两个首都的阿尔扎马斯,在约定好的固定日子里协会成员总会在阿尔扎马斯的一家小酒馆聚会(因此这个“小酒馆”被作者戏称为这些文人的“科学院”,这个协会也得名为“阿尔扎马斯社”),并在友好讨论中度过夜晚。有一天,他们无意中听到隔壁一陌生人的梦呓(很容易通过他的外在特征认出是沙霍夫斯科伊)。陌生人的梦话使用的是古老的文体和圣经寓言的形式,讲的是某位长老(从他身上可以看出希什科夫)托付给他一个使命,写一篇讽刺诗文,反对比长老更有天赋的对手。这样一来,长者似乎恢复了他跌落的名声,熄灭了啃食他的嫉妒,忘记了自己在创作上的自卑。布鲁多夫在其中精妙地回应了沙霍夫斯科伊公爵和希什科夫们的狂妄。

布鲁多夫的讽刺作品多方面显示了“阿尔扎马斯”社的风格以及他们的作品类型和讽刺技巧,他们就是借由这一作品决定将成立的文学社戏仿地命名为“阿尔扎马斯”社。于1815年9月14号在乌瓦罗夫家举行了“阿尔扎马斯”社第一次有组织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茹科夫斯基、А. И. 屠格涅夫、Д. В. 达什科夫、С. П. 日哈列夫、Д. Н. 布鲁多夫及乌瓦罗夫本人。后来加入该社的还有 П. А. 维亚泽姆斯基、Н. И. 屠格涅夫、М. Ф. 奥尔洛夫、К. Н. 巴丘什科夫、А. Ф. 沃伊科夫、В. Л. 普希金。А. С. 普希金从皇村毕业后也公开加入该社。在这次会议上“阿尔扎马斯社”戏谑的风格和会议的仪式得到了确立。正如会议记录所描述的那样,出席会议的人庄严地放弃了自己的名字,获得了新名(即绰号),以表示他们从“对话”和“科学院”的旧阿尔扎马斯人经过“利佩茨克天然矿物水”的洗礼转变为新阿尔扎马斯人。所有人取自茹科夫斯基被攻击的诗歌的绰号,表明他们已经准备好了:第一,为了“阿尔扎马斯”的荣誉而忍受一切责难;第二,成为对手攻击的稻草人,其形象就像诗歌中那些可怕的恶魔和死者。

就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该社一个“庄严”的仪式:每个新当选的成员都应向自己已故的前任宣读悼词;但由于“阿尔扎马斯”社的所有成员无疑都是不朽的,因此他们就从“对话”社或“科学院”中借用死者,选一具“活尸”,并为他作一个充满讽刺意味的“赞美演讲”。“阿尔扎马斯”人演讲的语言是献词语言,充满了文学引文和回忆,是为那些受过欧洲教育的“对话”者设计的,他们能够抓住潜台词并感

受到讽刺意味。“阿尔扎马斯”社还以“对话”社为榜样编撰“会议记录”,当然也是以幽默的方式编纂的。

由于“阿尔扎马斯”社是一个主要专注于与“对话”社和俄罗斯学院论战的社团,因而它在自己的机构中也戏仿他们的组织形式。与由著名的和经验丰富的官员参与的首都官方“对话”社相反,“阿尔扎马斯”社故意强调“无名之辈”和外省性,而且承认任何地方都可以是“阿尔扎马斯”——宫殿、小屋、战车、雪橇——这成为一项特别的章程。该社内部还有各种各样的惯例,它们都是戏仿“对话”社和俄罗斯科学院,甚至共济会和东正教会的章程。所以,“阿尔扎马斯”社无论是章程、人员、惯例,还是组织形式等,都以俏皮和戏仿元素为主。

该社的标识也很奇特,是一只雄伟的阿尔扎马斯品种的鹅,每次聚会它都会被端上餐桌(因而,“阿尔扎马斯”社也以其巨大而美味的鹅闻名)。与“对话”社浓厚的官方特点不同,“阿尔扎马斯”社的会议具有欢快、友情聚会的特点。为了取乐,朋友们称自己的欢乐派对为“阿尔扎马斯科学院会议”,并将晚餐时“吃一只美味的阿尔扎马斯鹅”列为一项规则,一个仪式;并配以吟唱相关的歌曲,例如著名的“沙霍夫斯科伊颂歌”,由达什科夫创作,每节诗都以这一诗句结尾:“赞美你,啊,苏托夫斯科伊!”^{[7]31}这也成为一个仪式性环节,被布鲁多夫和茹科夫斯基作为章程条例之一。

由“阿尔扎马斯”社这些诙谐幽默的行为中可见他们对“老一派”人的嘲弄和讽刺,其中,“博学之人协会”“阿尔扎马斯科学院”是指那些古典主义者皆为俄罗斯科学院的院士、博学之人;“沙霍夫斯科伊颂歌”“赞美你,啊,苏托夫斯科伊!”是对沙霍夫斯科伊的揶揄;还有,借用“对话”社和俄罗斯科学院成员作为“已故前人”等,这些都是诙谐的揶揄与讽刺的模仿。

“鹅”这个标志成为每个成员的荣誉。然而,同时代人也有其他联想。根据彼得大帝在1705年首次出版并多次重印的《标志和符号》一书中,第86号下有一个标志——“吃草的鹅”^{[7]31},解释其象征意义:“要么死,要么得到我想要的。”^{[7]30}这与“阿尔扎马斯”人的感情完全一致,他们宣称与“对话”社有着不可调和的仇恨。

于是,“阿尔扎马斯”人开始戏谑却狂热而无畏地反击“对话”社的攻击。争议的内容很严肃,但是“阿尔扎马斯”人赋予的形式确是俏皮的模仿。对于“阿尔扎马斯”人来说,“对话”社是一个过时的了

团体,那里除了克雷洛夫和其他几位作家外,都是以“白胡子”即希什科夫为首的停滞不前的老者,他们几乎都没有什么天赋,没有什么文学才能,因此,在“阿尔扎马斯”人看来,他们声称能领导文学的野心是可笑的,也是毫无根据的;作为作家,他们已经死了;他们的作品也同样如此,已经沉入冥界的“忘川河”。“对话”社的写作使用的是一种死的语言,是早已从言语中消失的词汇(如,“阿尔扎马斯”人嘲笑他们使用的“се́мо и овамо”即“тут и там”——现代俄语的“这里和那里”的古斯拉夫语)。在“阿尔扎马斯”人看来,希什科夫和他的兄弟们与其说值得无情的愤慨,不如说只配无害的嘲笑,因为他们的作品是空洞的,毫无意义的,而且他们自己暴露的不足比任何批评都要好。

“阿尔扎马斯”人用“胡言乱语”欢快地嘲弄,这成为他们论战的主要方法。在“阿尔扎马斯”人眼里,“对话”人的作品是一种过时的高雅风格,内容夸张,语言疯狂,无节制的诗意。他们的作品和演讲的庄严、雄伟的沉重与“阿尔扎马斯”人的轻盈、优雅甚至有些娇俏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阿尔扎马斯”人正在创造自己的宇宙世界,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阿尔扎马斯神话”。

“阿尔扎马斯”社的成立,把卡拉姆辛与“古旧派”的论争带向一个新阶段,他们将以茹科夫斯基为首的感伤主义者和巴丘什科夫领导的“轻诗”(poésie légère)的支持者联合起来,为扩大当时文学的主题和体裁范围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最重要的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语言。他们积极借用西欧文化的形式,借用自己所需要的一些语言元素,这些元素迥异于此前古典主义坚守的教会斯拉夫语体(即多为古斯拉夫语体)。在早期论争中,《论俄语的新旧语体》针对卡拉姆辛的俄语欧洲化创新,希什科夫提议放弃“卡拉姆辛主义者”引入的借用词和短语,如“品味”“风格”“道德”“审美”“热情”“忧郁”“感动”“娱乐”“本质”“集中”“博学”“深思熟虑”“工业”等;但这些词语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在俄语中扎下了根,变得可以理解和自然,它们非常准确地表达了新出现的文学概念、精神状态、情绪和思想。可是希什科夫要求在俄国书面语言中保持古斯拉夫语这一根源和形式,他要求用 гульбище 代替 Бульвар(林荫大道)、用 позорище 代替 театр(剧院)、用 мокроступы 代替 калоши(套鞋)、用 топталище 代替 тротуар(人行道)、用 шарокат 代替 бильярд(台球)等这些外来语。而“阿尔扎马斯”人对西方新思潮钦佩有加,在诗歌和书信中使用了許多在俄语不

使用的表达方式和法语单词。这看起来像炫耀,像是对时尚的致敬,实质是一种欲突破旧文体、进而突破旧有的思想钳制的努力。但在希什科夫们看来,他们贬低了一切本土的、俄罗斯的特性;高卢主义同样也遭到“古旧派”毫不客气的嘲笑。作为西方文化的反对者,他们嘲笑卡拉姆辛主义者偏爱借代、夸张和口头语,康杰米尔,冯维辛,克雷洛夫,都反对俄罗斯人的猴子式的模仿。

尽管“阿尔扎马斯”社和“对话”社之间的论争是在“卡拉姆辛主义”和语言改革的旗帜下进行的,但卡拉姆辛本人并没有直接参与,处于争论中心的是茹科夫斯基及其创作,当时他已经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浪漫主义者。从希什科夫派的角度看,茹科夫斯基浪漫主义的弱点是其翻译、模仿特征,因为茹科夫斯基从席勒和歌德、沃尔特·司各特和拜伦,从无人知晓的蒙克里夫或戈培尔,从罗伯特·骚塞、华兹华斯、拉莫特·福凯、查尔斯·米尔沃耶、弗里德里希·马蒂森那里为他的作品获得了情节。例如“狂飙突进”的戈特弗里德·奥古斯特·布格及其轰动一时的诗集《列诺尔》被茹科夫斯基重写为《柳德米拉》,后来重写为《斯维特兰娜》。又如对克洛卜施托克的旧约题材^⑥,以及托马斯·摩尔的新诗体^⑦的模仿。茹科夫斯基曾经说过:“我这里一切都是翻译的,但这一切又都是我的。”^{[8]30}他不是译手,不是奴隶,而是“对手”。

茹科夫斯基系统地挑战了希什科夫狭隘的语言方法,不过这种方法也使他分散了对文学内容、本土性和体裁特征的注意力。对希什科夫来说,文学是一堆“书”,对茹科夫斯基来说,文学是认知和表达的活生生的过程。希什科夫认为,语言创新只是一种“时尚”,而不是语言和文学的某种新品质。茹科夫斯基则一方面反复强调,他要谈的是散文,散文是文学成熟度的主要指标,而恰恰是俄国的散文仍然薄弱;他认为散文最好的榜样是卡拉姆辛的新语体试验,他努力以榜样为坐标;另一方面,他也强调,语言是“传递思想的工具”,而思想的水平,应该在伏尔泰、卢梭、高乃依、拉辛和莫里哀等作家身上寻找,他们是思想表达的楷模。

除了茹科夫斯基外,“阿尔扎马斯”社其他成员的作用,根据现有材料来看,还不能十分地确定。在1816年,“俄语爱好者对话”社关闭,未来的十二月党人加入“阿尔扎马斯”社后,“阿尔扎马斯”社成员试图让圈子的工作更加严肃,并决定出版自己的杂志。然而,接下来它并没有完成自己的既定目标。1818年“阿尔扎马斯”社解散。解散的外部原因是

其许多成员离开圣彼得堡。不过另一原因更具有实质性,即“阿尔扎马斯”人在社会政治观点上并不一致。这种不一致从一开始就由其成员的组成方式决定了——它纯属关系亲密的人的团体,并非完全一致的文学品位和社会政治倾向将他们连接在一起。他们一类是文学圈卡拉姆辛的支持者,如 B. 普希金,茹科夫斯基,达什科夫,维亚泽姆斯基,巴丘什科夫;一类是文学爱好者,如布鲁多夫,А. И. 屠格涅夫,乌瓦罗夫,维格尔,А. А. 普列谢耶夫等;还有一类是完全与文学无关,他们参与进来有各种原因,如谢维林是布鲁多夫和达什科夫的外交部同事;卡维林是 А. И. 屠格涅夫,Н. И. 屠格涅夫和茹科夫斯基的朋友而被介绍进来;日哈列夫、沃伊科夫与 А. И. 屠格涅夫之间是同事关系;其实乌瓦罗夫这时也属于与官场人士关系密切的人,后来担任了国民教育部部长,等等。这种组织文学社的方式,是那个文学沙龙时代非常典型的方式,但很快也就显示出它的缺陷。组成这一团体的是如此不同的思想观点的人,一方面是众所周知的保守派谢维林、卡维林、布鲁多夫、乌瓦罗夫,另一方面是左翼“自由派”维亚泽姆斯基等人;随后,未来的十二月党人奥尔洛夫,Н. И. 屠格涅夫和 Н. 穆拉维约夫也加入“阿尔扎马斯”社,他们要求坚持思想上的原则性。就在同时俄国第一个秘密革命社团(“救国协会”)形成(1816),各界人士从文学纷嚷转向政治议题的辩论,因而“阿尔扎马斯”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激烈也属自然。当巴丘什科夫和茹科夫斯基主张办一份非政治性刊物计划时,奥尔洛夫与 Н. И. 屠格涅夫坚持建立一个旨在“增强人民福祉”的社会政治机构(即他们后来加入了新的秘密团体“幸福联盟”[1818])。屠格涅夫-奥尔洛夫的计划没有得到大多数“阿尔扎马斯”人的支持。这样,最终表明“阿尔扎马斯”人之间的联系是多么不稳定,于是 1818 年解散。“阿尔扎马斯”这个文学圈,是文学和艺术中典型的初级共济会式圈子,是一场文学革命,一场“软”革命,而不是激进的革命;甚至,其成员各自取有“绰号”的现象,就类似于共济会仪式中的强制性,“阿尔扎马斯”社是对俄国科学院、共济会、东正教的戏仿,他们是无组织的、所谓“狂野的”俄罗斯共济会。

四、结语

卡拉姆辛与希什科夫关于统一的文学语言的两种观点各有优劣。卡拉姆辛正确地强调了受教育阶层的口头语言的“中间”风格的重要性并专注于此,

他最初没有考虑到“崇高风格”和“低下风格”各有其作用(后来,在研究俄罗斯国家历史时,他赋予其著作《俄国国家史》以“崇高风格”,这应该归功于希什科夫)。希什科夫正确地提请注意“崇高风格”和“低下风格”的区别,拒绝了“中间”风格。如果作家只走卡拉姆辛或希什科夫的道路,就不可能创造出统一的俄语文学语言。这三种风格都应当参与创作。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俄语语言的“中间”风格,在吸收“崇高风格”和“低下风格”的基础上得到丰富,并经过 19 世纪初所有作家的努力,形成了统一的俄语文学语言。不过,这并没有像卡拉姆辛和希什科夫所希望的那样成为民族各种力量统一的开端。相反,贵族和非贵族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它成为从普希金到别尔嘉耶夫所有俄罗斯作家和思想家反思的主题。然而,创造统一的文学语言这一创作原则在文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正是由于这种情况,俄罗斯文学在极短的时间内达到了与欧洲主要文学可以相提并论的水平。在其繁荣的起源处,是“阿尔扎马斯”人和希什科夫派之间一场快乐的论战,却充满了相当严肃和重要的内容。

不过,我们还是要回到这场争论与我们关心的 1820—1830 年代关于普希金创作的论争的关系上。普希金作为“俄语文学语言之父”,在统一文学语言的创造中无疑有巨大贡献。普希金当时作为皇村的学生,就已经信奉“阿尔扎马斯”社的思想倾向,投身于与“对话”社的文学斗争。可以说,从“阿尔扎马斯”社开始,他终身继承了文学恶作剧的精神和“轻松和欢快”的元素,因而才有了关于他的创作在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激烈的争论,对他 1820—1830 年代创作的肯定与否定^⑧。事实上,普希金对卡拉姆辛和希什科夫的片面性都感到不满。1823 年他写信给维亚泽姆斯基:“我想给俄语留下某种圣经式的污秽内容。我不喜欢在我们原始的语言中看到欧洲的矫揉造作和法国的雕琢精致的痕迹。粗鲁和简单对它(指俄语)来说更合适。我这样宣讲,是出于内心的信念,但出于习惯,我以另外的方式写作。”^{[9]62}这些话意味着普希金诗歌语言的基础是“中间”风格,但诗人对它的局限性也有清醒的意识。他承认希什科夫的相对正确性,他说:“希什科夫的主张在很多方面都是荒谬的;但在另一些方面他是对的。”^{[10]309}他希望向“崇高风格”和俄国“民间口语”风格的支持者卡捷宁学习。《鲍里斯·戈都诺夫》等作品证明了普希金考虑到了曾经敌对的观点。因此,普希金在他的作品中是结合了卡拉姆辛和“年轻一代拟古主义者”如格利鲍耶多夫、卡捷

宁、曲谢尔贝克尔、雷列耶夫等人的主张。在某些体裁中,例如,在他的挽歌中,卡拉姆辛主义占主导地位;在另一些体裁中,例如,在对圣经和古兰经的模仿中,采用的是古旧风格;而《叶甫盖尼·奥涅金》则用生动的俄罗斯语言写成,穿插着外来词,还放进去崇高修辞和日常白话。普希金自由地将“高级语体”和“低级语体”结合在一起,却没有显示出这种组合一般会带来的漫画式效果,最重要的是,他从特定的诗歌元素中去除了“高级语体”和“低级语体”的标签:在他的文体体系中,一切都是灵活的、流动的、情境的和功能性的,高级的可以作为低级的,反之亦然。

关于俄语文学语言的争议促成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文学放弃了对于体裁的过多思考,而转向“思想”和“风格”,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莱蒙托夫在他的诗歌中,果戈理在其早期小说中,都特别巧妙地运用了这一点。这一争论为浪漫主义在其心理和社会倾向上的发展开辟了空间。后来的文学发展证明,文学是按照卡拉姆辛的道路向前发展,当然,卡拉姆辛派的胜利并没有完全消除古典主义的影响。那些被称为“年轻一代拟古主义者”的作品都有古典主义的色调;甚至华丽的古典主义也强烈地反映在普希金的诗歌创作中(更不用说他少年时的《皇村回忆》,及后来的《波罗金诺周年纪念》)。古典颂歌的崇高悲情在丘特切夫身上也有独特的模仿。许多流派注定要利用古典主义悲情的强度,其结构线索的严格清晰以及语言手段的干脆利落。不过,后世作家对18世纪遗产的使用从未成为纯粹的模仿,他们不能也不想拯救正统的古典主义。

注释:

- ①因文中出现的人名较多,为行文简洁,对于较为陌生的人物只在第一次出现时给出俄语人名,其后皆只使用汉语,省略俄语字母。
- ②А. X. Востоков (1781—1864),俄国语言学家,古文学家,诗人,翻译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1841)。
- ③А. А. Шаховской (1777—1846),俄国作家和戏剧活动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1810年),圣彼得堡科学院荣誉院士(1841年)。1802至1826年,任圣彼得堡帝国剧院理事会剧目委员会成员。在这些年里(中间有间断),他领导了圣彼得堡戏剧团和戏剧学校。1811年,他组织了“青年剧团”,排演喜剧剧目。1811至1815年,任“俄语爱好者对话”社成员。1810年代后半期,沙霍夫斯科伊在圣彼得堡的公寓(“沙霍夫斯科伊的阁楼”)成为文学和戏剧生活的中心,普希金、П. А. 卡捷宁、А. С. 格利鲍耶多夫等人都曾光顾于此。

- ④А. С. Хвостов(1753—1820),俄罗斯外交官、军人、作家、翻译家,1804年后担任国家贷款银行经理。他是托木斯克州长В. С. 赫沃斯托夫的兄弟,诗人Д. И. 赫沃斯托夫的堂兄。帝国科学院荣誉院士。
- ⑤作为“平庸”的代名词的德国剧作家奥古斯特·科策布(全名Август Фридрих Фердинанд фон Коцебу,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费迪南德·冯·科策布,德语:August Friedrich Ferdinand von Kotzebue),德国剧作家和浪漫主义小说家,在俄罗斯奥斯特湖地区服役;然后在德国工作,曾担任维也纳宫廷剧院的导演,并凭借他的戏剧性和对大众口味的理解写了许多流行戏剧。卡拉姆辛因一些莫名其妙的误解而钦佩他,颂扬他的心理学。
- ⑥И. П. Пнин(1773—1805),俄国诗人和政论作家,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启蒙思想的主要代表,与拉季谢夫的圈子联系紧密。
- ⑦В. В. Измайлов(1773—1830),俄国作家,杂志人,卡拉姆辛的追随者。
- ⑧Фелисите де Жанлис(1746—1830),法国感伤主义作家。
- ⑨Анна Радклиф(1764—1823),英国作家,哥特式小说的创始人之一。
- ⑩在古希腊神话中,莱特河是源头,也是流经“遗忘之河”(有点类似中国神话中“孟婆汤”“奈何桥”“忘川河”)哈迪斯冥界的五条河流之一(与冥河、阿克伦河、科基托斯河和弗莱格顿河一起)。
- ⑪Василий Львович Пушкин(1766—1830),阿·谢·普希金的叔叔。
- ⑫А. Е. Измайлов(1779—1831),俄国寓言作家,杂志人,政论家,教育家。
- ⑬这个地方的矿泉水是俄罗斯医疗和生物指标方面最好的矿泉水,其历史始于1703年。
- ⑭《伊维克的鹤》是弗里德里希·席勒1797年的一首诗,由茹科夫斯基1813年演绎,重述了一个传奇故事,即杀害诗人伊维克的凶手被黑鹤看到,后来在所有希腊人集会上被指出。
- ⑮普希金在1815年11月28日的日记里写道:希什科夫和普尼公爵夫人最近为沙霍夫斯基公爵加冕了月桂花环;这一次,他们创作了一首非常诙谐的歌剧,名为“苏托夫斯科伊加冕礼”。其中有诗句:“赞美你,赞美你,啊,苏托夫斯科伊!”(见: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десяти томах, Том 8.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роза - Дневники: 28 ноября, 1815)
- ⑯弗里德里希·戈特利布·克洛卜施托克(Фридрих Готлиб Клопшток, 1724—1803),德国最重要的诗人之一,曾在耶拿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学习神学。他有三部圣经题材诗体戏剧《亚当之死》(1757年)、《所罗门》(1764年)、《大卫》(1772年),这些都没有受到同时代人的认可。最著名的诗歌作品《弥赛德》(Messiade, 1751—1773年)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这首诗最初是匿名出版的,灵感

来自弥尔顿。

⑰托马斯·摩尔(Томас Мур,1779—1852),浪漫主义诗人、词曲作者和民谣作家。爱尔兰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夏天的最后一朵玫瑰》和《爱尔兰旋律》系列。1812年,他遇到了拜伦,成为他的密友,也是他最早的传记作者之一。

⑱见笔者的文章《俄国1820年代关于普希金的论争》和《现代戏剧的先锋:〈鲍里斯·戈都诺夫〉发表前后的论争》。

参考文献:

- [1] Н. М. Карамзин, Сочинения Карамзина Т. 7 [М].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 Смирдин, 1834.
- [2] Михайлова Н. И., Василий Львович Пушкин [М]. Москва;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12.
- [3] Шишков А. С., Рассуждение о старом и новом слоге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М]//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 переводов. Ч. II., СПб., 1824.
- [4] Шишков А. С., Рассуждение о старом и новом слоге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языка[М]. СПб., 1813.

[5] Н. И. Мордовченко, Русская критика первой четверти XIX века[М]. М. —Л., 1959.

[6] Г. А. Гуковский, Пушкин и русские романтики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реализма, часть I) [М]. М., Интрада, 1995.

[7] Ян Тесинг, Илья Копицкий, Символы и эмблемата [М]. Амстердам, 1705. 电子版: <https://lib.geraldika.ru/b/30>.

[8] Кулешов В. И.,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IX века [М]. М., 2005.

[9] Пушкин А. С.,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В 10-ти тт. [М]//АН СССР. Ин-т рус. лит. (Пушкинский Дом); Т. 10. Письма, Л.: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 1979.

[10] М. А. Цявловский, Книга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о Пушкине [М]. Москва, 1931.

(责任编辑 刘海燕)

The Debate Between Old and New Styles of Language in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Russian Literature

GENG Haiyi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re is a debate about old and new styles of language in Russia, which is very similar to the argument between classical and vernacular styles of language during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in China. One side of the debate, represented by Shishkov, insists on the old Slavonic system of Russian language and opposes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languages, new vocabulary and new concepts from the West, especially from France; and it is considered to be not only a question of language, but also a question of preserv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The other side, represented by Karamzin and Zhukovsky, advocates and practices the linguistic innovations in their writings, reducing the use of old Slavonic, simplifying the grammar, introducing foreign languages and so forth. The supporters of the former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Colloquy of the Lovers of the Russian Word” society, and the latter forms the literary society “Arzamas”. Both schools hope to realize a united Russian literary language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their own ideas; however, Pushkin gradually achieves the unity of the modern Russian language by combining the “high style of language” and the “low style of language”, the “classical” style and the “modern” style, and thus he is crowned with the “father of modern Russian language”, which leads to his later writers taking Russian literature to the height of the world literature.

Key words: old and new styles of language; debate; “Colloquy of the Lovers of the Russian Word” society; literary society “Arzamas”

走出“启蒙与救亡”： 从一场关于鲁迅是否为民族主义者的争论说起

贺玉高¹, 牛旭阳²

(1. 郑州大学 文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2.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048)

摘要:新世纪初学界发生了一场关于鲁迅是否为民族主义者的争论。虽然争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但他们却具有同样的思想基础,即民族主义/个性主义、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等二元对立框架。无论肯定还是否定鲁迅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这种框架导致双方貌似合理的论证中都频繁出现了对“西方”“西方文化”“现代性”“民族主义”等概念绝对化、简单化的理解与使用。1980年代以来“启蒙与救亡”的二元对立思想所带来的盲点在这场争论中暴露无遗。国内外思想史研究界早已超越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鲁迅研究界的最重要成果也都是建立在这种超越之上的,但这场争论及后来的回响说明它的影响依然强大,现代文学研究界需要继续对“启蒙与救亡”二元对立的基础思维框架进行深入总结与反思。

关键词:鲁迅;民族主义;启蒙与救亡;二元对立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4.01.002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4)01-0011-08

周作人曾对鲁迅早期思想做了如下概括:“豫才那时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义包括之。”^[1]¹⁸⁸鲁迅身上的确有着一个显眼的标签——“民族魂”,他被很多人视为民族主义者或具有民族主义情结的人物。新时期以来,随着国内、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新思潮的涌现,学界对一些近现代议题进行重新审视,而关于鲁迅的“民族主义”也在21世纪初引发过一场争论。

这次争论的起点是杨春时在2004年发表的《中国现代性的四个陷阱》一文。作者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以及理想主义”视为造成中国现代性失落、现代化延迟的四个“陷阱”。在论及民族主义这第一个“陷阱”时,杨春时认为这来自中国知识分子对失去民族特性的焦虑与恐惧,“由于中国现代性的外源性,现代化事实上等同于西化。

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又需要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必然拒斥西方文化”。“反西方的话语背后,是反现代性,是对科学、民主的拒斥。”^[2]在杨春时看来,民族主义意味着维护民族特性,因而必然拒斥西方文化和现代性。而鲁迅也不可避免地跌入了民族主义陷阱,证据是鲁迅在《阿Q正传》中塑造了“假洋鬼子”形象,杨春时认为鲁迅在这一形象中“表露出对西化的某种厌恶”。正是这一观点引发了争论。

就在第二年,朱献贞发表了《鲁迅“厌恶西化”吗?——也谈鲁迅的“西化观”兼与杨春时先生商榷》。作者赞同杨春时对“四个陷阱”的认识,赞同民族主义造成中国现代性失落和现代化延迟的判断。但他反对将鲁迅视为民族主义者,他认为鲁迅并不恐惧失去“民族特性”,相反,鲁迅是“特殊国情论或者国粹论的批判者”——他从五四时期开始一直对国粹论调都持批判的态度。鲁迅虽然有民族国家救亡的意识,但由于他重视个人自由问题,因而不

收稿日期:2023-11-15

作者简介:贺玉高(1975—),男,河南洛阳人,文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牛旭阳(1993—),男,河南济源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

是“狭隘的民族主义”。“鲁迅不仅不厌恶‘西化’，而且十分投入地坚决地走西化之路。”有人将鲁迅扯向民族主义，是要“达到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西化倾向的目的”^[3]。“假洋鬼子”当然是一个反面形象，但鲁迅厌恶假洋鬼子不是“厌恶西化”，相反，是厌恶其“洋的假”，西化得不够彻底。

面对朱献贞的批评，杨春时很快作文回应，他认为“鲁迅的一生都没有摆脱民族主义情结的纠缠”。有“三个阶段”的鲁迅，其中留日时期鲁迅的民族主义是最鲜明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往昔的辉煌充满自豪”，并“站在保守主义的立场上反对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崇尚西洋文明的‘偏至’之举”^[4]。因此，留日时期的鲁迅基本思想是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的。五四时期，鲁迅开始意识到传统文化的落后与国民性的不良，“接受了以科学、民主为内涵的五四现代性，并由民族主义走向了世界主义”。但是，“归根结底，启蒙是为了救国，西化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4]，因此，这其实仍然是一种民族主义情结。五四之后，鲁迅又从世界主义回归革命民族主义。在杨春时对鲁迅思想历程的勾勒中，民族主义情结是串联起不同时期鲁迅思想表层变化的深层结构与动力。

朱献贞随后发文反驳称，早期鲁迅的确具有民族主义成分和色彩，但这是鲁迅思想尚不成熟的某种表现。这时的鲁迅已经开始学习和接受西方文化，倡导个性主义，思考国民性问题，走上了启蒙主义和世界主义的道路，并且这些倾向在鲁迅思想中占据越来越主要的地位，因此不能说鲁迅是民族主义者。^[5]

这场争论在十年后仍有回响。2016年，张福贵在一次研讨会上以《鲁迅思想的民族主义迷雾》为题，重提了十年前朱、杨二人的争论。他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具有排他性的民族至上、群体本位的大众化的民族思想体系”，“（民族主义）对于思想启蒙的个性主义构成了自然的集体围剿”^[6]。留日时期的鲁迅虽然具有民族主义思想元素，但这只能说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而不是民族主义。其思想主体属于以个人为本位的自由主义思想谱系，是个性主义和世界主义的，“这与他毕生致力于批判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坚持改造国民性的宗旨相一致”。不能认为鲁迅思想启蒙的目的和动力都来自民族主义思想的延伸，因为“在鲁迅的思想和概念中，前者的目的恰恰是对于后者的否定”^[6]。

二

这场争论的核心分歧是：鲁迅到底是不是民族

主义者。在杨春时这里，哪怕鲁迅主张“废除汉文”“只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哪怕鲁迅认为“中国文化是吃人的文化”，但只要他是为了民族救亡，那么他就是爱国的，他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鲁迅的西化、世界主义、启蒙主义不过是其深层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救亡主义的“表层思想”。哪怕鲁迅在五四时期是“最激烈的反传统和西化的主张者”，但也只是其思想发展“三个阶段”的中间阶段，其从留日时期的民族主义而来，又必将在下一阶段向左转中回归到革命民族主义。

在朱献贞这里，由于鲁迅的思想以个人主义、启蒙主义、西化等为核心，因此，即使他赞美过传统文化，认为中国“实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即使他关心“民族救亡和国家独立”，“自觉承担民族忧患”，呐喊出“我以我血荐轩辕”，他也不可能是民族主义者。与个人主义、启蒙主义等相比，这些只是“片面性和表象化的”。即使留日鲁迅的确有“赞美国粹倾向”的文章，那也只是早期鲁迅“思想上不成熟”，随着时间的推移，鲁迅成长为了“一个伟大的启蒙主义者”。

按照双方展现的逻辑，无论对方举出再多相反的证据都无法驳倒、说服彼此。这就使争论陷入了僵局。一般来说，一个判断及其背后的论证如果任何相反的外来证据都无法驳倒，那么这个判断及论证就不仅是一种简单的事实判断，而是具有了一种乔纳森·卡勒意义上的“理论”的味道，“它涉及一种系统的错综关系；而且要证实或推翻它都不是件容易事”^[7]³，因此我们需要对此进行理论方面的详审。

如果我们能穿透双方争论的表层而进入其内在肌理，就会发现其实双方的思想基础是高度相同的。他们的论述都是通过两组对立的概念，一组是“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爱国主义、传统文化、民族特性……”另一组是“启蒙主义、世界主义、现代性、西化、个性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西方文化、国民性批判……”这两组概念有三个特征：首先，同一组集合里的诸要素在价值上具有一致性，有时会互相替换。其次，两组概念互相水火不容。一个人如果是民族主义的，他就必然同时是传统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同时也必然是反现代性的，反西方的，反启蒙的；一个人如果是个性主义者，他就必然是现代的、启蒙的、世界主义的、西化的，同时也必然是反民族主义的、反传统文化的。在这样的意义生成框架下，鲁迅如果是一个具有基本同一性的人，他就只能属于两组互相对立的意义的一边，而不能同

时拥有二种因素。杨春时和朱献贞分别抓住其中的一个方面,针锋相对。他们只能通过表象与本质、正一反一合的演化论、思想成熟与不成熟等等来作局部的解释与调整,但在最终判断上却是绝不妥协,也不可能妥协的。第三,两组概念有价值上的正反高低之分,民族主义这一组概念拥有绝对的负面的价值,而相对立的启蒙主义一组概念则拥有绝对正面的价值。这样,二人对鲁迅思想的事实判断其实最后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对鲁迅的价值判断。因为二人都认为民族主义是坏的,所以对鲁迅是否为民族主义者的判断就变成了不断上演的另一场批判鲁迅与捍卫鲁迅的攻防战。

这里展现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非常明显都是来自1980年代李泽厚那个关于中国现代思想史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著名论断。李泽厚认为,启蒙与救亡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两个关联主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两个主题互相支持。此后,由于欧美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主权的不公正对待以及新生苏联对中国主权的尊重,使知识界开始从倾向欧美的自由主义慢慢转向苏联的社会主义。而为动员民众应对日本侵华带来的民族危机,强调集体与服从的传统文化价值不断地挤压强调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启蒙主义价值观,并使后者在后来的三四十年中彻底地衰落下去^①。

李泽厚的这个观点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并在中国思想和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这种强大的影响力从上述争论中就显露无遗:截然对立的双方竟完全共享同一个思维框架。但也正因为如此,它也在不断扩展其影响力的过程中一步步走向简单化和绝对化。比如杨与朱的争论,就十分明显地暴露了这个框架的危机。一方面,从常识性的角度,鲁迅这样一位致力于中华民族精神解放的爱国者,这样一个各个派别公认的中国现代“民族魂”的代表人物,朱献贞竟然断然否认他的民族主义特质,这是非常令人诧异的。另一方面,鲁迅这个中国早期现代性最具代表性的奠基人物,中国最重要的现代文学家,最激烈的批判传统文化、提倡现代启蒙的思想家,积极引入西方文化的旗帜性人物,在杨春时这里,竟然会是一个“厌恶西化”,抵制现代文化的反现代人物。并且鲁迅还不是作为现代性一部分的“反思现代性”而反抗现代性,而是完全外在于现代性的反现代人物,“他不是‘反思现代性’对资本主义的超前批判,而是站在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上批判西方文明”^[4]。总之,鲁迅像其他人物一样落入了民族主义这个陷阱,成为一个外在

于现代性的、非现代性的或反现代性的人物。这与我们一贯的认知多么大相径庭!争论以一种如此醒目的冲突方式,提示了这个二元对立思维框架内在的紧张以及面对具体复杂问题时的困难与危机。

三

中国思想界对启蒙与救亡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反思早已开始,王元化、秦晖、汪晖、许纪霖等思想史学者都对这个思维模式提出过深入有效的反思与批评。比如秦晖很多年来都在思考儒家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相通之处,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把儒家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对立起来的观点是找错了敌人。他发现晚清最早接受宣扬西方自由主义观念的重要人物恰恰都是当时的大儒们,这些人从原始儒家的伦理中轻易就找到了与自由主义的契合之处。而五四新文化运动通过个人主义打击小共同体本位的儒家伦理,使个人主义事实上最终成为通向国家主义(相当于杨春时、朱献贞和张福贵所说的那种以群体压制个体的、坏的“民族主义”)的桥梁。这就解构了原来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之间的那种僵化固定的二元对立思维^②。

如果把目光扩展至世界学术界,不断被重复并越来越极端化、简单化的启蒙与救亡二元对立模式的局限性,就更加明显了。当代西方学术界的主流把民族和民族主义归于现代性的产物和促进者,而不是前现代的或现代性的对立面。他们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不但在时间上出现较晚,而且史无前例,它是现代化的产物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东西^{[8]50-53}。

英国学者盖尔纳认为,现代工业社会对新型的有文化的劳动力的要求,使全民的书面语言教育成为必需,而完整的教育系统使现代国家成为必需,因此说,民族主义是现代经济基础变化在政治和思想领域的产物^③。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则认为,民族是印刷术、资本主义与语言的多样性三者相遇所造成的“想象的共同体”^④。英美著名学者如埃里·凯杜里、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安东尼·吉登斯、约翰·布鲁伊利、迈克尔·赫克特从不同的学科和角度,无不将民族主义视作严格的现代事物。赫克特断言:“关于民族主义最不具争议的结论之一是,它是一种现代现象。”^{[9]60}相比之下,把民族和民族主义看成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永存主义和原生主义的观点,在学术界却是非常边缘与非主流的观点。

在价值领域,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很多时候也都是与现代的个性自由、民主等现代价值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许多学者都认为,法国大革命既是

最具现代性的标志性政治事件(现代共和革命),又是现代民族主义的标志性事件。因为它要求把政治权力从君主那里转移到所有“法国人”那里,反对等级制,要求所有“法国人”权利平等。“民族国家的形成,最初正是通过权力主体转移到全体国民一方、亦即形成所谓人民主权而实现的。主权在民以及承认各个不同阶层的民众基本平等是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精髓,同时这正是民主的基本原则。”^[10]美国社会学家里亚·格林菲尔德认为:“主权在民并且承认各个阶层在根本上的平等,这构成了现代民族观念的本质,同时也是民主的基本信条。民主是与民族的意识同时诞生的。二者与生俱来就有着联系,不考虑这层关联,我们对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充分理解。”^{[11]9-10}其实政治自由与个性自由和民族主义在历史上也都有过紧密的亲关系。如朱献贞在说明鲁迅译介被压迫民族文学时所提到的,在鲁迅这里,立国与立人并不矛盾,“对异族的压迫和奴役一样也是反对的,对民族解放同样也是支持的”^[3]。这些文学包含着“悲哀、叫喊和战斗等反抗意志”,能够唤起那些“不为常俗所囿”者的觉醒和共鸣^[5]。这些表述实际上正透露出了鲁迅这里的民族主义与个性主义的统一。以赛亚·柏林说,与浪漫主义相伴而生的德国民族主义不仅具有反抗“趾高气扬的法国人”的对外的一面,其对内也具有“反对压迫性的、庸俗的社会的各种陈规陋习……推倒社会生活的一切壁垒与藩篱”^{[12]414},使个人尊严意识蓬勃兴起的一面。法国学者吉尔·德拉诺瓦也指出,“个人或个人主义的观念与民族观念形影相随”,与文化民族主义相关的浪漫主义“通过寻求人民的灵魂,寻求从社团主义角度来解释集体,远比启蒙思想更赞扬个人的天才,天才的个人”^{[13]28}。些内容在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文化偏至论》中都有充分的体现。

由以上可以看出,把民族主义与现代化、个人主义对立起来是多么的褊狭和武断。

四

从被简化的“启蒙与救亡”的二元对立模式来看,杨春时和朱献贞的观点都能够自圆其说,但如果跳出来看,会觉得他们的观点都非常荒谬。要论证出这样的观点,其论证过程必然要么是存在逻辑错误,要么存在概念混淆,还可能二者同时存在。仔细分析这些混淆与错误,对于我们深入了解这种简单化的二元对立模式问题是极为必要的。

鲁迅这样一个公认的现代性人物怎么会变成一

个反现代的人物呢?杨春时的推理过程是这样的:(1)因为鲁迅具有爱国与救亡的意识,所以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2)民族主义意味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也包括反对西方文化”^[4]，“民族主义必然拒斥西方文化”^[2],所以作为民族主义者的鲁迅排斥西方文化;(3)“由于中国现代性的外源性,现代化事实上等同于西化”,“反西方的话语背后,是反现代性,是对科学、民主的拒斥”^[2],所以鲁迅也反现代性。这个推理过程中哪里出了问题呢?论证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的前半段都是没有问题的。就中国近代在世界上面临的状况而言,中国要想建立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确必须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强权。但是这里论证的第二步的后半段是有问题的。反对西方列强并不意味着必然要反对西方文化。恰恰相反,为了打败敌人,学习强敌的文化是最通常的反应。验之于历史,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都是这么做的。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师夷长技”早就开始了,甲午战败后很快就掀起了留学日本的大潮,就是突出一例。就鲁迅来说,他反对帝国主义是一贯的,无论它来自西方还是东方。但他从不反对学习这些国家的文化,无论它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他明确表示过,“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14]84}。朱献贞和杨春时的文章中都举了大量鲁迅主张学习西方的言论就是证明。“西方”这个抽象的词汇,既可作为政治力量的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也可作为人类精神文明之一的西方文化,但二者虽在理论上属于不同范畴的事物,却在现实中经常被混同。但这在鲁迅那里却是判然分明的,那么第三步的推论——鲁迅反对作为西方文化产物的现代性——不用说也就不成立了。因此,杨春时上述论证的主要问题是把西方列强与西方文化二种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了。

进一步讲,杨春时同时混淆的还有“西方文化”这样一个需要细分的宏大概念。“西方文化”本来不是一个同一的实体,横向看西方包括许多种不同的文化,纵向看西方的文化也在不停地变化当中。在杨春时的论证中,这个词的含义被限定在近现代的西欧文化,并等同于现代(性)文化。按照近现代中国思想史讨论中的约定俗成,我们暂时可以接受这种“现代西方文化”的用法。但是,即使近现代的、西欧的文化,它的内部也是分成不同领域的,并且这些不同的领域还是存在紧张关系的。这种区分或称之为真、善、美的分立(康德),或称之为工具理

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哈贝马斯),或称之为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矛盾(丹尼尔·贝尔)。近现代的西方文化中,既有理性、科学、民主原则,也有对这些进行反思批判的人道原则与个人主义原则。在现实的政治经济领域,它们实行的是理性、科学、民主的原则,而在文化艺术审美领域,它们实行的却是与前者相对立的人道与个性原则。在现代西方社会中,文化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对于政治、经济领域功利理性原则的批判而定位自身的。这样其实就存在两个不同的“西方现代文化”:包括西方现代的政治文明、经济文明及文学艺术在内的广义的“西方现代文化”,以及在西方文明中作为政治、经济之对立物的文学艺术领域的“西方现代文化”。如果混用这两个字面相同而实际范围不同的概念,就会出现各种非常奇怪的推论,比如:(1)西方现代文化(文学艺术领域的“西方现代文化”)反对西方现代文化(政治经济领域的西方现代文化)。再比如,(2)西方现代文化(文学艺术领域的“西方现代文化”)不是西方现代文化(政治经济领域的西方现代文化)。或者,(3)西方现代文化(狭义的文学艺术)既是西方文化(广义的包括政治经济与文艺),又不是西方现代文化(仅仅指政治经济领域)。当杨春时把尼采的反现代性思想称为“反思现代性”^⑤时,他用的推论(1)的形式,认定尼采是反现代的现代文化。当他提到鲁迅受尼采影响而产生相似的反思现代性的思想时,他却用的是推论(2)的形式,说鲁迅的思想不是现代西方文化。综合这二种推论,可以说一种像尼采那样的反思民主主义与科学主义的思想既是西方现代文化又不是西方现代文化。像这样的论述方式足以让任何清晰的表达与理解变得不可能,同时也让任何的诡辩成为可能。鲁迅有没有反对某些西方现代文化呢?肯定有。但因此就能说他就是整体上反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吗?那可不一定。但如果你说尼采的反现代性思想是属于西方现代文化,你就不能同时否认鲁迅介绍的尼采思想也是西方现代文化。否则,这就是双重标准,就是诡辩。

杨春时混淆的第三个概念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不是单一的,它有许多不同的种类和维度^⑥。就杨春时来说,他混淆了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区别。前者指的是对民族国家的独立与富强的追求,而后者指的则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坚持与保守。二者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统一的。美国学者格里德早在1970年就指出,中国20世纪早期从五四运动而来的“是一种明确而强烈的民族主义……

对其中有些人来说,民族主义意味着中国的‘封建’的过去所带来的一切障碍都必须摧毁,对另一些人来说,它证明了重新肯定传统标准的合理性。而对他们中的几乎所有的人来说,民族主义意味着,中国必须甩掉西方帝国主义带给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包袱,重新取得一个主权国的独立”^[15]¹⁴³。这意味着中国的民族传统派与“西化派”的对立只是路径上的,其追求民族独立富强的目标是一致的。后来,汪晖也发表过几乎完全一样的观点,“实际上主张西化与坚持民族主义之间并不矛盾。一个主张西化的知识分子可能同时正是一个政治民族主义者。……在中国近代史中,主张西化,以西方的价值体系来批判自身文化传统的知识分子中的民族主义,大多为政治民族主义。它的基本前提是认同民族国家的主权,而为了维护自己国家的主权,就必须向西方学习,学习的结果是一同走向‘现代化’,也只有通过‘现代化’才能保持民族国家的利益”^[16]。只有把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混为一谈,才能推出“民族主义一定反对西方文化”或“民族主义一定保守民族文化传统”。这也就是杨春时的论证逻辑:因为鲁迅是民族主义者,所以他是保守民族文化传统的,所以他本质上是反感和排斥西方文化的。但是民族主义者就不可能是提倡现代化和西化的吗?如果区分了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我们就能看到,鲁迅就是一个反对文化民族主义的政治民族主义者。

如果说杨春时是通过混淆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区别得出鲁迅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结论,那么朱献贞则是通过把“民族主义”概念窄化、绝对化、极端化而推论出鲁迅绝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的。他的基本论证是,因为鲁迅是个坚定的西化论倡导者、世界主义者、启蒙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所以他不可能是民族主义者。但他对“民族主义”概念的用法就绝不同于周作人的用法。当周作人说留日时期鲁迅的思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义包括之”的时候,他说的“民族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在接着的后半句周作人做了举例,“如所介绍的文学亦以被压迫民族为主,俄则取其反抗压制也”^[1]¹⁸⁸。可见,同情、认同于自己的民族、追求民族解放,反抗压迫,都是周作人所认为的“民族主义”的内容。但朱献贞对鲁迅翻译被压迫民族文学的解读却恰恰得出相反的结论,他认为这是鲁迅超越民族主义或反民族主义的东西,即使“多少带有民族主义的成分,但绝对不能片面的用‘民族主义’一语来概括”^[5]。仔细看他们二人对

“民族主义”一词的用法会发现,周作人使用的“民族主义”概念是一种包容性的概念,而朱献贞的“民族主义”概念则是一种绝对的、排他的概念。至少,周作人会认为民族主义与反抗压迫是兼容的,而朱献贞则似乎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极端的保守、排外和压制个人自由的思潮。在他的两篇文章中,他认为只要鲁迅是西化的、批判传统文化的、崇尚个人自由的,鲁迅就不可能是民族主义者。

对民族主义概念的绝对化、极端化与窄化,在朱献贞辨析“民族主义色彩”“民族主义成分”与“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不同时,变得更加明显了。对于别人指称的“民族主义”内容,他论证说,虽然不成熟时期的鲁迅“带有民族主义色彩”,具有“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或者“夹杂着诸多民族主义成分”,但他和其他启蒙者一样“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爱国主义”^②，“早已脱离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窠臼”^[3]。在他看来,民族主义色彩、民族主义成分、民族国家意识,这些都不是一般的爱国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然而,如果鲁迅不是一般的爱国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那么他能不能是不一般的爱国主义或开放的民族主义者呢?作者没有直接说,而从两篇文章综合来看,他的答案是否定的。他更多表露出这样一种观念和倾向,不但鲁迅不可能是一个非狭隘的、自由开放的民族主义者,任何人都不是一个非狭隘的、自由开放的民族主义者,因为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非狭隘的、自由开放的民族主义这种东西。世界上只存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它不可能与自由、个性、反压迫、启蒙、现代化相兼容。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会用鲁迅拥护自由、个性、反压迫和启蒙主义来证明鲁迅不是民族主义者了,也不会认为以民族主义概括鲁迅就是片面的。因为任何一个事物都有很多特征,也有很多种概括方式,我们对它的描述永远不可穷尽。只要我们不说它身上只有某个东西,那么就难说这种概括是片面的。只有当他认为别人说鲁迅是民族主义者就意味着对鲁迅所追求的其他那些美好价值的排除与否认,他才会强烈反对这种说法,并认为这种说法是片面的。

朱献贞对“民族主义”的这种绝对化,十多年以后被张福贵以更明白和夸张的方式表述出来了。张福贵同样把“民族主义”与“民族精神、民族意识”概念区分开来: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是正常、有益的,然而民族主义是这二者的极端化表现;民族主义是“具有明显排他性与极端化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没有所谓‘极端的民族主义’之说,因为相对于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来说,民族主

义思想本身就是极端的,就像科学主义和科学精神之间的差异一样”^[6];“民族主义是一种具有排他性的民族至上、群体本位的大众化的民族思想体系”,“对于思想启蒙的个性主义构成了自然的集体围剿”^[6]。至此,一个本身就是狭隘、极端、绝对负面的“民族主义”概念得到了清晰表述。其实,这样一个绝对负面的“民族主义”概念不但与周作人的“民族主义”概念不同,而且与历史文献和世界主流学术界对“民族主义”的定义都很不相同。这种对常用概念的修改使他们观点的可靠性、可交流性和适用范围都受到一定限制,容易带来很多不必要的混乱。

在朱献贞这里,“民族主义”概念的绝对化与极端化是与其他概念的绝对化、极端化相伴而生的。比如在作为这场争论的导火索的“假洋鬼子”问题上,朱献贞认为“鲁迅之谓‘假洋鬼子’的‘假’,指的是‘洋’得‘假’”。假洋鬼子对民众压迫和欺凌,与封建势力勾结与妥协,为了瓜分利益而参加革命,这些反动性“无不说明‘假洋鬼子’‘洋’的‘假’,和骨子里‘中’的‘真’”,“这样的‘假洋鬼子’怎样不会令一向主张彻底西化的鲁迅‘厌恶’反感呢?”^[3]鲁迅当然是反感假洋鬼子的,但反感的是什么呢?杨春时说鲁迅反感的是西化,朱献贞则说反感的是其假装西化而实际上不够西化。我们先不说洋不洋的问题,从最直接的方面解读,假洋鬼子的恶主要表现在他趋炎附势、见风使舵、仗势欺人,也就是鲁迅一向最痛恨的“势利”上。如果说这个形象与中西文化问题有关系,那也是因为在未庄(当时中国的隐喻)的语境里,西方作为一个强势符号,有些人通过这个来趋炎附势,欺人渔利。这样看来,杨春时与朱献贞的解读都有点牵强附会和似是而非。趋炎附势、仗势欺人者哪里都有,真洋鬼子里也不少。势利的文化也是到处都有,比如近代西欧文化中的科学—物质主义与民主主义,即上文所说的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文化也是一种功利的、势利的文化,鲁迅在《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等文中对此进行了激烈批判。这些无疑都是真的和彻底的洋,鲁迅不是一样反感吗?同时这些文章里也都直接赞美或间接运用了西方的最新精神文明。他不但明确说“欧洲十九世纪之文明,其度越前古,凌驾亚东,诚不俟明察而见矣”^{[17]56},而且不断努力翻译介绍西方最新思想,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诚与爱。这样的鲁迅怎么可能仅仅因为“假洋鬼子”身上的“洋”而讨厌他?到此为止,我们能够清晰看出,由于陷入简单化的二元对立框架之中,这个由“假洋鬼子”问题所引

发的鲁迅保卫战其实从一开始就走向了与鲁迅原本思想相悖的歧途。

五、结语

对于我国新时期以来的民族主义与个人主义、民族主义与现代性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我们在承认其历史贡献的同时,也应看到它是一个需要超越与反思的思维模式。这个反思的工作在思想史研究领域早已引起普遍的关注,但是在文学领域却似乎还没有取得足够的注意。上述关于鲁迅的争论与误解,无不与这种对启蒙与救亡的二元对立模式的简单化理解相关。它们都建立在对于“民族主义”的绝对负面化理解上,与之相关的则是对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混同,对西方的本质化、绝对化理解,对西方强权与西方文化的混同,以及对西方文化的抽象化、同一化、绝对化理解。而讨论的对象鲁迅则沦为了一个被争夺的符号,被强行塞入预定的二元对立解释框架中。

但是鲁迅思想本身恰恰是拒绝这种简单化视角的。新时期以来我们在鲁迅研究方面引入的诸多新视野,也都正是建立在对这种简单化视角的突破与超越之上的。如伊藤虎丸认为,鲁迅面对肤浅的全盘欧化观点及其对立的国粹主义观点,“一方面把这两者的对立……予以同时否定;另一方面他也提出……真正的近代化和真正的国粹的一致性”^[18]。“鲁迅的‘个人主义(即西化主义)’和‘民族主义’,实际上,在同一个主体性思想上是彼此连接着的。”^[19]木山英雄指出鲁迅早已超出了国粹与欧化的皮相对立^[20]。钱理群认为,鲁迅是以立人为中心,两面作战,既反中国传统专制病,也反西方现代病^[21]。汪晖则说,“鲁迅既反传统,又在传统之中;既倡导西方的价值,又对西方的野心保持警惕”,鲁迅是“在”而“不属于”,是天然的孤独者与反叛者^[22]。王富仁认为,鲁迅的个人主义同时具有启蒙主义、民族主义、世界主义的性质,内部有着同构性质的关系模式^[23]。

因此,在鲁迅研究领域,我们看到的是简单化二元对立模式与超越这种模式的二种观点之间有些奇怪的共存。反思与突破早已开始,但是却并没有对旧思维模式中的问题形成足够的冲击与清理。我想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启蒙与救亡的二元对立作为一种思想模式,它是无处不在的,但又是抽象和无形的,因此很不容易直接把握。但杨春时与朱献贞(还有张福贵)的这个争论则以非常直接、夸张和典型的方式把这个思维模式的框架和局限彻底地暴露

了出来,因此仔细分析这个争论对于文学界反思与超越启蒙与救亡的简单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具有特殊的价值。由于这种简单化思维模式不仅存在于鲁迅研究领域,更是存在于现当代文学/文化研究中的普遍性问题,因此对这个案例的分析、反思的意义便远远超过鲁迅研究的范围。过去和现在的观点与研究方法,哪些是在简单化的二元对立思维中运作的?它们的具体论证中到底在哪些地方犯了错误?如何在继承启蒙精神的同时超越对“启蒙与救亡”的简单、僵化理解?沿着这个思路,学界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注释:

- ①参见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收入《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1-36页。
- ②参见秦晖:《新文化运动的主调及所谓被“压倒”问题(上)》,《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9期,第72-81页;秦晖:《新文化运动的主调及所谓被“压倒”问题(下)》,《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10期,第74-82页。
- ③参见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
- ④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中文版译者吴叡人在正文之前作的导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10页。
- ⑤这里的“反思”不是一个动词,而是一个形容词,用以表示“反思现代性”其实是现代性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 ⑥参见贺玉高,《民族主义分类与后殖民论争》,《中州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 ⑦朱献贞列举陈独秀与胡适的例子,指出他们反对传统爱国主义的狭隘,即那种只要求个体为国家民族作牺牲而忽视个人权利自由的偏枯道德。由此可知他所说的“一般的爱国主义”的意思。

参考文献:

- [1]周作人. 瓜豆集[M].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 [2]杨春时. 中国现代性的四个陷阱[J]. 粤海风,2004(3): 4-6.
- [3]朱献贞. 鲁迅“厌恶西化”吗:谈鲁迅的“西化观”兼与杨春时先生商榷[J]. 粤海风,2005(1):53-57.
- [4]杨春时. 鲁迅的民族主义情结及其思想历程:兼答朱献贞先生的批评[J]. 粤海风,2005(4):53-56.
- [5]朱献贞. 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此消彼长:鲁迅早期思想略论[J]. 继续教育研究,2005(6):131-133.
- [6]张福贵. 鲁迅思想的民族主义迷雾[J]. 探索与争鸣,2016(7):103-105.
- [7]乔纳森·卡勒. 文学理论入门[M]. 李平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 [8] 安东尼·史密斯. 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M]. 叶江,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 [9] 迈克尔·赫克特. 遏制民族主义[M]. 韩召颖,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 [10] 姚大力. 变化中的国家认同[M]. 原道,2010(1):126-148.
- [11] 里亚·格林菲尔德. 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M]. 王春华,等译. 上海:三联书店,2010.
- [12] 以赛亚·柏林. 反潮流[M]. 冯克利,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 [13] 吉尔·德拉诺瓦. 民族与民族主义:理论基础与历史经验[M]. 郑文彬,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5.
- [14] 鲁迅.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M]//鲁迅全集:第6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15] 格里德. 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M]. 鲁奇,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
- [16] 汪晖. 文化批判理论与当代中国民族主义问题[J]. 战略与管理,1994(4):17-20.
- [17] 鲁迅. 文化偏至论[M]//鲁迅全集:第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18] 伊藤虎丸,松永正义. 明治三十年代文学与鲁迅:以民族主义为中心[J]. 河北大学学报,1982(2):82-93.
- [19] 伊藤虎丸. 鲁迅早期的尼采观与明治文学[J]. 文学评论,1990(1):135-147.
- [20] 木山英雄. 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M]. 赵京华,编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21] 钱理群. 以“立人”为中心:鲁迅思想与文学的逻辑起点(上)[J]. 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3(1):1-7.
- [22] 汪晖. 论鲁迅的文化心理结构:对五四以来知识者心理模式的分析[J]. 学术月刊,1989(5):1-10.
- [23] 王富仁. 时间·空间·人(三):鲁迅哲学思想刍议之一章[J]. 鲁迅研究月刊,2000(3):5-16.

(责任编辑 刘海燕)

Go Beyond the “Enlightenment vs National Salvation”: from a Debate on Whether Lu Xun Was a Nationalist

HE Yugao¹, NIU Xuyang²

(1.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China;

2.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there was a debate about whether Lu Xun was a nationalist. Although the two sides hold diametrically opposed views on this issue, they share the same ideological basis, which is the binary opposition framework of nationalism versus individualism, China versus the West and tradition versus modernity. Whether one affirm or deny that Lu Xun was a nationalist, this framework leads to the absolute and simplified understanding and use of the concepts of “the West”, “Western culture”, “Modernity”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eemingly reasonable arguments of both sides. Since the 1980s, the blind spots brought by the binary opposition of “enlightenment and national salvation” have been exposed in this debate. The research circles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already surpassed the dualistic thinking mode, and the major achievements of Lu Xun’s research circles are also based on this breakthrough. However, this debate and its subsequent repercussions show that its influence is still strong. The research circles of modern literature need to continue to reflect deeply on the basic thinking framework of this binary opposition, and go beyond it at last.

Key words: Lu Xun; nationalism; enlightenment and national salvation; binary opposition

梦幻叙事之精神探秘

——以张鲜明《信使的咒语》等为例

方向真

(自由撰稿人,上海 200092)

摘要:张鲜明《信使的咒语》以99个梦幻场景,打开了一个神秘的潜意识世界。梦中的“我”是作家主体分裂出的另一个不戴社会面具的人,“我”经历的惶然、被追赶的惊悚等一系列戏剧化场景——危险而美妙的游戏,拓展了人的意识边界与语言叙述的向度。张鲜明梦幻叙事背后的文化谱系及文本生成机制源自其独特的文化基因——豫西南豫鄂山区地缘文化的气脉、父母的遗传,以及他的语言的自觉。他的梦幻叙事具有独特的文学原创性。

关键词:梦幻叙事;潜意识;《信使的咒语》;《寐语》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4.01.003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4)01-0019-06

梦幻叙事在中外文学作品中并不陌生,我们皆知的如卡夫卡的《变形记》和中国当代作家残雪的一系列作品,但我们对此还缺少深入的专题研究。河南诗人、散文家、“幻象摄影”者张鲜明,在其叙事体《信使的咒语》一书中,记录了几十年来的梦境,可谓典型的“梦幻叙事”。正如评论家耿占春在《〈信使的咒语〉:梦、神话与精神分析》一文里指出的:“《信使的咒语》就是一个梦的博物馆,一个梦境的长廊,这些梦幻叙事和神话一样,为一切不可言说之物提供了一种话语,并揭示着已经失去或暂时隐匿的‘世界的本质与秩序’。”^[1]在此文里,耿占春为“梦幻叙事”做出了恰切概述,梦幻叙事“意味着置身于意识与潜意识之间,非语言与语言之间,无意义与意义之间,不可理喻之事与隐喻符号之间。梦幻叙事是对可记录的身体——潜意识的一种虚构,又是对虚构体验的一种真实记录”^[1]。

进入《信使的咒语》的梦幻场景,就如同进入陌生世界里一个接一个危险的游戏。那是深藏于内心深处的晦暗领域,让梦、无意识或潜意识获得了文学性及其修辞形式。

一、危险的游戏:潜意识世界的孤身历险

人类潜意识的梦境,隐藏着无限的可展开情景、意象和隐喻,折射出被意识忽略了的丰富驳杂的潜意识世界。阐释梦境,是人类探察内心世界的方式之一。

我们翻阅一下文学里的梦境——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借梦来讽喻现实;卡夫卡以梦来隐喻生存的荒诞;博尔赫斯设置梦一般的叙事迷宫;卡尔维诺笔下的人物在不尽如人意的城市里做着白日梦;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则以亦梦亦幻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的讲述,呈现出拉丁美洲一个世纪以来光怪陆离的历史;残雪潜入意识的暗河,她笔下阴郁的情境里处处是猜忌的气息和暗算的危机,她的梦与现实没有边界……

梦,已成为文学创作永远不会枯竭的矿藏。

梦——人类的潜意识暗河,随着外部世界的变迁而呈现着不同的形态和声音,被不同时代、不同作家赋予独特的形态与意义,梦的暗河折射着人类精神的流变及难以界定的种种可能。愈是现代,文学艺术与梦愈是难解难分——梦幻、荒诞、意识流、蒙

收稿日期:2023-11-20

作者简介:方向真(1957—),女,河南南阳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现居上海,自由撰稿人,主要从事当代文学及外国文学研究。

太奇等,在文学或影视作品中时频频出现。当代发展迅速的人类科技、生物学、医学、精神科学等,还将研究发现梦的新形态、新价值,从人的内部机制来探察人性的复杂及意识的边界。

张鲜明《信使的咒语》及之前出版的《寐语》,皆为梦的纪录。诗人张鲜明做梦之持久、频繁远远超乎常人,他告诉笔者,做梦成了他的习惯——从童年做到成年,梦伴随着他的文学创作而生长。

张鲜明梦幻叙事的主角——“我”,这个天真的成年漫游者——冥冥之中被抛入无意识暗河的孤独者,其所经历的都有着不测的危险,他的梦有情节,有场景,有戏剧效应。“我”的一幕幕离奇游历,令读者仿佛置身于正在上演的一幕幕神秘剧情里,比如梦《苦——啊!》^{[2]45-46}:

我坐在一片麦田边上,麦田里的麦秆一根根高大粗壮如参天大树,却依然是麦子,密密麻麻的,一片金黄……我来到这里是為了躲避什么,也可能是在与人玩捉迷藏,反正是很紧张……

突然,眼前出现了一个人。没有看清这人的长相,只看见他的身影……既然有人发现了我,我继续躲藏下去就是一种耻辱,我必须离开。

麦秆是那样的密,麦田无边无际,没有路,也无法辨认方向,加上我穿着长长的戏装,根本无法正常行走。怎么办?呃,有了,我可以像仰泳那样,从麦子的上方飞出去……

既然我穿着戏装,那就应该来一句道白。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用力地吐出来:“苦——啊!”

背朝大地,面向天空,四野茫茫,我看见我的这句道白在空旷的天空下像一片白雾慢慢地飘散开去。……

四周是无边的空虚,我不知道自己置身何处;但我知道,在这个地方,为了不坠落在地,就必须不停地呼叫。我一声接一声地念着道白:

“苦——啊!”

“苦——啊!”

再比如梦《楼的惊变》^{[3]46}:“我”看见一个平躺着的大楼,像是唱片。一个圈是一个楼层。突然它不甘于此,它要站竖起来试下自我价值。它竖起来变成笛子,大楼里的人们紧紧吸着笛子的内壁。“我困在里面,怎么出去呢?”“我”想变,变成尘埃、

蚂蚁,变成音符才能逃出去。对死亡的恐惧令“我”急忙使尽浑身解数变戏法般地逃生。

梦中“我”的奇幻动作、奇幻场景及特有的童年视角,使张鲜明的梦境更纯粹,更有趣,也更神秘。读者在陌生的惊悚的阅读历险中,竟不乏温暖、愉悦之感,如同置身于危险而又美妙的游戏。

也正是“我”的童年视角,张鲜明的梦里不见暴烈肃杀的戾气,不见社会生活中的模式套路,也不见意识形态教化而来的成见。梦中的漫游者“我”,是不戴面具、满怀好奇的大孩子。

梦世界里这个“我”究竟是谁?是《信使的咒语》的作者——从事媒体工作的记者、作家张鲜明的替身或影子;是自我的第三只眼——探察直觉、潜意识的探测器;是先民与自我的重合,是儿童的我与现在的我的重合……

在这个梦的世界里,“我”是游历者、观察者、表演者、讲述者、逃离者,是被冥冥之手抛入这个既虚幻又真切的陌生世界里的人。“我”始终在游走,游走在一幕又一幕的旷野、山间、院场、断墙边、昏暗的屋子等,莫名地介入诸般人事。“我”成了一个半隐身的人——无人交流的、没有观众的漫游者,虽然身边风、草、大地、树木、家具等都是感觉有灵性的。

张鲜明笔下的梦,是纯粹的梦,无限流动的梦,没有入口和出口。

这让我想起了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那个持矛不停冲撞的骑士——世界文学史上不衰的形象。堂吉诃德这个人物形象的价值,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会被重新估量。比如,最后的骑士——骑士文学的挽歌;行动的理想主义者等。如把他与《信使的咒语》里的“我”并置,发现他们皆有性情的天真,在社会化进程中人类逐渐被遮蔽或失去的“童性”,在他们这里存在着。

在理性退场的梦幻叙事里,赤裸的人性在童心的状态下无忌展现,无论是悲伤、良善、美好,还是令人羞愧的自私与施虐。《信使的咒语》和《寐语》中各种场景里的“我”,都是这么一个孩子般的成年人,他独自在梦幻世界里历险,走着,看着,听着,逃奔着,与各种人事交集着、冲突着。他用自己的肢体和感官去触碰周遭,来探察陌生的世界。在这里,梦呈现的是现象本身,你无须牵强寻找与现实的对应。如果执意去寻找张鲜明梦幻叙事的隐喻,是否可以这样解读:“我”的危险游戏,隐喻着尚未进入规训性的人类潜意识;隐喻着人类潜意识的神秘与自由;隐喻着人类认识和探索的永无尽头。

二、鲜明之幻：梦世界的生成及想象力的谱系

梦之于张鲜明，仿佛是他存在的一个证明。成年后的他仍无休止地做梦，并且他回忆梦、记录梦、追寻梦，使梦成为诗学的自觉。不知不觉地，与他如影相随了几十年的梦，蓦地生长成了一个自在自为的魔幻世界！与日常现实世界并存。

与《信使的咒语》同时，作家出版社重点推出的还有他的诗集《暗风景》，摄影诗集《幻游记》，三本书的封面都标上了的“鲜明之幻”——“梦幻叙事”“魔幻诗歌”“幻象摄影”——张鲜明梦幻、灵幻风格的精准提示，精神图式的独特呈现。“幻”，显然是张鲜明给自己的标识性定位，是进入其文本的玄牝之门。

那么，张鲜明的梦幻叙事有着何样的精神图式？其“图式”背后有着怎样的文化谱系？其梦幻叙事又是怎样的生成机制？

张鲜明出生在离神农架不远的鄂西山区，他家对面有一棵巨大的银杏树，树荫遮蔽着整个广场，树的肚子通向一个很深的地方，那里生长着几十条碗口粗的长着红冠子的蟒蛇。大树旁边住着一家戴姓人家。他听爷爷说，蟒蛇叫一声，这家就要死一个男丁。他的家族故事也弥漫着巫意和神话的色彩。老祖宗讲，家族救过一个狐狸精家族，事后按照狐狸精——白胡子老者的指示，在一个老树桩下面挖掘到一块大青石，青石下有砚台和药方。自此，家族人皆喜读书，出了文人和名医。

张鲜明的父亲爱做梦，还写诗填词记录梦，日常里他还总用编织的幻象打消一家人的愁苦，父亲为家人描绘的生活蓝图总使绝望拐弯。张鲜明记得小时候过春节他家没有钱买鞭炮，他拽着父亲闹，父亲说：“孩儿，等你长大工作挣钱了，咱家就在新盖的三层楼顶弄一个长长的竹竿放炮，连着放它三天！”^[4]平日里很乐观的父亲，还有着纤敏的感觉。张鲜明记得儿时父亲描述某年大批人饿死之后的场景：那一天他进了浙川县城，到县城西关的大码头，白日里大太阳出着竟然乌云滚滚，冤魂们的瘴气雾一样飘荡，丹江河滩上的沙洲上空瞬间暗黑，父亲的头发梢都竖起来了，像进到了地狱……

张鲜明的母亲爱听戏，还会讲故事。在农村的地头，母亲常给妇女们唱歌唱戏。娘家曾住县城剧院隔壁的母亲，给张鲜明讲过许多戏曲故事，而且母亲也讲梦。有一次母亲说，她饿死的五岁女儿给她托了个梦：妈，我变成了虫翼，不吃麦子只吃草籽，我看见麦子了就给你叼回来……

儿时的张鲜明，每当遭遇饥饿、打击、恐惧的时候就想，这要是梦就好了——早上睁开眼就没有了。饥饿难耐时，他望着天上飞的鸟对母亲说：“妈，它们要是掉下来多好，我们就能吃饱了。”^[4]他时而做白日梦。正如安徒生《卖火柴的小女孩》里在墙角擦亮一根又一根火柴、寻找火光中温暖幻象的小女孩，又如莫言《透明的红萝卜》里那个独自疯狂地拔出一个又一个红萝卜、被人视为哑巴的瘦弱小黑孩（有一天小黑孩又被大人羞辱后，他趴在地里将拔出的红萝卜一个个对着太阳照，想找回之前他发现的美好瞬间——胡萝卜须须上金色的光）。在张鲜明的梦里，童性思维的光芒随处可见。

梦，不期然地成了童年屡遭苦难的张鲜明的精神救赎。梦演示的诸般荒凉、惊恐、逃离、失落、不知所措的场景，成了他释放被压抑情绪的潜意识出口，他因梦得以超越饥饿、流浪和父兄曾被关押的恐惧，超越残暴的血腥与人格侮辱。如五岁那年夏天，他听到镇上开会的人说，如果资本主义复辟，就要人头落地。要在某月某日，将某某出身的人们被赶到山上砍头，用他们的血染红雪山的山头。他赶快跑回家告诉父母，父母说他胡言乱语。他不敢再说话，晚上早早躲进被窝。那天夜里他梦见自己被人反绑着跟大人一起来到东边的山上。山上一个个被砍掉的脑袋像南瓜一样成堆扔在地上，露出白花花的骨头……第二天一早，他发高烧说胡话，父母叫来邻居堂奶奶为他叫魂。他还想象把眼下的苦难变成梦，在某天醒来就消失了。

梦抚平了他童年、少年不堪承受的身心创伤。然而，不是所有的苦难经历者都能为自己找到释放的出口，从这个意义上讲，张鲜明又是苦难中的幸运儿，因为有梦，他活过了不堪的年月；因为梦幻叙事，早年的痛苦得以艺术的升华。

是否可以说，张鲜明独特的文化基因——地缘文化的影响及来自父母的遗传基因，构成他精神图式最初的底色。

对张鲜明笔下纷繁奇幻的梦，我们能做出怎样的解读？让我们跟随叙事者“我”，进入作者的梦幻空间——

我看到——其实是感觉到——有一些东西出现在地平线上，它们在行走。这些东西从形状上看，就特别像是河滩里的鹅卵石，它们正在努力地成为某种意象，从而让自己成为诗歌。

——《就像一只兴奋的跳蚤》^{[2]177}

我骑在一个木梁上往下看。这是一个

幽暗的空间,空间里出现了一张虚拟的纸张。这种纸张比这个世界上最薄的纸还要薄,是透明的,接近于虚无,上面记录着我的梦……

一个女人出现在现场……没想到,她的眼珠竟然可以像蟾蜍的舌头那样猛烈地弹出,又闪电般缩回。随着她眼珠伸伸缩缩,承载着我的梦的那些蓝色纸张上出现了一个一个的洞孔,一些汉字从那洞孔里滴滴答答往外流……

——《盗梦》^{[3]175-176}

作家在叙事中通常都有一个分裂的自我。写作者的张鲜明清醒地认知到他的两个我:一个是记者的我,采访、组稿、策划、热情满怀地做事情,谈笑风生轻松自如地处理问题;另一个是摘下社会面具不再模仿大众的我,待晚上回到住处,那个为生存而展现的与内心意念相违的我,就回归到真实的我,如同归窝的老鼠安然于自己的洞穴。他说:“我心里有个按钮,按下键,就屏蔽了尘世的世界。虽然有时候也还止不住流露出分裂的迹象,领导不计较,同事们也包容我。”

由内心的自我驱动,张鲜明将他的梦一一回忆并记录下来。某一天,他打开电脑里的一个文件夹,啥时候记录了这么多的梦,自己读来也觉得陌生,“是我记录的吗?”当他把几十年来梦的记录呈现出来,读的人皆感动于心。《信使的咒语》每个梦里那一次性乍现的灵光,让人情不自禁地用怀疑的目光审视自以为是的日常经验。如果将《信使的咒语》交付于精神分析的释梦与民间巫术传统的释梦,将会显得迂腐和滑稽。虽然张鲜明的梦世界里存在着上述释梦对应的元素,比如可用于精神分析解释的梦——作者早年缺乏安全感的惶恐记忆的折射,梦里的集体无意识,梦里隐现的楚文化巫传统元素(作者儿时受到巫韵的浸染),某个梦里偶尔可析的隐喻。但是,上述从精神机制的研究与治疗的分析阐释及出于生存的实用功利的释梦,都轻贱了梦,使梦变得生硬而失却梦的自在可爱,尤其是对于张鲜明的梦。

《寐语》《信使的咒语》的情节、意象、心性多元地呈现出诗的元素。诗怎么能简化,怎么能还原呢?诗与梦的叙写,都体现出对直觉的赋形能力,相对于诗的知性直觉,梦处于原始混沌的感知。但作为诗人的张鲜明,他的寻梦、记录梦的自觉已经与诗创作一起,融于他的精神构建。他天性敏感,对心灵事物至今怀着如初的好奇及探索的热情,笔者在世纪初

曾被他的诗歌里潜在的灵异气象触动,暗自断定他的创作将会独秀于文学之林,至今还记得他的《疯蝴蝶》^{[5]80-81}:

这疯蝴蝶
一定是从她的梦中飞出来的
要不然,怎么会
如此不要命地,如此精准地
扑向我

这是她一贯的做派——
当年,她一脚踢开
一排排酸枣刺似的睫毛
把玉米棵和狗尾巴草
搓成翅膀
驮着我
飞起来
是的,我能认出来——
这疯蝴蝶是从她眼里飞来的
……

没想到,大半辈子了
你竟然背负着村庄
像秦香莲那样
一路追来

我的疯蝴蝶啊
你扇动翅膀
我汹涌如海

人的内心——一个充满无限能量的内宇宙,那潜运着的能量聚集、生成,你无法预测它何时突现瞠目的奇观。虽然二十年前我已发现了张鲜明诗中独有的意象——朴野灵奇的意象。那时我不知他有这么多的梦——他元意象的丰厚储备,更未料到二十年后作家出版社重点推出他的梦幻系列三部曲!这梦幻三部曲会聚的奇幻意象,构成了壮观的魔幻景观。

三、语言的自觉:文学叙事的原创性拓展

精神图式如何变得更丰富,更具吸纳力,更具形而上的美感?这需要作家具备深厚的诗学积淀。首先体现在作家生命体验的深刻性和彻底性,这来自命运,更来自体验的自觉,即是否能进入生命意识的“新大陆”。笔者曾在《黑暗的大陆——探秘埃尔弗丽德·耶利内克的世界》一文里谈道:“新大陆往往从痛苦和恐怖开始。那些原创性的大师都经历了他

们各自征途的痛苦——恐惧、恶心、虚无、孤独……心态不一，形态各异，本质却是一致的——痛苦。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尼采、荷尔德林、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萨特、鲁迅等大师都伴随着相近的体验——从痛苦中超拔出来的冲动……许多人在这探险的途中被甩下。更多的人根本看不到这片神秘的大陆，或者不愿意深入这条陌生、恐怖的地带，他们满足于已经熟识的世界。这神秘大陆的探险之路属于极少数渴望走进精神深处的人——这里通向人的意识的暗河，验证着心灵的原始力量。”^{[6]10}

张鲜明对梦的情有独钟，使他冲破了精神分析释梦的模式，他以梦自身的形态，构建起梦的诗学。汉字的象形、会意特性，使汉语成为最理想的诗的文字，自然也是最理想的描绘梦的文字。21世纪文学的梦幻叙事，从张鲜明这里开启一个新的旅程，且为梦的诗学赢得尊严。

较之于记了134个梦的更自然、纯然状态的《寐语》，《信使的咒语》在文体上有了自觉的提升。记梦的文体，成就了张鲜明的梦幻叙事——独标的语言、结构和修辞。

张鲜明将他《信使的咒语》与《寐语》称为“梦幻叙事”，有人将它们当小说读，有人视它们为散文，更有读者认为它们就是诗。属于什么文体，已经不重要了，跨文体写作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文体边界的模糊显示着创作意念及方式的扩展。

与《信使的咒语》同时出版的摄影诗歌集——《幻游记》，张鲜明自称为“幻象摄影”，他别出心裁将作品划分成三个单元——地界、天界、灵界，其镜头里的“幻”来自他的意念与他镜头里景象偶遇的刹那。镜头里的日月风雷山川花木，时而透迤，时而装帧般成为梦中的奇幻。与摄影平分秋色的是他的短诗——以梦幻来重构家族故事。地界、天界包孕着自然万象，而灵界是超验的不期而至的灵魂渴望的居所。灵界之维——天才作家与一般作家的分水岭（小说家里，曹雪芹、鲁迅、陀思妥耶夫斯基、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卡夫卡、莫言、残雪等属前者；诗人里，杜甫、李商隐、歌德、荷尔德林、里尔克等，属前者）。

张鲜明之所以为三部曲冠之以“幻”——“梦幻叙事”“魔幻诗歌”“幻象摄影”，显然他是以日常现实里的文化人和作家的我，给自己的标识性定位，它们是“鲜明之幻”的玄牝之门。

《信使的咒语》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现实经验与思维无法应对、无法解释的世界。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做过梦，并不断有新的梦呈现。但是，如此庞大

的没有入口与出口的纯粹的梦世界，恐怕很少见。接下来，我们看看《信使的咒语》里梦世界的内核——梦世界的魅力所在，价值所在。

“鲜明之幻”抓取了稍纵即逝的意识核心、直觉核心的一刹那，让它定格。他笔下的、镜头里的景象对于尘世惯常的看，是幻象；对于打开了天眼的看，是本真的直觉呈现。它们连接着作者的直觉，也昭示着自然的真谛——自在自为、遗世而立，张鲜明在与它们的守望中穿透凡尘的雾障，进入大化之境。

如同张鲜明儿时的梦化解了他童年不堪的饥饿与所受的羞辱，当今人类若要安置自己的心灵，也必得再造一个尘世之外的世界——精神的世界，这包括梦。张鲜明在《寐语》后记里写道：“在梦中，我的灵魂经常脱离肉体，以旁观者的态度看着我的肉身，在虚拟的空间里单独行动，就像在看电影；在梦中，‘我’总是在逃跑，我知道，是我小时候被吓掉的魂儿在逃跑、在惶恐、在悲伤。”当今，现代人如何在艺术中获得自我救赎？梦幻叙事或许为人们提示了一个精神出口。

作家与评论家们皆注意到了张鲜明梦幻叙事重要的文学价值。敬文东发现，因为记录梦，“叙事的语言居然改变了身段”^[7]；耿占春指出：“无论如何理解张鲜明的写作，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梦幻叙事通过神话思维及其他所打开的感知与想象视野，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一种异质性话语。”^[1]

在此之外，笔者试从张鲜明梦幻语言的生成机制来探讨其语言的个性特点。文学语言，或任何创造性的语言，都全息呈现着人的身心状貌、智识、精神图式、审美价值及终极取向。这里借用康德的“图式”——人心灵深处的一种精神结构，来探察、描述张鲜明所独有的心灵图式。显然这也是一场有趣的精神分析，但非弗洛伊德式的解析。

张鲜明是幸运的，父母的才情及苦难中的达观植入了他的根性，懵懂未开时民间文化的滋养，几十年经典作品的阅读，几十年不间断的诗歌写作——语言的文学性、根本性的训练，使他从本然的表达走向了自在自为的语言王国。他的幸运既是先天所得，更来自他语言的自觉及悟性。他说出这样的感悟：语言要与语境相吻合，要不伤对象（题材）本身；要让技术不再成为障碍。

如何感受语境、进入语境？语境是已有的存在，还是人为的创设？想来，语境应该是作者与所选取的对象、题材间可能的互为达成。语境——显在或潜在的情境，心理的某种推手，一种气场，一种可能性的张力，等等。一旦具备了这种对感官、意念、在

场的全息觉察,训练有素的语言就会在语境里脱颖而出,一如春天大地回春,一如夏夜的繁星。张鲜明写道:“关注大自然的四季、生死的轮回,觉得特别奇妙。进入了无意识放松状态,会觉得以前的小哲理小发现太小儿科了。”人的心境、格局乃创作之道。抵达大道之境的张鲜明,令笔下惊悚、奇瑰、纯粹的梦散放着迷人的气息与光泽——即便是危险的气息,即便是幽深的光。你会不禁感叹:这些不重样的纷繁奇幻的梦,要怎样的魔力来制造?

创作到一定境界会呈现出人格的力量。浮躁矫情的人难以写出具有深刻洞察力的文字;过于计较得失的人,其文字通常失之于狭隘;过于虚荣,会导致视野的雾障……与梦有着不解之缘的诗人张鲜明说:“我的文学使命就是我的梦幻叙事。”

张鲜明天地灵的格局与他诗人的气质,使他的梦幻叙事呈现出整体的隐喻性。他的具有现象学意义的梦幻叙事,成功地启示写作者怎样自觉地调动意识能量,尤其是被忽略的潜意识能量;怎样让语言

展现不曾有过的精神现实、灵魂现实。《信使的咒语》——危险而美妙的游戏——其迷人的文学原创性,拓展了人类的意识边界与语言叙述的新向度。也许,21世纪与智能时代的虚拟现实交相辉映的,会是与人类科技发展同步的、不断拓展的意识景观。

参考文献:

- [1] 耿占春.《信使的咒语》:梦、神话与精神分析写作[EB/OL]. 中国诗歌网,2023-04-15.
- [2] 张鲜明. 信使的咒语[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21.
- [3] 张鲜明. 寐语[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7.
- [4] 张鲜明. 幻游记[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7.
- [5] 张鲜明. 暗风景[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21.
- [6] 方向真. 她们的自由历险[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 [7] 敬文东. 梦幻叙事的诗学效果[N]. 文艺报,2022-04-01(6).

(责任编辑 刘海燕)

Exploration of the Spirit of Fantasy Narrative

— Taking Zhang Mingming's *The Messenger's Spell* as an Example

FANG Xiangzhen

(Free-lance Writer, Shanghai 200029, China)

Abstract: Zhang Mingming's *The Messenger's Spell* presents a mysterious subconscious world through 99 dream scenes. The dreamer is portrayed as a person who does not wear a social mask and is separated from the writer's main body. The dreamer experiences a series of dramatic scenes, such as being chased with feelings of panic and horror. These scenes expand the boundaries of human consciousness and the dimensions of language narration, offering a thrilling and thought-provoking journey. Zhang's dream narration is undoubtedly influenced by his cultural background, which encompasses the geographical culture of the Mountain area in southwest Henan, his parents' inheritance, and his language consciousness. His dream narrative is a testament to his unique perspective and literary originality.

Key words: fantasy narrative; subconscious; *The Messenger's Spell*; Dream scene

数字普惠金融减缓城乡差距的效应研究

——基于中部六省的经验分析

赵健¹, 卓奇昕²

(1. 河南工程学院 经济贸易学院, 河南 郑州 451191; 2. 香港城市大学 商学院, 香港 999077)

摘要:数字普惠金融借助数字技术,在缩小城乡差距中发挥了不同于传统金融的重要作用。以2011—2021年中部六省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差距的现状其特征,通过构建两者间计量模型,定量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减缓城乡差距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减缓城乡差距存在显著的积极作用,呈倒“U”形规律,目前已过拐点;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减缓城乡差距的效应是显著的,但使用深度却不显著;产业结构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城镇化水平和政府财政支出能有效减缓城乡差距。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从改善数字环境、优化产业结构、创新财政工具、提升农民创业能力等方面提出了进一步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减缓城乡差距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减缓;城乡差距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4.01.004

中图分类号:F832.0;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4)01-0025-09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城乡差距则是不平衡的主要表现。农为邦本,本固邦宁,“三农”问题始终是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更是紧紧围绕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问题,出台和实施了一系列利民惠民政策,不断缩小城乡差异、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我国长期以来优先发展城市的政策导向,导致城乡二元结构未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现阶段城乡差距依旧存在。2022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9283元,同比增长3.9%,同一时期,农村居民相应数据分别为20133元和6.3%。从统计数据上看,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较大,但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依然很明显。

城乡差距过大会造成社会公平缺失,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影响人民群众生活的幸福感。因此,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经济利益的合理分配、缩小城乡差距、优化居民收入结构,是我国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

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的结合,推动了数字普惠金融的产生和发展。与传统普惠金融相比,数字普惠金融从可获得性、成本控制等方面进一步凸显传统金融服务的“普”和“惠”特征,使社会更多群体能够获得全面、完善的金融服务,有效增加农村地区金融供给,持续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与农业产值,增加农户收入和农户消费能力,进而缩小城乡差距。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格局重塑重要组成部分的中部六省,自2004年提出“中部崛起”政策后,凭借良好的区位优势、丰富的内陆资源和较低的生活成本,在经济

收稿日期:2023-12-18

基金项目:2020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重大项目“精准扶贫视阈下河南省普惠金融的供求机理、耦合效应与绩效评估研究”(2020-YYZD-09);2020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河南省普惠金融发展的绩效评价及模式创新研究”(2020BJJ048)

作者简介:赵健(1977—),女,河南新野人,经济学博士,河南工程学院经济贸易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普惠金融与农村金融。

和人口方面迅速崛起,对国家整体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应看到中部六省城乡差距依旧不容忽视,以中部河南为例,2022 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38484 元和 18697 元^①,前者是后者的 2.058 倍。因此,剖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影响效应,探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路径,可进一步提升金融对减缓城乡差距的力量,这对发挥中部六省对我国经济的重要引擎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作为普惠金融的数字化延伸和智能化拓展,数字普惠金融从实践意义上拓宽金融触及范围、延伸金融包容性内涵、降低金融服务成本。自 2016 年杭州 G20 峰会上首次提出数字普惠金融概念以后,数字普惠金融成为金融创新的热点,有关研究成果不断丰富。部分成果集中在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价值和比较优势上,但更多成果从实证角度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实践效应,其中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一)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影响

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差距的研究中,一部分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可有效缓解城乡差距。数字普惠金融是普惠金融以数字技术为服务手段,有效降低传统金融对金融服务需求的限制,大大缓解金融排斥和金融抑制,将更多弱势群体纳入正规金融服务范围内,对增加农户收入、缓解农村贫困发挥了重要作用。Isaac Koomson、Renato A. Villano、David Hadley^[1]利用 2016—2017 年第七轮加纳生活水平调查数据,研究了普惠金融对家庭当前贫困和未来贫困的影响。研究认为普惠金融将使一个家庭当前贫穷的可能性下降 27%,未来贫困的可能性降低 28%。Fan Liu、Barnabé Walheer^[2]认为普惠金融是促进家庭收入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工具之一,并基于访问、可用性和使用三个维度提出了测度数字普惠金融的量化指标。周利等^[3]利用分位数回归的 MM 分解方法,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减缓作用,且低分位点处其边际效应更大。田瑶、郭立宏^[4]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群体提供增收的边际动力更为有效,因此有利于优化分配,有效减缓城乡差距。邓金钱、张娜^[5]也得到类似结论。

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影响效应是不确定的,甚至会加大城乡收入差距。杨怡等^[6]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向农村地区和农业生产领域下沉,可为农户生产、创业和子女教育提供资

金支持,增加农户收入。但数字普惠金融同样也会惠及城镇居民,提高城镇居民收入,因此数字普惠金融是扩大还是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中各自获取的收益。李牧辰等^[7]利用 2011—2017 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认为因为数字技术门槛等原因,数字普惠金融中的数字化程度加大了城乡差异。陈熹、徐蕾^[8]认为低收入水平的居民从数字普惠金融中获得的收益远远低于高收入水平居民,因此数字普惠金融拉大了城乡差距。一方面是因为农村金融快速发展会导致农村居民资金外流,一定程度上抑制农户收入;另一方面,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整体偏低,获取数字资源的能力有限,难以享受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红利。

还有一部分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影响存在非线性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影响,都是源于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及金融资源分配的均衡程度而导致的。金融集聚初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金融业和科技水平不发达,金融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比较小,无法形成规模经济,城乡间金融资源分配差距不大。随着生产力的不断积累,经济发展水平提升,金融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比增加,科技进步推动金融资源向城市集聚,金融集聚进入发展阶段,城乡间金融资源分配不均衡日益加大,城乡收入差距凸显。金融集聚后期,随着科技水平的持续成熟,更多资本投入工业的扩大再生产中,在资本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的不断作用下,金融资源集聚程度达到最大。在溢出效应作用下,金融资源开始从城市向农村扩散,促进农民收入增加。科技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推动金融资源在城乡间充分流动,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因此,金融集聚随数字普惠金融水平而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因为金融资源集中的城镇,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而当数字普惠金融达到一定水平时,金融资源开始向农村扩散,城乡收入差距缩小^[9]。王英姿^[10]以长三角 27 个地级市 2005—2019 年数据为样本,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影响呈倒“U”形特征。崔建军、赵丹玉^[11]运用门槛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非线性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₁: 数字普惠金融对减缓城乡差距具有显著影响;

H₂: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影响是非线性的。

(二)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作用机制

创业行为是提升居民收入的主要因素之一^[12]。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有效缓解农村地区金融借贷的信息约束、融资约束和信任约束,激发农户创业热情、提高农户创业能力,通过创业增加农户收入、改变城乡居民初次分配结构,缩小城乡差距。首先,数字普惠金融利用线上平台及时向农户和农村地区传递创业信息、技术信息和信贷信息,为农户创业奠定基础^[13]。平台及时推送国家创业政策、解读相关文件,使农户充分了解相应的优惠政策,激发创业热情;通过平台提供创业培训、学习机会和产业项目,使农户具有一定的创业技能,同时降低了农户创业的学习成本,减低创业的准入门槛,更利于激发居民的创业行为^[14];通过平台向农户推荐农技专家、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人员,使农户获得产业的技术资源和资金资源。其次,数字普惠金融基于大数据、借助数字技术较为准确分析农户、农村小微企业和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特征,破解传统金融因缺少有效抵押物导致的“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落实普惠金融“普”和“惠”特征,扩大金融服务对象,增加金融弱势群体获贷可能性。最后,数字普惠金融透明化信用状况,增加了投资方与创业合作方之间的信任,通过减少双方信息不对称,增加创业可能性^[15]。传统金融模式下,农村创业主要是通过亲戚朋友间介绍而合作,数字普惠金融运用数字技术使创业者信用信息透明,有利于获得投资方信任,农户创业就可以跨越熟人、亲朋的圈子,开辟更广阔的空间。在数字普惠金融刺激和支持农户创业的同时,发展农村经济,解决农村地区就业问题,提高农户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正如 Banerjee、Newman (1993) 观点,数字普惠金融整合了技术创新与普惠金融的优势,完善了农村金融市场,使传统金融中受到金融排斥的群体有机会得到金融支持和创业活动,因此势必会缩小社会收入差距^[8]。

已有研究显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优化居民收入结构,缓解城乡收入差距^[16]。作为一种先导性产业,金融业的发展和推广会带动其他生产要素的流动,数字普惠金融以低成本、便捷性、多样性和高可获得性刺激居民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17],随着居民消费体系的不断完善,第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升级^[18];同时数字普惠金融优化了企业创业的金融环境,增加了小微企业获得金融支持的效率,提升企业创业积极性,金融机构可充分利用数字信息优势实现金融要素的精准配置,使得金融资源在不同产业、不同部门之间实现科学有效配置,推动

产业优化升级。随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城镇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农村地区扩散渗透,带动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农业体验、乡村旅游、农业观光、农家乐等新业态相继涌现,吸引更多的城镇资本注入农村,越来越多的城镇居民下乡消费,农户家庭收入稳步增长;越来越多的外出人员返乡创业,农村创业主体规模扩大,可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农村劳动力可根据自身实际在农村就业,从而拓宽农民收入渠道,实现工资性收入增长,城乡收入差距得到有效减缓。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₃: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农户创业影响城乡差距;

H₄:数字普惠金融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影响城乡差距。

三、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城乡差距现状分析

(一) 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分析

利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可分析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该指数主要包括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图1给出了2011—2021年中六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发展趋势图,图2给出了2011—2021年中六省及河南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增速趋势图,图3^②给出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三个维度的箱线图。

1. 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发展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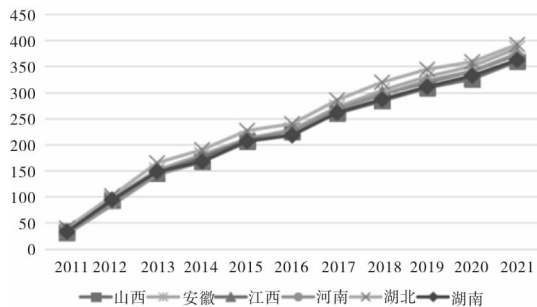


图1 2011—2021年中六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发展趋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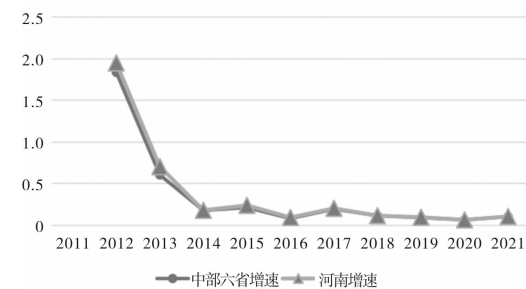


图2 2011—2021年中六省及河南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增速变化趋势图

图1显示,2011—2021年间,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区域间存在显著差

异,2014年后差距基本保持稳定;湖北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一直保持领先地位,随后是安徽省,2016年以后,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均出现大幅度提升;近几年,湖南省和山西省则位居中部六省尾部。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不断提升主要是因为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在金融业中的应用普及;作为金融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节点,数字普惠金融离不开经济基础的支撑,中部六省经济基础存在差异,是导致中部六省各省之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

图2绘制了2011—2021年中六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增速变化趋势线,鉴于河南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成功模式,同时也绘制了河南省数字普惠金融增速变化趋势线。图2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增速在2011—2013年变化速度较快,2016年后增速有所下降,2018年后增速趋于稳定。河南省增速相对较快,作为农业大省,近年来,河南省积极探索创新,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借助数字技术,“人人有授信、户户能贷款”,在河南部分地区已成为现实。2016年,河南省兰考县成为中国首个国家级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通过与银行合作,建立数据风控模式,兰考县开发打造了全县第一个县域政务数据支持的数字化金融产品;2017年,河南省内乡县与网商银行签约,成为全国第一个数字普惠金融试点县。截至2021年12月,至少有60个涉农区县与网商银行合作,该模式被全国900多个县域沿用。2021年,河南省成为第一个政府融资担保机构联合互联网银行发放助微减息券的省份,该模式已被全国15个省市沿用。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日前也与网商银行深入合作,共同支持“乡村振兴带头人”,有标杆示范作用的农户将获全年免息及长期利率支持,为河南乡村振兴注入资金。河南省对金融技术的开放举措,正让越来越多的农户享受到普惠金融带来的利益。

2. 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各维度发展现状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包括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通过对三个维度的比较,可进一步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深层原因。图3给出了中部六省2011—2021年数字普惠金融各维度箱线图。由图3可以看出:

(1)三个维度中数字化程度的离散程度最大,中位数也最大,说明2011—2021年中六省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变化幅度较大,均值最大;数字化程度反映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实惠性,主要体现在移动支付数量、企业贷款利率水平和免抵押支付比

例等。这几年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数字化程度得到了大幅提升,因此在样本期内变化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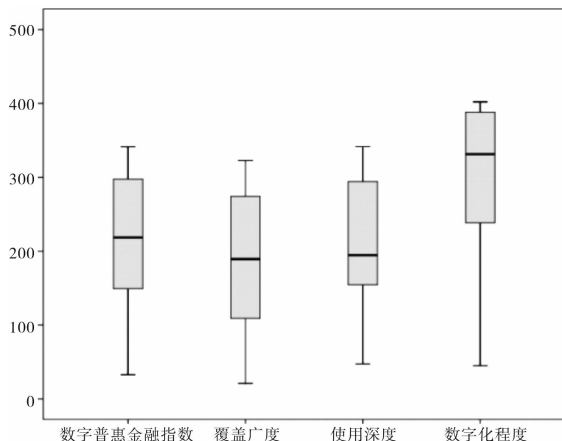


图3 2011—2021年中六省数字普惠金融各维度箱线图

(2)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离散程度差异不大,说明2011—2021年间,两维度基本保持同步增速,相比较而言,覆盖广度变化较大;使用深度的低水平省份较多;但从整体均值来看,水平基本一致。这从侧面反映,在普惠金融相关政策引导下,中部六省各省数字普惠金融都得到了快速发展,覆盖广度差异不大,但当发展进入使用深度驱动时,因各区域资源禀赋差异较大,区域间就出现了显著差异。

(二)中部六省城乡差距现状分析

城乡差距主要反映在收入、教育、医疗、消费、就业以及政府公共投入六个方面。出于数据的可获取性考虑,此处从经济要素出发,用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来反映城乡差距情况。数据来源于中部六省各省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图中数据为中部六省历年平均值。

1. 中部六省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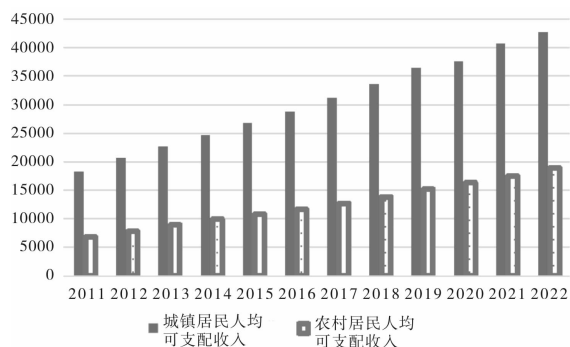


图4 2011—2022年中六省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单位:元)

图4显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差距明显,且有增大趋势。2011年,中部六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值为18303元,同一时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值则为6850元,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绝对数值为11453元;2022年上述差距为23829

元,差距在进一步拉大。因此,缩小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仍是实现共同富裕路上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

2. 中部六省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分析

图5绘制了2022年中部六省城乡居民人均可消费支出的差距图,由图5可以看出,城乡消费差距不容忽视。其中湖南省差距最大,2022年该省全省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083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与同时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差距为11502元;差距最小的河南省,这一数据也是8715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消费支出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消费支出的比值为1.588。同时,也应看到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使农村地区得到了快速发展,农民生活得到了大幅提升,两者差距不断缩小。2022年,中部六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消费支出环比平均增长率为2.5%,农村居民人均可消费支出环比平均增长率为6.45%。^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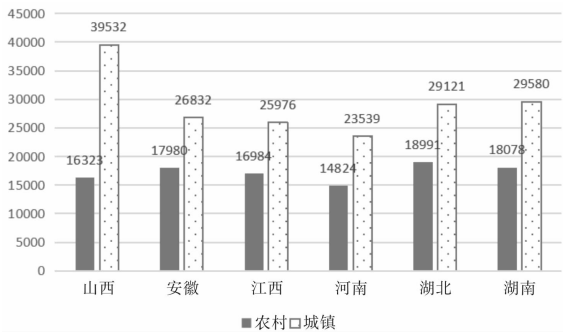


图5 2022年中部六省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差距图(单位:元)

四、河南省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差距的效应分析

(一) 模型构建

为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影响,在前文研究假设的基础上,构建如下研究模型:

模型 I:

$$Gap = \alpha_0 + \alpha_1 DIF + \sum_{i=2} \alpha_i Con + \varepsilon \quad (1)$$

$$Gap = \alpha_0 + \alpha_1 Cov + \alpha_2 Dep + \alpha_3 Dig + \sum_{i=4} \alpha_i Con + \varepsilon \quad (2)$$

模型 II:

$$Gap = \alpha_0 + \alpha_1 DIF + \alpha_2 (DIF)^2 + \sum_{i=3} \alpha_i Con + \varepsilon \quad (3)$$

模型 III:

$$Str = \alpha_0 + \alpha_1 DIF + \sum_{i=2} \alpha_i Con + \varepsilon \quad (4)$$

$$Gap = \alpha_0 + \alpha_1 DIF + \alpha_2 Str + \sum_{i=3} \alpha_i Con + \varepsilon \quad (5)$$

模型 IV:

$$Inn = \alpha_0 + \alpha_1 DIF + \sum_{i=2} \alpha_i Con + \varepsilon \quad (6)$$

$$Gap = \alpha_0 + \alpha_1 DIF + \alpha_2 Inn + \sum_{i=3} \alpha_i Con + \varepsilon \quad (7)$$

模型中 Gap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城乡差距; DIF 为核心解释变量,反映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 Cov 、 Dep 和 Dig 分别表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指数、使用深度指数和数字化程度指数,这是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维度,可用来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各维度指数对城乡差距的影响; $Open$ 、 Urb 、 Inv 和 Exp 均为控制变量,分别表示对外开放度、城镇化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和政府财政支出,这四个变量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也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硬件条件和软环境。 Str 和 Inn 为中介变量,分别表示产业结构和农户创业行为。

模型 I 和模型 II 用来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直接效应,其中模型 I 中式(1)用来分析线性效应,式(2)用来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各维度对城乡差距的影响,检验研究假设 H_1 。模型 II,即式(3)则用来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非线性效应,检验研究假设 H_2 。数字普惠金融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经济环境、制度条件和基础设施的支撑。只有处于一定的环境中,数字普惠金融的优势才能充分发挥出来。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个体的金融素养要求会随之增加,诸如“数字鸿沟”等效应就会出现,影响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影响可能会是非线性的。

模型 III 和模型 IV 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研究假设 H_3 和 H_4 ,其中,式(1)、(4)和(5)用来分析产业结构在数字普惠金融作用城乡差距中的中介效应;式(1)、(6)和(7)用来分析农户创新创业在数字普惠金融作用城乡差距中的中介效应。

(二) 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被解释变量 (Gap) 为城乡差距,与前文一致,用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消费差距来代表城乡差距情况。城乡收入差距 =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城乡消费差距 =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消费支出 -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则城乡差异 = $0.5 * 城乡收入差距 + 0.5 * 城乡消费差距$,数据来源于中部六省各省历年《统计年鉴》。

核心解释变量 (DIF) 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其三个维度 (Cov 、 Dep 和 Dig),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数

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中介变量(*Str* 和 *Inn*), 分别表示产业结构和农户创业行为。产业结构 = (第二产业 + 第三产业)/GDP, 表示产业结构调整的情况, 数据来源于中部六省各省历年《统计年鉴》。农户创业行为用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

控制变量(*Ope*、*Urb*、*Inv* 和 *Exp*), 分别表示对外开放度、城镇化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和财政支出, 对外开放度 = 进出口贸易总额/GDP, 外商直接投资 = 外商直接投资总额/GDP, 财政支出 =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GDP。数据来源于中部六省各省历年《统计年鉴》。

各变量符号、意义和计算方法如表 1 所示。

表 1 各变量名称、符号及计算方法

变量	名称	符号	计算方法
被解释变量	城乡差距	<i>Gap</i>	$0.5 * (\text{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 \text{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 0.5 * (\text{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 - \text{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	<i>DIF</i>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	<i>Cov</i>	
	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	<i>Dep</i>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	<i>Dig</i>	
中介变量	产业结构	<i>Str</i>	(第二产业 + 第三产业)/GDP
	农户创业行为	<i>Inn</i>	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
控制变量	对外开放度	<i>Ope</i>	进出口贸易总额/GDP
	城镇化水平	<i>Urb</i>	城镇化指数
	外商直接投资	<i>Inv</i>	外商直接投资总额/GDP
	财政支出	<i>Exp</i>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GDP

本文以中部六省为研究对象, 因为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公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是从 2021 年开始的, 因此样本时间跨度为 2011—2021 年。

(三) 实证结果及分析

1.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直接效应分析

借助模型 I 和模型 II 可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直接效应, 因各变量量纲不一致, 首先对变量中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及城乡差距数据进行取对数处理。采用豪斯曼检验, 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回归结果显示:

(1) 第一列反映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差距的线性关系, 回归结果显示,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偏回归系数为 -0.071, 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存在显著减缓效用;

(2) 第二列反映数字普惠金融三个维度对城乡差距的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 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但使用深度却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3) 第三列反映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非线性效应, 回归结果显示, 二次项偏回归系数为 -0.226, 一次项偏回归系数则为 0.816, 两者均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 呈倒“U”形规律, 表现为先加剧、后减缓的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作用需要一定的实施基础, 发

展初期, 相应的金融环境尚不够完善, 其对城乡差距的积极性作用不能展现出来, 一旦过了这一拐点, 其减缓城乡差异的积极作用就会显现。从回归结果看, 其拐点为 0.0938, 以河南为例, 该省 2021 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为 374.37, 其相应对数值远远超过 0.0938, 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可显著减缓城乡差距。

表 2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直接效应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城乡差距		
	模型 I	模型 II	
常数项	0.394	0.580	-0.774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ln DIF$	-0.071* (0.037)		0.816** (0.382)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平方 ($\ln DIF$) ²			-0.226** (0.105)
覆盖广度 $\ln Cov$		-0.183*** (0.045)	
使用深度 $\ln Dep$		0.402 (0.360)	
数字化程度 $\ln Dig$		-0.052*** (0.016)	
对外开放度 <i>Ope</i>	-0.138 (0.321)	-0.084 (0.052)	-0.059 (0.158)
城镇化水平 <i>Urb</i>	-0.542*** (0.229)	-0.865*** (0.221)	-1.039*** (0.323)
外商直接投资 <i>Inv</i>	0.651** (0.228)	0.316 (0.325)	0.251 (0.245)
财政支出 <i>Exp</i>	-0.836*** (0.228)	-1.865*** (0.451)	-0.342** (0.163)
R^2	0.536	0.875	0.660
F	8.086	30.33	9.68

注: 括号内为偏回归系数的标准差; *, ** 和 *** 分别表示在 10%, 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Ln 表示变量取对数。

(4)从控制变量看,在各回归模型中的特征基本一致,对外开放度都是不显著的,外商直接投资仅在第一列是显著的,而城镇化水平和财政支出是显著的。说明城镇化水平和财政支出可显著减缓城乡差距,外商直接投资则会加大城乡差距,这可能是因为外商投资项目更多集中在城镇所导致的。

2.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中介效应分析

借助模型 III 和模型 IV 可分别检验产业结构调整 and 农民创业行为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影响

中的中介效应。表 3 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存在显著的正效应,而产业结构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则对城乡差距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说明产业结构在数字普惠金融减缓城乡差距的作用中具有中介作用。而农民创业行为的中介效应却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在文中是用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表示农民创业行为的,该指数反映区域整体创新创业行为,并不是完全反映农户创业行为的。

表 3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模型	模型 III		模型 IV	
被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 <i>Str</i>	城乡差距 <i>Gap</i>	农民创业 <i>Inn</i>	城乡差距 <i>Gap</i>
常数项	0.777	0.294	0.424	0.575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ln DIF$	0.014 *** (0.038)	-0.069 ** (0.040)	0.014 * (0.533)	-0.538 ** (0.224)
产业结构 <i>Str</i>		-0.129 ** (0.063)		
农民创业 <i>Inn</i>				-4.501 (5.018)
对外开放度 <i>Ope</i>	0.035 *** (0.008)	0.134 (0.152)	0.013 * (0.007)	0.012 * (0.006)
城镇化水平 <i>Urb</i>	0.162 *** (0.051)	-0.563 *** (0.152)	-0.019 ** (0.009)	-0.138 *** (0.034)
外商直接投资 <i>Inv</i>	-0.091 ** (0.422)	0.662 * (0.387)	0.012 * (0.007)	0.545 * (0.313)
财政支出 <i>Exp</i>	0.119 *** (0.034)	-0.851 ** (0.424)	-0.017 ** (0.007)	-0.068 ** (0.029)
R^2	0.825	0.537	0.899	0.585
F	33.001	10.773	6.495	7.894

注:括号内为偏回归系数的标准差;*、**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Ln表示变量取对数。

五、结论与建议

(一) 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构建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差距间的计量模型,并以2011—2021年中六省相关面板数据为样本,从非线性效应和中介效应两个角度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在缓解城乡差距中的效应,研究结果认为:

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减缓城乡差距存在显著影响,呈倒“U”形的非线性规律,从中部六省当前整体情况看,目前已过拐点,表现为积极的减缓作用。

第二,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维度中,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对缓解城乡差距是显著的,但使用深度却不显著,后续应注重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对城乡差距的减缓作用。

第三,产业结构显著中介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减缓作用,而农民创业的中介效应没有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如何提升农民创业行为,有效刺激其创业行为是需要重视的一个方面。

第四,城镇化水平和政府财政支出,可有效缓解城乡差距,但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开放度对城乡差距的影响未能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

(二) 减缓城乡差距的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立足中部六省现状,可通过如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缩小城乡差距的积极作用。

其一,满足金融需求,提升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反映了居民的金融需求,从实证结果看,目前河南省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对减缓城乡差距的作用不够显著。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目前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与农户的金融需要不匹配;另一方面可能是农户的金融素养不足,不能完全了解和使用相关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导致使用深度欠缺。金融机构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切实了解农户和农村企业的金融需求,不断创新更加多元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确保乡村地区各个领域的社会群体都能够享受到金融发展的便利服

务,为农户生产、创业、子女教育等提供金融支持,逐步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环境,引导农村居民积极金融消费,真正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减缓作用。

其二,加大农业投入,引导投资和创业向农村下沉。实证研究显示,产业结构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差距间存在积极的中介作用,而农民创新创业的中介作用和外商直接投资都没能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比如,中部六省中的河南省是农业大省,人口多,人均耕地资源不足,因此要加大农业投入,尽快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吸引更多外商投资下沉农村。一方面,要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优化产业结构,整合全省优质资源,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建立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运转一体的产业体系,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吸引更多外商投资。另一方面,要完善基础设施,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各级政府部门给予投资者工作支持,主动帮助解决企业经营中遇到的问题。同时,还要引导和鼓励农民创新创业,充分考虑农民的创业需求,可考虑让农民优先使用部分公共资源,为农民创业提供政策保证和便利条件。

其三,创新财政工具,夯实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基础环境。加大农村互联网建设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尽快实现宽带网络系统全覆盖,夯实数字普惠金融实施的基础环境。建立风险补偿机制,设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风险补偿基金,激发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积极性。健全融资担保体系,打造贷前补贴、贷后补偿的风险共担机制,鼓励各担保机构和银行与省、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合作,充分发挥融资担保代偿补偿资金池作用。各级政府应加大区域间合作,搭建跨地区数字化应用平台,实现信用评价、风险防范、供需对接的服务平台,使数字普惠金融扩量增面,覆盖领域更加广泛、全面。

其四,加快城镇化建设,改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环境。提高城镇化率有利于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金融力量,缩小城乡差距。城镇化率越高,居民集中度越高,金融机构的服务成本越低,金融机构在这些区域增加金融服务设施和金融网点的积极性越强,无形中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同时,城镇化率高,居民越集中,政府建设网络基础设施的成本就越低,使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更有可能;随着网络基础设施优化,农村金融弱势群体接受金融教育的机会增多,更好地享有金融服务,获得个人及家庭发展的金融资金,逐步缩小与城镇居民的差距。

其五,扩大对外开放,持续释放普惠金融改革和

发展动力。实证结果显示,样本期内,作为控制变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开放度对城乡差距的减缓效应尚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因此中部六省要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和区位优势,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扩大对外开放,是金融业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一方面扩大改革开放,尤其是金融业改革开放,使金融业能够接触和获得更多金融模式和金融理念的成功经验,纵观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历程,很多实践都是在开放中借鉴、学习国际经验的结果,正是因为开放,中国的普惠金融体系建设才有了全新格局;另一方面可将国内金融与国际化市场环境、多元化参与主体、更加复杂的交易机制相融合,随着国内金融主体的不断扩大,可降低金融服务门槛,在更大范围内满足不同人群、不同层次的多样化金融需求,实现普惠金融有效供给,提升金融特殊群体享受金融服务的获得感。同时,要注重提升金融监管能力,数字普惠金融对金融弱势群体的倾斜使得承受风险的能力较为薄弱,随着开放步伐的加快,金融监管部门应具备根据市场变化,提升监管水平和防控风险的能力,以有力支持农村地区等薄弱领域发展,为减缓城乡差距贡献数字普惠金融力量。

注释:

- ①数据来源:2022年《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②图3中历年数据是由相应年度中部六省数据均值而来。
- ③平均增长率数据由2022年中部六省各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数据平均而来。

参考文献:

- [1] Isaac Koomson, Renato A Villano, David Hadley. Effect of financial inclusion on poverty and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Evidence using a multidimensional measure of financial inclusion[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20, 149(2): 613 - 639 .
- [2] Fan Liu, Barnabé Walhee. Financial inclusion, financial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composite index approach[J]. Empirical Economics, 2022, 63(3): 1457 - 1487.
- [3] 周利,冯大威,易行健.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数字红利”还是“数字鸿沟”[J]. 经济学家, 2020(5): 99 - 108.
- [4] 田瑶,郭立宏. 数字普惠金融缩小收入差距了吗:来自中国国家追踪调查的经验证据[J]. 当代经济科学, 2022, 44(6): 57 - 70.

- [5] 邓金钱,张娜. 数字普惠金融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了吗? [J]. 农业技术经济,2022(6):77-93.
- [6] 杨怡,陶文清,王亚飞.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J]. 改革,2022(5):64-78.
- [7] 李牧辰,封思贤,谢星.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异质性影响研究[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20(3):132-145.
- [8] 陈熹,徐蕾. 数字金融、创新创业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 [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2,21(5):537-546.
- [9] 赵丙奇.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面板门限模型的实证研究[J]. 社会科学辑刊,2020(1): 196-205.
- [10] 王英姿.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研究:以中国长三角地区为例[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3(6):118-126.
- [11] 崔建军,赵丹玉.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吗: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J]. 经济问题探索, 2023(3):79-96.
- [12] 杨伟明,粟麟,王明伟.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收入: 基于经济增长与创业行为的中介效应分析[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0,22(4):83-94.
- [13] 王曙光,刘彦君. 数字普惠金融是否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J]. 农村经济,2023(2):75-84.
- [14] 张碧琼,吴琬婷. 数字普惠金融、创业与收入分配:基于中国城乡差异视角的实证研究[J]. 金融评论,2021,13(2):31-44.
- [15] 琚琼.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创业效应研究[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4(3):45-53.
- [16] 伍卓,周付友. 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J]. 江汉论坛,2023(5):22-29.
- [17] 张林. 数字普惠金融、县域产业升级与农民收入增长 [J]. 财经问题研究,2021(6):51-59.
- [18] 李亚. 轨道交通建设对城市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J].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22,35(3):432-437.

(责任编辑 刘成贺)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on Reducing Urban – rural Gap: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Six Provinces in Central China

ZHAO Jian¹, ZHUO Qixin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Henan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Zhengzhou, Henan 451191, China;

2. College of business of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999077,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help of digital technology,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finance in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aking the relevant data of six provinces in central China from 2011 – 2021 as sampl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the urban – rural gap in Henan Province, constructs an econometric model between the two, and quantitatively analyzes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on reducing the urban – rural gap.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reducing the urban – rural gap, showing an inverted “U” shaped law, which has passed the inflection point at present; The coverage and digitization degree of digital finance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alleviating the urban – rural gap, but the depth of use is not significan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played a significant Mesomeric effect, and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and government financial expenditure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Based 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abov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further exert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to reduce the urban – rural income gap. These measures include improving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meeting financial needs, innovating financial tools, increasing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and accelerating urbanization.

Key words: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reducing; urban – rural gap

数字化生存视域下公民的主体性困境及纾解路径

张玉洁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91)

摘要:主体性问题一直是无数思想家所探讨的哲学命题,是人类同其他一切存在相区别的典型特征。随着数字技术在人类社会范围内的大规模使用,公民的生产生活更加倚重于数字技术这一载体,数字化生存业已成为近在咫尺的现实。数字化生存天然所具有的“赋能”本质不断驱动公民主体性的发展,但在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公民生存的过程中,对公民主体性的应然发展却也实然落空,数字价值茧房弱化公民主体选择的能动性,数字全景监狱阻碍公民主体发展的自由性,数字异化劳动蚕食公民主体劳动的自主性。因此,亟须积极探索纾解数字化生存视域下公民主体性困境的路径,从技术、公民和社会层面协同发力,最终回归公民的主体性本位。

关键词:数字化生存;公民的主体性;主体性困境;纾解路径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4.01.005

中图分类号:D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4)01-0034-06

一、问题的提出

(一)主体性概念的历史回溯

主体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所特有的属性。人的主体性问题悠久而古老,一直是哲学界经久不衰的话题。自人类产生伊始,主体性问题就开始逐渐浮出水面,尤其是当人与动物区分开来,成为真正的人,主体性问题就成为与人本身息息相关的重大问题。人的主体性的最大特点在于其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深受所处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影响。所以,纵使都是主体性问题,历史条件与时代背景不同,必然会对人的主体性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回顾人的主体性的历史,我们尚可发现主体性的发展历经一段相当漫长的、从无到有的、从弱到强的时期。在马克思人的主体思想提出之前,哲学家们围绕此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形成颇多代表性的观点。例如,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在人与万物的关系中首次突出人的相对主体地位;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把探究重点从自然转向人本身;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推动西方近代哲学人的主体性研究的发展;康德提出“人为自然立法”,把人的主体性地位

在西方哲学中首次确立。直到马克思在辩证批判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从实践的角度科学地阐述了哲学界长期争论的人的主体性的话题,认为人的主体性产生于主体通过实践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先验的存在,迎来了人的主体性的伟大转向。

时至今日,主体性问题的探讨仍未间断。随着科技的发展与进步,必将会带来生产力的变革,一方面将增强主体改造自身与改造世界的能力,人性得到空前解放,给公民主体性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契机。不可否认,同过往历史相比,我们当今处于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处于一个主体性空前爆发的更好的时代。但另一方面,在为主体性的发展插上腾飞翅膀的同时,也在主体性前进的道路上种下了反噬的种子,制造出接连不断的障碍与麻烦,致使主体深陷主体性困惑久久不能自拔。因此,在时代突飞猛进的背景下,对主体性思想的探讨仍具有深远意义。

(二)公民主体性是数字化生存视域下的重要议题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收稿日期:2023-12-12

作者简介:张玉洁(1997—),女,河南滑县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伦理。

2022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6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5.6%,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99.8%,网络支付用户规模达9.11亿,占网民整体的85.4%,互联网医疗用户规模达3.63亿,占网民整体的34.0%^[1]。借用美国学者尼古拉斯·尼葛洛庞蒂在其著作《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所言的,我们确实进入了“数字化生存时代”,公民的生活业已深层次、多领域地搬迁至数字王国之中。

不可否认,在数字化生存时代将会助推公民主体性的发展。在信息方面,信息的传播速度大幅增长,信息的获取渠道更为丰富与多样,公民不再局限于简单地复制与接受信息,而是依靠自己的思维与意识主动获取、分享与交流信息,促进了自我的觉醒与启蒙。在话语方面,媒介技术的发展消除了公民话语表达的障碍,每个公民都可以直抒己见、畅所欲言与张扬个性,开创了一个人人都可以手持麦克风的时代。可以说,数字化生存打破了过往所存在的强权话语体系和时空区隔,为公民开启了一个更为平等、更为民主、更为自由的公共话语空间,照亮了枯燥乏味的繁忙的私人生活。在行动方面,赋予公民更多的自由时间与虚拟生存空间,促进公民的自由发展。就时间而言,随着数字技术的突飞猛进,必将带来生产工具的巨大创新与生产力的大幅提升,办公自动化、工厂生产自动化的大范围普及,促使公民在一定程度上从繁重的事无巨细的工作中得以脱身,不仅减轻了自身的工作强度,而且也使公民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发展个人的兴趣爱好。就空间而言,公民的社会活动不再仅仅局限于现实的生存空间,每个公民都可以凭借自身“数字虚拟人”的身份在数字空间开展。但是,正如德国学者理查德·大卫·普雷希特仿照《共产党宣言》首句的话语表达方式,在其著作《我们的未来,数字社会的乌托邦》对数字化生存两种态度的经典概述:“一个幽灵,一个数字化的幽灵在全球化的社会徘徊。全世界都在注视着这个幽灵,一方面满怀喜悦和希望,另一方面充满恐惧和担忧。”^[2]数字化生存也不可避免地将会给公民主体性发展带来束缚。作为主体的公民,在数字化生存时代也未能逃脱数字技术的奴役,给公民主体性的发展带来创伤。

总而言之,数字化生存的时代不仅是信息流动加速、科技高度发达、网络广度覆盖的时代,而且也应是一个更加注重公民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时代。尽管每个公民在数字化生存时代逐渐变为一个“数字代码”,但公民仍旧是构成我们当今时代不可或缺的主体。因此,在数字化生存视域下,加强对公民主

体性的学理探究,这将对于推动数字技术复归造福人类社会的初衷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样态审视:数字化生存视域下公民主体性困境的表征

当前,数字化生存业已成为公民的常态,数字技术运用的本质目的是强化公民认识与改造世界的能力,实现主体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然而当数字技术被用于研究和控制公民的行为时,它就有可能成为操纵公民、利用公民、束缚公民的工具,使公民丧失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机会。从已有分析来看,数字技术的运用对数字化生存视域下公民主体性可能造成的困境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一)数字价值茧房弱化公民主体选择的能动性

选择的能动性是公民主体性的生动体现。现代控制理论表明,事物之间存在众多的因果联系,从此物发展为他物具有多种模式和途径。因此,若想达到预期的理想目的,离不开作为主体的公民从多种可能性的因素中选择出能最大程度促使目的实现的那种因素,并主动作用于此因素以助推目的实现。所以,公民主体选择能动性的发挥至关重要。公民主体选择的能动性是指公民作为主体性的存在,不仅仅是为简单地认识自然界中的各种存在物,更为重要的是在深刻把握存在物的本质和发展趋势的前提下,从主体自身的知识结构、意愿、目的、经验等为出发点,选择自己活动的方式或者行为的价值取向,从而最大程度地满足主体自身的目的和需要。

公民主体选择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对外界信息的研判,但在数字化生存视域下,信息呈爆炸式的增长样态,由于受人脑对于信息吸收、储存、内化、处理局限性的影响,致使公民无法将其注意力持久维持于广泛的内容领域,正如约瑟夫·奈所言:“丰富的信息导致关注的贫乏。当我们被大量的信息淹没在其中之时,我们难以确定关注什么。”^[3]数字技术的出现,有效地解决了此难题。在数字技术的助推下,将会依据公民的个体偏好产生“过滤气泡”,为其量身定制打造的“私人日报”会自动过滤异己的信息,同质化的信息充盈于公民四周,使公民逐渐放弃对外在多元信息的主动追寻,这将最终致使公民主体只能接触个人所选择的某一方面的特定内容,即只接触与公民主体“固定成见”相似或相同的话语和言论,而无法接触与自身话语或言论相左的观点,使公民被悦己的信息所围困,而公民信息领域的窄化则会固化主体的价值观与思维模式,形成所谓的“数字价值茧房”,正如凯斯·桑斯坦在《信息乌托

邦》一书中所言：“当个体只关注自我选择的或能够愉悦自身的内容，而减少对其他信息的接触时，久而久之，便会像蚕一样逐渐桎梏于自我编织的‘茧房’之中。”^[4]比如，我们上网将会在网络空间留下“足迹”，大数据技术将会通过对公民网络“足迹”信息的处理分析得出公民的个人所需或价值偏好等信息。因此，只要我们触动手指打开网页将会给我们推送相关的信息。那么这些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吗？是我们真正所喜欢的吗？答案有可能是或者不是，但无论是或不是，为我们推送的信息有可能使我们丧失其他更好的选择机会，都将致使我们的选择身不由己。

由此观之，一旦数字技术将价值茧房构筑而成，在封闭的“数字价值茧房”中，依据公民个人价值偏好所选择的信息将会被数字技术所持续推送的信息而得以强化，公民会为保持自身心理的舒适感与注意力的集中而选择接受相同价值取向的信息，久而久之便将主体自我围困于同质化信息之中，而信息领域的窄化则会固化公民主体的选择立场。这样最终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公民主体仿佛不仅被设计着，而且还被数据技术牵着鼻子走，弱化了公民主体选择的能动性。

（二）数字全景监狱阻碍公民主体发展的自由性

发展的自由性是公民主体性的本质体现。正如马克思所言：“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5]⁵⁶其所表达的主旨为公民的活动是自由的，不受外力所束缚，只受自己主观所具有意识的管控，可以在社会生活中自由地发展、自由地交往、自由地生产等。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打破了既往所存在的时空限制，作为主体的公民在数字空间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自由，以一种毫无外在约束的方式将“本真自我”得以充分展现，在“美丽新世界”中自由翱翔。但与此同时，数字全景监狱的存在使公民主体无处遁形，阻碍自身发展的自由性。

进入数字时代，社会对公民的监视更加无孔不入而又不易察觉，将公民置身于数字全景监狱之下。数字全景监狱是边沁提出的“圆形监狱”的一种更为高级的新变式，与之前构想不同的是，这次不再是中心对四周进行监视，而是四周监视中心，能够无死角和无盲区地开展周密的监视，“人们是全方位地，甚至从内向外地被照得通亮”^[6]。正如英国的著名学者乔治·奥威尔在其所著《一九八四》中所言：“不论你是醒来或睡着，工作中或吃饭，在室内或室外，在浴室或床上——一句话，你逃不了。除了你脑

袋内那几个立方厘米的脑浆外，没有别的东西是属于你的。”^[7]这句话仍适应于生活于数字化生存视域下的公民主体。在数字化生存时代，公民看似是在私人领域活动，但由于所到之处无一遗漏的“第三只眼”的存在，使公民主体发展的自由性举步维艰。当我们去商场购物时，我们会被监控所监视，当我们刷卡支付时，我们的账单流水会被后台服务器所记录，当我们登录需要个人身份信息的数字平台时，我们的各类信息会被一层层剥离等等，公民实际上是以一种透明人的身份一丝不挂地在数字化生存时代“裸奔”。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人可以确保这些属于私人领域的的数据可以不被公布于众而永久封存，没有任何人可以确保通过分析公共领域的的数据不会获知公民的隐私。例如河南红码事件、棱镜门事件、Facebook 爆发的“泄密门”事件等，皆演绎着在数字全景监狱下公民被无死角地监控，私人领域被逐步侵占，公民主体发展的自由性举步维艰。

总之，随着物质条件愈加丰富，科技力量愈加强大，公民主体发展的自由性似乎愈加锐减。数字技术的发展虽在表面上为主体带来发展的自由性，但这种发展的自由性在数字全景监狱面前变得不堪一击。因此，数字化生存时代的公民面临着为实现主体发展的自由而造成的“悖论”：若为避免数字全景监狱对个人全方位的监视所造成的个人数据信息的泄露而谨言慎行，那么公民主体发展的自由性将会受到限制；若为了获得主体发展的自由而常态化地生存于数字全景监狱下，那么公民的数据信息将会面临不断泄露的风险，无时无刻不置身于监控之下，也同样无法实现主体发展的自由，这种悖论对公民主体发展的自由性造成巨大的伤害。

（三）数字异化劳动蚕食公民主体劳动的自主性

劳动的自主性是衡量公民主体性是否彰显的基本特征。公民主体劳动的自主性是指公民在劳动的过程中应当抛弃对外在之物的依赖，依照个人的主观意愿有所选择与取舍地开展自身的劳动活动，正如马克思所言：“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下才进行真正的生产。”^[5]⁵⁷在当今时代，伴随数字技术的革新人类社会步入数字化生存时代，数字化劳动看似赋予公民主体更多的劳动自主性，能够自主选择劳动的时间与地点，但数字化劳动下的公民仍未摆脱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束缚，一举一动仍离不开数字资本的规制，致使从事劳动的公民丧失主体发展的自主性。

从农耕时代所存在的手工劳动到工业时代所存在的机器劳动,回顾人类千百年发展的历史长河,我们尚可发现在生产力革新的过程中将会促使劳动形态发生相应的改变。进入21世纪以来,数字技术突飞猛进,在全面革新人类社会生存空间的同时产生了一种新的劳动形态——数字劳动。虽然劳动形态发生了改变,但资本家通过剩余价值的攫取以达到利润无限增值的目的并没有改变,劳动异化问题仍旧存在,蚕食公民主体劳动的自主性。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公民可以借助数字平台开展大量工作,使工作地点不再固定于具体的办公地点,在表面上营造出工作环境更加惬意、自由时间更多的景象,但并没有真正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时间。与传统劳动相比,“过去借由钟表界定的时空律令被挑战,取而代之的是由移动互联技术再造的更加多维立体的时空架座”^[8],数字劳动模糊了公民劳动时间与自由活动时间的边界,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机会,公民不得不在劳动的过程中处于一种随时待命的状态,不得不成为忙碌的数字劳工,不得不为数字资本的增值而日益东奔西走,致使数字劳动不再成为增进公民主体劳动自主性的途径,彰显了数字异化劳动之态。如在亚马逊仓库中从事分拣工作的工人,由于他们是通过智能设备开展工作,因此他们的劳动也就转变为数字劳动。每人手持一台电脑,电脑会告诉工人他们应取回什么物品以及物品在仓库中的位置。然后,电脑就会对工人取回物品的时间计时,必须在所规定的时限内正确地找到并扫描该物品。如果工人未能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此任务,那么会导致任务完成率的下降。若完成率低于所规定的最低标准将会被解雇,择取一名新的工人将其取代,如此循环往复,生动反映出数字化生存视域下数字化劳动蚕食公民主体劳动的自主性。

综上所述,数字技术作为人造的“物体系”,在应然状态下应更好地服务于公民的生存和发展。然而,在实然状态下资本家为实现资本的无限增值,依靠数字技术随意控制和操控公民在数字劳动中的行为与思想,使公民沦落为生产剩余价值的数字化工具,催生出数字化新形态,最终使公民在数字劳动中丧失了主体劳动的自主性,沦落为数字化生存视域下一枚不起眼的“数字符号”,同数字技术创造的初衷渐行渐远。

三、进路探寻:数字化生存视域下公民主体性的复归

在当今的数字技术发展浪潮中,公民的数字化生存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我们不能因为数字化生

存中主体性困境的存在而退回到前数字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跟随数字技术的节奏起舞,丧失自身的主体性。为此,我们必须积极探寻规避数字化生存中公民主体性困境的路径,从而实现公民在数字化生存中主体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一)技术层面:秉承增进人民福祉的价值驱动

在数字化生存视域下,数字技术使用的初衷是为造福公民,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力量,但数字技术在发展的进程中工具属性仍占据主导地位,当工具理性被价值理性所驾驭时,公民在舍本求末的情况下被迫沦为数字技术的客体,丧失自身的主体性。因此,若想要摆脱数字技术加诸公民身上的隐形枷锁,离不开从技术层面寻求克制与突破之道。

在数字技术研发时,秉承增进人民福祉的价值理念,首先应该考量的是如何才能规避数字技术之“恶”,实现数字技术向善的美好愿景,这就要求在数字技术研发的进程中不应把目光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推动数字技术的发展,还需要在道德层面和伦理层面开展自我审视,优先考虑其对人类社会的潜在影响与威胁,从而确保其在正确的轨道前行。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研发还必须符合创新的负责任伦理设定,数字技术研发的本质目的在于有所创新,但其创新应彰显增进人民福祉、对社会负责任的面貌,这就意味着需要将创新精神与数字技术的底线相融合,以负责任的方式对待数字技术大研发问题并最终达至促进公民生活和谐幸福的目标。这就离不开伦理学家、技术人员和科学家的通力合作,对于偏离伦理道德和法律法规的研发,我们应果断地采取严厉的措施对其加以制止,并建立完善的监管机制,从源头上遏制数字技术研发违背初衷的行为。

在数字技术应用时,秉承增进人民福祉的价值理念,我们必须规范好数字技术的应用边界,确保公民的主体地位。具体来说,我们一方面应确保公民在数字化生存中的主体地位,以公民为主,数字技术为辅。不可否认,公民是构成数字化生存中的基本要素和不可或缺的唯一真实存在的主体。因此,公民不能过于依赖数字技术,笼统地将一切事务全部移交于数字技术,而应对不同的领域有所侧重地选择。如发生的“北斗掉线案”源于交警部门为提高行政效率,借助“北斗卫星定位记录仪”自动化开展电子监管与行政处罚,完全忽视公民的主体地位所赋予的自我陈述与申辩机会。由此观之,不能忽视公民在数字技术中的主体性,必须将数字技术的适

用范围控制在可控区间。另一方面,积极利用数字技术在数据信息收集、分析与处理等方面的优势,主动探寻数字技术和公民主体的深层次结合,提升公民在数字化生存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如数据技术能够通过分析公民出行的相关数据,及时调整与优化公交车的发车时间表以及站点的设置,使公民享受到数字技术应用带来的红利。

(二)公民层面:唤醒公民数字生存的主体意识

在数字化生存背景下,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给公民带来振奋人心的希望,公民总是想借助于数字技术来解决现有生存条件下所存在的主体性问题。但是,数字技术在降解主体诸多问题与矛盾的同时,也给公民的数字化生存带来新的主体性困境,仍未突破数字技术运行的怪圈。这令我们不得不反思,单纯地依赖数字技术并不能有效地化解公民的主体性困境,最终要回归于公民层面,唤醒公民的主体意识,主动探寻数字化生存新方式。

首先,转变公民对数字生存与技术的认知。“真正发生改变的,永远不会是互联网本身,而是主体的思维观念和价值标准、行为规范等现实中的传统累积。”^[9]具体来说,一方面,公民要把握与处理好数字生存与现实生存二者之间的度。作为主体的公民要认识到数字化生存中的虚拟存在只不过是公民现实主体存在的外化表现,即使数字化生存中的虚拟环境或者角色与现实社会无比的贴近与契合,但只能以无限趋近的形式贴近与契合,现实存在仍不能被取代,公民的主体性地位仍不能被撼动。另一方面,公民要以理性的态度看待和审视数字技术,正确处理公民同数字技术二者之间的关系。面对数字化生存中数字技术赋能公民但与此同时给公民主体生存造成困境的现象,我们不能把数字技术给抛弃,而应当改变公民对待数字技术的态度,要明确数字技术是公民所创造的工具,创造的初衷是为公民服务的。同时,还应加强公民对数字技术的反思与批判能力,不但要肯定其在增强实践能力、扩大交往范围、提升言论自由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也要对其所造成的“数字价值茧房”“数字全景监狱”“数字异化劳动”等困境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其次,培育公民的数字素养与技能。在数字化生存时代,数字素养与技能是每位公民都必须具备的。一方面,要深化公民对数字技术的认知,包括数字技术滥用的风险,自我隐私意识和权利意识的提升,通过数字技术的科普知识的讲座、科普电影的放映、文化专栏的宣传等形式普及公民对数字技术的认知,在普及知识的同时唤醒公民的主体意识。另

一方面,通过全民数字教育和人文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培育公民的数字素养和技能,通过对知识源源不断地汲取丰富个人数字素养和技能的储备,从而能够熟练操作云计算、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积极参与到数字化生存中,遏制数字技术对公民的掣肘,提升公民在数字化生存中主体的创造能力、选择能力、生产能力以及辩证思考能力,使得公民不仅能够使用数字技术,而且能够善用数字技术,使公民成为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二者兼备的数字技术使用者,从而主动化解主体性生存困境,高质量地、全面地满足自身在数字化生存中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三)社会层面:构建友好型数字化生存发展格局

时代发展不可逆转,科技进步势不可挡。面对数字化生存中公民的主体性困境,如何促使数字技术趋利避害地化解公民主体性困境是一个亟须应对的时代课题。为顺利地破解此难题,离不开友好型数字化生存发展格局的构建。社会应充分关注数字技术客观存在的消极和积极影响,营造和谐友好的数字氛围,促进数字技术同公民数字化生存的深度耦合。

首先,社会应恪守以人为本的数字生存发展建设理念。数字技术的应用对公民的生存产生了重大影响,构建友好型数字化生存发展格局是数字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在构建数字化生存发展格局时,不能仅仅着眼于数字技术的发展,而应当关注公民的利益和需求。在数字时代背景下,社会应深度思考在数字化浪潮中如何维护公民的主体地位,保护公民所享有的数字权益不受侵犯,尤其是要重点关注数字化生存中弱势群体的合理需求,弥合数字鸿沟,确保数字技术真正地造福于全体公民,这离不开以人为本理念的保驾护航。

其次,社会应完善现有的法律体系。对于公民而言,道德因素是决定个人行为的根本。但在数字化生存背景下,仅靠道德的力量远远不够,法律与道德正如鸟与其双翼的关系,密不可分,与非制度性的道德相比,法律更具有强制力,更能规范与约束公民的行为。因此,有必要通过与时俱进地完善现有的法律体系破解公民数字化生存的桎梏。除了《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是必须遵从的法律指引外,社会应进一步完善细化已有法律体系中表达模糊的论述,规制数字技术使用中越界的行为,保护公民数字生存中的主体性。

最后,社会应加强对数字技术发展全过程的监督。一方面要努力规避数字技术受资本奴役的风

险,数据、产品和算法的不透明化、黑箱化和专业化导致的公民难以有效识别内部所存在的风险和陷阱,从而陷入数字生存主体性困境。因此,社会应积极发挥监督作用,对于违规的行为依法进行惩处,有序引导数字技术的发展服务于公民、造福于公民。另一方面,在监督的过程中也不能对于正常的数字技术创新活动盲目地进行阻止。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好数字技术造福公民的关卡,为数字化生存中公民主体性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四、结语

数字技术的发展,已经将公民带上数字化生存的列车,我们不可能暂停这列列车的行驶,重返前数字时代寻找公民生存的主体性。不可否认,数字化生存视域下公民的主体性确实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困境,但我们不能以此为理由草率地逃离数字化生存,而应主动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遇,将其困境转化为数字化生存视域下公民主体性前沿问题探究的动能,努力规避数字技术对公民主体性的束缚,积极探索数字技术张扬和发展公民主体性的路径,使公民早日实现“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5]165}的生存状态。

参考文献:

-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23-03-03) [2023-12-12]. <https://www.cnnic.net.cn/n4/2023/0303/c88-10757.html>
- [2] 理查德·大卫·普雷希特. 我们的未来,数字社会的乌托邦[M]. 张冬,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3.
- [3] 约瑟夫·奈. 硬权力与软权力[M]. 门洪华,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52.
- [4] 凯斯·桑斯坦. 信息乌托邦[M]. 毕竞悦,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58.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6] 韩炳哲. 他者的消失[M]. 吴琼,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73.
- [7] 乔治·奥威尔. 一九八四[M]. 刘绍铭,译.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26-27.
- [8] 吴鼎铭,胡鹰. 数字劳动的时间规训:论互联网平台的资本运作逻辑[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1):115-122.
- [9] 汪广荣. 虚拟生存与人的主体性发展[M].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91.

(责任编辑 刘成贺)

The Citizen's Subjectivity Dilemma and the Way to Relief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Existence

ZHANG Yujie

(Graduate School,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 P. C
(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nance),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The issue of subjectivity has always been a philosophical proposition explored by countless thinkers, and it is a typical characteristic that distinguishes humans from all other beings. With the large-scale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human society, citizens' production and life rely more on digital technology as a carrier, and digital survival has become a reality within reach. The inherent "empowering" nature of digital survival continuously drives the development of citizen subjectivity, but in the process of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to citizen survival, the expected development of citizen subjectivity is also in vain. The digital value cocoon weakens the initiative of citizen subjectivity to choose, the digital panoramic prison hinders the freedom of citizen subjectivity to develop, and digital alienation labor erodes the autonomy of citizen subjectivity to work.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actively explore ways to alleviate the dilemma of citizen subjectivity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survival, and to work together from the technical, civic, and social levels, ultimately returning to the subjectivity of citizens.

Key words: digital survival; the subjectivity of citizens; subjectivity dilemma; relief pathway

高质量推进审计工作研究

阎建合

(郑东新区国库集中支付中心,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高质量推进审计工作,应有高深、宽广、长远的审计观、科学辩证的审计方法论和行之有效的审计推进保障机制。离不开审计人不断梳理、总结、丰富、发展审计理论,更离不开站立时代潮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举旗定向、掌舵领航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何高质量推进审计工作研究在新时代必将是一个重大而又深远的课题,值得审计人不断地去追求、探索、深化。

关键词:审计;审计观,审计研究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4.01.006

中图分类号:F239.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4)01-0040-04

2023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审计担负重要使命,要立足经济监督定位,聚焦主责主业,更好发挥审计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中的独特作用。”为进一步推进新时代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以有力有效的审计监督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审计工作应顺应时代大势,肩负党和国家、人民的使命重托,不断地丰富审计实践,大力发展审计理论,进一步深化对审计规律的认识,积极开创新时代审计工作的新境界。笔者以为,高质量推进审计工作,应有高深、宽广、长远的审计观、科学辩证的审计方法论和行之有效的审计推进保障机制。

一、高质量推进审计观

(一)以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本”

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确保全党令行禁止。这是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内在要求,是强化党内监督的刚性约束,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保障。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审计走出了

一条契合中国国情的新路子,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审计制度,积极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审计监督已经成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在党的自我革命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推动新时代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按照党中央的部署要求,坚持如臂使指,不断地增强政治属性和政治功能,把推动党中央政治意图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作为首要目标,党中央决策部署到哪里,审计就跟进到哪里,保障党中央令行禁止。根据党中央、国务院交给审计的重大政治任务,坚持如影随形,立足经济监督定位,准确把握和高质量推进审计全覆盖。按照党中央关于深化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部署要求,坚持如雷贯耳,对经济权力运行进行监督和制约,反腐治乱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二)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纲”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

收稿日期:2023-12-06

作者简介:阎建合(1972—),男,河南南阳人,硕士,郑东新区国库集中支付中心正高级审计师,从事政府审计理论与实践工作的研究。

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理论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审计人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忠诚履行审计监督职责,保障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落地。

(三)以维护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为“基”

“纵观党百年来的历史,我们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都是为人民谋利益,让人民过上好日子。”^[1]坚持审计力量和资源向基层一线下沉、向群众身边延伸。“为民而审,为民而计”,就是要坚持人民至上,把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审计监督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审计全过程。就是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系统研究谋划和解决经济社会领域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紧扣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种种问题,紧扣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药卫生、住房等方面的突出问题,紧扣社会治理、和谐稳定等方面的难题,紧扣公权力运行中的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等现象,紧扣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四风”问题,积极发挥审计在党的自我革命中的独特作用,有效推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积极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紧盯人民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密切关注相关困难群众资金使用情况,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等问题,兜牢民生底线、聚焦“身边蝇贪”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深度查处揭示不正之风,以“审计力度”,保障“民生温度”,推动相关部门单位及时查补漏洞、完善机制,健全民生

制度政策。

(四)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魂”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审计工作,对违反法律问题和违反道德问题应一并关注。对问题的识别既要有法律视觉,也要有道德视觉;问题判定既要坚持法律标准,也要遵循道德要求;问题处理既要考虑法律效果,也要考虑社会效果。

做好审计工作,应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审计坚持问题导向,所发现的问题有很多种类,有的问题属于对纯技术规范的违反可能不涉及道德层面,有的问题既涉及法律问题又涉及道德问题,特别是在社会伦理领域,关乎老年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以及特殊群体保护,就更应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作用,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应有的社会价值。^[2]

二、高质量审计推进路径探讨

(一)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治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权力是一把双刃剑。”^[3]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4]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坚定不移地反腐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力,依纪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在审计领域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治审:一方面要加大重大违纪违法问题查处力度,紧盯重点领域和重大问题,提升重大问题突破能力,提高审计质量,更好发挥审计在反腐治乱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要以自我革命精神不断加强审计自身建设,严守纪律规矩,强化政治忠诚,时刻保持谦虚、谨慎、敬畏的工作作风,做到打铁必须自身硬。

(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具体的审计工作中,应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好地在实际工作中把握哲学规律,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把各

项工作做好。当前,审计工作要注重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学习掌握哲学原理,深化对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认识,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推动工作。第二,学习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积极面对矛盾、解决矛盾。第三,学习掌握辩证唯物论的根本方法,辩证地而非形而上学,发展地而非静止地、全面地而非片面地、系统地而非零散地、普遍地而非孤立地观察事物,妥善处理其中各种重大关系。第四,学习掌握并深化对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认识,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在实践中深化认识,在认识中丰富实践,并在推进实践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

(三) 坚持法治的思维和法治的方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多次提到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这一概念。例如,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到“法治思维”这一概念。他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

对于审计人员来讲,法治思维在本质上区别于人治思维和权力思维,其实质是各级领导干部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审计人员要带头做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和坚定捍卫者,应切实把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贯彻落实到审计实践中,坚持“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认真为”,坚持运用制度赋权,坚持把法治服务贯穿于审计全过程。

(四) 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衡量审计工作是非成败的标尺。在审计实施过程中,以事实为根据,充分收集审计证据,重点关注审计证据的充分性、相关性、可靠性、合法性等,避免审计证据不充分、证据链不完整、取证方法不合理、事实表述不清等,坚持审理关口前移,实现审理与审计实时对接,对问题的认定,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能以与案件有关的客观事实作为根据,而不能以主观臆想作为依据,应当认真查清事实真相,使法律适用能够做到“有的放矢”。以法律为准绳,明确审计执法边界,编制审计执法路线,推进审计业务标准化作业。以法律为准绳,在认定事实的基础上,以法律为客观尺度来分清是非,不能以言代法、以权代法,

也不能主观臆断,任意曲解法律为我所用,影响整体审计质量。

特别是在审计评价工作中,“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尤为重要。脱离了这条原则,就会产生两个极大的危害后果:一是否定了正确行为,肯定了错误行为,把对的事情改成错的事情,直接对国家、社会、个人造成了危害;二是为错误行为大行其道进行背书作保,践踏法律纪律,对社会行为产生极大的恶劣影响。

(五) 坚持创新的思维,积极探索审计监督有效路径

审计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带动审计监督,勇于创新,积极探索审计监督有效路径,发挥审计专业技术优势,把审计的经济监督与党的政治监督相结合,审计专业职能部门优势与巡察政治权威优势相结合,促进审计监督与巡察监督、纪律监督贯通融合,形成监督合力。

1. 关于巡察监督与审计监督融合:审计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巡察工作,并担任一定职务,对巡察业务提供审计专业技术指导。一方面,基于审计监督与巡察监督在“以法治的思维和法治的方式开展工作”“依法审计与依规巡察”等工作逻辑方面相通原因,努力把审计的思想、制度、规则、方法与政治巡察贯通融合,推动巡察部门在巡审贯通方面建章立制,积极推动巡察工作的规范化、正规化。另一方面,基于审计监督与巡察监督在“坚持问题导向”“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紧密联系”等方面相通原因,为充分发挥审计专业技术优势,围绕巡察内容编写经济业务巡察工作流程图,梳理经济问题清单等,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为巡察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审计力量。

2. 关于纪律监察监督与审计监督贯通:审计与纪检同向发力,问题共答。坚持纪严于法、纪挺法前,用党纪丈量,积极发挥审计机关专业职能优势,违规违纪问题抓早抓小,积极主动查处违纪问题,加大移送处理工作,与纪律监察监督实现贯通。

3. 关于纪律监察监督与审计监督融合:尝试建立纪检监察审计工作组织(工作组),接受同一任务,实施同一方案,组成人员为同一整体,之间既有分工又有协作,把审计人员的专业技术优势与纪检监察的政治权威优势相结合,在一定程度、较高层次上推动纪检监察与审计监督的资源整合、力量融合,形成监督合力。

三、高质量审计推进工作保障机制分析

(一)注重加强对审计工作的领导,形成部门联动的工作合力

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是全党全社会的风向标,领导干部是高质量审计工作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在具体审计工作中,既可以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也可能起到致命的破坏作用。要注重加强对审计工作的领导,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进一步强化领导干部对高质量审计工作推进的主体责任,建立约束机制,形成政绩考核机制,推进干部能上能下。领导干部要做高质量审计工作推进的模范,这也是完成高质量审计工作目标和任务的关键所在。

应坚持审计监督与其他监督的贯通融合。以党内监督带动各方面监督,深化审计监督与纪检监察监督、巡视巡察监督等各类监督的贯通协同,进一步完善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紧盯审计移送问题线索的办理结果,紧盯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结果,推动形成衔接顺畅、配合有效的大监督工作格局。

(二)注重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促进审计工作的专业化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传承审计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按照“以审计精神立身、以创新规范立业、以自身建设立信”的总要求,筑牢理想信念,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强化许党报国、为国履职、执审为民、为民尽责情怀。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确保政治过硬,对党忠诚、坚持原则,在职责范围内大胆监督,敢审敢严,真审真严,坚持查真相、说真话、报实情。坚持依法审计,文明审计,时刻保持谦虚谨慎。做实研究型审计,强化专业训练和审计实践锻炼,增强审计干部能查能说能写本领,以专业能力确保审计质量。牢固树立“有问题没有发现是失职、发现问题不报告是渎职”的意识,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打造经济监督“特种部队”,发挥审计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中的独特作用,全面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审计干部队伍,为新时代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监督别人首先要做好自己。打铁必须自身硬。从严治理审计队伍,提升政治能力,夯实专业能力,培养职业精神,以高于监督别人的标准、严于监督别人的要求来约束自己,始终做遵纪守法、廉洁自律的表率。根据岗位职责,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咬耳扯袖、红脸出汗,严守纪律规矩。

(三)注重问题导向精准发力,确保审计工作实效

坚持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审计查处的经济社会问题,严守政治规矩,严格政治纪律,有力呈现政治问题、深刻挖掘政治责任,坚决保障党中央决策部署、政治意图和战略目标有效实现,以有力有效经济监督保障党中央令行禁止。

坚持以改革视角揭示问题,以改革思路推动解决问题,努力打造一批高层次、有分量的审计成果,为党委、管理层宏观决策提供参考,甚至直接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措施,努力将审计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结合具体审计领域,应深刻揭示风险隐患,积极发挥审计触角广泛、反应快速等优势和经济运行“探头”作用,有效防范各类风险,问题抓早抓小,及时揭示经济运行中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积极应对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坚持大兴调查研究,把研究作为审计的行为方式、融入审计实践,把立项当课题研究、把问题当课题研究、把建议当课题研究。推动调查研究与研究性审计融合,察实情、解难题、谋良策,不断深化解决问题思路和破解举措。

四、结论与展望

高质量审计推进是新形势、新时代的要求,审计事业的发展应顺应时代,具有符合时代的审计观、科学的审计方法、有效的工作保障,当然也绝不仅限于此。审计监督立足经济监督,经济又与政治密切联系,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紧密联系,因此研究、观察审计的视觉应当更加高深、宽广、长远,“跳出审计讲审计”“跳出经济讲经济”“跳出监督讲监督”。深入推进高质量审计当然离不开审计人深刻地审计实践,离不开审计人不断梳理、总结、丰富、发展审计理论,更离不开站立时代潮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举旗定向、掌舵领航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何高质量推进审计工作研究在新时代必将是一个重大而又深远的课题,它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值得审计人不断地去追求、探索、深化,以期有更先进的理论来指导审计实践,以期能更好地履行审计在新时代的职责,以期审计人能更好地担负起党赋予我们的使命。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

(下转第50页)

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的辨析

——以限缩解释方法展开

张子晗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在行为方式上存在相似之处,但前者的社会危害性明显低于后者,不应轻易界定为犯罪。为平衡个人权利与社会利益,辨析二者时应采取限缩解释方法,将符合条件的维权行为进行出罪处理。在法益层面,由于正当权利基础的存在,维权行为并未造成被害人的实质财产损失,不具有财产方面的法益侵害性。判定权利基础时应采取尽可能宽松的标准,不论是法定权利还是自然权利抑或道德权利,都能够成为合理的权利来源。在主观目的层面,充分的维权依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排除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只有当行为人主观上完全出于故意侵犯他人财产的恶意时,才能认定其目的上的非法性。索赔数额与非法占有目的之间没有必然联系,高额索赔只是行为人进行谈判的手段,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客观行为层面,过度维权也可能采取胁迫手段,虽然不一定构成敲诈勒索罪,但可能满足其他犯罪的成立条件,对其依照相关规定处理即可。

关键词:过度维权;敲诈勒索罪;正当权利基础;限缩解释;非法占有目的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4.01.007

中图分类号:D924.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4)01-0044-07

近年来,不论是“江苏女辅警敲诈勒索案”“演员吴秀波被女友敲诈案”等社会热点事件,还是实务中大量存在的“捉奸索赔”“怀孕索赔”等案例,抑或消费领域中频繁出现的职业打假、天价索赔等现象,都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在法治时代全面到来的今天,公民的权利意识得到了显著提升,也更加懂得使用法律武器来捍卫自身权益。然而,如果其采取了不当的维权方式,则有触发敲诈勒索罪的潜在风险。目前来看,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之间的界限仍然较为模糊,不仅在理论层面上众说纷纭,而且在实践判决中也饱受争议。一方面,出现了许多“同案异判”的现象,不同地区的司法判决结果各异^①;另一方面,部分判决结论超出了常理、常识、常情,无法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同。因此,关于二者的边界问题仍然存在进一步反思和探讨的空间。

根据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敲诈勒索罪的行为方式表现为以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向公私财物的

所有人或持有人强索财物。其中的威胁、要挟是指能够引起他人心理恐惧的精神强制方法。^[1]从客观上看,敲诈勒索罪要求通过威胁手段使他人遭受财产损失,从而让自己获利;从主观上看,行为人应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在一些不当维权的案例中,行为人出于迫使义务人履行义务的目的,采用了“威胁”“要挟”手段以获取他人财物。这种做法表面上看起来符合敲诈勒索罪的行为外观,如果仅仅从行为外表着手则难以直接对二者做出有效的区分。然而,过度维权行为毕竟属于“事出有因”,虽然其手段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侵害性,但其目的往往是为了恢复已经受损的权益,相较于“无中生有”的敲诈勒索罪,行为的法益侵害性与社会危害性都较低。因此,本文的基本立场是对涉及权利行使的敲诈勒索罪采取限缩解释的方法,在罪刑法定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应有权利。在判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要“重视权利人或利益主张者

收稿日期:2023-12-15

作者简介:张子晗(1999—),女,湖北荆门人,武汉大学法学院2022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刑法学。

因被侵权而索财的‘因果性’，而非局限于财物被索取的‘结果性’”^[2]，避免对案件的形式化、机械化处理，防止敲诈勒索罪落入“口袋罪”的深渊。当然，维权行为也不能毫无节制，否则将导致权利滥用和放纵犯罪，进而对作为个人法益集合体的社会法益造成难以逆转的损伤。因此，在解释时必须严守文义，避免走向极端，在保障权利正当行使的前提下力求理性克制，以更加清晰地厘清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的边界，为今后相关案件的科学、准确裁判提供有力的参考。

一、法益维度之限缩

(一) 敲诈勒索罪的保护法益

敲诈勒索罪属于典型的侵财类犯罪，基于体系解释原理，其保护的是财产法益，但有关财产法益的具体内容却一直存在争议，主要包括以结果无价值为基础的本权说和以行为无价值为基础的占有说两大派系。前者认为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是所有权及其他本权。据此，只有造成了民法上的实质财产损失，才能肯定财产犯罪的成立。^[3]后者认为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是他人对财物事实上的占有本身。只要行为人不是以法律所允许的方式获取他人财物，造成了财产秩序的破坏，就足以作为动用刑法的根据。^[4]^[122]二者在理论上都存在难以自洽的缺陷，例如，依照本权说的观点，如果行为人以赃物、违禁品等作为敲诈对象，则由于他人对这些物品的占有缺乏合法性基础，导致行为人即使实施了侵财行为，也不构成犯罪。然而，这样会不当缩小犯罪的成立范围，导致“黑吃黑”现象肆意猖獗，显然不合适。同样地，占有说虽然有利于维护经济秩序的稳定，但又会无限扩张犯罪处罚范围，不利于实现对真正权利人的保护。

为了弥补各自的不足，既不扩大也不缩小财产犯罪的处罚范围，出现了众说纷纭的中间说，虽然其具体观点各异，但主要都是围绕“基于本权说的中间说”和“基于占有说的中间说”两大分支展开。前者认为财产法益原则上限于所有权及其他本权，占有需向本权让步，但在例外情况下承认对违禁品等的占有。后者认为财产法益是占有本身，但如果事实上的占有者没有可以与本权者相对抗的合理理由，则其占有不受保护。^[4]^[122]二者相较，“基于本权说的中间说”更加具有说服力，更能解释财产犯罪的侵害本质，也更契合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应当作为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

结合敲诈勒索罪的具体认定进行分析，其一，保护占有归根结底也是为了更为有效和全面地保护本

权，如果过分强调对程序性利益的维护而忽略实体性利益，难免有本末倒置之嫌。在基于合同等民事权利主张的情况下，被害人在债权范围内本来就有根据合同约定支付款项的义务，行为人虽然迫使其交付财物，但他只是获得了其应当得到之物，而并未取得非法的财产利益。^[5]如果认为只要存在财物交付，就必然存在财产损失，只会使得损失这一概念有形无实流于形式。^[6]^[269]其二，从法秩序统一性的视角来看，如果行为人具有民法上的权源依据，其主张权利的行为能够为民法所认可，那么便应否定该行为成立犯罪的可能性。刑法要保持自己特有的谦抑性、补充性，尽量避免主动介入民事纷争，在民法上合法的行为，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刑法上的犯罪行为。其三，考虑到被害人先前存在过错，可以认为其对自身财产的占有在一定程度上不值得刑法保护。对此，山口厚教授认为，“金钱债权，并非是指对具体的日本银行券的占有，而不过是对金额具有意义，因此，除了能认定债务人具有期限利益、同时履行的抗辩权等正当持有金钱的利益的情形之外，在未履行债务的状态下，债务人对作为金额的金钱的占有，在债务的限度之内，就可认为是不合法的”^[7]。由于行为人是利益受损方，即使其实施了恐吓行为，也只是为了减少和弥补被害人先前过错造成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发动裁判规范对行为人施以刑罚。综上所述，应当认为，正当权利基础的存在能够排除行为的法益侵害性。换言之，如果行为人的过度维权行为并未造成相对人的实质财产损失，那么其就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二) 权利基础的类型

前已述及，行为人有无正当的权利基础、被害人是否遭受实质的财产损失，是判断敲诈勒索罪能否成立的核心要素。问题在于，何种类型的权利才能被视为正当呢？笔者认为，在判定权利基础时应采用相对宽松的标准，符合常识主义刑法观的要求，不仅需穷尽实定法已经规定和确立的权利谱系，也要充分考虑生活中广泛存在且获得普遍认可的非实定法意义上的“利益”。

1. 法定权利基础

行为人享有法定权利基础，也即行为人的请求权源于实定法的明文规定，具有法律上的权源依据。根据权利内容的确定性程度，可以进一步将其划分为确定的权利和不确定的权利，前者如数额确定且已届清偿期的债权，后者如购买到伪劣产品后对商家所享有的赔偿请求权。总体而言，当前学界大多数观点认为，如果行为人的“胁迫取财”具有法定权

利基础的支持,就不能被视为敲诈勒索罪。例如,张明楷教授曾指出,行为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进行的索财行为原则上不成立敲诈勒索罪。刑事司法机关应当妥善处理讨债、自力救济、职业打假等存在法定权利基础的维权行为,即使这些行为违反了民法、行政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存在不当、越权等情形,也不能轻易追究刑事责任。^[8]

在德国刑法中,如果行为人存在实体法上的请求权,通常就可以否定其利用恐吓手段取得财产行为的违法性,即便手段不合法,原则上也不成立敲诈勒索罪。^[9]日本刑法对此暂无明文规定,但理论上存在激烈争论。虽然目前学界通说认为,非经法律手段迫使他人交付财物的行为能够成立敲诈勒索罪。但也有学者指出,如果满足了以下三个条件,便可以阻却行为的违法性:(1)处于权利范围之内;(2)有私力救济的必要性;(3)社会通常观念看来手段具备相当性。^{[6]269} 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于那些具备法定权利基础的行为人,即使他们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胁迫行为,也往往不会构成财产犯罪。例如,前文提及的“郭利三聚氰胺奶粉索赔案”中,被告人郭利发现其购买的奶粉中三聚氰胺含量严重超标,要求施恩公司支付300万元人民币的巨额赔偿金。经历了一审、二审和两次再审,原先的有罪判决被推翻,郭利被改判为无罪。^②由此可见,法定权利基础在敲诈勒索罪的认定过程中扮演着不可逾越的“权利障碍”角色。

2. 自然权利基础

这里所提的“自然权利”主要指的是指高利贷、赌债等“非法债权”,债权人可以向债务人请求履行,但其请求权缺少法律强制力的保障,无法获得国家的强制执行。对于这类权利,笔者认为,尽管它们在民法上缺乏合法依据,但这并不意味着行为人无权提出相应主张,更不能据此断定讨债行为侵犯了财产法益。

首先,虽然债权、债务关系是非法的,但不能单纯凭此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不论是赌博还是高利放贷等行为,都是建立在双方当事人合意基础上的真实交易,这与不支付任何对价、凭空获取他人财物的敲诈勒索罪存在本质区别。其次,行为人之所以实施恐吓、纠缠、骚扰等行为,是因为被害人拒绝履行债务,被害人对于矛盾的激化负有明显责任,其在进行违法交易的当时就应该能够预见到债务被催收的后果。在这个意义上,财产损失的风险并非行为人所引起,而是被害人自己在其先前的行为中预设的。最后,从类比的视角来看,

依照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行为人非法扣押、拘禁被害人,并向其亲属主张高利贷、赌债等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仅构成非法拘禁罪而非绑架罪。^③在抢劫赌资、犯罪所得的赃款赃物等情形中,行为人仅以自己所输赌资或所赢赌债为抢劫对象,一般也不以抢劫罪定罪处罚。^④由此,依照“举重以明轻”的法理,行为人通过恐吓、威胁等手段主张权利,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的结论可能更具合理性。至于其手段行为是否符合其他犯罪的构成要件,则是另外需要讨论的问题。

3. 道德权利基础

此处所讨论的道德权利与前文提及的自然权利具有一部分共同特征,即虽然行为人的请求权不具有法律上的权源依据,不能合法有效地请求国家强制执行,但行为人又确实存在事实上的损害,并认为自己有权向对方主张赔偿。例如,妻子在两年间持续遭受领导的性骚扰,丈夫知道后,认为自己的“夫权”受到了侵害,夫妻二人及家庭受到了永久且无法弥补的精神损害,于是向该领导索要16万元精神损失费。^[10]对于此种权利主张,许多学者倾向于直接否定其作为权利基础的正当性,司法实践通常也将这种“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予以犯罪化处理^⑤。有观点认为,此类请求权有事实根据,但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为正当的索赔依据。例如,甲女因与乙男分手后心怀不甘,设下圈套索要“青春损失费”5万元,该恐吓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11]还有观点认为,如果债权的合法性本身存疑,且主张权利的方式违反社会通常观念,则可能会被认定为犯罪。例如,甲因妻子与他人通奸,为索取奸夫乙事先答应赔偿的5万元,带领亲友多人携带凶器前往乙家索要财物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12]然而,就道德权利基础能否成为敲诈勒索罪的出罪依据的问题而言,笔者认为仍然存在较为广泛的讨论空间,不应一概进行否定。

一方面,道德权利是一种先于并独立于国家法律而发出的对人们的普遍期待,它决定了法定权利的合理性。^[13]即使是被学术界所普遍认同的能够成为正当权利基础的法定权利,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由人们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演化来的。如果将利益受损这一事实仅仅等同于对法定权利的侵犯,不仅难以解释为何要对这些利益进行保护,也容易导致司法的机械和僵化。另一方面,权利的范围本身也处于不断的变动和发展过程中。立法者无法穷尽人类社会已经出现和将要出现的所有权利类型,新型权利不断产生,因此,对于未经法律正式认可但

被社会公众广泛接受的权利,也必须予以承认和尊重。^[14]“不管是法定权利还是习俗权利抑或是道德权利,都是人类社会所认同的文明类型,都蕴含着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世俗的道德权利也具有规范力量,作用于共同的社会道德框架”。^[15]故而只要行为人的权利主张没有明显超出“社会相当性”,符合社会公众的常情常感,具备道德上的合理性,就不应构成敲诈勒索罪。

二、主观目的维度之限缩

(一)非法占有目的之“非法”要素

虽然我国《刑法》对于敲诈勒索罪的规定并未明示“非法占有目的”这一构成要素,但它一直被普遍认为属于财产犯罪的必备条件。甚至在不少刑法教材中,敲诈勒索罪被直接定义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构成要件。^[4]^[1329]^[16]从字面含义进行理解,“非法占有目的”是指非法掌握控制财物的目的。^[17]尽管学界对于何谓“占有”存在着不同见解,主要涉及支配意思说、利用处分意思说和中间说等三种学说^[18],但无论是行权行为还是勒索行为,行为人在主观上对于财物都具有“占有”目的,如果仅将“非法占有目的”的核心内涵限定于排除意思和利用意思之间的区分,显然无益于敲诈勒索罪范围的限缩。因此,此处讨论的重点应集中在“非法”这一定罪的前提要素上。只有行为具有非法性的基础,才可能构成犯罪。

至于行为目的是否“非法”,有学者主张应当依据行为人的“主观确信”来判断,但这一主张的前提是行为人的主观确信必须有合理根据,即与社会通常观念相符。^[19]然而,这种判断方法主观色彩过于明显,完全依赖于行为人的内心意图,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同时,“社会通常观念”这一概念也存在较大模糊性,能够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另有学者主张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方法,认为如果行为人没有证据和法律依据证明其权利主张的正当性,就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20]但这种做法不仅不利于行为的准确定性,还会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导致冤假错案。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应由控方承担^⑥，“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是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之一。

本文的立场是,首先应从客观角度审视行为人的维权依据。维权依据越不充分,行为人对财物的非法占有目的就愈加显著,行为便更容易被定性为敲诈勒索罪。反之,如果行为人的目的并非非法剥夺他人财产,而是出于一种私力救济的考量,那么在

对其进行财产犯罪的评价时则要格外慎重。其次,“非法”这一要素要求行为目的具有剥夺性,即行为人明知自己没有任何权利基础,仍然具备侵犯他人财产的主观恶意。换言之,行为人主观上所表现出的对他人合法财产利益的不尊重,才是判断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前提和基础。

(二)索赔数额与“非法占有目的”之间的关系

当行为人拥有的请求权是确定的——如数额明确的债权,为了使权利真正得以落实,行为人采取带有恐吓性质的自救行为,索取其权利范围内的财物,由于没有侵害财产法益,不构成敲诈勒索罪,这是毋庸置疑的。与此对应,如果行为人故意超出自己的请求权范围,采取强制手段索取其权利范围以外的财物,造成被害人的财产损失,则可以认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如果其他方面符合了敲诈勒索罪关于罪质和罪量的要求,就可以据此判定其构成敲诈勒索罪,这也是不难理解的。^[21]

真正引发争议的情形是:行为人虽然享有索取对方财物的请求权,但有权索要的具体数额却是不明确的。其基于此种权利基础而实施了恐吓、胁迫等行为,是否足以成立敲诈勒索罪呢?实际上,现实生活中大部分涉嫌犯罪的权利行使行为都属于这种情况。不论是拥有法定权利基础的消费者索赔案,还是拥有道德权利基础的“怀孕索赔”案等,由于权利的不确定性,要认定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和被害人的利益损害都变得非常困难。对此,笔者的基本主张是,权利基础正当但得以主张的具体数额并不明确时,无论是再大的索赔请求也不足以认定“非法占有目的”。

首先,这是“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基本体现。赔偿额的多寡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领域,具体数额取决于双方的协商,不能简单地认为某一限度内的赔偿数额是合法的,超出这一限度即属非法。例如当前争议颇大的消费者索赔案例,由于涉及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等关系人们切身利益的问题,消费者提出较高的索赔数额是常见且不难理解的,因此,不应将合理索赔数额限制在较低范围内。^[22]其次,以前文提及的“夫权”为例,许多尚存争议的新型权利本身就无法体现为具体的数额,法律也缺少与之相关的规定。既然难以确定一个统一、明确的衡量尺度,那么如何才能判断行为人的主张是否“明显超出权利范围”呢?即使对于专业法律人士来说,这也是一个难以给出标准答案的问题,那么,就更没有理由去为难普通的社会公众了。最后,当侵权行为发生后,行为人会同时产生两项权利,一项是实体性

的,另一项是程序性的。前者是要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权利,后者是通过提出保护、救济的请求来保障前者得以实现的权利。应当将这两种权利分别进行审查,即使行为人的实体性权利主张无法得到支持,也不能因此否定其程序性权利。^[23] 综上,对于内容不确定的权利,行为人单纯提出较大的索赔数额并不会使被害人的财产权利受到实际损害,也不应当将之作为认定敲诈勒索罪的依据。

三、客观行为维度之限缩

(一) 恶害胁迫与恐惧心理的实质探析

一般认为,敲诈勒索罪既遂的基本结构为:对他人实行威胁(恐吓)→对方产生恐惧心理→对方基于恐惧心理处分财产→行为人或第三者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4]1329} 其不法手段主要表现为采取“恶害通告”的方法来实施胁迫。胁迫的方式没有具体限定,可以是采用轻微暴力,也可以是以暴力相威胁或者以损害名誉、揭发隐私等作为要挟。无论采取何种手段,核心目的都是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并基于这种心理主动向行为人交付财物。

然而,不少观点认为,“恐惧心理”并非所有敲诈勒索罪的被害人都必须具备的主观要素,其处分财物的行为也不一定完全是基于恐惧。例如,有学者指出,应当以“意思形成自由受到强迫”来替代“被害人恐惧”,因为勒索行为是通过对方的精神强制来获得财产利益,精神强制并不一定导致恐惧,但恐惧却必然源于某种形式的精神强制。^[24] 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是否会感到恐惧极易受到被害人个体差异的影响,勇敢或镇静的人不容易感到恐惧,但他们仍可能基于羞愧、无奈等心理而做出处分财物的行为。如果认为只有被害人基于恐惧心理所做的财产处分才构成敲诈勒索罪,无疑会限制该罪的适用空间,从而使该规范保护财产法益免受侵犯的目的落空。因此,笔者主张,恐吓行为的不法性并不在于使被害人恐惧,而在于限制被害人的自我决定,强制性才是恐吓行为最核心的特征。

在正常的维权活动中,行为人也可能使用“恶害通告”的方式对义务人施加精神压力,迫使其履行义务。在判断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时,应采取严格的限缩解释立场,认真考察所谓的“恶害胁迫”与被害人“精神强制”之间的实质联系,而不宜进行抽象的泛化理解。例如,在“黄静天价笔记本索赔案”中,黄静购买的华硕笔记本电脑的CPU为工程测试版而非正常版,这种样品CPU不被英特尔公司允许在市场上销售。因此,黄静向华硕公司提出了5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25] 本案中,黄静索

赔的数额远远超出其实际损失,其行为显然干涉了商家的财产处分自由,但不论是司法实务还是刑法理论,都没有将黄静的所作所为当成犯罪来处理,而仅将之理解为消费领域的“过度维权”现象^[26]。之所以得出这种结论,是因为被害人基于精神强制所作的财产处分,只有在行为人单方施加“胁迫压力”的情况下才能构成敲诈勒索罪。换言之,如果行为人拥有某种权利基础,其据此实施的胁迫行为虽然具有“以恶害相通告”的形式外观,但却由于被害人先前存在过错而在实质上变为了双方关于被害人过错的“处置性协商”。可见,行使权利的行为与敲诈勒索罪规范意义上的胁迫、恐吓等要素显然不处于同一位阶的评价体系,对此需进行理性的区分和对待。

(二) 非法手段本身可评价为其他犯罪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判断维权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的过程中,权利的正当性是认定手段正当性的前提和依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要存在权利基础,就可以完全摆脱任何行为无价值方面的约束。由于各个犯罪的构成要件不同,所侵害的具体法益也有差异,就不同犯罪而言,违法性的判断是相对的。使用恐吓手段来主张权利的行为,尽管在构成财产犯罪方面存在障碍,但却完全可能由于手段本身的社会危害性而成为其他犯罪的追诉对象。例如,通过非法拘禁或者故意伤害的方式强取财物,无论权利基础是否正当,手段行为本身都有可能单独构成非法拘禁罪或故意伤害罪。再如,根据我国《刑法》第293条之一的规定,对于使用暴力、胁迫方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或者侵入他人住宅,恐吓、跟踪、骚扰他人,催收高利放贷等产生的非法债务,情节严重的,构成催收非法债务罪。这一条文确认了采用胁迫手段索取非法债务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表明自然权利也能成为正当的权利依据,与本文观点具有一致性。同时,该规定也对行为手段的违法性进行了合理评价,有效避免了处罚漏洞,能够做到罪责刑相适应。

四、结语

就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的关系而言,行为人是否具备某种正当的权利基础是区分二者的关键。如果行为是“事出有因”,就不应轻易将之认定为敲诈勒索罪。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法益,如果被害人先前存在不法或过错,对行为人负有法定或道德上的义务,行为人通过胁迫方式索取财物的行为就只能视作督促对方履行义务的手段。基于权利基础的所谓“敲诈勒索”,在本质上应当认定为双方带有交易色彩的相互妥协。行为人的行为并没有使被害人的

整体财产状况恶化,没有造成实质意义上的财产损失,因而并未侵犯财产法益,也就谈不上敲诈勒索罪的问题。对于这种体现着浓厚私人属性和个人意志的妥协活动,刑法应保持其特有的谦抑性而不能强力介入。如果司法判决过于强调表面的“胁迫取财”行为而忽视其深层的权利基础内核,不仅对行为人来说难言公平,也不利于社会矛盾的及时解决。因此,对行为的评价不应拘泥于表面,而要采取实质正义的立场。法律不应强人所难,不宜也没有必要对维权人提出过于苛刻的要求。虽然文明社会强调维权时应优先考虑公力救济,但在实际情况中,公力救济的高成本和低效率常常成为维权过程中的重要障碍。在当今权利多元化的时代,我们需要对私人权利予以足够的尊重,为私力救济多留一丝空间,为维权行为多留一丝宽容。在判断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时,要坚持限缩解释的方法,平衡好私人权利与公共秩序之间的关系。当然,如果手段行为本身符合了其他犯罪的构成要件,则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不会导致权利滥用。

注释:

- ①例如,同样都是消费者维权的案件,“黄静天价笔记本索赔案”被作存疑不起诉的决定,“郭利三聚氰胺奶粉索赔案”再审判判无罪,“李海峰今麦郎方便面天价索赔案”却获刑八年六个月。
- ②参见广东省潮安县人民法院(2009)安刑初字第492号刑事判决书、广东省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潮中法刑一终字第17号刑事判决书、广东省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潮中法刑终再字第1号刑事判决书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审监再字第19号刑事判决书。
- ③参见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拘禁他人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解释》的规定。
- ④参见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所印发的《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条第2款。
- ⑤此例中的丈夫即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 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61条第二款:“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指控犯罪时,应当提出确实、充分的证据,并运用证据加以证明。”

参考文献:

- [1]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522.
- [2]庄绪龙.道德权利理论与敲诈勒索罪的教义学限缩[J].中外法学,2022(2):485-503.
- [3]胡启忠,金朝榜.“先因型”敲诈索财行为的罪与非罪[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65-

73.

- [4]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
- [5]周光权.权利行使与财产犯罪:实践分析和逻辑展开[J].现代法学,2023(2):158-174.
- [6]西田典之,桥爪隆.日本刑法各论[M].王昭武,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20.
- [7]山口厚.刑法各论[M].王昭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34.
- [8]张明楷.妥善对待维权行为 避免助长违法犯罪[J].中国刑事法杂志,2020(5):3-19.
- [9]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0:569.
- [10]刘立军,陈磊.北大刑法学博士“勒索”隐情披露:妻子两年间遭领导性骚扰丈夫索要16万元精神损失费[N].法治日报,2011-01-04.
- [11]柏浪涛,谷翔.敲诈勒索与行使权利的界限[J].法律适用,2010(10):76-79.
- [12]周光权.刑法各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154.
- [13]罗翔.法益理论的检讨性反思:以敲诈勒索罪中的权利行使为切入[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8(2):52-69.
- [14]谢晖.论新型权利生成的习惯基础[J].法商研究,2015(1):44-53.
- [15]程燎原,王人博.权利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327.
- [16]陈兴良.刑法各论精释[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580.
- [17]刘明祥.财产罪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67.
- [18]大谷实.刑法讲义各论[M].黎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78.
- [19]叶良芳.权利行使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7(3):64-69.
- [20]沈志民.对过度维权行为的刑法评价[J].北方法学,2009(6):80-84.
- [21]董文蕙.维权的界域:敲诈勒索罪与非罪的探讨[J].社会科学家,2009(4):83-86,91.
- [22]蔡桂生.合理行使权利与敲诈勒索罪的区分[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8(2):23-33.
- [23]杨路生.敲诈勒索罪定性研究[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5):50-57.
- [24]蔡桂生.敲诈勒索罪中“被害人恐惧必要说”之证伪及其出路[J].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9(4):87-93.
- [25]李琦,胡祥宝.台商华硕遭500万美元索赔真相调查[J].IT时代周刊,2008(22):32-39.
- [26]蔡颖.有因型敲诈勒索的刑法定性:以被害人过错为视角[J].中国刑事法杂志,2022(5):64-79.

(责任编辑 刘成贺)

Analysis of Differentiating between Excessive Protection of Rights and the Crime of Extortion

—By the Way of Restrictive Interpretation

ZHANG Zihan

(School of Law,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Abstract: Excessive protection of rights and the crime of extortion share similarities in their modes of behavior. However, the former is significantly less socially harmful than the latter and should not be easily defined as a crime. In order to balance individual rights and societal interests, a restrictive interpretation approach should be adopted when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he two, whereby qualified rights protection behaviors are exempt from criminal prosecution. On the aspect of legal interests, due to the existence of a legitimate right basis, the act of protecting the rights do not result in substantial property damage to the victim and do not constitute a property interest violation. The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the basis of rights should be as lenient as possible, whether it's a legal right, a natural right, or a moral right, all of which can be a reasonable source of rights. Regarding the subjective intent, a sufficient basis for the protection of rights can, to a certain extent, exclude the actor's illegal possession intent. Only when the actor is subjectively motivated by the malice of intentionally infringing on another's property can his intent be considered illegal. There is no necessary connection between the amount of the claim and the intent for illegal possession. High claims are merely negotiation tactics, and the autonomy of the parties' intentions should be respected. On the objective behavioral level, excessive protection of rights may also employ coercive means. While it may not necessarily constitute the crime of extortion, it may satisfy the criteria for other crimes, which can be dealt with by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Key words: excessive protection of rights; extortion; legitimate basis for rights; restrictive interpretation; intent for illegal possession

(上接第 43 页)

[2] 阎建合. 新时代背景下对权力运行审计监督: 内容、目标及路径[J]. 中州大学学报, 2022(5): 37-38.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

[4] 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上)[M]. 张雁深,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1.

(责任编辑 刘成贺)

Research on High – quality Advancement of Auditing

YAN Jianhe

(Zhengdong New District Finance Bureau, Zhengzhou, Henan 450046,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audit work with high quality, there should be a profound, broad and long – term view of auditing, a scientific and dialectical audit methodology, and an effective guarantee mechanism for the promotion of auditing. It is indispensable for auditors to constantly sort out, summarize, enrich and develop audit theories, and even more indispensable fo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which stands at the head of the tide of the times, and raises the flag for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akes the helm to steer the ship. How to promote high – quality auditing research in the new era will be a major and far – reaching subject, worthy of auditors to continue to pursue, explore, deepen.

Key words: audits; audit perspective; audit research

《民法典》转介条款适用问题研究

刘思艺

(中南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 410017)

摘要:《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是强制性规范干预私法自治的转介条款,也是公法转介进入私法的通道。转介条款是转介公法的概括性条款,在引致规范的基本功能之上具有使法官进行自由裁量的概括功能,与引致条款、任意条款具有根本上的区别。转介条款转介规范的具体类型为对法律行为内容进行规定的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转介条款是民法典的立法者通过立法技术以水平的方法解决公私法接轨争议问题的途径之一,其在民法典中的设立具有必要性。转介条款的具体适用方法包括三个步骤:首先,判断是否存在强制性规范;其次,判断法律行为是否违反强制性规范;最后,判断违反强制性规范是否必然无效。

关键词:转介条款;强制性规范;法律适用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4.01.008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4)01-0051-06

转介条款是我国《民法典》中较为特殊的一类条款,其定义目前仍存在分歧。有学者指出,转介条款等同于“另有规定”条款^[1],也有学者认为转介条款即为转介公法进入私法的条款,从而排除了部分“另有规定”条款。苏永钦教授指出,转介条款是在《民法典》内建立某些让管制法规的政策考虑“流入”私法关系的管道,且强调转介条款为概括条款,不应只具体导向某一法律及法条,而是以法官的自由裁量为主。^{[2]83}笔者更倾向于苏永钦教授这一定义,基于此,转介条款应当是转介公法进入私法、以法官的自由裁量为主的概括性条款。

通过这一定义对我国《民法典》中的转介条款进行搜索,明确我国《民法典》中的转介条款主要为第153条第1款。《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那么为何第153条第1款的性质为转介条款,如何界定转介条款,其与“另有规定”条款之间的区别是什么?转介条款的适用依据是什

么,应当如何适用,具体的适用方法何在?这些都是《民法典》实施过程中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从司法实践来看,我国并未明确指出某一条款是不是转介条款,且大多数法院的实际做法将转介条款与引致条款适用相混淆,而对于具体适用的方法更是不甚明确、做法不一。这些现象表明实践中对于转介条款究竟应当如何界定、正确的适用方法是什么等问题,尚未形成共识。为此,本文拟针对这些问题谈一点看法。

一、转介条款的基本理论

如何理解和适用《民法典》中的转介条款,既是法学理论领域的重要命题,也是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应从转介条款的基本理论入手,透视立法主体寓于其中的价值取向,归纳总结该类条款的一般性原理,了解其定义、范围与功能。基于其理论基础,可探求该类条款适用根据与方法。

(一)转介条款的界定

转介条款的界定主要在于界定其与引致条款、任意规定的区别。目前许多学者仍然将转介条款等

收稿日期:2023-12-20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下失地人群权益保障问题研究——以云南大理为例”(CX20220152)

作者简介:刘思艺(2000—),女,湖南长沙人,中南大学法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同于引致条款或是任意规定,或是将所有条文中出现“另有规定”这类表述的条款均归于转介条款。这是对转介条款的定义、定位模糊所导致的。《德国民法典》第134条规定:“法律行为违反法律上的禁止时,无效,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一规定与我国《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存在相似之处。德国学者Flume认为这一类型的规定应当为引致规范条款,即不具有独立规范含义和解释规则意义,在功能上只是单纯将法律适用者的视角引致另一个具体法律规范。引致条款强调法律规范的具体性,即要求其引致的法律规范在特殊事项的法律体系中能找到具体适用的规范。它不要求法官对这类条款的适用进行裁量与权衡,法律适用者需做的仅仅是根据民法典中具体事项与引致条款的结合指引找到应当适用的特殊法。其主要作用是引致某一规范供法官适用,把私法或者其他法律中已规定了私法效果的条文重复作一次总括规定。也即大部分学者强调的连接功能。我国《民法典》中存在大量引致条款,例如第138条规定:“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表示完成时生效。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这类依照相关规定的条款,即为引致条款。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将任意规定与转介条款相混淆。任意规定是指可以以当事人之间规定优先的规定,其主要立法形式为“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或是“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民法为私法,讲究私法自治,因此其中存在大量以当事人约定为主的规定。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当事人规定与“另有规定”条款共存的情形。有学者认为,虽然规定可以选择适用当事人约定或是法律法规特殊规定,但由于存在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情形,则将适用法律法规特殊规定,因此这类条款也将转介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进入民法典,属于转介条款。这一观点的错误在于任意规定并未课予当事人任何义务,因此也无从“违反”;而对于多数当事人无约定情形,其仍然是引致条款引致到其他特殊规定的情形,不属于转介条款所要求的转介公法并由法官自由裁量是否存在效力的情形。因此,对于认定合同违反任意规定而无效者,并以此认定该类“另有规定”条款为转介条款的情形,可以说是完全错误。

由以上区别可以看出,转介条款本质上为与公法相接轨的概括条款。既然为概括条款,那么转介条款必然不应当仅仅只转介到具体的法律规范,而是给法官基于实际情况和立法宗旨进行自由裁量的权力,这与引致条款具有本质上的差异。“台湾最

高法”103年度台上字第1242号判决中指出:“惟其性质上属于‘转介条款’及‘概括条款’,自须引入联结该条以外之其他公私法中之强制规范,使之成为民事侵权责任的内容,该项不明确之法律规范得以充实及具体化。”可见,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实务中对转介条款的适用也是将其作为概括条款进行适用。若将其与引致条款相混淆,则会使人认为只要无法引致任何特别规定,转介条款就只能作为概括条款,不予以适用。若将转介条款混淆为能引致特别法的具体规定的引致条款,无疑使得它的适用范围以及作用大大减小。而转介条款既然是转介公法的条款,那么其必然排除当事人的约定,不存在违反当事人约定而导致行为无效的情况,其继而适用特别法的情形也应当将其认定为引致条款,与转介条款相区分。据此进行界定后,我国《民法典》中符合转介条款定义特征的规定为第153条第1款。

(二) 转介条款的范围

转介条款的范围主要是指转介条款所转介到的法律规范。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的规定,其指出无效的理由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此处的强制性规定是与任意性规定相界分,也是转介条款的范围。强制性规定是指行为人应受约束而不得自行调整的规定,不同于可以适用当事人约定的任意性规定,强制性规定以“强制”为赖以依凭的基本方式。^[3]曾经的《〈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4条将“强制性规定”限定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而将“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排除在外。根据这一解释,转介条款的范围首先应框定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以及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内。

曾经的《〈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进一步将“强制性规定”明确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划分一直以来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化是一记“马后炮”,并无能力指导法官的预先判断,因而无实际意义;还有学者认为此类型化是司法解释的错误,应当放弃。^[4]然而王利明教授认为此种区分是对此概念的目的性限缩解释,通过减少法律、行政法规对法律行为效力的限制,扩大了民事主体意思自治的范围。^[5]强制性规定目前最为主流的类型划分是将其划分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这一划分方法来自《〈合同法〉司法解释(二)》,但其根本来源实则继受域外法。强制性规范类型化系日本民法学者所创设,德国和法国民法没有效力性规定与管理性规

定的区分。因此,我国台湾地区学界和审判实务界是继受日本学者对此概念之区分。然而实务中对这两类的区分仍然存在较多争议,存在同案不同判的情形。最高院编著的《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一书中提出识别的正反两个标准直接采纳了王利明教授的意见,即效力性强制规范针对的多为行为内容,而管理性强制规范大部分时间单纯限制的是主体的行为资格。目前在学术界和实务中,对于这两类强制性规范的界分仍无明确的、可适用的标准。

(三)转介条款的功能

对《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其具有引致规范与概括条款双重功能。引致规范的功能体现在若法律、行政法规有具体的强制性规定,则可以直接进行引致,从而对某一事项进行规制。但前文提到,转介条款为概括性条款,那么其功能就不仅在于单纯地转介具体规范对某一事项进行规制。在转介条款中,立法者并未做出私法评价,司法者需要独立地做出评价,这里已经蕴含了司法者评价的必要性。^[6]即让法官对内部的自治规范要坚持到什么程度做一个把守和定夺。法官和学说会创造出一个调和的判断基准,比如《民法典·合同编》的大部分规定应当以私法关系为主,在合同编的管理性规定中公法就不应该通过转介条款介入私法关系,这即是应当坚持的私法自治的部分。而对于效力规定是否应当介入私法关系进行干预,若干预应当干预到什么程度则需要由法官进行自由裁量。对《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的规定进行分析,该条是一个具有概括性的表达,并无法具体举例。在公法具体规定了某一民事法律行为违反了相关规定且无效的情况下必然应当转介,但某一行为已经违法,其转介的强制性规范并未规定法律行为的效力,那么则需要法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定夺。这即是转介条款的功能所在,也就是说不仅是单纯的引致,而是以其概括性条款的定位,要求法官根据各类具体情形灵活行使自由裁量权,分析公法介入与否与介入程度,以求公私法的平衡与公法对私法的明确、清晰的管制。

二、转介条款的适用根据

任何一个条款的设立都有其根据。转介条款基于其强制性规范对私法进行干预的功能,适用根据源于古罗马时期的公私法界分及由于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下的公私法接轨,即转介条款是解决公私法接轨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一)公私法的界分

公法、私法的划分渊源于古罗马时期法学教科

书的逻辑分析。目前关于公私法界分的学说较多,其中较为主流的为意思说,该说认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为公法关系,其法律规范为公法;平等的、不具有管理关系的主体间的关系为私法关系,其法律规范为私法。公法关系为垂直关系,以行政关系为主干,其指导原则为依法行政;而私法关系为水平关系,以契约关系为主干,其指导原则为私法自治。

公私法之间原本隔着“楚河汉界”,并不互相干预。公法领域的行政关系主要由抽象行政行为 and 具体行政行为所形成或确定,私法领域的契约关系则以当事人的意志为核心。然而随着经济发展、政治制度、法律思想和市民观念等多个因素的演变,在单方行政行为相同的具体规范层次,又衍生出了包括行政协议、行政合同的双方行政行为。私法领域的契约也变得十分复杂,在公法领域出现了具有私法的平等关系的行政协议等行政行为的同时,私法领域也相应地出现了具有管理特征的具有公法特征的行为与规定。公私法相互渗透的背后,也说明传统公法和私法所实践的分配和对等正义,已经不能满足高度工业化、都市化的社会对正义的渴望。^{[2]97}劳动法、经济法、环境法等新兴法域的出现,使得私法与公法交互影响,而在公私法进一步多层交错的同时,其内部的调和问题以及外部的接轨问题就出现了。

(二)公私法规范的接轨问题

尽管公私法之间各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但公法和私法并不可能泾渭分明,完全不接轨。从立法层面上来看,民法的主要内容源于对罗马法的整理诠释,其产生较行政法早,并远比行政法发展成熟。基于此,行政法在制度设计时不可避免地会借鉴当初的民法理论。以行政主体为例,余凌云教授指出,将我国目前的行政主体理论与民法上的法人概念进行比较,不难发现其实质上是后者在公法上的翻版,只是用行政权力替代了权利能力的内涵。^[7]除此之外,在我国目前实行的行政法中处处可以发现民法的影子,例如国家赔偿制度就参考了侵权行为。而后来发展出的行政合同、行政协议,更是兼具公私法的性质。因此,行政法在立法层面就已经大量移植了民法的概念、制度与方法。在适用层面,民法在一定的情形下必须以公法领域的决定或是行政行为为基础,而行政法以一定的民事关系为其公权力行使的构成要件。类似于这样的适用层面的互相接轨,在公私法领域已高度的发展的今天,出现越来越频繁,因此公私法的接轨问题也越来越

重要。

除此之外,特定行政机关的决定或行为是民事关系发展中重要的一环。例如各项许可证的取得,特定产品进出口应取得的配额等。而行政行为的标的必须随着民事关系的复杂化而增加其精确度和特殊性。公私法的接轨在潜移默化中越来越密切,而这一强制接轨也产生了许多接轨问题。我国是审判权二元化的国家,相牵连接轨的公私法争议事项在两者中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法律概念或是解释,这样的不同将导致当事人无所适从。基于此,立法者用规定前后顺序的方法解决这一冲突,而转介条款的设立,正是民法典的立法者通过立法技术以水平的方法解决接轨争议问题的途径之一。民事关系的复杂化导致行政行为的标的无法完全具体化,转介条款以其概括功能,在无法具体对应一一接轨时,使得公法介入私法进行干预,使得公法在某些情形下位于私法秩序之上,也就是常说的先行政后民事。此时的公法,应当视为私法的辅助工具,通过这一辅助工具发挥整合功能。而转介条款,则是使用这一工具的管道。

(三) 转介条款的干预限度

转介条款的设立是公私法接轨的管道之一,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私法公法化”是当前发展的趋势,但是民法作为私法,其最为主要的原则仍然为私法自治,过分依赖体现国家干预的强制性规范来实现管制目标,有可能会适得其反。也就是说,转介条款引入公法进行干预是有限度的。对转介条款的适用情形进行分析,其多为公法的立法者十分重视实现某个事项的管理与管制目标的领域,如特定行业的资格限制、生态保护等,而权衡某个事项的管制目标,是否足以使公法干涉私法自治,这是其限度所在。基于此,转介条款对经济事务的干预应当严格控制,控制在“国家和社会无法忍受”的范围内,否则将打破公私法之间的平衡。

三、转介条款的适用方法

条款的具体适用方法在实务应用过程中必不可少。转介条款的适用步骤以及每个步骤的具体操作、判断标准等,目前来说并不清晰。本文将从《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的规定着手,分三步对转介条款进行具体适用。

(一) 是否存在强制性规定

判断是否存在强制性规定,首先要区分何者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即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相区分,并对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进行识别。目前对于效力性强制性规范的识别仍不甚清晰,最高院在其下发的

《合同纠纷指导意见》中指出“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法律法规的意旨,权衡相互冲突的权益,诸如权益的种类、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规制的对象等,综合认定强制性规定的类型。”而目前学术界与实务界最大的误解在于将赋权性规定认定为是强制性规定。前文提到,效力性强制性规范多为针对行为内容,包括行为对象、行为标的、行为目的等。例如我国《招标投标法》规定“中标人不得向他人转让中标项目,也不得将中标项目肢解后分别向他人转让”。这一规定即是针对行为标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管理性强制性规范限制的大多是主体的行为资格。赋权性规范即是对主体的行为资格的限制,与其他规定“不得”“禁止”形式存在的其他规范存在区别,与其相抵触只发生是否“生效”的问题^[8],如《招标投标法》第9条规定:“招标项目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履行项目审批手续的,应当先履行审批手续,取得批准。”对效力性强制性规范的识别,是适用转介条款的第一步。

(二) 法律行为是否违反强制性规定

1. 探索立法宗旨

在《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作为引致条款时,由于强制性规范已就法律行为的效力进行了明确规定,此时不需要对立法宗旨进行探索。而在其作为转介条款时,由于强制性规范未就法律行为的效力予以规定,表明法律已经授权民事法官就法律行为的效力给出答案,此时即需要民事法官对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的立法宗旨进行探究,主要应探究相关强制规范所欲实现的具体立法目的是否关涉公共利益。^[9]若转介所引入的强制性规范其主要立法目的是对个人的利益,即私法上的利益进行保障,而不是直接明确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则不应使其转介强制性规范对该类行为进行干预。最为典型的是限制私法权限的强制性规范,例如对劳务、商誉、特许经营权的出资禁止,破产管理人的职权限制。这类强制性规范的立法目的不关涉公共利益,抑或是不以公共利益为最主要、直接的立法目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是援引无权代理、无权处分等相关规范予以适用。也就是说,并不因其违反涉及公共利益的强制性规范而认为其行为绝对无效。

2. 权衡相冲突的法益

在分析立法宗旨明确其关涉公共利益后,也不必然代表该法律行为无效,还需由民事法官对相冲突的法益进行权衡。首先,应当考虑强制性规范立法目的,即其所考虑保护的法益与某一行为本身所涉及的法益是否处于同一保护层级。例如有关卫

生、环境的行政法规所规定的强制性规范多为对公民生命健康以及国家环境的保护,而民法典中的法律行为涉及的法益大部分情况下为交易安全、信赖等,与之相比,强制性规范所保护的法益应予以更高的评价,对其权衡下应当判定法律行为因违反行政法规的规定而无效。其次,对法益侵害的程度以及借私法自身所包含的制裁手段发挥的“预防效果”也可以作为考虑的因素。即在认定法律行为有效的情形下虽然侵犯了高评价的法益,但其侵犯的程度较小,借私法自身的制裁即能发挥“预防效果”,则不必然需要转介公法对其进行干预,而可在私法自治的范围内对其进行评价,例如侵权行为在侵犯了人身权、财产权的情形下,《民法典》自身已规定了相关制裁手段对法律行为进行评价,行为人对法律行为造成法益侵害时不需转介公法辅以制裁。总而言之,若法院权衡冲突的法益——强制性规范的保护法益,与民法保护的交易安全、当事人自主等后,如认为强制性规范所保护的法益仍应给予较高评价时,可依其职权认定法律行为无效。

3. 法益相当或模糊时的判断

对法益的权衡存在法益相当或是模糊的情形,此时应当认定法律行为违法。例如我国《证券法》规定证券公司从事证券融资融券业务不得违反规定向客户出借资金或者证券。禁止证券公司出借资金或者证券是为了使证券公司的功能“单纯化”,避免证券公司利用证券交易的特殊环境影响客户的正常判断能力,兼具有保护证券市场及信用交易相对人的目的。此时,虽然信用交易的安全同样具有保护的必要,不易取舍,处于法益相当或是模糊的情形,应由法官进行权衡,但本文仍认为在法益相当的情形下,应当认定为法律行为因违反强制性规范而无效。因为行为已涉及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明确禁止,此时禁止的目的是排除某种法律绝不愿出现的后果,因此即使法益相当,但若使该法律行为有效仍会出现法律所不愿出现的后果时,法官应当认定该法律行为无效。

(三) 违反法律行为是否绝对无效

1. 绝对无效的情形

法律行为违反强制性规范时,并且该强制性规范明确规定违反该条款时法律行为无效,该行为原则上即归于无效。此时《民法典》153条第1款是作为引致条款,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范直接具体规定了无效的法律后果,法官无自由裁量的空间,因此称之为绝对无效。绝对无效较由法官认定无效的情形而言较为具体,其不需要法官进行法益衡量,因

此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不存在同案不同判的情形,但也因为其引致条款,适用范围固定,可发挥空间小,无法根据情形的变化而变通,较为僵硬。

2. 相对无效的情形

除绝对无效外,还存在法官认定无效的情形,本文称之为相对无效。在我国实务中对《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的适用大多为相对无效的情形。如中闰建设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与李勤辉合同纠纷一案中,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指出原告与被告之间名为上下级的承包管理关系,实为挂靠,其实质是不具备相应建筑资质的自然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根据《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的规定,此法律行为违反了《建筑法》的强制性规定并会损害到公共利益,应认定无效。国家对于资格或者资质的管理是为了使需求方更便利快捷地寻找合格的合同服务者,是一种提供便利的行为。因此,欠缺此类资质而设立的法律行为,并不因此而无效。但建筑资质的限制关涉公共利益,法官在权衡对公共利益的损害以及私法所规定的缔约自由后,选择认定该法律行为无效,属于绝对无效外的其他无效情形。

3. 效力待定的情形

德国民法学者 Canaris 认为《德国民法典》第134条作为转介条款转介强制性规范时存在效力未定的情形。他指出针对保护相对人订约自由的强制性规范,如禁止旅游业代理或订立金钱借贷合同,此类使当事人处于被引诱或迫于压力做成的法律行为固应禁止,但使其完全无效既不符合当事人利益,部分无效又不合法理(合同内容未必不妥当),故较合理的解决是赋予受保护的一方承认权。我国在《民法典》制定之前的合同解释中曾规定“合同未生效”的情形,可见我国对法律行为存在效力待定的规定,即在法律行为生效前设置相应的条件,在不满足条件的情形下法律行为不生效。基于此分析转介条款的效力待定情形。在适用转介条款时,该适用所产生的结果是使某一法律行为的效力并不必然无效,但也不必然有效。此时适用转介条款而被转介到的其他法律的强制性规范调整时,需要通过某一要素的填补使得法律行为生效。

四、结语

各国民法典中都含有转介条款,转介条款是在经济发展、政治制度等多个因素的发展影响下,在公私法多层交错、互相接轨过程中出现的调节公私法接轨问题的重要方法。转介条款与引致条款相比予以民事法官进行自由裁量的空间,与任意条款相比

转介公法进行干预,排除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其具有引致具体规定以及概括的双重功能。转介条款转介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范围仅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按照我国司法解释将范围进一步限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我国对于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与管理性强制性规范的划分仍存在争议,目前主流区分标准为强制性规范针对的对象是行为内容还是主体的行为资质。对转介条款的适用应分为三个步骤:首先判断是否存在强制性规范,即是否将转介条款当作引致条款适用;其次判断法律行为是否违反强制性规范,此处需要法官对法律行为涉及的法益与强制性规范所保护的法益进行衡量;最后判断违反法律行为是否绝对无效,目前的效力情况包括绝对无效、相对无效以及效力待定。转介条款的适用是民法典适用的重要一环,应在实务中把握适用方法、参考相关案例,做到转介条款的准确适用。

参考文献:

[1] 刑伟星.《民法典》“另有规定”条款的法理分析[J]. 青

海民族大学学报,2022(1):98-105.

- [2] 苏永钦. 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3] 宁红丽. 民法强制性规范的反思与优化[J]. 法学,2012(4):33-36.
- [4] 王文利. 论强制性规定类型化的价值[J]. 新疆社科论坛,2019(1):51.
- [5] 王利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详解(下册)[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668-669.
- [6] 朱虎. 规制性规范、侵权法和转介条款[J]. 中共浙江省委校学报,2014(3):115-121.
- [7] 余凌云. 行政法讲义[M]. 3版.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116-121.
- [8] 刘贵祥.《民法典》实施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J]. 法律适用,2020(15):9.
- [9] 冉克平. 论效力性强制规范与私法自治:兼析《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145-157.

(责任编辑 刘成贺)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Referral Clauses of Civil Code

LIU Siyi

(Law Schoo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17, China)

Abstract: Article 153, paragraph 1 of the Civil Code is a referral clause for mandatory norms to interfere with the autonomy of private law. It is also a channel for the referral of public law into private law. Referral clauses are general clauses that refer to public law. On top of the basic function of inducing norms, they have the general function of enabling judges to exercise discretion. They are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inducing clauses and arbitrary clauses. The specific types of referral norms in referral clauses are valid mandatory norms that stipulate the content of legal acts. Referral clauses are one of the ways for the legislators of the Civil Code to resolve controversies on integration in a horizontal way through legislative techniques. Its establishment in the Civil Code is necessary.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method of the referral clause includes three steps: first, determining whether there are mandatory norms; second,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legal act violates the mandatory norms; and finally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violation of the mandatory norms is necessarily invalid.

Key words: referral terms; mandatory norms; applicable laws

预防为先:沂蒙革命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宣传工作探究

刘冉冉

(临沂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临沂 276005)

摘要:沂蒙革命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宣传是战时疾疫防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医疗卫生工作的前置和有益补充,对疾病预防、控制以及日常生活环境改善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这一作用在当时战斗频繁、缺医少药、医疗卫生环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尤为重要。在艰苦的战时环境中,沂蒙革命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坚持预防为先的原则,积极开展医疗卫生宣传工作,维护了根据地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安全,进而为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关键词:沂蒙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宣传;预防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4.01.009

中图分类号:K2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4)01-0057-06

沂蒙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创建的著名革命根据地之一,境域包括鲁中、鲁南、滨海三个战略区,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过重要贡献。沂蒙革命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宣传是战时疾疫防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医疗卫生工作的前置和有益补充,对于疾病的预防、控制以及日常生活环境的改善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这一作用在当时战斗频繁、缺医少药、医疗卫生环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学界虽从不同角度对革命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建设开展了一定研究,但对沂蒙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的研究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深入分析沂蒙革命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为应对严酷的战争环境所开展的医疗卫生宣传工作,系统梳理沂蒙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宣传的形式、内容与成效,有助于深刻理解沂蒙人民对党和人民军队的政治认同与情感认同,了解中国共产党在沂蒙革命根据地的社会动员,理解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医疗卫生政策和始终如一的爱民为民情怀。

一、沂蒙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面临的形势

位于山东省中南部的沂蒙革命根据地,涵盖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沂蒙抗日根据地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沂蒙解放区,所辖区域山岭众多,纵横交错,独特的地理环境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选择。而艰苦的自然条件、长期的战争环境,使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沂蒙山区民不聊生,人民生活贫困,文化相对落后,医疗卫生领域尤甚。一方面是卫生设施的缺乏和严重的缺医少药,因为敌人对根据地的不断“扫荡”“蚕食”和严密封锁,沂蒙革命根据地的药材供应面临严重困难,医疗物资紧缺,加之经费紧张,缺医少药的问题长期存在;另一方面,在艰苦的生活条件和严酷的战争环境下,民众普遍缺乏卫生观念和基本的卫生常识,没有形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导致各类疾病、疫病易发多发且持续蔓延。在沂蒙根据地,疟疾、回归热、伤寒、流感、霍乱、猩红热、黑热病等均曾频繁发生。据《大众日报》报道,1943年八、九月间,鲁中泰山山区普遍流行疟疾和痢疾,仅刘家白杨一个村,就病死500多人。^[1]1944年夏秋两季,临朐发生严重疟疾,进而出现痢疾及头痛、浮肿、消化不良等并发症。300多个村庄中病倒两万多人,全县病死

收稿日期:2023-11-27

基金项目:2022年度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沂蒙抗日根据地医疗卫生体系建设研究”(2022-JCLS-08);2022年度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山东抗日根据地疫病防治中的社会动员研究”(22CDSJ03)

作者简介:刘冉冉(1979—),女,江苏丰县人,博士,临沂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临沂大学山东根据地医疗卫生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山东根据地及区域文化研究。

千余人,占病人的13%。^[2]1945年,鲁南地区黑热病流行,仅莒南、日照等五个县的患病人数就达20余万。临朐、益都等县发生恶性疟疾,严重地区的患者几乎占当地人口的85%。同年春,脑膜炎、痧子、流感、斑疹伤寒、回归热等季节性传染病在滨海区广泛流行,小儿痞块病、胃病、肺癆病等慢性病亦非常普遍。^[3]1946年春,滨海区各地再次流行伤寒、脑膜炎、回归热、感冒等传染病,仅竹庭县金山区和兴海区,患病者就达到两千余人。^[4]各类疾疫的发生与蔓延,严重危害着沂蒙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与此同时,医疗条件的限制和思想观念的局限,也影响到沂蒙山区民众对疾病的科学认知,“由于群众不了解疾病的基本原因,因此有了病,就疑为有神有鬼,加之有病求医的种种困难,就使封建迷信思想长期存在”^[5]。在严峻的医疗卫生环境下,如何帮助民众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尽量减少疾疫发生,并教导他们学会以科学态度防治疾病,成为沂蒙根据地政府和军队着力解决的问题。

要预防疾病,就离不开医疗卫生宣传。尤其是在医疗卫生条件艰难、形势严峻、疾疫多发的革命战争年代,有效的医疗卫生宣传既是保障军民健康的必要手段,也是有效预防疾病、减少非战斗性减员的现实需求。正如曾任山东纵队卫生部科长的李衡所说,“军队卫生工作最重要的任务是对军队和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建立卫生制度”^[6]^[32]。开展卫生宣传教育、普及卫生知识成为卫生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沂蒙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宣传的内容

艰苦严峻的卫生形势越发凸显预防疾病发生、讲求卫生的重要性。沂蒙根据地坚持预防为先的原则,充分调动各方卫生技术力量,指导群众性的卫生宣传与防病工作,在根据地军民中积极开展了医疗卫生政策法规、疾病疫病防治办法及基本卫生习惯与常识等的医疗卫生宣传。各级卫生部门分派专人负责卫生宣传工作,从组织上保证了卫生宣传的普遍持久开展。卫生委员会、卫生宣传小组等群众性组织的成立,保证了各项活动的有序推进。

(一)宣传医疗卫生政策与法规

1940年9月,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发布《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并在第十二条中特别强调了医疗卫生保健等内容,即“加强健康教育,厉行卫生行政,逐渐建立保健制度,广设平民医院,对于抗日军人家属及贫民之伤残疾病,予以免费治疗,优待产妇,保育婴儿,建立托儿所”^[7]。山东纵队卫生部曾翻印军委总卫生部颁布的《卫生法规》,强调部队

要自觉遵守,并提出“一两预防,胜过一磅治疗”^[6]^[32]的口号,要求卫生人员不能消极等待治疗病人,要积极地预防疾病的发生。1941年,第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印发《卫生管理规则》。1942年,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下发《关于夏季整军中卫生工作》训令,对公共卫生作出详细规定;是年冬,教导二旅又发出《冬季卫生防病工作》训令。“第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把卫生防病工作作为部队管理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举办各级军政领导干部集训班、教导队时,都安排有卫生管理教育课程;在一些重要会议上,军政首长和司令部门,都反复强调基层军政领导要学会连队卫生管理,抓好卫生宣传教育。”^[8]^[135]1945年10月,山东省政府发出《关于公共卫生的指示》,并特别强调开展群众性卫生教育。^[9]^[290]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卫生宣传教育,对疾病的预防、控制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宣传疾疫防治办法

沂蒙根据地经常利用季节之交、疫病多发之际,组织开展卫生清洁运动,向群众传播科学的卫生知识。1947年滨海区行政专员公署下发《关于加强机关卫生工作的通知》,要求“向驻村群众进行一些防病教育,并以实际的行动开展卫生运动,在村学中上卫生课,写卫生标语等,把机关卫生工作与驻村卫生工作结合起来”^[10]。1948年8月6日,滨海区行政专员公署对夏秋季防疫防病工作专门发出指示,强调:“一切干部要关心群众的疾病痛苦,随时进行防疫防病的宣传和教育,以防传染病的发生。”^[11]滨海医院还专门编印了卫生常识小册子,向群众宣传疾疫防治的知识。1949年7月,沂蒙专署针对夏季传染病多发的特点,“印发一部分夏季卫生小册子,发到各区、各学校及行政村,号召各级学校作广泛的宣传,要求区级加强卫生工作的领导”^[12]。

(三)宣传基本卫生习惯与常识

1940年,山东纵队向所属部队发出通知,提出了关于搞好个人卫生诸如定时理发、换洗衣服、洗澡、剪指甲、禁止随地吐痰和保持室内外卫生的“六条卫生要求”^[13]^[235]。1941年春,山东纵队卫生部举行了为期一周的卫生防疫展览会,以图表、文字、实物等多种形式,宣传如何讲求个人卫生、环境卫生、食品卫生等,如洗澡、烫洗衣服、毛巾消毒,提倡各人自带碗筷,一人一条毛巾、一只杯子、一把牙刷,中餐西吃,挖卫生壕、备土痰盂等,并展出伤寒病人和回归热病人形象模型及传染的途径、症状及预防的方法。^[14]^[282-283]1943年山东军区成立初期,为普及卫生常识,卫生部刻印了大量卫生宣传材料,广泛分发到基层,带动了驻地百姓加强防疫抗病的措施。^[14]^[12]

1945年印发的《山东省政府关于公共卫生的指示》提出开展公共卫生必须从两方面工作着手,其中之一即为“积极提高群众的卫生常识,养成卫生习惯,自觉自愿地预防疾病”^{[15][17]}。1947年2月,山东省政府颁发《山东省卫生会议决议》,要求各级卫生机关,利用报纸、图片、标语,广泛宣传卫生常识;教育机关、学校、团体,作广泛深入的卫生教育;卫生与教育工作结合,给农民讲卫生课。^{[9][29]}正如《沂蒙专署一九四九年全年卫生工作总结》所说,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状态的农村,“既没有卫生常识,又没有卫生习惯,宣传教育工作做不好,社会卫生工作是难以开展的。因此专署印发了夏季卫生小册子八百份,冬学添了卫生课,卫生常识初步走向了农村”^[16]。

三、沂蒙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宣传的方式

沂蒙根据地在开展医疗卫生宣传的过程中,考虑到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接受程度情状,既注重宣传内容的大众化,又注重宣传形式的多样化,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确保根据地军民真正能够听得懂、听得进,同时又注重日常宣传与集中宣传相结合,既保证了宣传工作的覆盖面,又提升了宣传的实效性。

根据1946年山东解放区救济分会《关于临沂区(滨海鲁中鲁南)医药卫生申请书》统计,全区一年来在卫生宣传教育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其中仅“印刷宣传品”一项,就涵盖了卫生防疫画报类、防疫传单、为防疫告同胞书、“卫生”(大众日报副刊)、卫生规则(公共卫生、饭馆卫生、理发馆卫生、澡堂卫生四种)、防疫指示(载大众日报)、出版山东卫生杂志等^[17],充分体现了沂蒙根据地医疗卫生宣传形式的多样化。

(一)媒介宣传

1. 报纸。“出版卫生报刊是中国共产党卫生宣传与动员的一个重要方法。”^{[18][103]}1945年3月19日,《大众日报》设立《大众卫生》专栏,并于当期刊登了《春季传染病预防要点》。《大众卫生》由山东军区卫生部医务杂志社主编,其任务是教育群众讲究卫生,传播卫生常识,交流为群众治病的经验等,特别是在当时时疫流行之际,切合实际地介绍防治疾疫的办法与经验,配合政府、军队、群众团体开展急救工作,真正为群众服务。此后,山东军区卫生部提出各种传染病的预防与治疗方法,刊登在《大众日报》的《大众卫生》栏目,使群众及时掌握防疫知识,了解疫情蔓延与救治情况。除专栏外,《大众日报》也会时常在其他版面刊登医疗卫生的相关报道。1944年6月21日,《大众日报》刊载谢辉《开展社会卫生运动》一文,强调要注意公共卫生,建立村

卫生大扫除、大检查制度,注意个人卫生,“养成早起洗脸,常剃头、剪指甲,不乱吃生冷不洁的食物,不随地吐痰和大小便,衣服被席常晒常洗”^[5]等习惯。1945年4月7日,《大众日报》载文提出开展卫生运动,加强群众卫生教育,研究流行病发生的原因,向群众说明,“信神信鬼为什么治不好病,教育人民相信科学,讲求必要和可能的卫生,如注意厕所的清洁,东西尽可能不要使蝇子爬,尽可能把用具用熟水洗一下”等,强调“要多用科学道理具体实例说服”^[19]。抗战时期,山东纵队四支队卫生处还创办“卫生小报”,并创办“卫生周刊”,对部队进行卫生教育,同时选登一些部队防病材料,“当时部队都住老百姓家,战士们每天都把学得的卫生知识向群众讲解”^{[14][184]},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2. 刊物。1940年,为落实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精神,山东纵队卫生部专门创办《卫生》半月刊,编写卫生小丛书,进行卫生宣传,普及卫生知识和防病技能。1944年1月1日,山东军区卫生部在鲁南创办《军医杂志》,并于1945年1月正式更名为《山东医务杂志》。该刊刊载主管部门的命令、指示,交流各地工作经验,介绍新的医术和战地救护技术等。^{[20][44]}该杂志按月印刷发行,主要栏目有医学论著、工作总结、国药研究、病例报告、经验介绍等。《军医杂志》第1、2期曾连续转载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一文,宣传白求恩事迹,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向白求恩学习的号召。该杂志还刊登山东军区领导对卫生工作的重要指示、题词、文章等,使广大军民进一步明确了党和军队对卫生工作的要求。

1946年12月1日,刊物《文化翻身》在临沂县独树头村创刊。正如其刊名所示,该杂志的办刊任务即为专门帮助群众在文化上翻身,设有时事政治、救护常识、军事常识、卫生常识等栏目。^{[21][70]}为宣传和普及医疗卫生知识提供了新的载体。

(二)会议宣传

沂蒙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宣传会议涵盖了专题工作会议、群众大会、座谈会等多种形式。

1941年6月,山东纵队卫生部召开第二届卫生会议,重点是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着重改变群众不讲卫生的习惯。^{[6][320]}会后,卫生部在《前卫报》发表《五次整军与卫生工作》的社论,将卫生宣传作为部队管理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印发了“部队卫生管理规则”,在纸张物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油印了各种预防疾病的小册子3000多份,大力宣传普及卫生知识。^{[14][121]}

1944年夏,莒南县流行瘟疫,仅莒宾区就病死二百多人,其中儿童占三分之二以上。民主政府除通过小

学及各团体进行卫生教育外,还在该区召开医救会会员座谈会,研究急救的办法,给全区十四个会员每人分配三五个村庄,在为群众治病的同时开展卫生宣传。^[22]1945年春,沂南岸堤一带发生脑膜炎疫病,涉及多个村庄,鲁中联办与鲁中军区立即派出卫生队和医务人员,携带大批药品前往抢救,并在岸堤设立临时治疗所,与此同时各村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治疗办法,军区卫生科配合群众团体,召开附近三区的中西医生会议,研究治病办法。^[23]1946年2月,临沂流行回归热。山东省卫生总局巡回医疗队赶赴疫区抢救,召开村民大会,讲解病源,散发传单,组织群众观察显微镜下的病菌。通过医疗队科学防治知识的宣传,“农民再不相信瘟神,愿意接受医疗队的治疗和预防要求”^{[9]291}。

(三) 学校宣传

创办专门的卫生学校,举办医训班,培养医学人才,对群众进行医疗卫生宣传和教育,是沂蒙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宣传的一种重要形式。山东纵队成立不久,就成立了卫生教导队。1939年至1941年,山东纵队卫生教导队先后举办五期医训班,共计培养学员170名。1943年3月,为适应抗战需要,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医训队与山东军区卫生教导队合并成立山东军区卫生学校,自此直至抗战结束,先后举办三期医训班,培养学员380余人,学习内容主要是军队常见病的诊断和治疗、战地急救、外科手术基本知识、卫生宣传教育及初级卫生人员培训方法。卫生学校培养出的这批医务人员,战时担任前方救护,平时组织军队开展群众卫生运动,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6]323-324}

此外,沂蒙根据地通过小学、识字班、工农青妇等各种群众团体,对群众普遍进行科学知识 with 卫生常识的教育。^[5]1945年春,桑园区一些村庄的儿童流行麻疹,王家庄、北庄、板石河等地均发现病例,情形严重。医生在对病情作出正确诊断的同时,研究出对其预防与减轻病症的方法,后来研究结论被编为教材,由县政府文教科油印分发各区,在庄户学里学习。^[24]1945年疫情蔓延时,滨海专署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各地军政卫生机关、医救会会员等,“百倍关心群众健康,为群众救命,在庄户学里和各种会议上,教育群众,讲求卫生”^[25]。

(四) 活动宣传

从1943年开始,山东军区将每年的4月12日至5月12日作为卫生月,集中开展卫生宣传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卫生防疫工作的深入开展。在此过程中,部队积极向驻地群众宣传卫生防病知识,帮助地方建立卫生机构和培训人员,诊治伤病患者。^{[26]173}在所驻村庄建立卫生大扫除、大检查制度,教育群众注

意公共卫生,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在1944年夏秋季卫生清洁运动开展期间,壮岗区各村组织卫生委员会、卫生检查小组,宣传卫生常识、治理环境卫生、开展卫生比赛,帮助群众初步建立起卫生观念、认识卫生防病的道理^[3]。1945年10月,山东省政府发出《关于公共卫生的指示》,要求开展群众防疫工作和卫生教育,强调指出:“有季节性推行群众的清洁卫生运动、灭蝇除虱运动,领导群众改造厕所、厨房和住屋,使之更合于卫生的要求。”^{[15]178}

除集中的医疗卫生宣传活动外,沂蒙根据地在日常生活中注重运用口号、标语、展览、宣传册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巡回医疗队在赴病区诊疗疾病的同时以事实教育群众,同步开展医疗卫生宣传,使群众于潜移默化中了解了党的医疗卫生政策、接受了基本的疾疫防治知识。1940年12月,时任中央军委卫生部部长的饶正锡总结抗战三年间的卫生工作,特别强调了部队灵活、普遍的卫生宣传教育,具体方式包括:每周一次的定期卫生课;依据季节气候的变更,以及疾病发生的情况,及时进行的卫生教育;卫生演习会、露天化装表演、壁报、画报、专门的防疫会议、印发防疫小册子及传单标语等。^{[27]66-67}八路军一一五师进入山东后,相继建立了各级卫生委员会,专门负责卫生宣传工作。在开展卫生宣传时,一一五师各部队除坚持定期上卫生课、讲解卫生防病知识外,还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了多种宣传方式,如张贴简明而生动的卫生标语、宣传画等,充分利用报刊、墙报、图片与实物展览、印发材料、编演节目等形式,进行防病保健宣传。^{[26]72-73}1943年,一一五师《卫生工作指示》要求部队“帮助地方开展社会卫生。各伙食单位由卫生人员在本村召开群众卫生大会,宣传卫生,调查疾病”。每年春季部队与人民群众共同开展卫生运动月,共同组织卫生运动领导小组,广泛宣传卫生运动的意义和卫生防病知识,动员群众破除迷信,讲究卫生,预防各种疾病。^{[8]145}

1945年,小坊前医药合作社组织巡回治疗,每到一村,先找村干部调查病情,给病人诊断后,就向病人说明得病的缘由,进行卫生教育。在村庄里既治疗病人,又进行防疫宣传。^[28]1946年5月,山东省卫生总局派出四个防疫医疗队,分赴沂源、淄博、赵博、郯城及临沂等县,开展回归热、麻疹、脑膜炎等疫病防治。防疫医疗队在集市和群众大会上演讲,并采用散发传单、张贴卫生漫画、举办街头卫生墙报等形式,宣传卫生知识。^{[9]173}1949年,鲁中南第二专署卫生科自5月份即着手推进夏季卫生运动,“号召群众早引注意加紧预防,特草拟夏季卫生常识的小

册子,文字力求通俗为农村易晓,内容为适合农村所能办到的日常卫生事项,拟印一千五百份,普遍到农村,以增加其卫生常识”^[29]。

除此之外,沂蒙根据地注重将卫生防疫宣传教育与文艺演出结合起来,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宣传疫病危害和卫生防疫知识,动员群众破除迷信,讲究卫生,预防疫病。农村剧团也广泛进行卫生宣传教育和反对封建迷信教育,使群众及时了解相关防疫知识和科学的应对措施。

四、沂蒙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宣传工作取得的成效

正如《八路军山东纵队回忆史料》所载,“在战争年代,我们军队的卫生工作,主要采取卫生宣传教育,使广大干部战士人人掌握卫生知识,防治疾病,对疾病实行各自为战。因为在战时日军严密封锁,我们药品来源十分困难,又加上经费缺乏,在这种情况下,预防疾病发生,讲求卫生就显得特别重要”^{[6]325-326}。军队如此,沂蒙革命根据地的普通民众同样面临着这样的情况。1946年临沂、费县等地“虎烈拉”疫病流行期间,卫生宣传发挥了积极作用。《大众日报》及各地报纸广泛宣传防疫办法,“凡能执行防疫办法的村庄,都能免染虎疫,村民大会及街头小型宣传,作用也很大”^[30]。不同形式的医疗卫生宣传,不仅有效预防了疾病的传播与蔓延,也帮助根据地军民逐步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逐步树立起科学的卫生观念,同时在潜移默化中密切了根据地人民与党和军队的血肉联系。

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卫生部长的白备伍曾说,既要向老百姓宣传防病知识,也要为群众治病,战时的卫生工作一刻也离不开群众。^{[14]183}在1940年山东纵队卫生部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召开之后,各支队认真贯彻会议精神,重视卫生宣传教育,不仅加强了连队卫生建设,预防了传染病的流行,驻地群众的卫生知识水平也有了普遍提高,卫生习惯逐渐养成。^{[6]320}

受制于当时民众的文化程度和医疗卫生知识的缺乏,对疾病、疫病的错误认知也曾是沂蒙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了一般的卫生常识,封建迷信思想,才能得以逐渐克服及消灭。”^[5]1946年临朐县疟疾流行期间,民众因为受到欺骗,跑出一二十里路去喝所谓的“圣水”,拒绝治疗。直到该县动员全县百余名医救会员,组成医疗队在集市上宣传,用实际的病例教育说服群众,才使得群众最终接受医疗,配合预防。^{[9]291}1949年,鲁中南行署通过编印卫生小册子、印发卫生宣传画,在群众中积极开展医疗卫生宣传,加之良好的治疗效果,

“在某些地区内打破了群众有病靠天求神的思想,知道了巫婆的害处,提高了群众的卫生常识”^[31]。

沂蒙革命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宣传工作,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开展医疗卫生事业的艰辛探索,也让根据地人民切实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对人民生命与健康的重视,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1947年鲁中山区流行恶性疟疾期间,省政府卫生科医疗防疫队、鲁中防疫大队及各防疫小组在积极治疗的同时,同步开展医疗卫生宣传工作,“边看病边宣传,挨家治病挨家宣传,分头治病分头宣传,白天集体治病,夜晚集体宣传,开村民大会宣传,演戏宣传,用黑板报宣传,画漫画贴标语宣传,人人都要宣传”。有效的治疗配合有力的医疗卫生宣传,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即治愈群众两万余人,“感激共产党感激民主政府的信,像雪片似的送给防疫队……各地送给防疫队的旗子,大的小的几十面,多少个旗子上写着:‘共产党是俺的救命恩人’”^[32]。

五、结语

战争时期的医疗卫生工作是关系民众健康和军队战斗力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在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中,沂蒙革命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坚持预防为先的原则,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医疗卫生宣传工作,这项工作符合战时需要,彰显时代特征,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在严酷战争环境下的创举。

沂蒙革命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宣传工作紧密贴合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是党的医疗卫生工作的缩影,是党在艰苦战时环境下始终将人民生命与健康安全放在首位的真实反映,为防止疾疫的发生、传播与蔓延,引导根据地人民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形成科学的医疗卫生观念,维护根据地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均发挥了重要作用,进而为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沂蒙革命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宣传揭示了“预防”在卫生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既是应对战时医疗卫生形势的必然选择,也是有效防止和控制疾疫的科学举措。新中国成立后,“预防为主”被确立为卫生工作的原则之一,其中,沂蒙革命根据地为“预防”而开展的医疗卫生宣传,与这一原则一脉相通,是对其生动的诠释与体现,为党在医疗卫生领域预防与控制机制的建立探索了道路。

参考文献:

[1]八路军给老百姓治病 去年治好两万多人[N].大众日报,1944-05-07(01).

- [2]省委派员抢救临朐人民[N]. 大众日报,1945-01-23(01).
- [3]滨海区两年来的群众卫生工作[N]. 大众日报,1945-08-09(03).
- [4]滨海各地时疫 医疗队医好病人四千余人[N]. 大众日报,1946-05-19(01).
- [5]开展社会卫生运动[N]. 大众日报,1944-06-21(06).
- [6]八路军山东纵队史编审委员会. 八路军山东纵队回忆史料(中)[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 [7]山东省临时参议会通过. 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N]. 大众日报,1940-09-07(02).
- [8]《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编委会. 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第一卷)[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
- [9]山东省卫生史志编纂委员会. 山东省卫生志[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 [10]滨海区行政专员公署关于加强机关卫生工作的通知[Z]. 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4-01-0009-014.
- [11]滨海区行政专员公署关于开展今后社会卫生工作的指示[Z]. 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4-01-0019-014.
- [12]沂蒙专署一九四九年卫生工作总结[Z]. 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2-01-0014-009.
- [13]朱克文,高恩显,龚纯. 中国军事医学史[M].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96.
- [14]《白备伍纪念文集》编辑组. 白备伍纪念文集[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8.
- [15]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省中共党史学会. 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21卷)[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
- [16]沂蒙专署一九四九年全年卫生工作总结[Z]. 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2-01-0014-016.
- [17]山东解放区救济分会关于临沂区(滨海鲁中鲁南)医药卫生申请书(1946年)[Z]. 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G008-01-0027-015.
- [18]李洪河. 往者可鉴:中国共产党领导卫生防疫事业的历史经验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19]开展卫生运动应从急救流行病做起[N]. 大众日报,1945-04-07(01).
- [20]临沂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沂蒙革命根据地志(上)[M]. 北京:中华书局,2014.
- [21]临沂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沂蒙革命根据地志(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14.
- [22]民主政府的防疫救护队到莒宾一带进行急救[N]. 大众日报,1944-08-09(04).
- [23]鲁中军政机关抢救岸堤一带病灾[N]. 大众日报,1945-03-29(04).
- [24]滨北我军卫生机关抢救桑园群众病灾[N]. 大众日报,1945-03-11(04).
- [25]鲁中滨海时疫蔓延 各地军政机关要紧急动员防疫,抢救病灾! [N]. 大众日报,1945-03-19(01).
- [26]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山东编年史(第五卷).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
- [27]饶正锡. 抗战三年来八路军卫生部门的工作[J]. 八路军军政杂志,1940,2(12).
- [28]小坊前医药合作社巡回治疗群众疾病[N]. 大众日报,1945-04-19(04).
- [29]鲁中南第二专署卫生科五月份总结(1949年5月26日)[Z]. 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2-01-0014-013.
- [30]临费虎疫大致扑灭,救活千余患病同胞[N]. 大众日报,1946-09-26(02).
- [31]鲁中南行署. 鲁中南上半年卫生工作总结(1949年)[Z]. 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G038-01-0719-004.
- [32]鲁中防疫记述[N]. 大众日报,1948-02-05(02).

(责任编辑 谢春红)

Prevention Going First: the Exploration of Medical and Health Publicity Work in Yimeng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LIU Ranra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Linyi University, Linyi, Shangdong 276005, China)

Abstract: The medical and health publicity in the Yimeng revolutionary base w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wartim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ork, serving as a prerequisite and beneficial supplement to medical treatment. It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disease prevention, control, and improvement of the daily living environment. This role wa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the context of frequent battles, being lack of medical supplies, and extremely harsh medical and health conditions at that time. In the harsh wartime environmen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Yimeng Revolutionary Base adhered to the principle of prevention going first, actively carried out medical and health publicity work, maintained the life and health safety of the people in the base area, and provided important guarantees for the consolid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ase area.

Key words: Yimeng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medical and health publicity work; prevention

刘邓大军医疗统计制度建设研究

吴兴维¹, 李飞龙²

(1.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0715; 2. 西南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 重庆 400715)

摘要:在战役相继、战斗频繁的革命年代,为保证战争胜利,军队需要在卫生方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但艰苦的医疗条件、有待缓和的医患关系以及较为薄弱的制度传统常常导致军队医疗卫生出现困境。全面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人员、组织、制度等方面不断强化医疗统计工作,并将医卫人员、伤病员、医疗物资等作为医疗统计内容展开重点建设。此举不仅有助于军队医疗卫生实践的改进,还推动了军队医疗卫生工作的建章立制,进而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卫生工作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军队卫生;刘邓大军;统计制度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4.01.010

中图分类号:R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4)01-0063-06

在战役相继、战斗频繁的革命年代,卫生部门难以准确把握部队医疗卫生情况,因此建立医疗统计制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948年10月,华北军区后勤部司令部指出:“统计登记,是我军报告制度的有利组成部分,是一种科学的计算方法;它可以反映出很多问题,找出卫生勤务某些方面重要的发展规律。”^{[1]92}实际上,从全面抗战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人员、组织、制度等方面不断强化医疗统计工作,并将医卫人员、伤病员、医疗物资等作为医疗统计内容展开重点建设,极大地推动了军队医疗卫生工作的建章立制,是人民军队医疗卫生实践的关键环节。目前,学界在对军队卫生制度的讨论中,还未专门涉及医疗统计制度。基于此,本文拟对刘邓大军医疗统计制度的形成背景、制度保障、核心内容以及主要成效等问题进行探讨,以便理解这一制度的生成历程及价值。

一、医疗统计制度生成的背景

全面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部队长期行军作战,流动性大,加之医疗条件有限,导致卫生问题

突出、医疗事故频发,这些问题成为推动医疗统计制度生成的重要背景。

(一) 卫生工作条件极为艰苦

1937年9月30日,一二九师东渡黄河,挺进太行山区,后转战多地,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不过,1941年初到1942年底,根据地遭到敌人千人以上的“扫荡”达174次,成为抗战中最艰苦的年代。^{[2]114}在敌人反复“扫荡”、部队高度分散、频繁转移的战争环境下,医疗卫生也相应地采取分散方式,伤病员不能大批集中,一般伤病员寄留在农民家中休治,等待“医生与看护清晨进行治疗。换药后,将器材埋在郊外,敷伤料立即洗涤烤干,下次消毒再用”^{[3]102}。不仅如此,住院伤病员为秘密隐蔽,也需要不断搬家。为此,医务人员除少数随军工作,其余大多需深入群众,与老百姓共同生活,医疗场所的家庭化特征明显。^{[3]104}在分散、灵活的作战方式下,医疗卫生工作,尤其是医疗统计,很难按照计划有序推进。

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转战19个省(区),行

收稿日期:2023-10-25

基金项目:2022年度西南大学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思政课专项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革命文化的弘扬研究”(SWU2209111)

作者简介:吴兴维(1997—),女,重庆万州人,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李飞龙(1981—),男,江苏连云港人,中共党史专业博士,西南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教授。

程二万里,部队作战方式由游击战逐步转变为大兵团运动战为主。随着作战规模扩大,部队伤亡人数急剧增加,从而给传统的军队医疗卫生系统带来了沉重负担。据统计,晋冀鲁豫军区自抗战结束到1947年底,共收治伤员147821名,病员190115名,伤员增多导致医务人员负担加重,一名医务工作人员需要负责5—6名,甚至更多的伤病员,一个容量为百余人的收容所,甚至要收容1000到2000名伤病员。^{[3]245,246}此外,战争导致的医疗手术剧增,晋冀鲁豫军区仅1947年就进行各类手术3万余例,足见战场救治任务之繁重。^{[2]218}不过,此时的医疗救治出现了明显的滞后性,1949年12月,第二野战军第六十军后勤部称,在手术中,因物质条件限制和卫生人员技术不熟练,导致消毒和切除工作不彻底;在伤病员收容上,因病员多、房子少,不能按具体伤病需求进行安置。^{[3]354}显然,战争方式和医疗形式的改变,都指向了医疗体系科学化的建立,现代战争医疗统计制度随之生成。

(二) 医疗物资保管较为混乱

医疗物资保管是军队医疗工作的重要内容。全面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军队医疗物资匮乏,药品难以补充,医用器械也需反复性使用,更加凸显了医疗物资保管的重要意义。就医疗物资保管而言,可以分为日常状态和战时状态。

日常状态下,医疗物资保管主要涉及储存环境和管理规范。就储存环境而言,不适宜的温度、湿度以及光线都会影响药品与医疗器械的品质。1940年,冀南军区卫生部将后方大部分医疗物资分散储藏在群众家里或埋在野外,其中一些部队卫生部门不清楚药品器材的保管条件和方法,导致脓盘、钳子等手术器材生锈。1942年上半年,八路军后方药库潮湿,且时常遭遇灌水、塌顶,损失了不少药品和器材。^{[3]106,136}就管理规范而言,战时医疗物资管理不严、缺乏规章制度,尤其是一些不良用药方式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1946年上半年,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四十八团司药人员将药品与弹药放在一起,“谁想拿就偷拿一些,把药都弄没有了”,抑或取药时不使用天秤和量杯,导致药品分量不准,既耗费药品又妨碍治疗。^{[3]216}

战时状态下,作战前方的药品器材需随军转移,然而频繁的行军作战,医疗物资难以得到有效保管。1946年下半年,晋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长期行军作战,又偏逢连绵阴雨,大部分药材被雨水浸湿,还出现驮药材的驮子落水后,药材未能充分晾晒以致失去疗效的现象。此外,还有司药、卫生员在行军途中

丢弃刀包、止血带、镊子、救急包等物资,以致全纵队药材损失巨大。^{[3]205}特别是在反“扫荡”中,医疗物资保管面临的压力和危险更大。1942年太岳纵队在反“扫荡”中,将药品器材埋藏在野外,但由于药品器材包装不良、瓶口密封不严,大量医疗物资遭到严重损坏。据统计,1942年全年八路军在紧张的反“扫荡”中,共损失价值4.5亿元的医疗物资。^{[3]145,154}这些保管方面的问题,使得军队医疗物资出现了大量的非使用性损耗。

(三) 医疗救护意识有待提升

医疗救护是军队卫生工作的核心任务。由于战救物资匮乏、医护人员短缺、医疗技术落后等原因,从一线抢救到后续治疗管理都缺乏条理性和规范性。

一线抢救主要涉及医疗物资准备和伤员转运两个方面。在战斗过程中,战救物资准备不足的情况时常发生。1942年太岳纵队在战地救护中,因缺少付木,致使部分骨折伤员无法使用付木固定。1946年上半年,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在战斗中,没有准备充足的绷带和纱布,以致在救护时,临时撕未经消毒的布条和被子来裹伤。^{[3]147,216}伤员的转运工作主要是转运速度迟缓,延误救治时机。1948年中原军区十四纵队由于有的团缺少甚至没有担架,且有的群众担架员不敢接近火线,导致转运不及时,造成伤病员不必要的死亡和残废。^{[3]299}在伤员抢运上,各部门配合契合度也有待提高。1940年,冀南军区第九旅在辛庆战斗中,就出现20余名战斗员搀扶伤员下火线的情形。1946年5月至1947年1月,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因司、政、供、卫生部门分工不明确,导致无人负责伤员转运、尸体掩埋等工作。^{[3]107,214}

伤病员的后续治疗管理亦有待提升。在伤病员治疗中,早期外科清创和消毒观念不强、治愈率较低。1942年春季,太岳纵队卫生部的清创消毒意识较差,医卫人员不做创面清洁而直接盖上纱布贴条,医卫人员换药时不洗手或直接用手捻药品,也不重视对重复使用的消毒材料的清洁,导致许多伤病员伤口化脓甚至生蛆,难以治愈。同年夏季,太岳纵队卫生部施行了129例手术,因医疗器材设备基础较差,加之后期治疗工作跟不上,所以术后化脓和二次手术等情况时常发生。^{[3]144}在医院管理上,由于缺乏一定的制度规范,对伤病员的管理并不严格。1941年一二九师后方医院没有严谨的出入院手续,因此部分伤病员出院逃亡或消失不见,造成伤病员出院数与部队实收数不符。1942年太岳纵队部分伤病员转院时,也同样存在“转院手续不全,大多无病历

表,个别缺介绍信”^{[3]113,147}等问题。

总之,战时医疗卫生工作存在多重问题,战争频繁、医疗救治及管理失序,迫切需要建立起科学的卫生理念和医疗体制,因此医疗统计制度应运而生。

二、战时医疗统计制度的生成与实践

为掌握军队医务工作概况、明确军队各级卫生组织及医务人员职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推动了医疗统计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一)统计人员和组织地位更加突出

无论是战场救护还是日常治疗,都会产生大量的医疗卫生信息。各级卫生组织及医务人员对这些信息的收集、登记和统计,不仅是军队医政工作的重要业务,也是医疗统计制度的实践主体。

战时状态下,伤病员登记统计工作一般由各级部队卫生组织负责。譬如,1941年邢沙永战役中,伤员下火线后,首先在团裹伤所做伤口检查和治疗,登记伤员信息,填写外科病历表或发给伤票,然后转至旅救急所,经旅救急所仔细诊断后,再详细登记和填写外科病历表或伤票,并发给组织介绍信,最后转至后方野战医院。^{[4]498-501}1946年陇海战役中,团、旅救护组织设立登记组,专门负责伤类统计和伤票填写。^{[5]593}1948年,中原野战军下发《临时战救工作条例》,规定伤病员在连队、营救护组织经过初步救治后,需后转的伤病员,先由团卫生队填发伤票,后送至旅卫生处补发伤票,最后转至纵队卫生部,详细登记后发给伤票,若为重伤,则须再转移到后方医院,由医院医疗队详细登记伤员救治及牺牲等情况。^{[5]397-400}在战场救护时,各级卫生组织、医务人员对伤病员情况进行初步收集和登记,保障了后续统计工作的开展。

在日常治疗中,医疗统计的主体涉及各级部队卫生机关、后方医院两个层面。在部队各级卫生机关层面,医政处或医政科作为统计主体,其地位不断提升。1948年,中原军区卫生部决定下设医政科,作为“医务行政工作之助手机构”,统筹办理各项统计报告制度。^{[3]276}1949年,第二野战军卫生部设立医政处,下设医政科,并升级为“医务行政工作之骨干机构”,办理各项统计报告制度。同时,二野卫生部还制定了部队各级医政工作的职责,其中兵团卫生部医政科应及时督促各级医政机关执行统计、报告制度,再综合汇报上级机关;军卫生部医政科须按时作综合统计报告,呈送上级卫生机关,并及时督促师卫生处按时填造各项统计及报告;师卫生处医政股落实统计、报告制度,按时汇报及督促下级呈报;团卫生队医政干事应按时做好统计、报告制

度。^{[5]400-409}可见,第二野战军卫生部在中原军区卫生部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医政工作,明确和细化了各级部队的医疗统计主体。

在后方医院,从所长到值班护士都各司其职,且权责明晰。1947年10月晋冀鲁豫军区卫生部颁布的《后方总医院医疗工作规则及职责条例》,规定所长负责全所的医疗行政事务,填写各种表册和书面工作报告;医生需填写入院特重伤员的病历表、死亡诊断书、残废等级等;实习医生或医助须详细填写伤病员病历表;司药人员登记药品器材的领发数目,将每日、每月的各种统计表册按时填造并送上级机关;护士长或看护长负责伤病员各种统计表册报告,还设置护士的轮流值班制度,日班值班护士要登记交换绷带、处方笺、罍包、注射、浣肠、化脓、发炎、湿疹、褥疮、骨折等数目,了解和统计值班日伤病员出院、转院、死亡、逃亡等数目。^{[5]355-366}1949年,第二野战军卫生部要求医院设置医政股,以保存各种资料、报告、统计材料,规定主治医生负责填写各种统计报告及日报表,医生(医务员)在室长(主治医生)领导下,负责伤病员治疗和指导医助进行病案登记,此外还设置材料干事,负责统计每日药品、材料、敷料的消耗情况。^{[5]409-413}无论医务人员职务高低,都是医疗统计工作得以有序开展的重要一环。

(二)统计制度不断成熟和完善

全面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为配合医疗制度,军队卫生部在伤病诊治和医疗行政工作上,都构建起了完备的制度体系,为医疗统计制度的有效运行提供制度保障。

在伤病诊治工作上,主要建立了医生袖珍簿或诊断簿、司药日记等制度。袖珍簿是医生在诊断或医治时,对患者“姓名、年龄、病因、时间、诊断情形、预后”以及对该疾病的治疗意见等内容的记录,要求袖珍簿、月终病类统计、现有住院病类三者数目上保持一致。^{[3]169,158}军队卫生部一直重视对袖珍簿的使用,1949年12月,第二野战军第十二军要求每个医生都要建立医疗袖珍簿,不能将其“视为支应公事的形式,应细心登记之”,以“帮助实际中的学习研究,提高技术”^{[3]350-351}。1942年,八路军野战卫生部直属医院建立了新看护制度、司药日记、会诊、门诊等制度,并且一般“都能坚持执行”,因此该年医疗、看护、药品管理质量都有所提升。^{[3]154}此外,还建立了病历表、门诊登记簿等多项制度,便于各类医疗信息的初步收集和统计。

在医疗行政工作中,医疗报告制度的建设尤其值得注意,它与统计制度密不可分。1942年,太岳

纵队卫生部要求各团在完成统计后对旅、分区每月报告一次,旅、分区在统计之后向纵队每季报告一次,医院及纵直各所每月统计并报告一次,纵卫完成统计后向野卫及纵司、政机关每季报告一次。^{[3]142}1948年,中原军区卫生部决定将工作报告分为书面报告和统计报告两大板块,并要求县大队(团)、军分区、二级军区、大军区进行逐级报告,此外还规定了报告时间、频率及注意事项等。^{[3]275-276}1949年5月,第二野战军卫生部对各级部队、所属医院、所属各直属单位、野直各卫生机关的报告制度做了更加详细的规定,并制定月终、季终、年终统计报告制度以及战役统计报告制度。^{[3]323-326}显然,报告制度的逐步完善与统计制度建设是同步且相辅相成的。

从报告内容来看,卫生工作报告内容虽全面广泛,但统计内容在其中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1944年2月,八路军野战卫生部计划建立各级卫生机关的月报、季报、年报制度,且要求在战斗后,各队所属医务人员上报战斗救护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好坏表现和伤亡统计。^{[3]169}1948年,中原军区卫生部专门开辟统计报告板块,规定收容病员的治疗机关列入医院的统计报告,而门诊治疗等列入部队统计报告。^{[3]275}1949年12月,在第二野战军第十二军卫生部制定的医疗工作方针中,规定战役结束后两天内由团送师的报告,其内容应包括留队治愈的伤病员登记表及救护工作简要报告,战役结束五日内由师送军的报告,其内容应涵盖战伤医疗统计表及救护工作简要报告。^{[3]350}由此可见,统计内容是卫生工作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二者的关联性不断增强。

(三) 统计内容走向规模和系统

全面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伴随医疗统计制度的建设,形成了大量针对医卫人员、伤病员、医疗物资的统计表册,这是军队卫生制度不断走向完善和体系化的重要标志。

全面抗战时期,医疗统计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各级卫生机关对统计内容仅是在方向上作了大致规定。1942年7月,八路军野战卫生部所强调,统计报告要求“内容充实,应多注意反映实际问题及医疗技术问题”^{[3]139}。基于此,1942年太岳纵队在医疗行政方面,对太岳军区整编后各级卫生机关的编制和卫生人员增减、培训及提升情况作了统计;医疗物资方面,统计了药品器材的损失情况,其中因反“扫荡”损失樟脑水1盒、麻黄精1盒、棉花2斤、汗必灵4磅、硫酸钠4磅、热退尽6磅、退热平5磅、疟疾丸60包等;在医疗卫生方面,统计了一年来部队发病情形,如太岳军区卫生部全年疾病收治分类统

计、太岳纵队各部队全年伤病员住院情况统计、太岳纵队卫生部全年伤员收治及伤类统计。^{[3]140-152}1942年八路军野战卫生部直属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在医疗卫生方面,对医疗成绩作了统计,该院全年所做各类手术达495例,其中一、二期愈合数共计416例,残废32例,牺牲4例。^{[3]154}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由于战斗分散、形势复杂,大规模的医疗统计工作尚未展开。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军队卫生政策制定与制度建设的推进,统计内容呈现规模化和系统化的特点。在医疗行政方面,1948年4月,晋冀鲁豫军区卫生部医政处对刘邓、陈谢大军南进前后医务人员之职别、数目和部别,以及军队南进前后卫生机关之所属单位、数目和部别作了详细统计。^{[5]377-388}在医疗物资方面,主要涉及的是药品器材,1946年晋冀鲁豫军区卫生部要求所属各单位对药品器材的补充、消耗、损失情况做详细统计,以说明保管情形;^{[3]188}1948年,经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第十旅统计,全年共有80人使用生理盐水54730毫升,平均用药量为每人684毫升,382人使用破伤风抗毒素307200单位,平均用药量为每人804单位,832人使用磺胺6705片,平均用药量为每人8片,^{[3]886}以此来掌握第十旅药品使用情况。在医疗卫生方面,统计内容更加复杂,以伤病员的人数来看,可以从收容数、减少数、现有数进行统计;以战伤情况划分,则包括负伤部位、伤类、医疗情形等内容;从伤病员治疗看,则需统计针灸、手术等情况;此外还可对医院收治伤病员的疾病作分类统计,如消化系、神经系、五官、循环系、传染病等。如1948年9月,中原军区第九纵队对南征一年来卫生情况作了综合统计,共收治伤病员5456人,做扩创、取异物、整复等各种手术达591次,因治愈、转院、牺牲、逃亡等原因共减少伤病员5433名。^{[3]258}军队卫生工作逐步走向专业化,医疗统计制度在这一时期贯彻力度不断增强,统计内容也趋于清晰和详细。

三、医疗统计制度的主要成效

全面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医疗统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不仅有助于改进军队医疗卫生工作,还推动了军队医疗卫生工作的建章立制,进而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卫生工作奠定实践基础。

(一) 改进了军队的医疗卫生工作体系

医疗统计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提高医务人员的责任意识,转变工作作风。1946年,冀南军区卫生部部长鲁之俊在高级医务干部会议上曾提及,“各分区做统计报告是为了提高卫生人员的责任

心”^{[5]491}，如对战役伤亡人数、伤情轻重、手术及化脓人数的统计，可以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帮助医务人员整顿业务和提高医疗技术。1948年9月，中原军区第四纵队卫生部提出在每次战斗后，须做简明扼要且具有批判性的统计报告，并强调工作总结与统计是“下边对上边的义务”，“没有总结和统计等于没有工作成绩”^{[3]259}，以此助推医务人员树立高度的责任意识，使军队卫生工作走向正规化。

贯彻医疗统计制度，对军队卫生工作具有指导作用。1948年中原军区卫生部鲁之俊强调：“医疗工作从数字中来看，便可看出工作的好坏，根据统计可以改进我们的工作。”^{[3]268}1949年5月，第二野战军卫生部指出：“登记统计报告制度是我军经常使用的工作制度之一，可以看出各种成绩或其他。”^{[3]330}例如，可以在战争统计中看出战役大小及伤亡之多少；在医院统计中，可以从归队数之高低看出治疗之成绩；在门诊疾病登记中，可以及时知道传染病发生与否，由此可协助提早预防。1949年下半年，第二野战军第二后方医院第四、五、六等单位接收的伤病员中，其病类以内科为主，战伤为次，且内科中又以疟疾、杆菌痢疾、回归热、疥疮、营养不良性水肿等疾病为主，医院即刻按不同病类调整病房，又将全院患黑热病的病人集中到四所三室隔离，及时治疗，同时开展卫生运动，成功阻止了疾病的大规模传染。^{[3]359}

整理、分析统计数据，有助于卫生机关制定更加科学有效的诊疗方案。1949年12月，第二野战军第二后方医院根据收容伤病员中最多的病类，确定了治疗工作重点，集中力量治疗，增加了治愈率，减少了死亡率；对病人的观察、诊断、治疗相较于之前更加精细正规，加强了会诊工作；能够利用X光、化验室帮助诊断治疗；手术室和药剂人员在治疗工作上也有了很好的配合。^{[3]360}由此可见，基于各类医疗统计数据，军队及医院医疗工作更加有序，救治水平显著提升。

（二）推动了军队医疗卫生工作的建章立制

医疗统计制度的建立，促进军队卫生工作制度的完善。为配合医疗统计工作，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建立了诸如袖珍簿、病历表、门诊簿、司药日记、出入转院、工作报告等制度。这些工作制度着力于收集和登记医疗行政、物资和卫生工作的基本情况，以及向上呈送统计信息，不仅为统计工作提供前提和保障，还健全了军队卫生工作的制度体系。

医疗统计制度的实施，细化了卫生机关及医务

人员的工作规则及职责。1947年10月，晋冀鲁豫军区卫生部制定了涉及住院、医生办公室、护士办公室、药房、外科室、伤病室在内的后方总院规则，以及包括所长、医生、实习医生及医助、护士长与看护长、护士与看护等的医务人员职责，力求通过确立工作规则和职责，来达到“一切准备成规，一切操作成套，变成条理规划，不致紊乱”^{[5]355-366}的医疗效果。1949年，第二野战军卫生部出台了《医政处组织系统与工作暂行条例》《各级医务人员职责》《各种医疗工作规则与职责》等，明确和统一了全军各级卫生机关、医院、医务人员的工作制度和职责。^{[3]316}显然，医疗卫生工作规则及职责的制定，有助于医务人员在卫生工作中增强职业素养。

医疗统计制度的实践，还上升到卫生法规的高度。1948年1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卫生部强调“卫生法规是卫生工作法定的规章”，其目的在于使“工作有所遵循，于查有所根据，借以提高工作效率，使之逐渐走向正规化”^{[1]221}。尤其在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出台了大量的卫生法规，如1948年中原军区卫生部制定的《临时战救工作条例》，规定了战救组织位置与任务、技术与纪律以及各种战救标记。^{[5]397-400}1949年5月，第二野战军卫生部更集中颁布了《部队各级医政工作职责暂行条例》《关于部队报告制度之规定》《怎样作登记与统计工作》，文件内容涉及登记、统计、报告等诸多方面，形成了系统的统计报告制度。^{[3]319}可见，颁布卫生法规的形式一方面巩固和充实了军队卫生工作制度，另一方面增加了制度执行的效力。

（三）为新中国卫生工作奠定了实践基础

战争时期军队的医疗统计制度建设还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甚至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国家卫生工作建设提供了历史基础。1982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发布《全国中医医院工作条例》试行版，要求中医医院根据中医特点，建立健全医疗统计制度，并按中医标准经常研究“诊断符合率、病床使用率、病床周转次数、平均住院日、门诊人次等指标变化”的数据，以此分析疾病原因，改进工作，逐步探讨出“适用于中医医院特点的统计指标”^{[6]5602}。卫生部重视中医医院医疗统计制度的建立健全，与革命年代的医疗卫生方针、政策以及制度的建设实践密切相关。

四、结语

革命年代，因战争造成的伤亡不计其数，因此高效、有序的卫生工作尤为重要。然而战时条件下，医疗卫生环境、医患人员、医疗管理及救治等方面均存

在一定困难,为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从人员、组织、制度等方面不断强化医疗统计工作,并将医卫人员、伤病员、医疗物资等作为医疗统计内容重点建设。医疗统计制度的建立与强化,有助于军队探寻卫生工作的发展规律,改进医疗卫生工作,推动军队医疗卫生工作的建章立制,进而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卫生工作奠定实践基础。

医疗统计制度是军队医疗卫生工作科学、有序开展的重要手段。总的来看,医疗统计制度的生成与实践历程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推进军队卫生制度的整体建设,为配合统计工作的开展,无论在前期的信息收集和登记,还是在后期逐级呈报环节,都设立起了较为完备的规则制度,不仅如此,除统计制度外,军队卫生工作还系统建设了“四二”学习制度(即每周四天业务学习,两天政治学习,该制度在不同时期依据军队中心任务的调整而有所变动)、供给制度、战地救护制度、日常卫生防病等多项制度,填补了过去卫生制度上的薄弱或空缺之处;二是形成了人民军队及医务人员艰苦奋斗之精神,无论隆冬风雪严寒,抑或盛夏酷暑炎热,部队始终坚持行军作战。同时后勤供应也殊多不易,医药、日常生活用品缺乏,便动员自办药厂,推行新疗法等。总之,战

时斗争局面复杂艰苦、卫生保障任务艰巨繁重,但全体医卫人员昼夜奋战、吃苦耐劳,成功完成卫生防疫和战伤救治任务,有效保障了军民健康。

参考文献:

- [1] 陈明光. 中国卫生法规史料选编(1912—1949)[M]. 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96.
- [2] 《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编委会. 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第1卷)[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
- [3] 《刘邓大军卫生史料选编》编写组. 刘邓大军卫生史料选编[M]. 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
- [4] 后勤学院学术部历史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五)[M]. 北京:金盾出版社,1992.
- [5] 后勤学院学术部历史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四)[M]. 北京:金盾出版社,1992.
- [6]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法律法规全书(第9册)[M].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 谢春红)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Medical Statistics System in Liu - Deng's Army

WU Xingwei¹, LI Feilong²

(1. School of Marxism,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2. Institute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istory and Party Building,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In the revolutionary era of continuous and frequent battles, in order to ensure victory in war, the military needs to invest a large amount of manpower, material resources,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in the field of health. However, difficult medical conditions, the need to ease doctor - patient relationships, and relatively weak institutional traditions often lead to difficulties in military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the War of Liberation, the people's arm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constantly strengthened medical statistics in personnel, organization, system and other aspects, and focused on medical and health personnel, the sick and the wounded, medical supplies and other medical statistics. This not only contributes to the improvement of military medical and health practices, but also promotes the establishment of regulations and systems for military medical and health work,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health work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Key words: military hygiene; Liu - Deng's army; statistical system

从看护到护理：近代中国护理学科专业化

宋青红

(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杨浦 200093)

摘要:西医护理本身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中国将近代西方护理学引进的过程是与传统看护相交织和反复的过程。最初中国护士教育师资主要来自外国,特别是英美传教士看护士,看护观念也受到日本看护学的影响。中国本土化护士体系的建立,一方面是在纠正传统的看护观念包括性别观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另一方面也是西学东渐的结果。近代护理学的引进过程中,不仅局限于家庭领域,近代早期中国革命党也号召妇女从事战时看护工作,护理逐渐走向公共领域,并最终走向医院等专业领域。随着护理学科的发展和护士学校的增加,护理从业人员越来越受到重视,护理学逐渐与医学分离,成为独立的学科和职业。

关键词:西学东渐;护理学科;护理教育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4.01.011

中图分类号:R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4)01-0069-08

西医护理本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西方传教士将其引入中国。学界对美国护理学科的出现有诸多研究,胡云天、甄橙指出,护士助产士整合了护理与助产实践,平衡了医生与护士之间的观念分歧。^[1]近代西医护理的产生,得益于西方教会的在华医疗活动。刘燕萍分三个时期梳理基督教与护理发展错综复杂的关系。^[2]杨欣对中西医发展的时代背景进行了梳理和比较,分别概述了基督教会派遣传教医生来华开办妇女医院、建立女子医学校、培养女子西医人才和翻译西方医学书籍等活动,分析了基督教会和华妇女医疗卫生事业的影响。^[3]姚莉莎探讨了1909—1937年中华护士会的在华事业。^[4]乔会妮以看护与护士之“变”为视角,探讨近代护理业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指出随着社会环境变迁,政府主导下的护理业逐渐向规范化与职业化方向发展,护理业内部选择以及社会发展的外推力促使其发生转变,护理业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可与接纳。^[5]甄橙回顾了1880年至1930年代美国传教士在华的工作,

重点介绍了沃安娜和盖奇两位传教士护士的工作,分析了西医护理在中国建立和发展的过程及影响因素。^[6]并从护理者身份、护理活动场所、护理对象和性质的变化过程,分析近代西方护理学的发展过程。^[7]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探讨近代中国护理观念产生发展及护理学科的专业化过程。

一、近代护士学校的设立

近代西医护理伴随基督教的传播进入中国,1835年英国传教士兼医师伯驾在广州设立眼科医局并开办博济医院,曾训练一些中国人充当助婢。1866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医生嘉约翰接管博济医院,初期只招收男生,后于1879年改为男女兼收。^[8]1884年,美国传教士麦克奇尼(Miss Elizabeth Mckechnie)来到中国并在上海妇孺医院(Margaret Williamson Hospital)服务。^[9]1887年,医师布恩在上海开始训练护士,“因为当时的社会观念认为看护病人仍仆役的工作,学校招生往往一个班只有三五个护士”^[10]。1888年,强生女士在福州医院开展护士

收稿日期:2023-11-25

基金项目:2013年度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抗战时期的女性精英群体研究”(13CZS036);2019年度上海市社科规划一般项目“近代中国留美女学生群体研究(1872—1949)”(2019BLS011)

作者简介:宋青红(1982—),女,江西永丰人,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妇女性别史、医疗社会史、抗战史、人物研究。

训练工作,第一期招收初识字之男、女生各一名,教授助产术及配药术等。^[11]

中国护士教育的历史也因西方来华传教士而产生。西方传教士最初开设医院,采取护士徒弟制度,“但是徒弟制,终久是笨拙的,无系统的”,“所造就的人才,是否能适应护士职业的环境,切合社会职业界的要求”,这值得商榷^[12],后来才有护士学校的设立。中国近代早期的护士学校大多附属于医院。晚清时期已创立护士学校。如镇江宝盖山美以美妇幼医院护士学校,据称到1924年已有30余年的历史。1924年该校毕业典礼,陈博士讲看护系服役一种特别工作,并全国看护会干事孙女士报告,“此次应护士考试者,全中国计90所学校,而在此中得称为优等者,只有四位。此四位又皆是妇幼医院护士学校”。他们不仅获学校毕业文凭,还获中国护士学会看护证书。^[13]可见该校办学成绩非常优秀。

1900年以后成立的护士学校就更多了。义和团事变后,有不少英美护士到中国各地教会医院服务,极力鼓吹中国人学护士,更于武汉筹设训练护士机关,提高课程,修业时间改为三年。^{[10]32-34}不过,当时中国人“知护士工作之重要性者颇少,为父母者更不愿子女学习护士,故历年研究护士人才而真能担任护士工作者,据记载不过数人”^{[10]32-34}。

中国从外国来华传教士训练护士,到中国自办护士学校,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如1900年上海同仁医院护校、1906年北京协和医院护士训练学校、1907年广州博济医院护士学校、1911年福州马戈纪念医院护士学校、1915年长沙雅礼医院护病学校(后改为湘雅护校)等纷纷成立。^[14]1908年,留美女学生金雅梅在天津设立的附属于北洋女医院的护士学校,得到袁世凯、严修等人的支持,培养了天津最早的一批护士,后由钟茂芳担任校长。钟茂芳曾留学美英,回国后任北京女医学堂看护教员,“于看护一科研究较详,热心教授”^{[15]2}。

1911年国立广东大学医科附属护士学校创立,以养成高等护士人才,增进社会卫生学术为宗旨。^[16]同年,盖仪贞女士在胡美、颜福庆的帮助下,创建了湖南省一所护士学校——雅礼护病学校。1915年,雅礼医院更名为湘雅医院,雅礼护病学校更名为湘雅护士学校。至此,“湘雅”形成了医学校、医院、护士学校三位一体的体系格局,并延续至今。湘雅医院护校校长由医学院院长兼任,1944年以后的主要工作由分院院长主持。

1918年广济护士学校成立,附属广济医院。该校授以护士科学知识技术,以养成男女高等护士人

才为宗旨,设置护士科,教员有温德来、巴格罢、彭朗德、苏达立夫人。^[17]从名字来看,很可能是外来传教士。^{[18]36-48}

北京协和医院护士学校于1919年由沃安娜(Anna D. Wolf)负责筹办。他邀请12名护士教师,经一年余的筹备,1920年9月正式开学。该校宗旨以培养具有良好文化教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预防保健、医疗和护理科学水平的护理骨干、师资和领导人才,以提高护理专业水平,适应现代卫生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开设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药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等学科,均利用医学院的教室及实验室上课和做实验。护校设有专用教室、阶梯式护理教室及练习室、营养饮食学实验室、教师备课室等。^{[19]123}由于入学文化程度要求较高,第一班仅招女生3人,到1924年毕业时仅剩曾宪章1人。1925年后,毕业人数渐增,每年约5至10人。该校毕业的知名护士还有夏德贞、徐蔼诸、朱宝钿等人。北京协和医院护士学校经过第三任外籍校长胡智敏(C. E. Hodgman, 1939—1940)以及第一任中国校长聂敏禅及全校教师的共同努力,得到长足发展。

1920年5月,中国护士学会还举行毕业考试:“博医会附属之中国护士会,定本月21日起举行全国中国护士毕业考试,至29日止,各地护士学校,业经由会推举,就近著名医院院长为监考员,如杭州梅藤耕,山西伍连德等,皆有任务。上海则为工部局医官白来生,其日期及考试科目,录之如下:21日手术,24日解剖学,25日药科、眼科、耳鼻喉科,26日内症及小儿科,27日外症及微菌学、饮食学、生卫学,28日产科、妇科、花柳科及急救法,29日临床护病学。”^[20]从考查科目之多可看出,要获毕业证书实为不易,也体现了护理学在趋向专业化。

1921年11月6日成立的上海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护士学校,专门培养女看护生,规定三年毕业,特聘欧美毕业医士教授内科、外科、妇科、产科、小儿科及临床看护等。^[21]

山西汾阳医院于1889年由美国基督教华北公理会创建。护士来自当地早期的基督教家庭。她们被送到沿海城市或北京一些医院进行短期培训后,再返院工作。1922年,该院才办自己的护校,交由美国护士张孔美玉负责。最初仅招男生,每班3—5人;后始招女生,每班10—12人,入学程度也由小学毕业提高为初中毕业,后又要求有1—2年高中教育。^[22]

1923年,上海妇孺医院附设协和护士学校举行校舍落成仪式暨毕业典礼,该校舍系美国浸礼会布

道总会筹款建造,教职员有明美丽、俞凤宾、何美丽等人。^[23]1924年,美国创办的上海福音医院办有一所护士学校,定于5月12日举行第八次高级班学生毕业式。^[24]天津南门外美以美会妇婴医院护士学校亦于同时举行毕业式,毕业生有王素娥、凤美贞、赵振华、贺秀贞等人。^[25]

1925年,办理多年的已有五届毕业生的湖州福音医院护士学校,“今年因新院落成,规范扩大,特招学生20名,投考者达40余名,已于昨日由沈阶平医生选题考试,英国算三科,并查验体格,现评定甲乙完毕,录取者15名”^[26]。

1928年,青岛普济医院开办的护士学校是青岛第一所专门培养护士的职业学校。1929年1月1日,美籍监督安保罗创建了青岛信义会医院。1932年7月,青岛信义会医院附设了信义高级护士学校。^[27]医院附设的护士学校主要借助医院的师资力量、经费和实习场所。

1937年,山东成立了仁济医院护士学校,其入学门槛并不高,“至低初中毕业,凡身体健康,有志服务者,最为合格,膳宿制服等费完全免纳,在学习期内,仅收保证金等六十元”^[28]。上海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附设之护士学校于1938年9月16日开学,入学者共计97名。^[29]另有高危行业也设有自己的护士学校,如中国煤矿于1926年建立开滦护士学校,1928年在中华护士会注册。^[30]到抗战前,中国人自办的护士学校已为普遍。

关于学费,各校也有不同,总体上还是较为实惠。上海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护士学校要求“学生入校时须先缴入学费洋25元,膳宿费概不收取,俟肄业一年后本校给津贴费按月两元,二年后按月五元,卧舍需用物品及校服书籍洗衣等费亦由本校供给”^{[21]25-28}。广济护士学校学费主要为膳宿费,男女护士第一年每月膳费四元,第二年每月二元,全年以12个月计,第三年免缴。^{[18]36-48}当时为了提倡护理教育,学费是比较少的,有些学校还免学费。^{[18]36-48}北京协和医院护士学校学费稍贵些。学生入学时交注册费10元,被正式录取者,此费在第一学期学费内扣除,未被正式录取或录取后不报到者,不予退还。第一学年:暑假开学时交35元,第一学期交30元,第二学期交35元;第二学年:第一学期交35元,以后不再交学费。另收书籍费约40-50元,主要用于向国外代购书籍;制服费第一年第一学期交89元,第二、三年各交10元。此外还有赔偿费押金4元,显微镜租用费4元。如果获得董事会奖学金,每年奖给毕业班最优秀毕业生一名250

元。^{[19]124}

护理学招生要求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这也反应护理学科的专业化趋势。1918年广济护士学校入学资格:“以品行端正、身体强健、文理精通及有高等小学毕业程度,年龄在20岁以上30岁以下者,方为合格。入学试验科目:国文、英文、算术、体格检查。”^{[18]36-48}上海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护士学校入学资格:“年龄须在18岁以上而未出嫁者或寡妇,身家清白品行端正,具有中学相当之程度,身体康健而无不良嗜好者。”“学生入校后先试学三月,在此期内学生可自决去留,若该生品行端正,操作勤俭,则定为正式学生而继续肄业,设于三年后而无违规旷课及考试合格者本校则给予毕业文凭。”^{[21]25-28}

1945年,各护校招生以初中毕业为限,陈崇寿指出:“要知道一个护士的养成,尤其是一个优秀护士的养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的文化程度最低是初中毕业,而近年来大专毕业后再去护士学校的也日见增加而成为普遍。他们除了对于专门学科如病理、心理、细菌病等学科为必修课外,尚须加以品性的陶冶,以及体魄的锻炼,要在智德体三者中,有一或缺,那决不能算得上护士之优秀者。”^[31]

时人认为,这种专业趋势还有待提升。翟枕流认为:初中毕业生在年龄、生理、心理上难负重任,应鼓励高中及大学毕业的女同胞们参加护理工作。且各护校应该独立,在行政、经济上自立自主,其训练中心应以学术的思想配合科学的方法,其教学目的,必须有绝对的专心与刻苦的准备,不能以廉价工人待遇供医院驱策。“若果能在护理教育制度上先予以改正,再设法增加护士进修的机会,使内无怨言,外无指责,则护理事业之发达,当然是百尺竿头。”^[32]

随着护理学科的专业化,近代专业护士群体大量出现。据中华护士学会统计,到1935年,在该会立案学校不下一百余校,领有该会文凭者计4805人,男性占1477人,女性占3328人。^[33]到1936年,中华护士学会已有会员由十年前的1186人增加到6523人,由该会登记的护士学校有174处。到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已有护士人数一万多人。1940年全国现有护士13750人。^[34]1942年,“据一般估计,我护士界从业员不下万余人”^[35]。到1948年,“迄今毕业的正规护士不过一万二千余名。护士学校约180余所,尚有半数未在教育部立案”。1949年中国护士人数为32800人。^[36]随着近代护士学科的引入,护理学科越来越呈专业化发展趋势。

二、近代早期“看护学”书籍引入中国

早期护理人员的培训以师徒的形式,带教讲

解为主,无固定学制和教材。随着正式学校的建立和学制的确定,必然产生对教学书籍的需求。至迟在1905年已有正式护理著作出版,如《护病要术》由中国博医会出版,编译介绍了西方护理的基本要求。

作为一门学科的看护学,最早于1907出现。曾留学日本的革命志士秋瑾认识到妇女从事革命的重要性,认为从事看护和慈善事业是妇女对于革命和社会的义务,因而将日本《看护学教程》翻译引进中国。她认为看护学需学习医学的全部知识,“看护法者,医学中之一科目。而以为治疗者之辅佐也。故欲深明其学,施之实际,而能收良好之效果者。非于医学之全部,皆得其要领者不能”^{[37]24}。这跟传统意义上的在家照看病人家属是有区别的。

秋瑾认为:“夫看护为社会之要素,妇人之天职”,“然则平时则能保社会之安宁,战时则增进国家之利益。虽谓之益国便民之事业,亦非过语。何贱业之,有热心爱群是我所望于胞姊耳。”^{[37]25}她把看护工作领域扩为家庭和战场,既延续了传统看护多限于亲属之间的旧状,同时也指出战时看护对国家的责任。秋瑾基于革命和国家的需要,为了革命的理念、社会的改进,引进《看护学教程》,培养护理人员,赋予了护理学公共性职责。

1909年赴日考察医学的丁福保^②在《看护学序》中也强调战时看护的重要性:“然有人焉无论其受伤之兵士医院之病人皆为之事事亲理,体贴周至如慈母之于爱子,如孝女之于父母者,伊何人,即东西洋文明各国之白帽白衣白领白带白裙之看护妇也。”^[38]时人已经充分认识到看护的独立性及其重要性,并努力将“看护学”观念及学科介绍到中国来,使其从传统狭隘的私领域走向公领域。

传统看护主要服务于家庭领域,近代看护也将其涵盖,鼓励家庭妇女学习看护知识。1911年的文献显示小儿疾病看护法是家政学内容之一,^[39]强调家庭成员应具备医学知识,出现了家庭看护学的概念。^{[40]1-6}为何需要家庭看护?吴杏一指出近代中国专业的护理人员没有培养起来,因而需动员家庭主妇学习之,并著《家庭看护法》。^[41]她认为,看护与服侍的区别在于前者略懂医学知识,后者是纯粹的使唤传奉人员。梅梦也强调主妇须人人略知普通看护法,“女子既为一家之主妇,若于看护方法昧然不知,则家族中偶有疾患,必至手足无措,其甚者轻信人言,医药杂投,易酿成大患。虽豪富之家,佣仆甚多,侍病不患无人,然不知看护之法,不知细心体贴病人,较之主妇亲自看护者,恐有霄壤之别矣”^[42]。

1913年,钟茂芳结合其在英国伦敦葛氏(Guy)医院的学习经历,在北洋女医学堂从事看护教育和看护工作,并翻译了英国伦敦葛氏(Guy)医院Miss M. N. Oxford(阿各斯大)的《看护要义》(*Handbook of Nursing*)一书,由陆军军医监长乐徐华(HSU Hua Ching)推荐写序。乐徐华称:“国家之强盛在乎人民之康健,人民之康健在乎医术之精良,而医术之精良,尤需看护之襄助,医与看护其关系至要,其职务至重,而责任亦至大,世称医有夺天之功,看护犹保姆诚非虚语。故东西各国医学而外,并设看护学校造就完全人才,以保卫夫民生,余问世三十年窃叹中国看护人材缺乏,往往贻误,心甚憾焉。”^{[15]1-2}乐徐华表达护士之于医生的独立地位,该书并载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伍莲德的题词:“是以欧美日本文明各国无不重视看护一门,且有时病之痊愈,迟速多在乎看护之良否,是病人恃看护或较诸恃医士为尤切。予每与人诊疾,若有良看护襄助,则鲜有失败之虞。是可见看护之学人,不可以不知也。”^{[15]7-9}

1917年,孙祖基译日本田村贞策的《看护学浅说》,他指出:生病就医无疑,“然如病人之看护,亦极紧要,故疾病之治疗,第一看护,第二药剂。看护之适当与否,有莫大之影响。及于病人,例如某种之疾病,专恃医药之功效,四周间可望全治,苟看护合法,则三周间便可全治,反是而医士为名,医药剂亦适当,苟看护失宜,则本克治愈之疾病,一变而为死症;本系轻微之疾病,一变而为重症。其不幸不特限于病人之一身,并贻全家之累。克胜看护之任者,以妇人为上,诚以妇人之性质温静而富于爱情,注意周密,天然胜看护之任”^[43]。他强调看护具有独立于医药的重要地位,并将看护职业与女性联系起来。

除引进日本的看护理念外,时人也开始翻译美国、英国的看护讲义。1916年,李恨生翻译了美国窦安和氏的《看护学讲义》,包括医院中看护之重要职务、病人之普通看护法、绷带法、传统病及杂病、急救法等内容。^[44]1918年,马民焕翻译了英国史多耐的《看护药料学》,指出:“迩来吾国西医极受社会所欢迎,但医士必须有良好之看护相助。是则培植看护,亦当今医界中之急务。无如教授看护书籍,其译成者甚少。而于看护药料学,则更无一见。”^[45]1918年,刘云航翻译美国人Miss L. G. Moberly的《家庭看护学》(*Sick Nursing at Home*),他指出:“今夫家庭看护之学,匪晚事也,事之难者,莫甚乎预言国事。而吾谓侍疾之事,将更有难焉矣。是故人人当受有家庭看护学之教育,以陶成侍疾者应有之本能——

即机智常识与恒心是也。”^{[40]1-6}应该说在 1910 年代,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时人开始认识到看护学于革命、战争及家庭的多重重要性。

俞凤宾^③指出看护乃“高尚之职业”,为社会所不可缺,除了有护理学的专业知识,也需具备良好德性、终身学习、爱人爱己、防病之理念。“护士(即看护)非人人能任者,心必具学问,道德,且怀爱人之心,方可为善良之护士。”^{[46]174-175}“护士之所以可贵,重在其所具之德性,苟无良善之德性。虽以侍疾为己任,亦难收效于病者之前也。”“护士暇日宜多读书报,以增加其学问,既离学校,则社会即是学样,修学无止境,宜终身为之。对于自身之保护,亦须注意。从井救人,君子不取。勿任传染病侵及己身,宜自知防患之法。而切实行之,平日宜有整洁之习惯,逢必要时,可注射苗浆血清之类,以造成抵抗疾病之力。学道所以爱人,亦所以爱护自己。”^{[46]174-175}

1930 年代,关于看护学的书籍越来越多了,比如 1930 年姚昶著《病人看护法》(商务印书馆),1931 年杨鹤庆编《内科看护学》(商务印书馆),1932 年协和医学院中文部翻译美国李嘉森(D. L. Richardson)编的《传染病实用看护法》(中华卫生教育会出版),1933 年胡宣明、杭海翻译美国红十字会的《看护病人要诀》,1933 年颜守民编著《乳儿保育法及看护法》(大东书局),1933 年胡珍元编《家庭看护法》(新亚书店)等,基本以“看护”命名“护理”,以“看护法”“看护学”命名“护理学”。

三、护理课程及其专业化趋势

(一)理论课程

随着护士学校及护理书籍的大量出现,护理学科逐渐呈现出专业化的趋势。从课程设置来看,护理学科涉及广泛的专业知识,理论学习与医院实习并重。

国立广东大学医科附属护士学校修业期限预科三个月,本科三年。预科:口授法、解剖学撮要、道德学、绷带、病室实习;本科第一年:解剖学及生理学、外科学、实用护病学、细菌学、儿科学;第二年:解剖学及生理学、外科学、内科学、实用护病学、药理学、饮食学、病室实习、外科手术室实习、传染病理法;第三年:药理学、产科学、妇科学、脑病学、揉捏法、X 光线理法、救急疗法、尿具学、病室实习、眼耳鼻咽喉学等。^[17]

上海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护士学校科目上如下:第一年:身体结构学及生理学、药性学、伦理学、看护法则、绷缠带法、英文;第二年:身体结构学及生理学、看护历史、饮食法、微菌学及验尿法、产科学、

药性学及施药法要、看护法则、英文;第三年:内科学、外科学、产科学及妇科学、小儿科学、揉捏法、看护法则、英文等。^{[21]25-28}

1947 年,江尊群讲:“现代护士学校之课程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基本科学,如解剖学、生理学、营养学、细菌学、药理学、病理学、寄生虫学、临症检验学、外科学、内科学、产科学、小儿科学、精神病学等;二是各种工作理论或工作实施的原则及方法,如普通护病学、烹饪学、外科护病学、内科护病学、妇产科护病学、小儿科护病学、精神病护病学等。基本科学有试验室之工作,以坚其学识之信仰;各种工作理论有示教,以则效其工作之楷模。使学生在附设医院中得实习之机会,所谓实习者,即将所学之基本科学及工作理论,应用于护理技术上,使工作达到最高效率。至于学生之道德,务使养成洁身自守,见义勇为的品格,与夫己饥己溺的概念。此种品格及概念影响护士工作甚大,为护士学校所注视者。故护士学校课程中,更设有护病历史及护病伦理,以其能窥见先哲之遗范而自勉。凡此种种皆为基本护士所必须具备者,当于三年期间完毕。”^[47]江尊群所说的第一类的基本科学,基本是医学学科的课程内容。近代护理学虽然相比看护更加专业化,但还是没有完全从医学中独立出来。

护理学课程标准和设备也在不断完善之中。1935 年,谢惇五指出:“改良护士教育的步骤,应该先着手调查及视察全国护士学校的程度,拟定护士教育合乎潮流的标准课程,视察以后,与各学校以此种标准课程,限定在某年起,如不及格者取缔,如及格者当然随时加以奖励。选择全国设备最好,及程度较高之护士学校内,设立中央护士师范学校,专门训练教授及领袖人才。”^[12]1935 年还制定了《高级护士职业学校暂行通则》,护士职业学校的学生需要学习的专业课程有:解剖生理学、细菌学、护士伦理及历史、药理学、护病学、护病技术、眼耳鼻喉科、国文、产科学、产科技术、个人卫生、公民、饮食学、心理学、病室实习、外科、内科及传染病学、小儿科护病学、外国文、物理治疗学、急救术、家政学、妇科或花柳科、公共卫生、护士职业问题、病室及公共卫生实习等。^[48]此一时期的护士学生既要学医学知识,又要学护理学知识,护士学校课程设置非常完备^④,体现出护理学科的专业化趋势。

(二)实践课程

护士教育做到理论学习与实习并重,据湘雅医院护士学校学生回忆:入校之后,前三期完全自费,从第四期起完全公费。但前三期读书最苦,必得抓

住时间去充实基础学科,每天七个钟头甚至八个钟头的正课,如英文、国文、生理解剖学、内外科、助产学等。待各门学科都超过标准分数后才能参加第四个学期的加冠典礼,穿上纯白的制服。从那天起,每日有一部分时间到病室实习,在每日连课带班七个钟头的工作下,度完后三学期,而临床实习,“是给我们一个获得丰富经验的机会,同时也是一个锻炼与试探我们才能的时候,但只要你坚决抱定服务人群的决心,那你会感到心灵上无限的愉快,工作责任随年级而增加,大概都是由高班同学领导各部门低班同学实习”,等三年二期所有学程都完全结束,参加毕业考试,通过后再参加当届全国毕业护士会考,榜上有名,最后半年在老师们的指导下进行助产训练,然后专待征调的命令,“征调一年完毕,成绩优良者,这张血与脑集成的文凭才算平安地为你所有,从此你就算是一个真正的护士了”^[49]。毕业后以同等学力资格投考,还有升入医院的希望,其次中央大学设有护士师资进修班及贵阳公共卫生人员训练班等都是进修的出路。

北京协和护士学校也特别注重护士实习,拥有医学院附属北京协和医院、北京第一卫生事务所、河北定县平民教育会等专门的实习基地。^{[19]124} 1947年,陆宝琪指出:“今后的护士教育,除给予普通之临床知识以为基础外,就该注意大众卫生知识方面了。给护生以实践的知识,发展他们的兴趣,给以充分时间,使了解护士工作的真谛。医院方面不应以利用学生的态度对学生,凡有护士学校的医院,应以教育为其第一目标。”^[50] 畚耒珠将督导学生实习工作作为护校教员的职责之一。^{[51]24-28} 畚耒珠指出:“护士学校之课程读书与实习并重,故科目之分派与实习之处所,须有紧密联系,因此一年级注重基本医学知识,如解剖生理学、细菌学、药理学、护病学,需于一年中读竟,而此时之实习时间较少。一年级之护生于病室中仅能作简单之治疗及护理。若上班之时间长,徒使之养成上班松懈之习惯,不如短时间之病室实习,而实习时一心一志,且有师长在旁督导,莫立良好之工作基础也。二年级则注重内外两科,可分别至内外科病室实习,内科除普通内科病室外,如传染病室、皮肤病室,亦可实习。外科则如眼、耳、鼻、喉、骨科等之手术病者,亦可使之护理。三年级讲授妇产科,小儿科,公共卫生,个案研究,精神病护病等,可至各该科目相关之病室实习,且对于病人之社会背景,予以研究,并可帮助解决社会问题,如此可引起兴趣。护生之督导员,最好能随学生至课堂听课,然后于实习时随时考验学生之课程,则能帮

助学生熟悉课堂中之讲授。每日晨间报告新入院患者之疾病,治疗及护理办法,亦可由护生轮流执行,对于讲述者及听讲者,均有莫大裨益。且因有实际之患者,在病室尤能引起全体护士人员之注意,其余若新药物或新医疗法之讲述,亦可补课室中教材之不足者焉。”^{[51]24-28}

从护士学校的课程设置大致可见,最初人们认为护理学专业也需要学医学相关的知识,护士学校在课程方面,涵盖内科、外科,甚至医学、心理学、人文学科以及护理学的相关知识,学习的内容比较多,护理学科没有完全与医学区分开来。

四、结语

作为西学东渐的产物,西方护理学在引进中国的过程中,经历了与传统看护相交织和反复的过程。早期护理人员的培训以师徒的形式,带教讲解为主,无固定学制和教材。随着正式学校的建立和学制的确定,护理著作至迟在1905年已有正式护理著作如《护病要术》出版。20世纪初,看护并无统一规定。北洋政府参考日本护理制度,又将德国各联邦看护妇规则作为参考,早期护士学校逐渐诞生。近代早期人们将护理等同于看护,认为不需要专业的护理知识,后来逐渐形成较为全面的护理学的知识。只不过护理学还没有完全与医学分离开来。护士学校的课程有较多与医学相关的内容,也涉及心理学以及人文素养方面的课程内容。随着护理实践,以及战争、疫病等因素导致社会对护理人员需求显著增加,护理学科呈现更加精细化和专业化的发展过程。

最初中国护士教育师资主要来自外国,特别是英美传教士看护士,同时看护观念也受到日本看护学的影响。中国本土化的护士体系的建立,一方面是在纠正传统的看护观念包括性别观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另一方面也是西学东渐的结果。近代护理学的引进过程中,不仅局限于家庭领域,近代早期中国革命党也号召妇女从事战时看护工作,护理逐渐走向公共领域,并最终走向医院等专业领域。从课程设置来看,护理学科涉及广泛的专业知识,而且理论学习与医院实习并重。从最初重视基础医学到更加注重护理学,各种看护知识及实验操作受到重视,基础医学逐渐弱化,这也显示了护理学与医学相分离的趋势。随着护理学科的发展和护士学校的增加,护理从业人员越来越受到重视,护理学逐渐与医学相分离,成为独立的学科和职业。

注释:

①钟茂芳曾作《护士会如何能协助中国》一文,她对中华护

士会扩大工作范围、提高护理程度提出许多见解。她建议中国毕业护士应一律加入中华护士会, 每省应设一护士分会, 每年应选派优秀护士赴美深造, 并特别强调, 护士应具有相当教育程度。参见冯克力. 老照片 第12辑[M]. 山东: 山东画报出版社, 1999: 138.

②丁福保, 幼通经史, 长而中西兼贯, 长于算术、医学、辞章、考据, 通日文。光绪二十二年补无锡秀才。25岁就读于江阴南菁书院。28岁东吴大学肄业。同年, 到上海江南制造局工艺学堂学化学, 入东文学堂学日文, 又师从赵元益学医, 学成, 任京师大学堂及译学馆教习。1909年赴日考察医学, 后于上海行医并创办医学书局。1914年始向佛。著作分为医学、文学、进德、佛学、钱币学等丛书。

③俞凤宾, 江苏太仓人。1907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部, 1912年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专修热带病学及公共卫生学, 获公共卫生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 在上海开业行医。兼任南洋大学校医、圣约翰大学医学部教授、卫生部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

④比较今天的护理学科, 主要的课程如下: 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护理学导论、护理学基础、内科护理学、外科护理学、妇产科护理学、儿科护理学、急救护理学、预防医学、精神护理学、护理管理学、护理礼仪、护理科研等。应该说护理学从医学中独立出来, 有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参考文献:

[1] 胡云天, 甄橙. 融合与实践: 20世纪初美国护士助产士的出现[J]. 医学与哲学, 2022(24).

[2] 刘燕萍. 基督教与护理[J]. 当代护士, 1996(4): 36-37.

[3] 杨欣. 基督教在华妇女医疗事业研究(1840—1949)[D]. 南昌: 江西师范大学, 2008.

[4] 姚莉莎. 1909—1937年中华护士会在华事业初探[D].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 2013.

[5] 乔会妮. 近代社会变迁背景下护理业的发展: 以看护与护士之“变”为视角[J].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1).

[6] 甄橙. 美国传教士与中国早期的西医护理学(1880—1930年)[J]. 自然科学史研究, 2006(4): 355-364.

[7] 甄橙. 南丁格尔时代以前护士角色的演变[C]//中华医学学会医史学分会. 中华医学学会医史学分会第十三届一次学术年会论文集. 北京大学医学部, 2011: 44-54.

[8] 嘉惠霖, 琼斯. 博济医院百年(1835—1935)[M]. 沈正邦, 译.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9.

[9] 中华护士会的起源与发展[J]. 中华护士报, 1923(2): 28.

[10] 汤其渊. 中国护士之职业[J]. 新重庆, 1948, 2(1): 32-34.

[11] 杨漫华, 宋淑铃. 护理学史概说[M]. 台北: 汇华图书出版公司, 1996: 107.

[12] 潘景芝. 护士教育应改革之方策[N]. 中央日报, 1935-

07-07(10).

[13] 林炳辰. 地方通讯: 镇江护士学校之光荣(江苏)[J]. 兴华, 1924, 21(11): 20.

[14] 张文亮. 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M]. 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1999: 229.

[15] 钟茂芳. 看护要义[M]. 北洋女医学堂刊印, 1913.

[16] 国立广东大学医科附属护士学校章程[J]. 国立广东大学周刊, 1925(29): 3.

[17] 附录: 浙江广济护士学校教员录: [表格][J]. 广济医刊, 1924, 1(9): 150.

[18] 广济护士学校章程(附表)[J]. 广济医报, 1918, 3(5): 36-48.

[1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史(1917—1987)[M].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7.

[20] 全国护士之毕业考试[N]. 神州日报, 1920-05-05(12).

[21] 专件(三): 上海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护士学校章程(1921年新订)[J]. 中国红十字会月刊, 1922(12): 25-28.

[22] 刘燕萍. 山西汾阳护士学校历史概述(1922—1951年)[J]. 天津护理, 2021(2).

[23] 妇孺医院护士学校之典礼[N]. 申报, 1923-09-26(18).

[24] 护士学校举行毕业[N]. 时事新报(上海), 1924-05-01(6).

[25] 护士学校毕业预志[N]. 大公报(天津), 1924-05-03(6).

[26] 湖州福音医院见闻录(浙江): 护士学校之兴盛[J]. 兴华, 1925, 22(41): 35.

[27] 青岛市史志办公室. 青岛市志·民族宗教志[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7: 140.

[28] 仁济医院护士校[N]. 新闻报, 1937-07-06(15).

[29] 红十字会护士学校开学[J]. 上海医事周刊, 1938, 4(38): 5.

[30] 胡高伟. 中国煤炭要事录[M]. 北京: 煤炭工业出版社, 2019: 43.

[31] 陈崇寿. 对于护士应有的认识[N]. 益世报(重庆版), 1945-05-11(4).

[32] 翟枕流. 护士事业的观感[J]. 中国护士季刊, 1948, 2(3): 12-16.

[33] 解冰士. 中国男护士将往那里去[J]. 医事公论, 1935, 2(18): 26-27.

[34] 护士教育五年计划(附表)[J]. 医育, 1940, 4(3): 25-31.

[35] 花新人. 勉护士界[J]. 西南医学杂志, 1942, 2(2): 3-4.

[36] 刘运焱. 我国军医人员的编制及统计[J]. 军医公报, (24): 81; 花新人. 非常时期中救护的统制问题[J]. 医事公论, 4(5): 17.

- [37] 鉴湖女侠秋瑾. 译编: 看护学教程(未完)[J]. 中国女报, 1907(1): 24.
- [38] 丁福保. 看护学序[J]. 医学世界, 1909(8): 6-9.
- [39] 汪杰梁. 小儿疾病看护法(家政学之一)[J]. 妇女时报, 1911(3): 35-39.
- [40] Moberly, L. G. 家政门: 家庭看护学(未完)[J]. 妇女杂志(上海), 1918, 4(1): 1-6.
- [41] 吴杏一. 家庭看护法(附图)[J]. 环球, 1917, 2(3): 55-61.
- [42] 梅梦. 家政: 简易家庭看护法(未完)[J]. 妇女杂志(上海), 1915, 1(3): 6-10.
- [43] 日本田村贞策. 看护学浅说[N]. 时报, 1917-03-04(14).
- [44] 窦安和氏李恨生. 专件: 看护学讲义(未完)[J]. 浙江广济医报, 1916, 2(1): 58-61.
- [45] 史多耐. 专件: 看护药科学(未完)[J]. 广济医报, 1918, 3(4): 57-62.
- [46] 俞凤宾. 上海协和护士学校第一次毕业礼勉助词: 学道爱人、护士之天职、护士之德性、护士之修学与防病[J]. 中华医学杂志(上海), 1924, 10(2): 174-175.
- [47] 江尊群. 护士教育内容介绍[J]. 中国护士季刊, 1947, 1(4): 19-21.
- [48] 高级护士职业学校暂行通则(附表)[J]. 教育部公报, 1935: 20-25.
- [49] 凤子. 湘雅高级护士学校[J]. 学生之友, 1944, 9(1-2): 42-43.
- [50] 陆宝琪. 今后护士职业与护士教育之展望[J]. 医潮月刊, 1947, 1(3): 16-18.
- [51] 畚韞珠. 对于护士教育之意见(续)[J]. 中国护士季刊, 1947, 1(3): 24-28.

(责任编辑 谢春红)

From Caregiving to Nursing: Professionalization of Nursing Discipline in Modern China

SONG Qinghong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Yangpu,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introducing modern Western nursing, China is facing a process of interweaving and repeating with traditional nursing. At first, the teaching staff of nursing education in China mainly came from foreign teachers, especially British and American missionaries who served as nurses, and their nursing concepts were also influenced by Japanese nursing studi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localized nursing system in China is not only a gradual process of correcting traditional nursing concepts, including gender concepts, but also a result of the spread of Western knowledge to the East. The process of introducing modern nursing was not limited to the family field. In the early modern times,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Party also called on women to engage in wartime care work. Gradually nursing moved towards the public domain and ultimately towards professional fields such as hospital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ursing discipline and the increase of nursing schools, nursing practitioners are receiving increasing attention, and nursing is gradually separating from medicine and becoming an independent science and profession.

Key words: caregiving; nursing; nursing concept; social gender

北宋中原书院的精神特色

孟莉莉

(郑州大学 文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北宋中晚期,中原理学先驱立足书院觉民行道。理学思想深刻影响了书院的教育理念和办学宗旨、书院的氛围以及师生关系等,塑造出了中原书院鲜明的精神气质,即“书院精神”:倡明道学、传道济民的教育宗旨;学术思想文化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具有学术共同体性质的师生关系;书院精神的核心师道精神。

关键词:北宋;中原书院;理学;书院精神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4.01.012

中图分类号:G649.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4)01-0077-06

钱穆认为宋学精神包含创通经义与革新政令之两端,而书院讲学是宋学精神的源头。^[1]书院教学推动了理学思想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促进了宋学精神的形成。在此过程中,书院教育也必然受到宋学精神的浸润、影响和塑造。理学家运用理学思想进行书院教育,不仅强化了中原书院最初独立、灵活、开放的特点,而且塑造了书院不同于官学和其他教育机构的独特精神气质,即所谓的“书院精神”。

书院精神形成于宋代,以南宋时期的理学书院最为突出。后世诸多学者都曾对书院的精神特色加以论述。胡适在《书院制史略》一文中说:“书院之真正的精神惟自修与研究,书院里的学生无一不有自由研究的态度。”^[2]朱汉民评价书院自诞生之后形成了许多不同于官学的教育特点。例如,书院一般由名师大儒执掌;学术吸引力强、影响力大;讲学方式自由灵活;人才教育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相互促进等。^[3]各家说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一而足。通过对北宋中原书院的研究发现,北宋前中期,书院虽然在科举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此时期书院教育为科举服务的功能更为突出,缺乏独

立的学术研究,并未形成系统的教育理念和特色。到了北宋中后期,书院与理学结合之后,在理学思想的引领下,中原书院开始形成独特的书院精神。书院精神体现在教育使命和办学宗旨、书院教育氛围、师生关系等诸多方面,充分彰显了理学的学术思想和教育理想,并成为后世理学书院精神的滥觞。

一、书院教育使命:倡明道学、传道济民

北宋初年,对儒者创办书院目的的记载并不多见,即使有文献记载,也颇为模糊,多为“乃建书院于湖南,化训州人”^[4]“戚公同文以贲于丘园,教育为乐”^[5]等。教学目标仅能够大致说明书院的儒学教育性质,并无过多清晰地描述。根据早期书院教育家和书院创办者的教育实践,也可以看出此时期的书院教育目标多源于儒家知识分子对儒学的倡导和对教育的重视。北宋中后期,作为理学的诞生和传播基地的中原书院,其教育使命越来越清晰,定位越来越明确。理学先驱把书院教育上升到了传道的高度,他们创办书院、在书院讲学的教育目标在于借由书院教育恢复儒家道统,倡明道学、传道济民。

范仲淹作《南京书院题名记》提到“经以明道,

收稿日期:2023-11-26

基金项目:2023年度河南省图书情报研究项目“河南省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机制研究”(HNTQL-2023-084);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清代中州后学对中原理学发展谱系的构建研究”(20222023-ZZJH-380);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项目“嵩阳书院与洛学的历史发展研究”(Y2022-9)

作者简介:孟莉莉(1980—),女,河南洛阳人,文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馆员,从事文献学研究。

若太阳之御六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时之妙万物焉”^{[5]163}，认为书院教育中，对儒家经典的旨意解读应以明道为切入点，文章要以阐发义理，追求真理为目的而作。在《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中，他指出“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才，陈正道”^{[6]377}，再次强调教育的目标应该是“陈正道”，即儒学之道。在理学思潮涌动的时代下，范仲淹对书院教育从多个角度不断论述，明确了应天府书院培养“明道”“通理”人才，传承儒家之道的教育目标。西湖书院创办于皇祐年间，创办人欧阳修主张应该以“天下之至理”“圣人之中道”^{[7]1123}为标准去辨别经典真伪，追求世间真理。其学术主张也影响了书院的教育目标，其培养的门人均是儒学复兴运动的中坚力量。如门人刘敞学问博洽，长于《春秋》学，不拘传注，开宋人评议汉儒先声。虽然欧阳修在书院教育实践中以承继儒学的目标来培养门人，但对于西湖书院的教育使命，并未见到欧阳修明确论述的文献记载。

庆历之际的中原书院，教育使命并没有上升到传承道统的高度。随着理学的逐渐形成，书院成为理学学者的栖息之地。理学学者对书院教育使命的论述伴随着理学思想的发展而越发清晰起来。《宋元学案》记载：“时程颢知扶沟县，兄弟方以倡明道学为己任，设庠序，聚邑人子弟以教之。”^{[8]994}明道书院由程氏兄弟为倡明道学而创办。在教学实践中，他们“讲道劝义”“讲明道义，以资后学”“倡圣学以示人”。随着他们二人理学探索的深入，和书院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们对书院教育的目标一步步明确，程颢将之清晰、明确的表述为：“志将斯道觉斯民。”^{[9]640}自此以后，理学教育书院确立教育目标为倡明道学，传道济民。这一目标在此后二程的书院讲学和著作中得到反复的阐述，如：

（程颢）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9]638}

先生（程颢）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斯道觉斯民。……先生出，倡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史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9]640}

吾生百年之后，志将明斯道，兴斯文于既绝，力小任重，而不惧其难者，盖亦有冀矣。^{[9]643}

由此，理学书院“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志将斯

道觉斯民”“志将明斯道，兴斯文于既绝”的教育使命和定位越来越坚定，归纳起来就是：倡明道学、传道济民。随着程颐的深入阐述，北宋中晚期的书院教育目标越来越明确地与理学求“道”、承继道统的理想相一致。

二、书院氛围：以学术思想文化为中心

傅斯年先生曾这样评论书院与官学的差别，来表达对书院自由讲学的肯定：“国子监只是一个官僚养成所，……书院好得多，其中有自由讲学的机会，有做些专门学问的可能。”^{[10]21}北宋中后期，以理学家为核心的中原书院，充分发扬了书院原有的灵活和自由，开展独立、专门的学术研究，确立了以理学学术思想文化为核心的书院氛围。

以学术思想文化为中心首先体现在教学内容方面。书院的教学不以科举仕进为目的，因此，作为理学思想的传播与学术研究的基地，教材的选择、授课的内容等都具有一定自由度。在邵雍、程颢、程颐讲学办校的书院中，教学内容的选择直接取决于他们的学术观点和研究。他们在书院中一边讲学、一边著书，书院教学课程体系围绕个人的学术著作和思想体系建立，个人的学术研究成果即是书院个性化的讲义，是讲授的教材。《宋史》称程颢“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11]12720}程颢从《礼记》中提取《大学》和《中庸》单独成书，与《论语》《孟子》并列，成为“四书”学在书院中讲授。这样就在思想史上开创了一个从孔子到曾子，再到子思至孟子的义理道学体系，而这一思想体系同时也是以义理为导向的一套独特的书院课程体系。

钱穆创办新亚书院时指出：“中国宋代的书院教育是以人物为中心的。”^{[12]2}北宋中晚期中原书院的课程体系即以人物为中心。以人物为中心即以人物的学术思想为中心，作为书院课程的设置依托，将理学家对某一儒学经典或儒学问题的研究成体系地在教学中传授，把理学家对时代问题的最新思考融入教学中。以人物为中心的书院教育不仅有利于打破拘泥古人注疏的学风，而且使儒家经典的教学能够深入，能够与时代相结合，激发门人的思考与研究的深入。学术思想通过课程的传授，又会得到教学的反哺。书院教学中，师生之间关于某一问题的探讨与研究不断推动思想体系的建构，实现了“思想—课程—思想的深入”这样教学与学术之间彼此互动、相互促进的关系。由此，一个学术观点通过课程成为一个学派的学术观点，学术思想在课程中得

到丰富、深入和体系化,教学服务于学术研究。例如,程颐晚年在伊皋书院,就将自己花费毕生心血研究的《易传》传授给尹焞、张绎。一部著作成为一门课程,借助这样的课程传承了一套学术思想。

书院的招生也是围绕理学思想文化的研究进行。不同于官学只收本地子弟,书院面向全社会开放,入学的核心标准在于生徒对道的向往与渴望。在生徒不避千里来书院择师求学之前,多已倾慕其道德学问许久,求学的士人根据自己的资质、喜好和学术兴趣投奔不同的教师,潜心学习。书院对生徒的地域、社会地位和年龄均不作限制。例如,杨时考中进士在家待阙闲居三年,去拜程颢为师。谢良佐“习举业,已知名,往扶沟见明道先生受学,志甚笃”^{[13]432},跟随二程求学于扶沟县明道书院。“程门立雪”发生在杨时和游酢由程颢处学成归南后多年。为了提升学问,再次赴洛阳拜见程颐的杨时和游酢都已经年届四十,杨时也即将赴外地任职。程颐的门人张思叔,本是一个喜欢作诗的酒保,其诗作言辞粗糙却往往蕴含理致,因而受到谢良佐推荐成为伊川高弟,“其后伊川之学,最得其传者惟思叔。”^{[14]20}中原书院传道济民的教育宗旨赋予了书院平等开放的姿态面向求学士人,无论贵贱长幼,随贤愚启迪之,既保障了学术研究的发展,成就了许多人才,又推动了书院教育的社会化。

三、师生关系:学术共同体

北宋中后期,中原书院以明确的道学传承目标和理学大师讲学,成为有志于道的士人的集合地。士人共同肄业于书院,跟随理学家求学,接受同样的义理思想,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与治世理想。师者与生徒教于斯、学于斯、游于斯,彼此之间交流学习,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士人于书院形成一个具有共同身份标签的团体,在共同的思想、志向与学术旨趣追求中,书院师生学术共同体的特征和性质愈发显现。

康德1979年的著作《学部冲突》认为,从学术目的、性质等角度来考察,大学是以学术生产为目的的“学术共同体”。“学术共同体”在享有独立性的前提下,以追求真理与理性为宗旨。这一看法得到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的认同。德国教育思想家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是作为教师的学者与求学的学生无条件追求真理的共同体,承担着学术研究、传承和创造性文化生活的功能。由此,可以总结出学术共同体的基本特征为:享有独立性,以追求真理为宗

旨,师生具有共同的目标、志同道合,进行学术研究和传承。根据刘河燕的研究,北宋时期的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具有一定的相似性。^{[15]6}在对北宋中后期中原书院的师生关系的研究发现,中原书院在北宋中晚期与理学相结合,以理学研究为中心后,书院的师生关系发展出“学术共同体”的要素和特征。师生之间亦师亦友、志同道合,遵守共同的理念规范,具有共同的意义追求,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推动学术的发展。

北宋时期,由理学家创办的书院,教师多为知名的理学家。他们是在书院教学、著述,肩负传道授业解惑与思想研究的双重人物,既是教师也是学者,既是教育家也是思想家。教师的教学在于传道、明道。学生求学的目标在于求道。在求道的学术理想推动下,学生呈现出求学的主动性和自主性,是学习的主体。书院教育将道的弘扬与学的传承结合于一体,师生双方的教育原动力和宗旨都在于追求“真理”——即儒家的道。以道相交、共同求道的目标成为连接师生的坚强纽带和基石。在此基础上,师生的学术传授、质疑问难等教学与求学的各个环节助推了志同道合、亦师亦友师生关系的形成。以理学教育为核心的中原书院,如安乐书院、嵩阳书院、伊皋书院等符合学术共同体的各方面特征,邵雍、程颢、程颐等理学家与门人之间形成了由理学研究连接起来的学术共同体关系。

理学之“道”以伦理理性的形式表现出来,道德养成教育是书院教学的重要部分。因此,书院教师以理学高度的道德水准自我约束,具有强烈的人格魅力。书院门人接受理学道德训练,同样具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师生之间相互尊重,亦兼师友。书院讲学因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只能是门人在书院从学于师的阶段内进行,但理学家及其门人通过书院讲学、思想交流、学术争鸣建立起的学术共同体关系并不会随着授业结束而终结。师生之间的学术交流贯穿此后双方的学术生涯持续经年,对真理的追求也会在共同体的学人中一代代传承下去。理学门人在书院求学的时间是短暂的,但由书院求道而成为学术共同体成员的身份却是终身的。

同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成员,必然具有对某种真理一致的学术信仰。基于同样的学术信仰,学术共同体的成员在对真理的探索与追求过程中付出激情与生命能量,并因此达成了一种默认的契约关系。北宋末年,洛学多次受到政治斗争的打击,在陷入发

展的低谷,几欲面临灭顶之灾时,理学门人求道的坚韧志向更加凸显,维护共同体的团结。哲宗元符二年(1099),“党祸起,谪涪州。先生注《周易》,与门弟子讲学,不以为忧;遇赦得归,不以为喜。”^[16]¹⁶⁴程颐遭受政治迫害,依旧沉浸于道学追求中,其矢志不渝的道学精神塑造了学术共同体的精神人格。崇宁元年(1102),程颐被列入元祐奸党名录,追夺官职,其门人也遭到外补或贬黜,在洛学遭受困厄的阴霾下,吕舜从、马伸、尹焞、张绎、孟厚等门人不惧打压,依然跟随程颐从学,坚守求道信仰与志向。政治压力造成的恶劣环境检验了学术共同体成员守卫共同体的意识、追求真理的信仰和求真明道的神圣志业,外部压力更加强化了共同体对共同使命与宗旨的认同与守护。

在中原书院的理学教育下,学术共同体成员形成了一种共存、共勉、共生的凝聚力,致力于统一的目标与追求,自觉承担和维护学术共同体追求真理的使命,获得了精神上的归属感与成就感。书院师生对以道治世,达成人性丰满、社会进步的理想达到高度契合,实现了教育“以智慧启迪智慧、以情感激发情感、以道德感化人格”^[17]的功能,形成了以追求真理为宗旨,进行学术研究和传承的学术共同体。师生之间亦师亦友、志同道合,遵守共同的理念规范,具有共同的意义追求。每个成员在学术中回归自我,借助书院“道”的传承形成了具有凝聚力和生命力的群体。这一群体不以血缘、地缘为依托,却引发了稳定、持久的共同使命感与思想一致性。通过书院共同体的建构,理学实现了人才和思想的代际传承,这成为理学伦理精神广泛散播社会,实现更大范围的社会整合效应,落实于救世行动的先决条件。

四、书院精神核心:师道精神

在北宋中后期,中原理学家建立的书院以“传道而济斯民”为教育宗旨,目的在于借助书院教育,恢复合乎儒家之“道”的秩序,实现天下大同的三代之治。中原书院教育中,师与道是结合为一体的,书院的师道精神承载着理学的人文理想。

中原书院的师道精神包含两方面的含义。其一,书院以倡明道学为教育宗旨,师者是道的传授者。那么,树立师的权威即树立道的权威。书院教育对师道精神的重视与强调是恢复道的独尊地位的努力,是对儒家之道的捍卫。全祖望曾概述宋初师道兴起的情况:

当时濂、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而睢阳

戚氏在宋,泰山孙氏齐,安定胡氏在吴,相与讲明正学,自拔于尘俗之中。亦会值贤者在朝,安阳韩忠献公、高平范文正公、乐安欧阳文忠公皆卓然有见于道之大概,左提右挈,于是学校遍于方,师儒之道以立,而李挺之、邵古叟辈共以经术和之。^[18]¹³⁴

全氏之语准确描述了儒学复兴的先驱对师道复兴的贡献。例如,其中提到的范仲淹即是主张恢复师道的先驱之一。范仲淹认识到“今文庠不振,师道欠缺,为学者不根乎经籍,从政者罕教化”^[19]²⁰⁴。师道在范仲淹看来是修理政教的中心,因此,无论范仲淹的书院讲学、创通经义,还是范仲淹革新政令的改革措施,重振师道都是他的主要关注点。

在濂洛之学兴起后,中原理学学者创办的书院,在“师儒之道以立”的基础上,继承了宋初理学先驱将师道传承与书院讲学相结合的理念,“以师道明正学”,推动师道精神的发展和道的传承。北宋时期最著名的尊师典故之一“程门立雪”,就发生在程颐与门人杨时和游酢师徒之间。程颐终生讲学著述,捍卫师道传承。程门立雪印证了理学学者与门人对师道精神的传承、信笃与坚守。张岱年在其《辨程门立雪》一文中说:“将程门立雪传为美谈,意在宣扬师道尊严。”^[20]³⁹²书院教育中,书院与理学结合只是外在表象,其精神内核是师与道的结合。

书院的师道精神的第二方面含义在于,希望通过强调师道精神,“建立起以孔孟之道为本位的师道型道统论”^[21]³¹⁻³⁹,确立学统与道统的内在一致性。

“宋学最先姿态,是偏重在教育的一种师道运动。”^[22]¹²在宋学的兴起阶段,宋儒充分发挥文化主体性的自觉意识,借助师儒的身份传承儒学,并实现了全祖望描述的“学校遍于四方,师儒之道以立”的景象。在宋学高涨的阶段,讲学于中原书院的理学家,在前人确立师道精神的基础上,将师道精神与道统和学统相结合,开始有意识地建构师道型道统论。

程颐在程颢的行状和墓表中反复写道:

(程颢)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22]⁶³⁸

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程颢)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斯道觉斯民。……先生出,倡圣学以示人,辨异端、

辟邪说,开历史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22]640}

在文中,程颢被尊奉为孟子之后得到儒学真传的第一人。这一说法反复出现,作为一种盖棺论定的评价,把道的传承由孟子直接联系到了程颢,潜在含义便是程颐将继承程颢未竟事业,成为道的传承者。包弼德认为:“这是一种关于谱系的主张:程颢是1400年来唯一的真儒,因为他理解圣人之学。这使他成为历史上第二个开端,也使他的弟弟成为他的继承人。”^{[23]76}道统论在此时开始由以帝王接续三代先王,转变为三代先王、周公、孔孟直至程颢、程颐。道的传承在于学的传承,程颐在有意识地建构一个两者具有内在一致性的道的传承系统与学的传承系统,即道统与学统。

正是由于程颐通过师道建构道统谱系,二程之后,理学成为一个具有明确谱系的层层递进的传承系统,学统也由此形成。二程洛学的学统谱系在程颐这里形成了开端,由后世一代代的洛学传人参与完成了建构。后世学者对于二程学说的传承谱系有众多说法,试举一例。“二程之学,龟山得之。而南传之豫章罗氏。罗氏传之延平李氏。李氏传之考亭朱氏。此一派也。上蔡传之武夷胡氏。武夷胡氏传其子五峰。五峰传之南轩张氏。此又一派也。”^{[24]1997}这样的论述清晰地表明了理学传播中的血脉源流,既表明了师承关系的学统,又彰显了具有师道精神的洛学传承中的学派正宗。程颐通过师道精神建构学统与道统的努力产生了如其所愿的效果。师道精神成为中原理学书院学术共同体契约关系的精神要素,将学派创始人和门人紧密联结在一起。在师道精神的指引下,宗师与门徒作为学派思想体系的创立者、完成者、传承者,构筑了本学派庞大精微的思想体系。在师道精神的指引下,学派成员在不同时代、不同发展阶段中,确保了道统的存续、传承与推广,确保了学统与道统的脉络不绝。据此后的发展来看,后世学者通过对本学派历史的不断书写,更加确立了先师的权威,使洛学的历史以展示学说传承与权威谱系的方式呈现出来,确保理学成为一个层层递进的传统。^{[24]75}师道精神随着学统与道统的延续而延续下去。中原书院理学先驱倡明道学的教育宗旨和明道体、重塑道统的努力,落实于重建师道精神。师道精神是中原书院精神的核心。

五、结语

北宋中晚期,中原理学先驱立足书院觉民行道。

范仲淹、邵雍、程颢、程颐等在中原书院传道授业的过程中,书院独立开放、灵活自由的特质,为理学的生存提供了土壤,为理学人才培养和理学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平台,而理学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书院的教育理念和办学宗旨、书院的氛围以及师生关系等,塑造出了中原书院鲜明的精神气质,即“书院精神”。

北宋中原书院的书院精神包含四个方面:书院的教育宗旨为倡明道学、传道济民;书院的教育理念以学术思想文化为中心;书院师生志同道合、亦师亦友,形成了以理学思想文化为纽带的学术共同体;书院高度倡导师与道相结合的师道精神,师道精神与书院教育传承道统的使命高度一致,是理学的伦理精神在书院中的落实,也是书院精神的核心。

“由北宋始,学术之发展开始全面系统地依托书院及其讲学活动。”^[25]书院与学术的渊源自北宋书院开始。可以说,理学为书院教育赋予了新的内容,是中原书院精神的思想源头。北宋末年,伴随着中原理学先驱的门人南下,在南方创设书院,承继先师们的学说、思想和书院讲学的传统,中原书院的精神特色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南宋时期的书院精神,以及书院制度的确立,其源头向前可追溯至北宋的中原书院,向后则影响了后继若干朝代的书院建设,“至于宋后七百年,书院制度之发展,盖袭宋代,并无创新之处”^{[26]25}。

参考文献:

- [1]钱穆.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2]胡适.书院制史略[C]//卞孝萱,徐雁平.书院与文化遗产.北京:中华书局,2009.
- [3]朱汉民.中国书院文化简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0.
- [4]刘节纂.颍州志[M].明正德六年刻本.
- [5]范仲淹.范仲淹全集·文集卷8[M].北京:中华书局,2020.
- [6]范仲淹.范仲淹全集·文集卷19[M].北京:中华书局,2020.
- [7]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78[M].北京:中华书局,2001.
- [8]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26[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9]程颢,程颐.二程集·文集第11[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10]傅斯年.改革高等教育中的几个问题[C]//杨东平.大

- 学精神. 北京:文汇出版社,2003.
- [11]脱脱. 宋史·卷四百二十七[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2]钱穆. 新亚遗铎[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 [13]程颢,程颐. 二程集·外书卷12[M]. 北京:中华书局,2004.
- [14]施德操. 北窗炙輠录·卷上[M]. 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
- [15]刘河燕. 宋代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之比较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6]邵伯温. 邵氏闻见录·卷十五[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7]段淑娟. 宋代儒师形象研究[D]. 长沙:中南大学,2012.
- [18]黄宗羲,全祖望. 宋元学案·卷三[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9]范仲淹. 范仲淹全集·文集卷第十[M]. 北京:中华书局,2004;204.
- [20]张岱年. 张岱年全集[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 [21]朱汉民. 师道复兴与宋学崛起[J]. 哲学动态,2020(7):31-39.
- [22]钱穆. 宋明理学概述[M].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
- [23]包弼德. 历史上的理学[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 [24]黄宗羲,全祖望. 宋元学案·卷34[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5]李劲松. 北宋书院研究[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
- [26]吴万居. 宋代书院与宋代学术之关系[M].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吕志远)

The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of Zhongyuan Academy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MENG Lili

(College of Literature , Zhengzhou University , Zhengzhou , Henan 450001 , China)

Abstract: In the middle and lat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pioneers of Neo – Confucianism in Zhongyuan disseminated their thoughts at the academies. Neo – Confucianism deeply influenced the academy’s educational concept and purpose, the atmosphere of the academ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shaped the distinctive spiritual temperament of Zhongyuan Academy, namely, “academy spirit”. The academy spirit of Zhongyuan Academy embodies four aspects: the educational mission of academies is advocating Neo – Confucianism; the educational concept focuses on Neo – Confucianism; the teacher – student relationship is of the nature of academic community; the authority of the teachers is the core of the academy spirit.

Key words: Northern Song Dynasty; Zhongyuan Academy; Neo – Confucianism; academy spirit

近二十年我国高尔夫学术研究热点及趋势演变分析

——基于 CiteSpace 的图谱化分析

梁建坤¹, 姚洁^{1*}, 张芸芸¹, 张佩佩²

(1.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体育学院, 河南 郑州 451100;

2.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体育学院, 四川 眉山 620500)

摘要:为揭示近二十年国内高尔夫研究的热点与趋势演变,借助 CiteSpace 对 CNKI 数据库 2000 至 2020 年间国内高尔夫研究核心期刊文献及学位论文的题录信息进行统计和可视化分析。结果显示:在作者合作网络中,韩烈保、郁小平、刘照辉等处于核心位置,辐射带动效应明显。近二十年国内高尔夫研究的热点主题分为高尔夫球场治理、高尔夫运动技术优化、高尔夫球产业发展以及休闲体育人才培养四个方面。国内高尔夫研究的趋势演变为 2000—2009 年(高尔夫球场治理)、2010—2015 年(高尔夫球产业发展及人才培养)、2016—2020 年(高尔夫运动技术研究),其中对于高尔夫球员的技术动作,采用高新设备进行分析是近年来研究的前沿问题,需进行重点关注。

关键词: CiteSpace; 高尔夫球运动; 可视化分析

DOI: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4.01.013

中图分类号: G8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715(2024)01-0083-07

自 2011 年国家发改委等 11 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全国高尔夫球场综合清理整治工作的通知》以来,随着《高尔夫球运动发展“十三五”规划》(征求意见稿)发布、高尔夫青少年运动等级标准确立以及中国高尔夫球协会启动“大众高尔夫项目”,国内高尔夫运动发展迎来新时期。对于新发展形势,从时间跨度出发,理清过往高尔夫研究主要聚焦于哪些方面、存在何种发展趋势,有助于更加全面地开展高尔夫研究工作。因此笔者借助 CiteSpace 以中国知网收录的 2000 至 2020 年间与高尔夫相关的核心期刊论文、CSSCI 期刊论文以及学位论文进行综合分析,通过对该领域作者与机构合作网络、热点主题、研究趋势进行图谱化呈现,揭示国内高尔夫研究的热点内容以及趋势演变,从而为今后的高尔夫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研究设计

(一) 分析工具

本研究采用的分析工具主要为 CiteSpace, 版本

号为 5.7.R5。CiteSpace 是美国 Drexel 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陈超美博士开发的适用于多元、分时、动态复杂网络分析的可视化应用软件^[1]。通过对关键词共现网络或主题词共现网络进行分析,有助于分析研究热点、研究趋势和知识结构^[2]。

(二)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CNKI)作为文献检索数据库,以“高尔夫”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剔除与高尔夫无关(如高尔夫钢板)或学术研究无关(如通讯、简报)的期刊文献资料以及学位论文资料,得到核心期刊文献 400 篇、学位论文 444 篇,至此共得到学术文献资料 844 篇,资料时间跨度为 2000 至 2020 年。

(三) 数据清洗

数据清洗是指为提高数据质量而对数据进行的预处理过程^[3],本研究借助“Notepad++”软件,一方面对错误关键词进行替换,如“高尔大运动员”替换为“高尔夫运动员”,“青”替换为“青少年”等;另

收稿日期:2023-12-21

基金项目:2023 年度河南省职业教育一流核心课程(高尔夫运动技术)

通信作者简介:姚洁(1960—),女,河南郑州人,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体育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校园高尔夫。

一方面将相似关键词进行替换,如“高爾夫球場”替换为“高尔夫球场”,“骨質密度”替换为“骨质密度”等。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 发文作者及机构分析

作者作为知识创造与运用的第一主体,通过考察作者的发文量以及作者群的数量变化,能够从微观层面反映出持续关注高尔夫研究的作者以及作者间的合作关系。本研究中,将学位论文的指导教师列为第二作者进行分析。经统计,在 844 篇文献中共涉及 1474 位不同的作者。依据普赖斯定律 $M = 0.749 \sqrt{N_{max}}$ 作为确定高产作者的选取标准^[4],得出 N_{max} 为 38,最终得出 M 约为 6,因此高产作者主要有韩烈保、刘照辉、马宗仁、吴克祥、郁小平等(见表 1)。在高产作者中,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北京林业大学的韩烈保、苏德荣、常智慧以及来自兰州大学的刘照辉等学者研究方向主要为草坪科学与技术、草类植物抗性生理、草地生态等方面;马宗仁(深圳大学)、吴亚初(现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等学者以及来自暨南大学的吴克祥、郁小平等学者研究方向主要为俱乐部经营与管理决策制定、高尔夫旅游、

高尔夫球文化发展与人才培养。

表 1 2000—2020 年国内高尔夫研究发文 6 篇以上作者

序号	作者姓名	发文量	所属机构	序号	作者姓名	发文量	所属机构
1	韩烈保	38	北京林业大学	10	李勇勤	8	南京体育学院
2	刘照辉	12	兰州大学	11	夏洪胜	8	暨南大学
3	马宗仁	12	深圳大学	12	尹少华	8	华中农业大学
4	吴克祥	11	暨南大学	13	陈小蓉	7	深圳大学
5	郁小平	10	暨南大学	14	唐少霞	7	海南师范大学
6	连佑群	9	武汉体育学院	15	常智慧	6	北京林业大学
7	苏德荣	9	北京林业大学	16	吴亚初	6	深圳大学
8	张建堂	9	北京体育大学	17	向佐湘	6	湖南农业大学
9	何莽	8	中山大学				

作者之间,是否存在合作关系以及辐射效应?为探究该问题,基于 2000 到 2020 年的国内高尔夫文献数据,依据每一年作者出现的次数,选取作者分析生成高尔夫研究作者合作网络图(见图 1)。结果发现韩烈保不仅具有高发文量,还形成了以其为纽带的子网络,辐射带动作用明显;郁小平、刘照辉也分别和其他作者形成了较为紧密的合作关系。但是纵览整个作者合作网络,大量的作者在进行高尔夫相关研究时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表明作者间合作网络还有待加强,尤其是独立研究的学者间积极开展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



图 1 2000—2020 年国内高尔夫研究作者合作网络

作者的科研工作开展,离不开机构作为平台的承载与支持。通过考察机构的发文量及合作网络,能够从中观层面映射出机构的科研实力,并观察到机构间的合作关系以及知识流动状况。因此基于 2000 到 2020 年的国内高尔夫文献数据,依据每一年机构出现的次数,选取机构分析生成高尔夫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图中圆圈的大小代表机构发文量

多少,圆圈越大机构发文量越多,连线标示了机构间存在合作关系(见图 2)。结果显示北京体育大学和北京林业大学不仅具有较高的发文量,还形成了以自身为核心的科研合作网络,处于高尔夫研究的第一梯队。深圳大学、武汉体育学院和上海体育学院(现上海体育大学)也形成了自身的合作网络,暨南大学虽有较高的发文量但研究多以自身为主体开

展,缺少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二) 研究热点分析

为揭示近二十年国内高尔夫的研究热点,借助CiteSpace 选取突现词探测,发现在某一时间区间内频次突然上升的关键词,已有研究表明这类突现的

关键词能够代表潜在的研究热点^[5]。如表2所示,施肥、农药、蛭螭、产业等关键词在统计的数据区间内较早引起学者的关注;Kinect、全挥杆技术以及体能等关键词是近年来国内学者关注的研究重点,属于研究的前沿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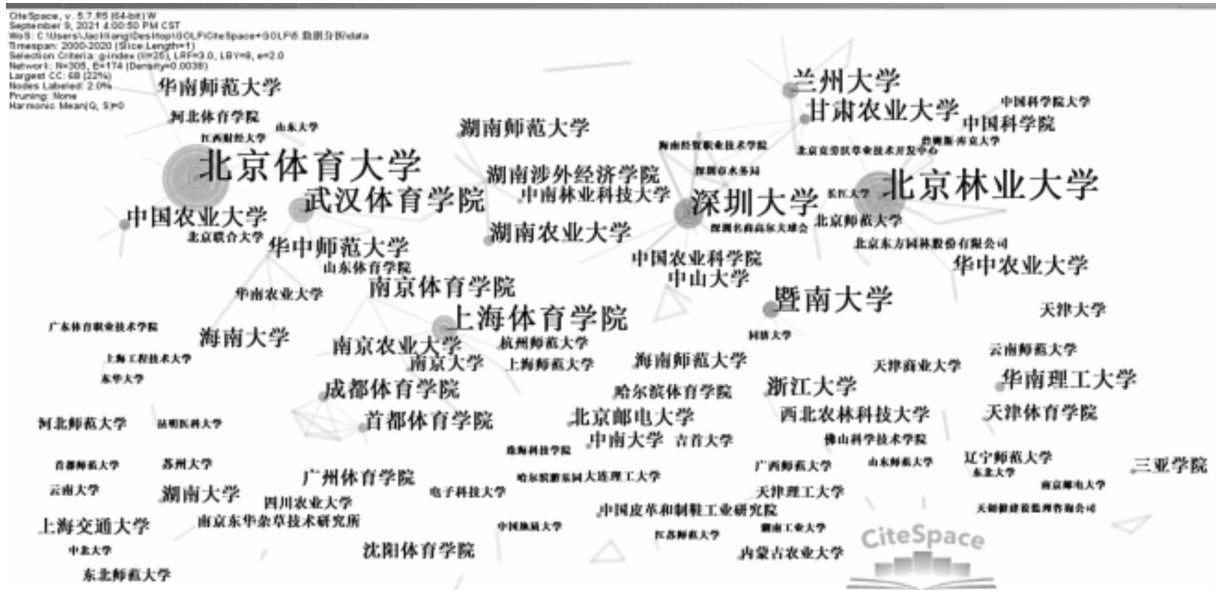


图2 2000—2020 年国内高尔夫研究机构合作网络

表2 2000—2020 年国内高尔夫研究的 28 个突现词

序号	关键词	突现强度	时间	序号	关键词	突现强度	时间
1	施肥	2.07	2000—2005	15	高尔夫产业	3.59	2010—2012
2	农药	1.27	2002—2008	16	人才培养	2.44	2011—2015
3	高尔夫球运动	4.96	2003—2004	17	竞技体育	1.75	2011—2014
4	蛭螭	2.85	2004—2008	18	专业人才	1.31	2011—2014
5	产业	1.29	2004—2010	19	营销策略	1.97	2012—2014
6	旅游	1.15	2004—2006	20	高尔夫球俱乐部	1.06	2012—2013
7	土地利用	1.11	2005—2006	21	人才培养模式	1.65	2013—2020
8	匍匐剪股颖	3.67	2007—2009	22	休闲体育	1.08	2013—2017
9	草坪质量	3.94	2008—2010	23	体育产业	1.29	2015—2018
10	人工湖	1.28	2008—2011	24	体育史	1.08	2015—2017
11	果岭	3.10	2009—2010	25	Kinect	1.87	2016—2020
12	高尔夫草坪	1.66	2009—2012	26	全挥杆	1.66	2016—2020
13	体育经济学	1.09	2009—2010	27	全挥杆技术	1.71	2017—2018
14	高尔夫旅游	3.72	2010—2011	28	体能	1.10	2016—2018

研究的主要类别与热点主题究竟该如何划分?为探究该问题,依据每一年共现的关键词信息,选择突出图谱网络中重要结构特征的剪裁方法^[6],生成关键词共现网络聚类图谱(见图3)。对于聚类效果而言,Q 值=0.804 > 0.3,S 值=0.9492 > 0.5,表明聚类结构符合标准^[7],结果显示高尔夫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七个大类:高尔夫、高尔夫俱乐部、高尔夫球、高尔夫球运动、高尔夫产业、高尔夫球场、匍匐剪股颖。

在聚类指标符合要求的前提下,通过分析聚类结果及各聚类内高频突现关键词(见表3),将国内高尔夫研究类别深化为以下四个热点主题:(1)高

尔夫球场治理;(2)高尔夫运动技术优化;(3)高尔夫产业发展;(4)休闲体育人才培育。在高尔夫球场治理方面,包含果岭、蛭螭、施肥以及匍匐剪股颖等关键词,研究内容主要为蛭螭防治、土壤理化性状分析以及草种培育等。在高尔夫运动技术优化方面,包含运动损伤、Kinect、青少年和杆头速度等关键词,研究围绕着运动损伤的成因和预防、高尔夫球员训练方法及技术动作生物力学分析等。在高尔夫产业发展方面,包含影响因素、高尔夫球俱乐部、高尔夫旅游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关键词——研究聚焦于三个方面,其一为高尔夫产业化发展,涵盖可持续发

展路径与评价体系建设;其二为高尔夫俱乐部现状分析,包括营销策略选择、员工素质提升和企业文化建设;其三为高尔夫旅游消费,主要为高尔夫旅游现状探究以及高尔夫产业与旅游业互促发展的可行性

分析。在休闲体育人才培养方面,包含休闲体育、人才培养、体育管理、专业人才等关键词,相关研究主要为从市场需求角度出发探究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以及休闲体育专业课程体系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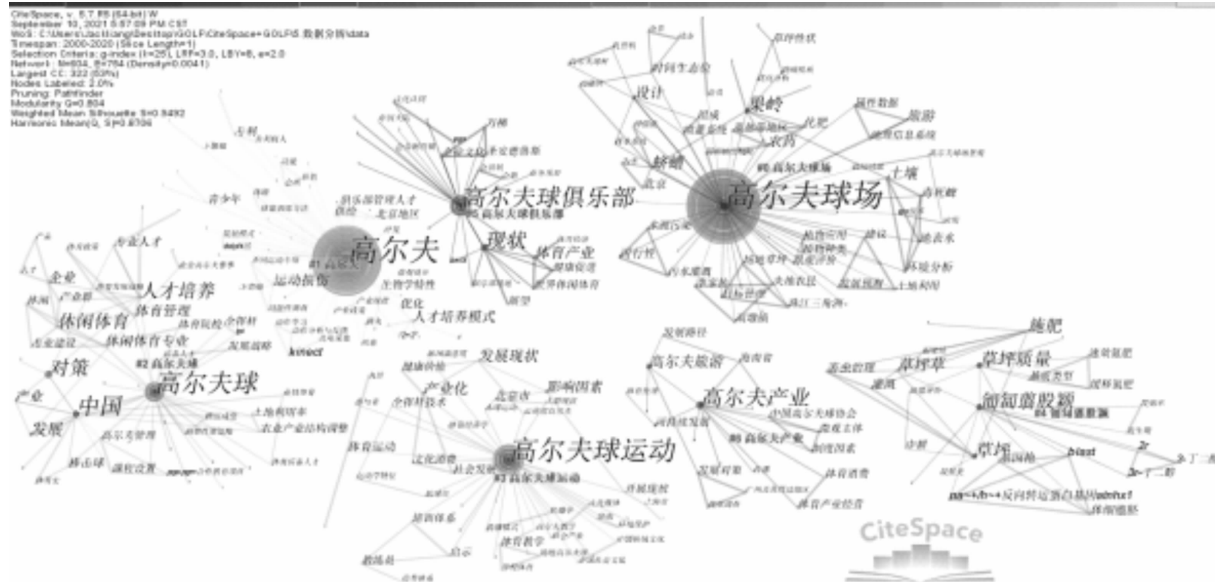


图3 2000—2020年国内高尔夫研究关键词共现聚类图谱

表3 基于关键词聚类的高尔夫研究热点主题

研究主题	关键词(部分)	共现频次	最早出现年份	聚类编号
高尔夫球场治理	高尔夫球场	122	2000	0
	果岭	12	2004	0
	蛴螬	6	2004	0
	设计	5	2001	0
	土地利用	4	2005	0
	物理性质	4	2009	0
	匍匐剪股颖	15	2007	4
	草坪	12	2004	4
	草坪质量	11	2008	4
	草坪草	8	2000	4
高尔夫运动技术优化	施肥	4	2000	4
	高尔夫	127	2004	1
	Kinect	5	2013	1
	运动损伤	4	2013	1
	青少年	2	2019	1
	杆头速度	2	2017	1
	高尔夫球运动	58	2001	3
	影响因素	8	2006	3
	发展现状	5	2010	3
	产业化	3	2003	3
高尔夫产业发展	高尔夫球俱乐部	36	2004	5
	现状	22	2008	5
	体育产业	4	2005	5
	高尔夫产业	20	2004	6
	高尔夫旅游	9	2010	6
	可持续发展	4	2005	6
	发展对策	3	2003	6
	高尔夫球	39	2001	2
	人才培养	10	2010	2
	休闲体育人才培养	休闲体育	6	2009
体育管理		4	2012	2
专业人才		3	2011	2

(三) 研究发展轨迹分析

为更深层次挖掘国内高尔夫研究的演变轨迹和阶段性特色,选择时区图(Time Zone)生成高频关键词共现时区图图谱,展示关键词随时间变化的相互影响及演进路径(见图4)。在时区图中,圆圈及字号的大小代表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多少,连线代表关键词存在共现关系,关键词的位置位于初次出现的年份,然而不同时期的主要研究内容与关键词初次出现的时点并不完全相关,因此借助研究热点主题进行整体分析。结果发现演变轨迹呈现出从高尔夫球场治理到高尔夫产业发展对策,之后为休闲体育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最后为高尔夫运动技术优化,从而在时间跨度上将国内高尔夫研究分为以下三个时期:2000—2009年(高尔夫球场治理),2010—2015年(高尔夫球产业发展及人才培育),2016—2020年(高尔夫运动技术研究)。

(1) 第一阶段(2000—2009年)。早期的高尔夫研究主要聚焦于球场环境治理,关键词包括施肥、农药、蛴螬、匍匐剪股颖等。自1984年国内第一座高尔夫球场(中山温泉高尔夫俱乐部)建成至今,我国的高尔夫球场建设经历了从无序扩张到高压管制再到规范发展的治理环境转变。在球场无序扩张阶段,各地新设的高尔夫球场存在地域不同、球场类型不同、自然环境不同等问题,导致如何遴选适宜草种、优化施肥用量、开展污水治理以及虫害灭杀等问

题成为研究重点,如马宗仁、常向前团队在此期间,研究了亚热带高尔夫球场不同功能区的蛭螭种群生态位、迁移动态问题以及草坪-杂草群落中主要杂草种类组成、时间生态位等问题^[8-10];韩烈保团队则研究了污水或再生水灌溉方案、草坪草综合管理等问题^[11-13]。

(2)第二阶段(2010—2015年),研究主要为高尔夫球产业发展及人才培育,关键词包括为现状、对策、高尔夫旅游、高尔夫产业、高尔夫专业、人才培养、营销策略等。我国的高尔夫政策发展经历了鼓励、限制、禁止和规范发展四个阶段^[14],在规范发展阶段如何推动高尔夫产业高质量发展并培养符合高尔夫行业的专业人才成为研究的重点。针对高尔夫产业发展,该阶段研究表明固定资产规模、国内生产总值、产业结构布局、参与人群消费力水平、环境保护观念等是影响高尔夫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15-21]。除上述因素外,建设符合市场需求的人才梯队也是推动高尔夫产业稳步发展的必要条件,过往研究已表明在高尔夫人才培养方面,传统学院式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不合理、人才质量无法满足社会需

求、球童培训缺乏规范、师资知识结构不完备等问题突出且亟待解决^[22-23],但直至2010到2015年,课程教材建设滞后、高尔夫人才培养目标不明确等问题依然存在,尤其是高尔夫俱乐部紧缺的管理运营岗位、草坪维护岗位以及教练教学岗位,学生的专业素质还亟待加强^[24-27]。

(3)第三阶段(2016—2020年),关键词主要为Kinect、青少年、杆头速度、全挥杆技术等。随着科学技术的革新发展,运用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心理学等学科知识,通过高尔夫模拟器、全挥杆动作捕捉系统、重心转换检测系统等高新设备,优化技术动作、减少运动损伤、提升心理素质等成为焦点内容。另外综合考虑球员的赛场表现,培育运动员的视觉素质、加强体能训练等也是该时期研究的关注内容^[28-31]。如秦鹏飞(2018)采用Motion运动红外捕捉系统以及三维测力台对职业运动员的挥杆动作进行深度剖析与观测^[32];殷怀刚和韩冬(2019)对40名不同等级的女子高尔夫运动员心理特征(意志品质、赛前情绪等)进行了实证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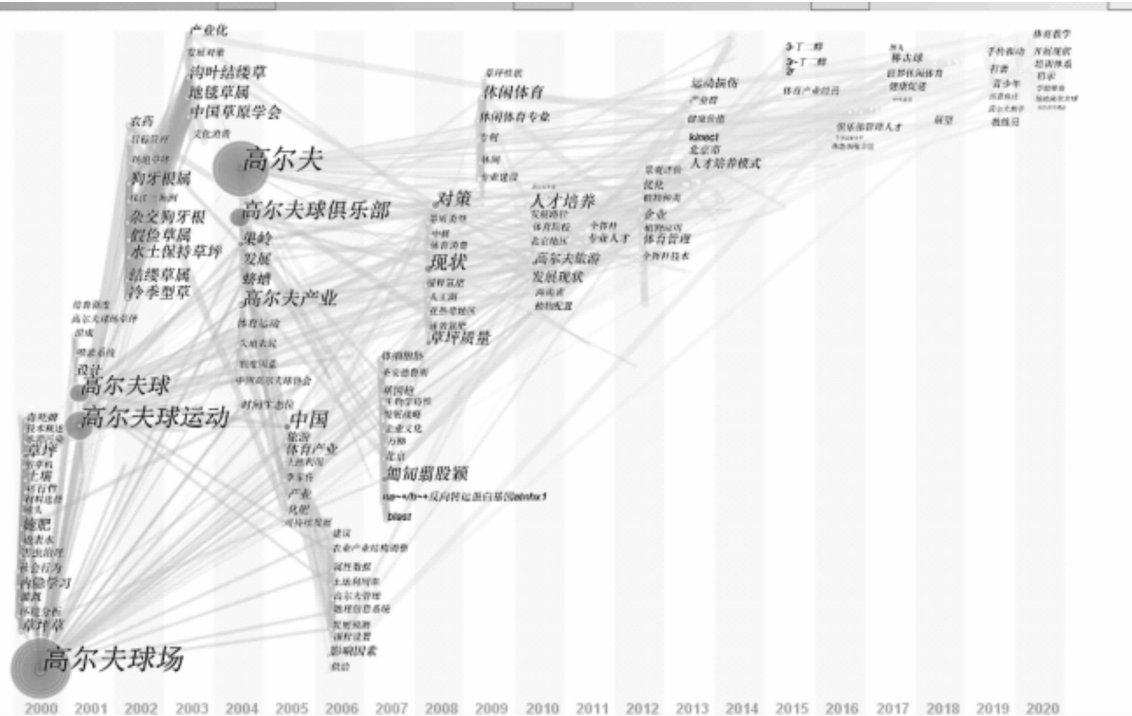


图4 2000—2020年国内高尔夫研究关键词共现时区图

三、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1)对于近二十年国内高尔夫研究的机构合作网络,总体而言北京体育大学、北京林业大学、深圳大学、武汉体育学院以及上海体育学院是高尔夫研

究的主要阵地,辐射带动效应明显;对于作者合作网络,北京林业大学的韩烈保教授在网络中处于核心位置且形成了研究团队,郁小平、刘照辉也分别和其他作者形成了较为紧密的合作关系。然而无论是作者合作网络还是机构合作网络,都存在大量独立的

节点,机构与作者间的合作需要加强。

(2)近二十年国内高尔夫研究的热点主题集中于高尔夫球场治理、高尔夫运动技术优化、高尔夫产业发展以及休闲体育人才培育。对于高尔夫运动技术优化,借助高速摄像机、无线生物反馈系统等高新设备,对高尔夫球员尤其是青少年球员的技术动作进行分析是近年来国内学者关注的重点内容,属于研究的前沿问题,这也与近二十年国内高尔夫研究的主题演变趋势相吻合——高尔夫球场治理(2000—2009年)、高尔夫产业发展及人才培育(2010—2015年)、高尔夫运动技术研究(2016—2020年)。

(二)建议

作者和机构作为密不可分的两个部分,加强作者间的合作有助于增强机构间的合作网络,因此无论是核心作者还是初涉该领域的作者,都应加强与其他学者的联系,通过跨领域、跨校域的合作,借助不同学科与观点融合碰撞,推动高尔夫运动发展。对于研究的具体方向,未来的研究不仅需关注诸如高尔夫球场治理、产业发展以及人才培育等方面,还应放置注意力在推动青少年高尔夫运动的发展以及如何借助高新技术设备对高尔夫动作进行分析调整。

参考文献:

- [1]高明,段卉,韩尚洁.基于CiteSpaceIII的国外体育教育研究计量学分析[J].体育科学,2015,35(1):4-12.
- [2]李杰,陈超美.CiteSpace: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77.
- [3]王曰芬,章成志,张蓓蓓,等.数据清洗研究综述[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07(12):50-56.
- [4]ALLISON P D, PRICE D, GRIFFITH B C, et al. Lotka's Law: A Problem in Its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J].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976, 6(2): 269-276.
- [5]陈超美.科学前沿图谱:知识可视化探索[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302.
- [6]李杰,陈超美.CiteSpace: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M].2版.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7:88-89.
- [7]陈悦,陈超美,刘则渊,等.CiteSpace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J].科学学研究,2015,33(2):242-253.
- [8]马宗仁,常向前.高尔夫球场不同功能区草地蛴螬出口密度及迁移动态研究[J].生态学杂志,2004,23(4):78-83.
- [9]马宗仁,常向前,郭辉.高尔夫球场不同功能区草地优势种蛴螬种群生态位分析[J].应用生态学报,2004,15(8):1416-1422.

- [10]马宗仁,阳承胜,常向前,等.高尔夫球场草坪-杂草群落中主要杂草种类年消长动态及时间生态位[J].生态学学报,2004,24(10):2230-2237.
- [11]周陆波,韩烈保,周军,等.再生水(中水)灌溉高尔夫球场的研究[J].节水灌溉,2005(4):7-9.
- [12]尹少华,卢欣石,韩烈保.不同配方高尔夫果岭土壤的物理性质及其对草坪生长的影响[J].草地学报,2009,17(3):358-364.
- [13]胡先登,韩烈保.污水灌溉方案的可行性:田间调查(英文)[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0,22(2):28-33.
- [14]杨中华,李延超,吴茜.我国高尔夫政策的发展阶段、特征及趋势[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14,28(6):4-8.
- [15]段永桓.影响RFA高尔夫产业发展的因素分析与对策[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3(3):198-201.
- [16]游松辉.后奥运时期长三角地区高尔夫休闲产业发展研究[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0,29(5):31-33.
- [17]沈克印.高尔夫产业发展中实现经济正义的哲学思考[J].体育学刊,2014,21(3):26-30.
- [18]顾跃.山东省高尔夫产业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J].草业科学,2012,29(8):1206-1211.
- [19]詹新震.中国高尔夫产业组织特征及其政策走向[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4,31(4):433-437.
- [20]沈克印.高尔夫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思考[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2,38(11):26-30.
- [21]王明伟,张丹芳,吴香芝,等.我国高尔夫产业发展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J].体育与科学,2015,36(6):41-47.
- [22]谢芳,陈小蓉.对中美高尔夫管理专业本科教育的比较研究[J].体育学刊,2006,13(6):71-74.
- [23]吴克祥,张弛.中国高尔夫高等教育的基础建设与实践[J].特区经济,2006(2):375-376.
- [24]牛真真.高尔夫球运动人才社会需求现状及其培养途径研究[D].沈阳:沈阳体育学院,2010:27.
- [25]邹本旭,孙文菲,刘丹.我国高等体育院校高尔夫球人才培养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5(11):157-162.
- [26]伍方荣.中国高尔夫人才的培养与市场需求分析[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2:36-37.
- [27]周徐娜.我国高校高尔夫专业人才培养对策研究[D].湘潭:湘潭大学,2011:23-24.
- [28]殷怀刚,韩冬.中国优秀女子高尔夫运动员心理特征研究[J].体育与科学,2019,40(4):100-105.
- [29]黄志剑,李佳俐,朱孟雪.否定形式自我谈话在高尔夫推杆任务中的自我控制逆效应研究[J].体育科学,2019,39(6):48-54.
- [30]陈革.视觉遮蔽推杆训练对高尔夫球手推杆准确率影响的实验研究:以武汉体育学院为例[D].武汉:武汉体育学院,2018:20-23.
- [31]张星月.现阶段青少年女子高尔夫运动员体能训练实

Analysis of Hotspots and Trends Evolution of Golf Academic Research in China for the Past Two Decades Based on CiteSpace

LIANG Jiankun¹, YAO Jie¹, ZHANG Yunyun¹, ZHANG Peipei²

(1.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1100, China; 2.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ishan, Sichuan 62050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reveal the hot spots and trends of golf research in China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CiteSpace was used to conduct statistical and visual analysis on the title information of 844 core journal articles and dissertations of golf research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20 in CNKI database.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authors co-operation network, Han Linbao, Yu Xiaoping and Liu Zhaohui, as the core authors, have obvious radiation-driven effects. In addition, the hot topics of domestic golf research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have been divided into four aspects: golf course governance, optimization of golf sports technology, golf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cultivation of leisure sports talent. The trend of domestic golf research evolved into 2000—2009 (golf course governance), 2010—2015 (golf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talent cultivation), and 2016—2020 (golf sport technology research), in which the use of new and high technology equipment to analyze the technical movements of golfers is a cutting-edge issue of the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which should draw more attention.

Key words: CiteSpace; golf; visual analysis

本刊声明

《中州大学学报》一贯提倡并引领对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原创性学术研究,始终对追求深邃的理论思想、高端的学术品位、扎实的原创成果和严格的学术规范的广大科研工作者保持敬意。

本刊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注重学术性和理论性,服务于广大教育、科研工作者为办刊宗旨。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学报编辑部上述声明,若无此意,请在来稿时注明。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和名义收取任何费用。真诚欢迎视角新颖、观点独到的高质量学术稿件。篇幅不少于8000字为宜,学术规范参见《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本刊以质取文,秉持优稿优酬。

文旅融合背景下红色旅游景区 IP 形象设计策略研究

——以红旗渠景区为例

赵 晴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文化艺术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 IP 形象设计在红色旅游文化传承中的应用, 有助于带给游客更为沉浸式的旅游体验, 提高旅游景点的吸引力, 帮助游客深刻认识和理解优秀文化, 进而形成文化认同感。红旗渠作为河南省最具有代表性的红色旅游景点之一, 其 IP 形象设计应聚焦红旗渠的核心精神品质, 挖掘相应的视觉元素如“渠水”和“红飘带廊桥”, 找到精确的形象定位元素, 以高辨识度的造型呈现, 使游客对形象外观产生信任和认可。

关键词: 红色文化; 红色旅游; 红旗渠; IP 形象设计

DOI: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4.01.014

中图分类号: F5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715(2024)01-0090-05

河南省地大物博, 人口众多, 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2021 年 6 月 10 日, 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河南红色旅游十条精品线路”^[1], 分别是: “砥砺初心——焦裕禄精神游”“峥嵘岁月——红旗渠精神游”“红色信仰——大别山精神游”“血脉永续——黄河红色传承游”“大河安澜——黄河治理成就游”“饮水思源——南水北调水利工程游”等, 织就成中原大地上一幅“红色版图”。其中, 红旗渠作为国家 5A 级景区是河南省最具有代表性的红色旅游景点, 入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 红旗渠的修建孕育了伟大的红旗渠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 是一座民族精神的丰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红旗渠精神同延安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是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 永远震撼人心。”^[2] 游客到此, 不仅可以欣赏壮美的自然风光, 更能感受到可歌可泣的红旗渠精神。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文化与旅游的融合也日渐紧密, IP 形象设计已成为景区宣传的重要

方式之一。IP 形象设计在红色文化传承中的应用前景广阔, 这里以红旗渠景区的 IP 形象设计为例进行研究。

一、IP 形象设计在红色文化传承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IP 为 Intellectual Property 的英文缩写, 指专注度高、影响力大且具有一定商业价值的跨媒介文化内容^[3], 展开关于旅游产业的 IP 形象设计, 有助于带给游客更为沉浸式的旅游体验, 它不再仅是来自旅游资源本身, 而是相关产业知识产权的旅游化^[4]。IP 形象设计有助于聚焦红色文化系列化的开发。

(一) IP 形象设计在红色文化传承应用中的案例分析

1. 新乡南太行吉祥物 IP——“红闪闪”和“旅行行”

新乡南太行旅游度假区的 IP 形象“红闪闪”和“旅行行”, 围绕南太行的自然风景和红色文化底蕴, 有针对性地完成了两款吉祥物的设计, 并根据当地的红色文化特点, 分别取名为“红闪闪”和“旅行

收稿日期: 2023-11-25

基金项目: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校级科研基金培优项目“河南红色文化传承研究——以红旗渠红色旅游 IP 形象设计为例”(2023-PYXM-14)

作者简介: 赵晴(1996—), 女, 河南郑州人, 艺术设计硕士,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文化艺术学院教师, 主要从事数字媒体与动画创作研究。

行”。

其中,“红闪闪”的形象设定为朝气蓬勃、热情勇敢的小男孩,头发造型以太行山为灵感,五星红旗的元素也被运用在了炯炯有神的眼睛和以红色为背景的衣服上,名字中的“红”寓意着南太行的红色文化基因,也是南太行山体的颜色;“闪闪”则代表着星星,寓意光明、闪耀,隐含着对于太行山未来发展的美好愿景,是南太行红色文化的体现。而“旅行行”的IP形象头顶的毛发和眉毛都是山的形状,呼应太行山,两颊的萌系腮红,饱满圆润形似南太行的特产山楂;“旅行行”的双手分别带着蓝色和红色的手套,蓝色取自南太行的水,寓意纯净、健康,给受众果敢冷静的视觉观感,红色取自南太行山体的红石岩,寓意坚韧、刚毅,给受众热情洋溢的视觉观感。“旅行行”名字中的“旅”,代表旅游,指南太行文旅资源丰富;“行”字音取自南太行的行,同时与旅字连在一起,也有旅行的意义。

2. 圣地河谷吉祥物——“红宝”

圣地河谷·金延安通过“红宝”的卡通形象,强化了红色文化,传承红色精神,“红宝”的“红”字代表“红军”“红色圣地”,“宝”字代表“中国革命之瑰宝”。在IP形象的设计方面,该团队经过深入的调研与思考,最终确定了“红宝”的形象概念,以红军长征时,毛泽东主席带领的中央红军形象为主要角色形象,并结合延安的地域特色装扮,衍生出白羊肚毛巾、羊皮袄的人民形象。此外,该团队还完成了一系列的摆件等衍生产品设计,并在2018年西安丝绸之路与国际旅游博览会上获得了诸多游客的喜爱。

3. 林州宣传卡通形象——“林林”和“红红”

林州市城市宣传卡通形象“林林”和“红红”是设计者结合当地的地域特征设计出的IP形象组合,其中“林林”以绿色为整体色调,象征着林州优质的自然生态环境,其发型也融入了太行山的水元素,标志着林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创新成果。“红红”则整体呈现红色色调,代表着林州热土孕育形成的由红旗渠精神、谷文昌精神、扁担精神、孙占元精神、太行精神、新时代林州人精神等组成的红色精神谱系。两个IP形象均色彩艳丽、活泼灵动,双手张开寓意着红旗渠故乡欢迎大家都来看看。

此IP形象设计是目前官方发布的与本主题研究方向最为接近的IP形象,特别是其中“红红”的角色发型融入红旗渠标志性建筑“红飘带廊桥”,此景点是红旗渠形态的延伸与精神层面的升华(如表1所示)。

表1 红色主题IP形象设计案例(笔者整理)

IP形象名称	形象展示	造型元素
新乡南太行吉祥物——“红闪闪”和“旅行行”		太行山形状、水源、山体颜色、五星红旗、特产山楂;
圣地河谷吉祥物——“红宝”		红色圣地中央红军形象、白羊肚毛巾、羊皮袄;
林州宣传卡通形象——“林林”和“红红”		太行山的水、红旗渠红飘带廊桥、欢迎手势。

(二)IP形象设计在红色文化传承中的应用

通过对于相关IP形象设计案例的分析与整理,可以看出针对红色文化传承开展IP形象设计不仅是对优秀文化元素的弘扬,而且更能使IP形象设计在新时代呈现更多的可能性,结合多元化的传播媒介拉进游客与红色文化之间的距离。

1. 聚焦红色文化元素

IP形象设计的文化属性是其根本属性^[5],传播红色文化元素与精神是IP形象设计的出发点,在进行设计时首先可对角色的形象设定展开创新,赋予其相应时代的外貌及人物特征,把观众拉回到特定的时代环境中,例如:“红闪闪”“旅行行”以及“红宝”的IP形象设计均以人物为原型,赋予其“小红军”或“延安人民”的角色形象,使观众更直观地感受到其时代氛围。其次,还可赋予角色一定的故事性,挖掘与设计主题相关的故事线索,展开创作,通过故事设定传递文化精神。

2. 系列化的开发趋势

此类IP形象设计,大多呈现形象开发系列化及衍生产品开发多样化的趋势。首先,在IP形象的设计上,除了对于主要角色形象进行设计外,还有对于不同造型的人物形象设定,丰富了特定角色造型的多样性,为游客提供更多的文化信息。其次,开发具有吸引力的文旅衍生品和纪念品,有助于提升相关文化辨识度^[6]。在衍生产品的开发中加强创新性,对于平面化的IP形象进行立体性的创作,开发出实物化的衍生文化创意产品。此类衍生产品不仅可以满足游客对于商品实用化的消费需求,也能同时宣传文化元素,拉近了消费者与红色文化的距离,并为

景区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

(三) IP 形象设计在红色文化传承中的意义

开展 IP 形象设计,有助于在丰富旅游产品的形式和内容、提高旅游产品吸引力的同时,帮助旅游者深刻认识和理解优秀文化,提高旅游质量,进而形成对于文化的认同^[7]。

首先,关于红色文化的 IP 形象设计可在文创领域拉近游客与红色文化间的距离,结合时代审美与大众消费需求展开关于红色文化的创新,探索出更具时代特点的文化传承表现方法。其次,IP 形象设计与之前的靠文字传播相比,其传播性强,可使文化的传播更加具象化,扩大并延伸红色文化的传播途径与范围。最后,IP 形象设计的视觉效果可生成相应的衍生产品,可作为商品对外销售,这不仅可以促进景区经济的发展,还能促进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

二、河南红色文化传承主题的 IP 形象设计方法探讨

河南红色文化传承主题的 IP 形象设计方法,大致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探讨:深入的精神文化内涵、精确的形象定位元素、高辨识度的造型设计及清晰的受众视觉需求,结合红旗渠景区近期的现状,以及具有代表性“渠水”与“红飘带廊桥”等视觉元素。

(一) 深入的精神文化内涵

在对于 IP 形象开展设计工作前,应先对其文化内涵与精神品质进行深入挖掘,使 IP 形象设计能够准确传达出相应的精神内涵,体现出红色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围绕红旗渠进行的红色文化 IP 形象设计,在设计过程中首先要考虑怎样呈现红旗渠的特色视觉元素,并最大限度地体现红旗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核心精神品质。

其次,在塑造 IP 形象时应尽量挖掘相应的视觉元素,使消费者对形象外观产生信任和认可。红旗渠最具特点的视觉元素当数“渠水”和“红飘带廊桥”。其中“渠水”的代表性元素是近 10 万人参与修建且耗时近 10 年才得以修成的“人工天河”,“人工天河”改善了当地干旱缺水的困境,加入“渠水”的视觉元素更能强调出其得来不易。而“红飘带廊桥”则位于红旗渠青年洞主入口处,它形态蜿蜒优美,像一条红飘带舞动于山间,是目前红旗渠景区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故在设计时有意识加入这两个代表性较强的视觉元素,并以可爱活泼的卡通形象,吸引更多的年轻游客关注民族红色文化。

(二) 精确的形象定位元素

红旗渠 IP 的设计,不仅需要对其历史文化内涵进行深入挖掘,还需与当代社会生活紧密连接。如

2023 年 10 月 17 日,河南省第 29 届“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启动仪式就是在林州市红旗渠·林虑山国家地质公园举行的,放归了 67 只被救护的珍稀野生动物^[8],此项举措充分说明了红旗渠生态环境良好,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适合鸟类等野生动物的栖息与繁衍。故本 IP 形象将角色聚焦于鸟类形象,并加入红旗渠具有代表性的视觉元素,取名为“渠小宝”,突出红旗渠的地方特点,增加了记忆点,也加深 IP 形象与文化内涵和生态环境的关联程度。

另外,在对于本 IP 的塑造上,还赋予其明确的角色定位及相应的故事背景。红旗渠自 20 世纪 60 年代修建以来,不断被赋予其新的历史意义,历久弥新,在艰苦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中,均具有感化、激励人心的教育意义。基于此,赋予本 IP 形象“宣传员”的角色定位,作为鸟类,“渠小宝”盘旋在红旗渠上空见证着其发展与变迁的同时,还向众多游客介绍着关于红旗渠的历史发展并宣传其精神内涵。

(三) 高辨识度的造型设计

高辨识度的造型可使得 IP 形象设计更容易被大众记住,故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加深关于红旗渠红色旅游 IP 形象设计的辨识度:

在视觉元素上,增加具有地域特点的色彩及造型,头顶与尾巴处的水元素及脖颈处的红色飘带都是与红旗渠密不可分的视觉元素;在造型和线条的运用上,以简洁、易于记忆的造型为主,以便容易被识别和记住,选择鸟类的形象既有利于赋予其“宣传员”的角色定位,也有助于加强其独特性,与市场上的其他红色旅游类 IP 形象区分开来;IP 形象设计还应具有可塑性,通过对其展开衍生品的设计,从而在各种媒介平台上得到持续性的延伸推广。

(四) 清晰的受众视觉需求

红旗渠工程于 1960 年 2 月开始动工,距今已有 60 多年的历史。对于当今的青少年群体而言,红色文化因时隔较长而相对陌生;在日常生活中,因物质生活富足,他们很难深刻体会到那个年代的艰苦。而 IP 设计则需要考虑目标受众的喜好,为设计效果提供保障,故本 IP 形象设计的受众以青少年群体为主,在视觉设计方面运用饱和度较高的色彩和较为卡通化的设计风格,在尽可能满足青少年群体审美需求的同时,吸引他们更多地了解红色文化,起到文化教育意义的教育意义。

三、IP 形象设计在河南红色文化传承领域的实践研究

红旗渠红色旅游 IP 形象设计,主要通过对于红色文化元素的提炼与现代化的设计方法相结合,借此实现对红色文化更深层次的传播。通过赋予 IP 形象相应的角色设定、故事背景及衍生产品的设计,探索以传播文化为主要意图的 IP 形象设计方式。

(一) 设计构思与定位

关于 IP 形象角色“渠小宝”的设定与视觉元素“人工天河”“水”元素的提炼,上文已论及,这里不再赘述。结合目前红旗渠景区的发展特点,“红飘带廊桥”作为红旗渠景区的标志性建筑,在林州宣传卡通形象“林林”和“红红”的设计中,“红红”的角色设定也充分体现了廊桥的红飘带元素,故在对于“渠小宝”IP 进行设计的过程中,也有意识加入“红飘带”的红色视觉元素,与红旗渠景区目前的发展相呼应(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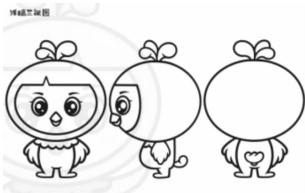


图 1 “渠小宝”三视图展示(笔者绘制)

色彩是视觉效果的标记媒介,是影响视觉观感的重要因素^[9],鲜艳醒目的色彩可以提升 IP 形象设计的辨识度,在让角色富有活力的同时,可以起到更好的宣传作用。在本次 IP 设计的色彩运用上,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因为本 IP 设计的主题是为了传播和宣扬红色文化,故在配色上也致敬了五星红旗的颜色选取,将红色运用在 IP 设计的脖颈处,既是红色革命的象征,又呼应了红旗渠的“红飘带廊桥”。而国旗上象征着共产党领导下革命人民大团结的五颗五角星的黄色,则被大面积的运用在 IP 形象的头部、身体和四肢上,象征着红色文化即使在当代也依然会被继续传承,展现出鲜活的生命力。

其次,在确定主色调及完整的色彩体系后,考虑到受众的年轻化审美要求,故将颜色进行细微调整,在确保色系不发生变化的基础上降低色彩的纯度并提升明度,整体色彩基调以轻松活泼为主,既能第一时间吸引游客视线,也能给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感受。

(二) 设计实践

1. 主题形象展示

展开造型设计时,首先要思考其头身比例,以头长作为基本的单位进行躯体、四肢等各个部分的设

计,并把握好整体比例。“渠小宝”IP 形象设计整体呈现可爱并偏向卡通的风格,故在对其比例进行设定时适当压缩身体比例,扩大头部占比,使其形象更加呈现出可爱与亲和力,也更方便后续展开衍生品及相应的一系列设计。另外,“渠小宝”形象的脸部及五官设计强调亮感,将眼睛进行重点表现,提升其辨识度并增加记忆点(如图 2 所示)。



图 2 红旗渠红色旅游 IP“渠小宝”形象效果图(笔者绘制)

2. 动作延伸及表情设计

首先,确定主体形象后,便展开一系列的动作延伸及表情设计。通过对其不同情绪及动作的设计丰富“渠小宝”IP 形象的饱满与生动程度,塑造更为立体的角色性格,以此拉近 IP 形象与游客之间的心理距离(如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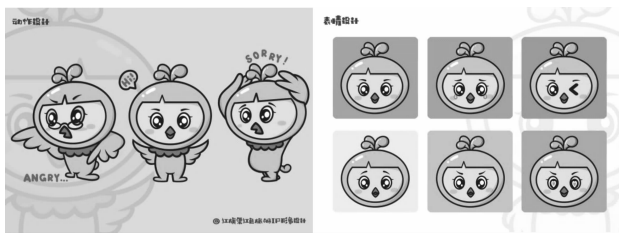


图 3 “渠小宝”动作延伸及表情设计展示(笔者绘制)

其次,表情包作为如今社交平台常被使用到的交流工具,经历了传达表情、表达情绪以及陈述情节几个发展阶段,其象征意义逐步增强^[10],除了具备日常交流中情绪表达的基础功能外,还可以达到文化传播的作用,故借此背景完成灵活生动的表情设计,使本 IP 形象更加受到青年受众群体的喜爱,并由此完成红色文化传承的最终目的。

(三) 衍生品设计

展开衍生产品的设计,既可以进一步加深宣传效果,又能获得一定的盈利收入,故展开对于“渠小宝”IP 形象的一系列产品设计,更加关注消费者的体验和反馈,以完善 IP 形象价值的循环与再生^[11],加深本次研究的实践应用价值。(如图 4 所示)。



图 4 “渠小宝”衍生品设计展示(笔者绘制)

五、结语

随着时代的进步及文化产业的发展,我国优秀文化元素的关注度在不断提升,在旅游产业的发展中上下游产业与旅游活动的关联度也在不断增强^[12],但红色文化的弘扬也存在着创新性不足、青年群体了解度低及传播途径单一等问题,影响着景区的发展。而IP形象设计作为一种创新性较强的文化呈现方式,可作为良好的文化传播载体。展开对于红色文化的IP形象设计,不仅可以提升相关文化精神的接受度,达到卓越的宣传效果,更能拓展以传承民族优秀文化为目的的IP形象设计方法与思路。

红色文化蕴含着深刻的精神内涵,在未来的发展中,随着文化传承方式的不断创新,优质文化的传播范围也将越来越大,其影响力及辐射的受众范围也会逐步拓宽,红色文化也将支撑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不断艰苦奋斗,砥砺前行,成为民族精神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参考文献:

- [1]刘春香.河南发布十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N].河南日报,2021-06-10.
[2]杨震林.红旗渠精神:党领导人民干事创业的一面旗帜[J].党建,2023(7):34-36.

- [3]向勇,白晓晴.新常态下文化产业IP开发的受众定位和价值演进[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123-132.
[4]洪清华.旅游,得IP者得天下[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18:184.
[5]陈昌凤,仇筠茜.技术可供性视角下优质IP的媒介逻辑分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
[6]刘中华,焦基鹏.文旅融合背景下海派传统工艺美术IP资源开发策略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1):126-135.
[7]施爱芹,董海奇,郭剑英.IP创意视阈下乡村旅游文创的设计价值及互动体验[J].社会科学家,2022(3).
[8]67只被救护珍稀野生动物在安阳红旗渠·林虑山放归自然[EB/OL].环球网.央视新闻客户端.2023-10-17.
[9]杨珍.视觉传达色彩设计与色彩的文化表达微探:评《视觉传达色彩设计》[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3(12):65.
[10]赵爽英,尧望.表情·情绪·情节:网络表情符号的发展与演变[J].新闻界,2013(20):29-33.
[11]谢涛,路由.基于形象IP构建的网络表情符号视觉形态设计[J].包装工程,2019,40(24):133-138.
[12]习近平.习近平在俄罗斯“中国旅游年”开幕式上的致辞[EB/OL].人民网,2013-03-23.

(责任编辑 刘海燕)

Research on IP Image Design Strategies for Red Tourism Scenic Spo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 Taking the Red Flag Canal Scenic Area as an Example

ZHAO Qing

(School of Culture and Arts, Zhengzhou Tourism Vocational College, Zhengzhou, Henan 450000, China)

Abstract: Application of IP image design in the tourism industry, especially in the inheritance of red culture, helps to bring tourists a more immersive travel experience, improve the attractiveness of tourists, help tourists deeply understand the excellent culture, and then form a sense of cultural identity. As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red tourist attractions in Henan Province, Red Flag Canal's IP image design should focus on its core spiritual quality. It should excavate corresponding visual elements such as "canal water" and "red ribbon corridor bridge", find accurate image positioning elements, and present them with highly recognizable shapes, so that tourists can trust and recognize the image appearance.

Key words: red culture; red tourism; Red Flag Canal; IP image design

基于核心期刊的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学术图景分析

——基于 CiteSpace 的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1993—2022)

高 冲

(天津外国语大学 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天津 300204;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外语教研室,天津 300204)

摘 要:借助 CiteSpace 可视化文献计量工具和 Excel 分析工具,对从中国学术期刊网采集的中央文献翻译与传播相关论文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及解读,发现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呈现显著上升趋势;作者合作方式以中央文献翻译实践机构与高校合作以及教师与学生团体合作为主;研究主要以翻译实践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中央文献国际传播与影响三个进路为主;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形成初步探索、稳定过渡、创新发展的演进脉络。未来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应深化跨学科视角的翻译研究,在丰富研究内容的基础上探索构建中央文献翻译研究体系,在加强合作基础上加大对于中央文献翻译研究的支持力度。

关键词:中央文献翻译与传播;演进路径;可视化;CiteSpace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4.01.015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4)01-0095-05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中央文献翻译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一环^[1]。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对于提升国际形象、提高国际话语权意义重大。

近年来,学者们对中央文献翻译研究热情高涨,对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相关研究、重要文献翻译研究、对外话语体系研究三方面的发展趋势进行梳理,并从研究视角、研究对象、研究方向、研究内容、研究手段等方面对文献数据进行归类分析^[2]。中国政治文献外译要丰富对译者、受众、翻译效果等翻译行为要素的研究,构建中国政治文献翻译研究体系十分重要^[3]。目前国内政治话语翻译研究文献探究受众翻译接受效果的实证研究

较少,研究方法单薄,语料库定量研究相对滞后^[4]。针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一具体的中央文献文本进行梳理研究,发现运用中国本土理论进行中央文献翻译研究、跨学科视角、话语分析等研究未来将成为热点^[5],话语分析理论框架下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对外翻译研究的研究前景广阔^[6],针对两会翻译语料研究将更加注重本土翻译理论和定量研究方式^[7]。

既往针对中央文献翻译的可视化研究侧重于其中的某类文本和某个视角的分析,对中央文献翻译研究的演进路径少有总结概括。本研究将借助 CiteSpace 可视化文献计量工具(6.1r6 版本)和 Excel 分析工具,对从中国学术期刊网(CNKI)采集的中央文献翻译研究相关论文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直观呈现中央文献翻译研究的历时脉络与研究态势,旨在探讨以下研究问题:(1)中央文献翻译研究

收稿日期:2023-10-19

基金项目:2022 年度天津市教委科研计划项目“中央文献翻译教材建设与教学研究”(2022SK010);2022 年度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校级课题“认知范畴观视域下中央文献中的隐喻翻译研究”(qgsz2216)

作者简介:高冲(1990—),女,黑龙江密山人,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博士生,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央文献翻译研究。

的现状、热点为何?(2)中央文献翻译研究的历史演进路径为何?对中央文献翻译研究演进路径进行梳理并分析相关研究热点,以期当前中央文献翻译研究提供一定借鉴。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美国德雷赛尔大学陈超美教授在2004年开发了CiteSpace(引文空间)可视化分析软件,融合科学计量学和数据可视化背景,分析科学文献中蕴含的潜在知识,通过可视化分析手段呈现科学知识的结构、规律、分布态势,从而获得科学知识结构与进程的科学知识图谱^[8]。本文借助CiteSpace进行作者发文、机构、关键词聚类 and 关键词突变分析。另外,本文借助Excel工具对数据进行年度发文趋势、文献类型、基金来源、期刊发文量的统计分析。以此对中央文献翻译研究进行比较全面的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为CNKI收录的与中央文献翻译研究相关的核心期刊论文。检索数据来源类别为北大核心、CSSCI、AMI,另外天津外国语大学设立了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故也将《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列入检索数据来源期刊,检索时间截至2023年2月3日。根据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编译局)的内涵界定,中央文献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中国共产党历史、党代会和两会文件,以及其他重要会议文件等^[9]。依据上述界定,参考以往中央文献的文献计量分析相关研究关键词,本文以“中央文献翻译”“毛泽东翻译”“毛泽东选集翻译”“邓小平翻译”“邓小平文选翻译”“江泽民翻译”“江泽民文选翻译”“胡锦涛翻译”“胡锦涛重要讲话翻译”“习近平翻译”“习近平重要讲话翻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翻译”“党史翻译”“党代会翻译”“十六大(至十九大)翻译”“两会翻译”“政府工作报告翻译”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在检索出的结果中人工剔除通知、简章、专栏、词汇选登、述要、主持人语等非研究性论文,中央文献翻译主题相关性较低的论文,以及不符合上述含义界定的翻译研究(如中国法律翻译)等论文数据,共获得有效数据319条。虽然对于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尤其是《毛泽东选集》的外译问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已出现,但是根据本文选取的研究刊物数据,上述刊物中出现得最早的一篇文章在1993年,最后一篇文章出现在2022年,据此在CiteSpace软件中研究数据的时间范围为1993—2022,本文拟探讨近30年的中央文献翻译核心期刊

研究图景。

三、研究结果分析

(一)整体发文趋势

将CNKI文献数据通过CiteSpace进行数据转换和数据导入,获得数据量为319,与CNKI导出数据一致。将CiteSpace数据处理报告中的年度发文量导出Excel,并计算出年累计发文量在2022年为319,与导出数据一致,据此获得1993—2022年中央文献翻译研究的整体发文时间趋势。从年发文量来看,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在2008年以前发展较为缓慢,年发文量不足5篇。自2009年以来,中央文献翻译研究论文年发文量波动上升,其中2017—2018,2019—2021这两个时间段的年发文量呈现显著上升趋势,2021年年发文量达到峰值46篇。我们根据时间节点可推断这两个时间段年度发文量骤升与社会热点的出现和研究热点转移具有相关性,通过阅读文献可知2018年发表的39篇研究文章标题中有14篇关联十九大,占比35.9%,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相关翻译成为了研究热点;2021年发表的46篇研究文章标题中有15篇关联《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占比32.6%,2020年6月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成了翻译研究热点。

(二)主要作者分析

发文量在3篇以上的进行中央文献翻译研究的作者共18位,其中发文量在4篇以上的作者共6位:何明星、李正栓、潘卫民、卿学民、胡开宝、李晶。使用CiteSpace,设定文献发表数量在3篇以上,我们绘制了中央文献翻译研究作者合作网络图谱,研究发现合作密切的团体有4项,阅读文献可知,李正栓为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学翻译和典籍翻译,与之合作的张丹、陶沙为河北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该合作团体的研究集中于国内外的毛泽东诗词翻译研究;修刚为天津外国语大学教授,与之合作的李钰婧为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研究生,另一个合作者李运博教授的工作单位涉及天津外国语大学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该合作团体的研究主要涉及中央文献日文翻译研究;潘卫民为上海电力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生导师,与之合作的卜海丽和张娇均为长沙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该团体以《毛泽东选集》为语料进行翻译研究;苏宁、罗莹、于蕾、宋虹、季智璇均为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工作人员,另外两位合作者李汶莲和宋元玲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六研究部(原中央

篇、中译日、传播、中国形象、习近平。其中突变关键词相关联的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翻译是热点研究对象。这一阶段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结合愈加密切:突变强度较高的意识形态相关翻译研究侧重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和翻译中意识形态的建构;政治等效相关翻译研究将等效翻译理论与实践结合。在这一阶段,中央文献作为术语首次出现在研究文献中,其多语种翻译研究受到越来越多关注,集合了多语种的专门研究基地的创办促使中央文献、中译日成为研究热点。“中国梦”由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12月提出,伴随这一政治热点,“中国梦”相关论述的翻译研究与话语构建成了中央文献翻译研究热点。伴随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海外出版,其传播和中国形象相关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丰富了中央文献翻译的跨学科视角研究。

3. 创新发展阶段(2018年至今)

这一阶段的突变关键词包括:十九大、日译、互文性、副文本、翻译策略。随着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十九大报告多语种相关翻译研究成为中央文献翻译研究热点,包括功能对等、语用学、认知语言学、跨文化交际、接受美学等跨学科视角翻译研究,利用语料库、计算机辅助翻译等信息化手段进行研究,深入探讨十九大翻译的变通策略、以我为主的忠实原则、灵活的翻译方法等内容。互文性和副文本成为突变关键词,反映出中央文献翻译研究的科学化、系统化、深化、细化。翻译策略于2010年出现,自2020年开始成为突变词,说明中央文献翻译研究集中于翻译本体,继续探究翻译学科视域下的翻译策略与方法。

四、讨论与展望

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要求对中央文献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提出了更多挑战,同时也促进了中央文献翻译研究的蓬勃发展。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因其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其学术研究图景和演进路径为未来翻译研究带来以下启示:

(一) 拓宽研究视域,深化跨学科研究

通过CiteSpace可视化分析可以看到当前中央文献翻译研究以探讨翻译策略、翻译方法、政治等效等翻译学本体视角的中央文献翻译研究为主要内容,从中央文献翻译的翻译本质属性和翻译作品特点出发,侧重探讨作为政治文本的中央文献翻译。随着技术和跨学科翻译研究的发展,语料库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传播学、叙事学等跨学科

视角的中央文献翻译研究进一步丰富中央文献翻译研究视角^[10],如天津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论文对中共党史英译的叙事建构研究就是典型的跨学科研究探索。此外,本土翻译理论的创新应用,如生态翻译、变译、译者行为批评等理论也将拓宽未来中央文献翻译研究领域。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应融合多学科的发展,拓宽对于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对象的研究视角,从而促进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创新发展。

(二) 丰富研究内容,构建研究体系

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内容丰富,除了对中央文献翻译文本的研究之外,还应关注中国共产党翻译史、对外传播效果、国家形象构建等涉及翻译和对外传播全过程及其参与者的研究^[11]。此外,国际话语体系建构亟待深入系统研究,有赖于将中央文献翻译与具体的国际话语体系建构有机结合,如开展中央文献翻译视域下增强新型政党关系国际话语体系研究等。深入挖掘并持续细化研究,加强跨学科多维度的深入合作研究,进一步探索适用于中央文献翻译实践的翻译标准制定和质量评估体系构建,从而从宏观层面构建中央文献翻译研究体系。中央文献翻译研究不仅要关注词汇层面的翻译质量,也要关注句法、语篇层面的翻译质量,从整体上探究对中央文献翻译的宏观翻译理念、中观翻译策略、微观翻译方法的整体、全面、综合性研究。

(三) 加强机构合作,加大支持力度

中央文献翻译是政治文献翻译的一种,其重要性、专门性、国际影响力决定了未来需要针对中央文献翻译的特点继续进行专门性的细化分析。除了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外,还需要更多的翻译研究机构合作关注中央文献翻译研究,也期望设置更多的基金项目专门用于支持开展中央文献翻译研究,以期更好地为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对外翻译研究服务。

五、结语

本文基于文献计量学方法分析了1993—2022年发表于核心期刊的关于中央文献翻译相关研究论文。研究发现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在翻译实践反思、翻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及中央文献国际传播与影响三个进路不断创新发展,其研究进路也反映了翻译研究的转向特点。本文认为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应加强横向的跨学科研究,拓宽研究视域;同时,应丰富纵向的中央文献研究内容与对象,深化中央文献翻译研究。此外,中央文献翻译作为国家翻译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翻译研究更需要不同研究机构和研究团队的密切合作,共享研究成果,共同为中央

文献翻译、国家翻译实践、政治文献翻译提供切实的翻译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黄友义, 李晶. 做好中央文献翻译 打通国际传播的最后一公里[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2(2): 110.
[2] 王俭, 姜龙范. 中央文献翻译研究的文献计量及可视化分析[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1(5): 160.
[3] 陈双双. 新世纪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研究的现状、问题与展望[J]. 外文研究, 2020(4): 106.
[4] 刘宏, 李明徽. 国内政治话语翻译研究文献计量分析: 问题、热点与趋势(2000—2021)[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2(4): 145.
[5] 栗慧敏, 牛桂玲. 中央文献翻译与传播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为例[J]. 民族翻译, 2021(4): 22-32.

[6] 杨立学.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研究综述: 基于重要研究文献(2015—2019)的分析[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1(2): 45-56.
[7] 于蕾. 两会翻译研究状况可视化分析(1985—2021)[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2(4): 48-61.
[8] 李杰, 陈超美. CiteSpace 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M]. 2版.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7.
[9] 李晶, 任俊桦. 中央文献翻译多维策略与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的思考[J]. 外语教学, 2022(5): 91-95.
[10] 宫宇航, 项成东. 身体认知与译文的可接受性: 中央文献翻译研究的新视角[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2(1): 20-30.
[11] 王铭玉, 邹昊平. 中国共产党百年翻译史初探[J]. 新疆学刊, 2022(3): 1-10.

(责任编辑 谢春红)

A CiteSpace – Based Analysis on the Status Quo and Developing Path of CPC Literature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1993—2022)

GAO Chong

(Translation Studies Center for CPC Literature,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300204, China;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Office, Tianjin Light Industry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Tianjin 300204,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s CiteSpace as a major tool to mine and visualize texts, assisted with Excel. Data on CPC literature translation study are extracted from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according to relevant keyword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researches on CPC literature translation study are increasing, and that the cooperation of authors is mainly between institutes of CPC literature translation and universities, and between professors and their students. The content of study involves translation practice,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practices, and the spread effect of CPC literature. The development of CPC literature translation study goes through three periods: primitive exploration, stable transi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Further studies should be made in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n CPC literature translation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build a system of CPC translation study based on diverse study content. In addition, further support for cooperation in CPC literature translation study is expected.

Key words: CPC literature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he developing path; visualization; CiteSpace

从句后置型假设句的语法特征与语用动因

张雪平

(河南大学文学院/语言科学与语言规划研究所,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现代汉语从句后置型假设句是一种主要用于言域的语用性特殊假设句式。因使用非常规语序而语义关系不明,便强制要求使用假设标记,同时排斥推论标记,形成“……,如果……的话”这样的典型结构形式。其语体分布和假设标记显示了其书面化倾向,具有追补说明作用的从句可为主句所言提供适宜性条件。这种特殊语序假设句能在汉语中使用开来,外受西文翻译的影响,内则因凸显强调主句内容及与前后文保持语义连贯的语用需要。语用表达需求是假设句语序变异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从句后置型假设句;语用性;语法特征;语用动因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4.01.016

中图分类号:H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4)01-0100-06

一、引言

学界很早注意到现代汉语假设句及其他偏正复句的偏句通常在前,认为假设从句后置是受了英文等西文翻译的影响所形成的一种欧化结构形式。如黎锦熙指出,假设句在“国语中,有两个排列法:习惯的,在主句前;欧化的,在主句后”^{[1]218}。朱德熙把“我明天一定来,要是下雨的话”看作倒装句,认为“要是……”是临时想到追加的话,后一句代表一种欧化的句法。^{[2]218} 贺阳对五四前从14世纪到20世纪的五部白话作品(《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中的有标假设句(由“若”等18个假设连词和“即使”等8个假设让步连词标记的)进行了统计,没有发现从句后置型假设复句;还统计了当代小说和论著中的“如果”假设句用例,发现从句后置型在原创文本中占比为4.4%,而在翻译文本中占比为12%。^{[3]276} 因此,贺阳指出,五四以来汉语假设复句的语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传统的语序习惯不再被严格遵守,从句后置在汉语书面语中已成为一种比较常见的语法现象^{[3]278}。在北大语料库(CCL)中设定假设标记“要

是”与“的话”间隔小于/等于10字进行检索,得到的72个从句后置型假设句中,有66个(92%)出现在翻译作品中,仅6个(8%)见于汉语原创作品。可以推知,在现代汉语中假设从句后置大多可能是直接翻译外文的的结果。在古代汉语中,除非为了韵律上的特殊需要偶尔让假设从句后置^①外,基本只用从句在前这一种语序。以上事实说明,现代汉语假设从句后置这种特殊语序的使用的确是受了西文翻译的影响。

张炼强从常式句和变式句相互变换的角度,描写了假设从句后置的多种条件限制。^[4] 贺阳^[3]、黎洪^[5]和谭全呈^[6]对现代汉语偏正复句的变序问题进行了综合研究,也论及了假设复句的语序变异现象。王春辉从类型学比较视角对汉语条件句的语序类型特点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在对相关解释讨论的基础上,从语义和篇章连续性角度,对从句前置优势语序和从句后置特殊语序的成因进行了比较合理的分析。^[7]

Greenberg通过跨语言调查得出的第14条语序共性为:在条件陈述句中,所有语言都以条件从句处

收稿日期:2023-10-15

基金项目: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现代汉语假设句研究”(21FYYB061);2020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现代汉语非典型假设句的结构和功能研究”(2020BY001)

作者简介:张雪平(1971—),女,河南舞阳人,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现代汉语语法。

于结论之前为正常语序。^[8]这条普遍语序规则跟时间顺序原则^[9]一致,符合汉语假设句的语序特征。假设句从句前置是句法相似性的表现,而从句后置违反时间顺序,使用频率也低得多。据姚双云对579个“如果”假设句的考察,只有1例假设从句后置,比例不足0.2%,而其他学者的调查结果大致为3.7%。^[10]我们对王朔《顽主》《一点正经没有》穷尽检索,得到78个由“要是、要、如果”等引导的有标假设句,其中有4个从句后置,占比约5.1%;广播剧本《千古流芳》是对话语料,涉及政治谈判,表达上比较正式,出现了55个有标假设句,无一例是从句后置的。可见,不管语料的来源如何,从句后置型假设句在现代汉语中绝对处于劣势,频率极低。

语序是汉语中一种重要的语法手段,非常规语序的从句后置型假设句不是汉语中的常规假设句,在现代汉语中非韵律需要而使用,固然与语言接触有关,更与其语义表现、语用属性和特别的表达功能有关。本文拟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对真实语料的考察,分析从句后置型假设句的句法特点与语义表现之间的互动关系,探讨其语体特征与语用属性,揭示使用这种假设句的语用动因。

二、结构形式与语义表现

从句后置型假设句要使用假设义关联词语做语法标记,我们所调查的语料中未见无假设标记的无标假设句从句后置的。所用假设前标记一般是“如果、要是”等假设连词,且多与假设后标记“的话”配合,结果分句中不用承接性关联词语“那么、就”等做推论标记,形成“……,如果……的话”这样的双标假设句式,如:

(1)当时为取得这一成果,宋庆龄作出了她的贡献。这使她很愉快;想来也一定会使孙中山愉快,如果他还健在的话。(陈廷一《宋氏家族全传》)

(2)“行,我把这个座位让给您,要是您不拒绝的话。”钢琴家微微一笑说。(《读者》)

(3)他还带着一筒牙膏,给伤员抹在口中,润一润唇舌,假若一时找不到水的话。(老舍《无名高地有了名》)

(4)这个,请老兄自己去判断,假如你想结婚的话。(老舍《婆婆话》)

有少数用例只使用假设前标记,不用假设后标记,形成“……,如果……”这样的单标假设句式,如:

(5)鞋跟高点走起来有点踩泥的感

觉,深一脚,浅一脚,如果宽厚点。(王朔《千万别把我当人》)

(6)是的,你的妈妈一定比我还喜欢你,要是在病中看见你这样远跑回去。(叶紫《古渡头》)

(7)他如今每年作一次水墨画,一个半月,怕丢掉。他感慨地说:“做画家是自己找麻烦,假如要做一个实在的画家。”(《人民日报》,1998年)

从句后置型假设句的假设从句与主句之间书面上常有逗号相隔,如上面各例。有的假设从句则出现在破折号或省略号后,甚至小括号中:

(8)你必须把自己的感情问题安排妥当——如果可能的话。(《读者》)

(9)你不喜欢独自一个人待着,你需要有朋友围在身边。你非常喜欢帮忙……如果这不花费你太多精力的话。(同上)

(10)至于评价,那它是对价值的主观关系的表现,因而既可能是真的(如果它符合价值),也可能是伪的(如果它不符合价值)。(读书,CCL)

有时,前置的结果小句是疑问语气,后置的假设小句是陈述语气,如(11);或者前置的结果小句和后置的假设小句之间被其他成分隔开,如(12),甚至相隔较远,如(13)(见下划线部分)。这种情况下,虽然假设小句和结果小句一般都带有独立的句调,按一般的句子定义,形式上算不上是假设复句;但它们各自语义上并不自足,还是彼此依赖,所以仍构成假设条件关系。这是口语篇章中因交流互动带来的假设句式的语用变化,因此本文一并讨论。

(11)“什么条件?如果我帮你。”(王朔《人莫予毒》)

(12)“到我那儿去吧。”丁小鲁说,“你们要是还想聊。”(王朔《顽主》)

(13)“噢,我建议您还是照常去参观那个展览”,分局长出门前回头说,“我去看过,办得挺不错,你能看到一些真正的国宝……如果您身体允许的话。”(同上)

由上述可知,与常规语序的从句前置型假设句相比,从句后置型假设句在结构形式上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强制使用假设标记。即必须使用假设前标记,多同时使用假设后标记“的话”,不能是无标形式。这种句法特点主要是基于表义的需要。从句后置型假设句是非常规语序,主从句之间的语义

关系便不够明确,若不使用假设标记,便很难确定句子是否表假设条件关系。这样,就会造成主句和从句语义上的不连贯,从而导致句子不合法,或者语义发生变化,如上举例(2),若删除从句中的假设标记“要是”,则导致句子语义不连贯,不能说,见(2’);例(6)从句中的“要是”删除后,则变成现实性叙述而非可能性假设了,见(6’)。

(2’) * “行,我把这个座位让给您,您不拒绝。”钢琴家微微一笑说。

(6’) 是的,你的妈妈一定比我还喜欢你,在病中看见你这样远跑回去。

其次,主句排斥推论标记。从句后置型假设句的主句不用推论性强的连词“那/那么”,一般也不用推论性较弱的关联副词“就/便”等。这种句法表现主要是假设句式推断性因果关系义制约的结果。“那么、就”等充当推论标记,用于引出推断性结果小句,其出现必须以假设条件小句的出现作为推断的前提。但从句后置型假设句的主句前置于从句先出现,在前提未出现时,这类推论标记自然无法使用。此外,也与前置主句对后置从句语义上的依赖性弱有关。从句后置型假设句的主从句之间往往不存在必然的推论性因果联系,有的前置主句甚至是对事实的陈述,如上面例(3)中“假若”所引从句前的几个分句,再如下面两例,从句前主句(下划线部分)的命题内容都是事实性陈述,主从句之间也无逻辑上的蕴涵关系。这些后置的假设小句对整个假设句的语义贡献很小,其功能主要在语用层面,多是为了表达的严谨或得体而用的。详见下节。

(14) “实际上,”马锐继续朝夏经平说,“他最近对我什么都没干,如果什么都不干就算好的话。”(王朔《我是你爸爸》)

(15) “知恋君飞呀!任意地飞呀。可惜你的伴儿离你渐远了,假使你会想的话。听说你是不大会想的,那么也好吧,好好地飞呀。”(俞平伯《稚翠和她情人的故事》)

黎锦熙、刘世儒指出,常式句“如果你要迎合我的心意,那么我们的谈话就没有什么好处”,不可变为从句后置的变式句,但若去掉主句中的“那么”,且把“就”改为“怕”的话,则可以。^[11]张炼强也指出,“如果……那么……”句中,如果要后置从句,非把“那么/那”去掉不可,但认为主句中可以出现“就”,并举出下面两例:^[4]

(16) 真理,它要你的一切,等到你真相信它时,你就不能拒绝,若是它要你的一切。(黎锦熙、刘世儒《汉语语法教材》)

(17) 但将来的命运,不也就可以推想而知吗?如果乡下人还是这样的乡下人,老例还是这样的老例。(鲁迅《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不过,我们在557万多字的老舍等现代作家的文学作品文本中,穷尽检索得到的30个从句后置型假设句中,仅见到1例主句中出现了有关联作用的“就”,见(18),但语义上与其前小句联系紧密,主要表示顺接连贯,与假设标记呼应引出推论的作用并不明显。其实(16)也属于这种情况,“就”所在小句主要是承接前面的时间小句“等到……时”的。(17)中的“就”可能有引出推论的作用,但由于用于反问句中,而且与假设小句相距较远,所以与“如果”所引两个假设小句的呼应关联功能也不明显,其强调语气功能更凸显。因此,我们认为,从句后置型假设句前置主句中排斥推论标记。

(18) 自己的车,当然格外小心,可是他看看自己,再看看自己的车,就觉得有些不是味儿,假若不快跑的话。(老舍《骆驼祥子》)

因从句后置而必须使用假设标记,致使从句后置型假设句一般不会紧缩在一起,这与常用紧缩形式的无标假设句不同。在我们所检索到的用例中,主句与从句之间没有书面上停顿标记,看似紧缩式的后置型假设句,仅见到王朔小说中1例。这应该与王朔小说的个人言语特点有关,他的小说中往往很长一段话不用标点符号,并非规范用法。

三、语体分布与语用属性

贺阳依据语料统计数据指出:“语体正式程度的高低似乎对从句后置现象并无明显影响,正式程度较高的学术语体和正式程度较低一些的文学语体,在从句后置现象上并没有呈现出比较齐整的差异。”^{[3]277}但就假设句来说,从句后置型在语体分布上存在一定倾向性。我们从2200余万字的当代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及少量应用文等文本中,检索到“……,如果……的话”这种典型形式后置假设句共48个,其中17个(35%)用于对话中;所用假设前标记情况为:“如果”36、“假如”6、“要是”4、“假若”1、“若不是”1。从557万多字的老舍等作家的现代小说、戏剧和散文作品中所检索到的30个这种后置假设句,只有3个(10%)用于对话中,并且有27个见于老舍作品(“假若”句17个、“假如”句10个),另有2个“假使”句分别见于苏青、俞平伯作品,1个“倘若”句见于施蛰存作品。从这些现代时段语料中的用例情况来看,未见带有口语色彩强的假设连

词“要、要是”的用例,而且在当代语料中也很少见到。由此可见,从句后置型假设句偏于书面性,多用于书面语体中,尤其是在现代汉语早期,主要见于文学作品中,典型的口语体对话中极少使用,其书面化倾向很明显。到了当代语料中,书面色彩有所淡化,不过仍较少用于对话中。

我们还检索了北京大学1982年调查的自然口语对话语料《北京话》(约13万字),假设标记“如果/要是/要”与“的话”配合使用的双标假设句共16例,没有一例是从句后置的。而《廖秋忠文集》前6篇语言学论文(约8.7万字)中检索到1例“如果”从句后置的,见(19)。该文集是科技语体,表达正式,有鲜明确书面色彩。所以说,从句后置型假设句并不偏爱非正式的口语语体,也未必偏爱谈话语体^②。如果说它对语体有所偏爱的话,也倾向于有书面色彩的比较正式的语体。

(19)此外,语义是否和谐还得经常依靠听者/读者的背景知识来定。例如,在例(11)里,状况短语“在这些方针指导下”的管界有可能只限于第一句,如果所提到的这些方针只涉及工业方面的改革,不涉及农业方面的改革。(廖秋忠《篇章中的管界问题》)

从语用角度来看,各种复句的语义关系都处在“行”“知”“言”三个认知域中,即分别处于客观事理、主观推理和言语行为层面。处于“行域”中的假设关系是典型的蕴涵关系,最不典型的是处于“言域”中的假设关系。从复句“三域”理论来看,可以说,从句后置型这种非常规语序假设句具有明显的语用属性,较多用于言域层面,主从句之间不具有真正的蕴涵性语义关系,即一般不具有客观事理或逻辑推理上的必然性因果联系,从句实际上是为主句所言提供一个适宜性条件,从而满足书面表达追求严谨的逻辑要求。因此,从语义内容上来看,后置的从句多表达对主句内容的解释说明,学界通常认为是“追补”或“补充说明”。如(20)的从句用于表示补充说明的破折号后,其语义上的补充说明性质更加凸显,表述得出主句的评价性断言的适宜性条件,(21)和前面例(8)一(10)亦同;(22)(23)的从句分别补充说明主句提出要求、请求的适宜性条件,前面(2)(13)同样;(24)则补充说明表示感谢的适宜性条件。用于口语对话中表示请求时,显得更加客气和礼貌,如(23)。

(20)大言不惭的尽管普遍,落落大方的也比比皆是——如果你不恶毒地管这叫

“腆着脸”的话。(王朔《一点正经没有》)

(21)曲时人绝对的不管什么是应有的客气,或者几乎是故意的假充乡下佬,假如他也会假充的话。(老舍《蛻》)

(22)旁的人不要说三道四,假如你没有经历过那种婚姻。(毕淑敏《婚姻鞋》)

(23)大卫:是,我想跟他谈一谈。当然如果你允许的话。(电视电影:《北京人在纽约》)

(24)我知道有些人专门对我进行研究,把我历史上多少年的东西都找出来。我感谢他们,如果是“好意”给我提出来的话。(金戈《外交部“夺权”前后的周恩来与陈毅》)

四、凸显强调与篇章连贯

王春辉参考前人研究指出条件从句后置的动因有二,一是作为事后追补语,二是主句而非条件小句与前文保持着篇章的连续性或连贯性。^[7]这个概括比较简明,但还不十分准确。现代汉语中从句后置型假设句的出现,从外因上看主要受西文翻译的影响,但能够在汉语中使用开来,则主要是基于凸显强调前置主句内容,以及与前文或后文保持语义连贯的篇章语用需要。

作为偏正复句的假设句的主句,本是句子表义重点所在,却前置于假设条件先出现,违背了正常的逻辑顺序和思维规律。但从语用功能上看,则具有凸显强调前置主句内容的特别表达作用,而后置的假设从句,在语义内容上几乎都可以看作对前面小句内容的补充说明。如上面(20)一(24),用于补充说明主句中所实施的某言语行为的适宜性条件。还常见于从说法的得体性或合宜性上对主句中某个词语或部分内容加以补充说明的,如下面三例,后置的假设小句分别对前置主句/小句中的“小品”“姑娘”“来世”进行了补充说明。这种假设句也被称为元语篇或元交际条件句^[12],英语中比较常用。

(25)我很喜欢白居易的这首“小品”——如果可以这样分类的话。(《市场报》,1994年)

(26)从那时到现在,又过了很多年,现在无双简直就要变成个老姑娘——假如她还是姑娘的话。(王小波《寻找无双》)

(27)吴松桥是在刘桂英疯了的时候收留她的,这样的好心人死后应该有一座好坟,这样的好心人来世应该有好报,如果有来世的话。(蔡康《花烛泪诉人间情》)

从我们对近 3000 万字语料的调查来看,多数用例中主句前置,只是为了把说话人的认识或结论先说出来以予以凸显强调,因此,后置的假设小句在语调上要低于前面的结果小句。这才造成了从句作为“追补语”后置这种句法后果。如(28)表义的重点在从句前“他”的认识上,(29)在得出的检查结论上,后面的假设小句只是补充了得出该认识或结论的一个适宜条件。因此,我们认为,后置的假设小句作为“追补语”只是句法语义表现,凸显强调主句内容,才是其语序变异的语用动因。

(28)他晓得,被日本人占据了的北平,已经没有他做事的地方,假若他一定“不食周粟”的话。(老舍《四世同堂》)

(29)“基本完好。”主管大夫对白度说,“如果不作解剖标本的话。”(王朔《千万别把我当人》)

还有一部分假设句的从句后置,是由于主句在语义上与前面语句内容联系更紧密。如(30)的前置主句“还得带一壶水”是紧承前一句中的“提醒”内容而说的,前后句之间语义连贯,而假设从句只是针对这最后一个提醒内容而言的,为了使前面几个小句的内容更加连贯,便让从句后置了。(31)(32)的主句(下划线部分)也是因紧承前句内容而前置的。

(30)明天要记住,得备中午晚上的干粮,每次开发票,给报销的。还得带一壶水,如果你们不怕渴死的话。(方方《埋伏》)

(31)但是如果只分内外不分上下地看,由圈外人来研究某一群体似乎的确比圈内人来研究好些,前者至少不应当比后者更差,如果不会更好的话。(李银河《女性主义》)

(32)你不喜欢独自一个人待着,你需要有朋友围在身边。你非常喜欢帮忙……如果这不花费你太多精力的话。比起爱来说,你更加寻求被爱,但这是不够的。(《读者》)

另有个别假设句从句的后置,既是为了凸显强调主句内容,也是由于作为追补语的从句内容上与其后续小句联系更加紧密。如(33)的假设小句中后面一句是对从句中“代价”的进一步说明,二者语义联系紧密;(34)中假设小句中“穿大衫”与后面一句中“找中山装”语义联系紧密。可见,后置的假设小句有时也为了更好地与后续篇小句衔接连贯。

(33)这就是用我的这种语言,表达这种意思。如果我在北京大学跟学生们讲话,基本的态度就是,我希望你们作李教第二,如果你愿意付代价的话。这个代价很大。(《李教对话录》)

(34)可是,今天他须领队。他怎想怎不合适,假若穿着大衫去的话。他冒着汗从箱子底下把那套中山装找出来,大胆地穿上。(老舍《四世同堂》)

不管是主句内容与其前小句内容联系更紧密,或是从句内容与其后小句联系更紧密,采用从句后置语序的假设句,有些是发挥着篇章连贯作用的。因此说,篇章连贯的需要,同样是后置型假设句存在的一个语用动因。从语义和表达上看,因篇章连贯需要而后置的假设从句,一般不能换位而前置。

五、结语

本文基于现代汉语语料,主要采用实证分析法,比较充分地考察了从句后置型这种非常规语序假设句式的语法特征及其语用动因。从结构形式上看,从句后置型假设句要求强制性使用假设标记,而不使用推论标记,这种句法限制与其特殊语序带来的语义关系模糊性及其句式义和分句之间语义依赖性不强有关。从语体分布和假设标记的使用上看,从句后置型假设句具有书面化倾向,起追补说明作用的假设小句,实际上为主句的言语行为提供了一个适宜性条件,从而满足了书面表达追求严谨的逻辑需要。从句后置型假设句在现代汉语中非因韵律需要而使用开来,外因是受了西文翻译的影响,内因在于凸显强调前置主句内容,以及与前后文保持语义连贯的语用需要。从本文对从句后置型假设句式的考察可知,特殊复句结构与其特别的表义特点及表达功能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说明了多样化的语义语用表达需求是语法形式产生变异的重要制约因素。

注释:

①杨伯峻、何乐士指出“假设句也有正句在前、偏句在后的”,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楚辞·离骚》)其中下划线部分是假设连词“苟”所引从句后置的假设句,是因押韵的需要而倒置的。

②汪晓欣以“如果”句为例,根据对北大 CCL 中语料的统计结果,认为语体正式程度高低对假设复句语序的变异有影响,从句后置假设句多用于谈话语体和文学语体,基本不用于报道、政论、科技和事务等实用语体。我们的认识与该结论不大一致。

③关于复句三域的区别,参考 Sweetser、沈家焯。

Greenberg, Joseph H. (ed.), *Universal of Language*, 73 - 113, London: MIT Press, 1963.

参考文献:

- [1] 黎锦熙. 新著国语法[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 朱德熙. 语法讲义[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3] 贺阳. 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4] 张炼强. 假设从句后置的条件(上、下)[J]. 逻辑与语言学习,1992(1/2).
[5] 黎洪. 汉语偏正复句句序变异研究[D]. 合肥:安徽大学,2012.
[6] 谭全呈. 弱逻辑性偏正复句的变序研究[D]. 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9.
[7] 王春辉. 汉语条件句小句间的语序类型[J]. 世界汉语教学,2010(4).
[8] Greenberg, Joseph H. 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 In

- [9] 戴浩一. 时间顺序和汉语的语序[J]. 黄河,译. 国外语言学,1988(1).
[10] 姚双云. 英语if句与汉语“如果”句用法之异同:基于语料库的比较研究[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
[11] 黎锦熙,刘世儒. 汉语语法教材[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12] 项成东. 元交际条件句的语用认知研究[J]. 外国语,2006(6).
[13] Sweetser. *Eve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14] 沈家焯. 复句三域“行、知、言”[J]. 中国语文,2003(3).

(责任编辑 谢春红)

The Grammatical Features and Pragmatic Motivation of the Postpositive Hypothetical Sentence

ZHANG Xueping

(Institute of Language Science and Language Plann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The post clause hypothetical sentence in modern Chinese is a pragmatic special hypothetical sentence pattern that is mainly used for speech act domain. Due to unconventional word order and unclear semantic relationships, it is mandatory to use hypothesis markers while excluding inference markers, forming a typical structural form of “……, ruguo(如果)……dehua(的话)”. Its stylistic distribution and hypothesis markers indicate a tendency towards writing, and clauses with complementary explanatory functions can provide appropriate conditions for the main sentence. This special word order assumption sentence can be used in Chinese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translation, but also because of the pragmatic need to emphasize the content of the main clause and to maintain semantic coherence with the preceding and following texts. The demand for pragmatic expression in discourse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variation of word order in hypothetical sentences.

Key words: post clause hypothetical sentence; pragmatic attribute; grammatical features; pragmatic motivation

毛泽东关于民主监督和制度反腐的重要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以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重要谈话为中心的考察

李琳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郑州450044)

摘要:毛泽东非常重视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问题,始终对党员干部腐化变质的危险保持高度警觉。1965年5月他重上井冈山并发表了重要谈话,其核心议题就是如何防止党员腐化变质、确保江山颜色不改。这次谈话中,毛泽东科学总结了革命战争年代发展党内民主、防止党员腐化变质的历史经验,深刻揭示了特权思想、官僚作风、贪图享受、脱离群众现象等对党的执政地位构成的现实威胁,鲜明提出了依靠民主监督和制度建设防止党员腐化变质的重要思想。毛泽东关于依靠民主监督和制度反腐的重要思想是我们党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当前治党治军治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关键词:民主监督;制度反腐;时代价值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4.01.017

中图分类号:D232,D2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4)01-0106-06

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如何防止自身腐化变质一直是毛泽东最为关切的重大政治问题。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并发表重要谈话,表露了自己对这个问题思考与感想。他重提土地革命时期的士兵委员会,强调要在全中国推行政治民主制度,以此来防止党员腐化变质。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重要讲话已经过去50多年了,但毛泽东关于民主监督和制度反腐思想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一、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重要谈话的历史背景与核心议题

(一)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重要谈话的历史背景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独创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1965年5月,在阔别38年之后,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他这次“千里来寻故地”,不是为了旅游观光,而是有着很深的政治思考。他一边走一边谈,既回顾了井冈山斗争的艰难岁月,表达了

对革命先烈的深切怀念,也表露了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焦虑与担忧。在重寻故地途中,毛泽东深情追忆了井冈山斗争的艰辛历程。他说:“为了创建这块革命根据地,不少革命先烈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牺牲时都只有二十几岁呀!没有过去井冈山艰难的奋斗,就不可能有今天。”^{[1]494}随后,毛泽东话锋一转,谈起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现实。他不无忧虑地讲,千百万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人民江山,会不会因为我们队伍里滋长特权思想而改变颜色呢?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他就担心今天的政权。他以苏联共产党腐化变质的深刻历史教训为鉴,语重心长地说到,我们国家也有这种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过多次,仍然存在,甚至还很严重。报喜不报忧,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这些很容易导致干部腐化、蜕化和变质。他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担心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

毛泽东的这种担忧并非一时有感而发,而是早已萦绕心头。1957年6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宣称

收稿日期:2023-12-15

作者简介:李琳(1978—),女,河南南阳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要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并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第四代人身上。翌年10月,杜勒斯又明确表示,要用“和平方法”改变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开会议时,首次提出要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问题。他说,杜勒斯要和平演变谁呢?就是演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此后,毛泽东反复强调要警惕和防止和平演变。他认为,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一定社会基础的,中国确实存在被和平演变的危险。毛泽东清楚地看到,党执政后一些党员干部经不起执政考验,沾染了官僚主义作风,甚至蜕变为腐败分子,毛泽东深知这些行为的危害。从保持党和国家永不变质、永不变色的战略高度,他告诫全党,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1960年3月30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毛泽东对当时一些地方农村人民公社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表示严重关切,将该作风称之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60年代初期,由于中苏两党论战逐步升级并导致两党关系破裂,加上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误判,毛泽东对党腐化变质的现实可能和危险性愈加担忧起来。1963年5月9日,在一份关于浙江省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上所作的批语中,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严重警告,他指出,如果不能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他还语重心长地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尽管毛泽东一再向全党发出警告,但当时的党内状况并不能令其满意。1964年下半年的两份报告更加重了他对党腐化变质的担忧。一份是广东省委11月13日报送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第一次报告。报告说,这几年农村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基层组织被篡夺以及干部被和平演变的情况到了异常严重的程度,基层组织已经被篡夺和已经和平演变过去的,也就是说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不是有没有三分之一的问题,更普遍的是大量农村干部正在和平演变之中。另一份是刘少奇12月6日就《河南省委关于集中整训工作队、解决县社两级骨干“四不清”问题的报告》给宋任穷的信。刘少奇在信中说,从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到在一些县社领导干部中和平演变和阶级斗争的大体情况,实际情况可能比报告中所说还要更多更严重一

些。

这两份报告反映的情况给毛泽东以很大震动,使他愈加感受到了党腐化变质的现实危险性及反对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也促使毛泽东进一步思考防止党腐化变质、确保红色江山不改变颜色的路径和举措。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两份报告是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并发表从严治党重要谈话的“导火索”。

(二)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重要谈话的核心议题

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毛泽东问陪同人员井冈山精神是什么,并引导他们要从制度方面去想。最后毛泽东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2]174}毛泽东接着说,苏联共产党之所以蜕变为修正主义的党,国家也改变了颜色,就是因为缺乏政治民主和群众监督,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他最后强调说:“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要在怎样防止特权阶层方面有一整套好制度,要继承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井冈山精神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意义一样深远。”^{[3]21-22}毛泽东把井冈山时期的士兵委员会提升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是想通过传承弘扬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那样一种好制度、好作风,来确保党不腐化变质、国不改变颜色,确保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不白流。

二、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重要谈话关于民主监督、制度反腐思想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在重上井冈山的重要谈话中,毛泽东把士兵委员会与支部建在连上一起作为井冈山精神的两个重要支点。应当说,这是以民主制度防止党腐化变质的一种极为深刻的战略考虑。毛泽东如此看重士兵委员会这一群众性组织,并以此作为防止党腐化变质的民主制度模板,是有其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

(一)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重要谈话关于民主监督、制度反腐思想的理论逻辑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毛泽东关于民主监督、制

度反腐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在总结法国巴黎公社经验时,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通过普选民主和人民监督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思想。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导言中指出:“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4]55}列宁进一步阐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他指出:“为了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就会立即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措施:(1)不但选举产生,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3)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5]210}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又不失时机地向全党发出了执政党的引诱力和脱离群众的危险的警告,他指出,必须注意到,参加执政党的引诱力在目前是很大的,要防止那些阶级异己分子混入到党内来。他还说,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这是可能导致党腐化变质的最重要因素。列宁强调,要确保执政的共产党不腐化变质,就必须以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来反复地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

(二)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重要谈话关于民主监督、制度反腐思想的历史逻辑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逻辑是理论逻辑的现实基础,毛泽东从严治党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红军初创时期以士兵委员会的组织形式实施民主监督的实践取得了成功。士兵委员会是在1927年9月毛泽东在秋收起义部队三湾改编时创立的一种民主制度。三湾改编以前,部队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基层没有党组织,军阀作风严重存在,军官不仅生活特殊,而且还随意打骂体罚士兵。为了把秋收起义部队改造成新型人民军队,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体运用于中国新型人民军队建设,在确立支部建在连上原则、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同时,创制士兵委员会,实行军内民主主义。连以上部队普遍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直接参与军内民主管理。1928年11月,毛泽东曾给中共中央报告说,军中组织了士兵委员会,连、营、团都有了士兵会,代表士兵利益,并做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士兵委员会设立

具有深层次原因。井冈山斗争时期,国民党军重兵“进剿”围困,红军物质给养极度匮乏。严酷的斗争环境,要求在红军部队中建立官兵薪饷平等制度,做到官兵一致。而要做到这些,既要靠军官们的自觉,也要靠士兵们的监督。这就对建立以士兵委员会为组织形式的民主制度提出了要求。在士兵委员会制度下,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这一民主制度的突出特点,就是彰显士兵主体地位,强化士兵民主监督,并将这一群众性组织置于党组织的领导之下,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

士兵委员会制度影响深远,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军队的雇佣性质,为根除军阀主义思想残余、建立新型官兵关系,密切党与士兵群众的联系、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调动官兵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士兵委员会制度的实行,给部队带来许多新变化,使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毛泽东对此高度评价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他还由此得出结论: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后来,贺龙元帅曾深刻阐述该民主制度的重大意义:“(它)完全打破了那种认为军队要打仗要服从命令,就不能有民主的陈腐观念,创造了历史上第一支真正讲民主的属于人民自己的军队。”^{[6]2}

(三)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重要谈话关于民主监督、制度反腐思想的实践逻辑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实践。毛泽东从严治党思想是在实践中得以检验和升华,主要经过“甲申对”“窑洞对”到“赶考对”等发展历程。

1944年,抗日胜利在望,郭沫若鉴古观今,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分析了李自成起义失败的原因。毛泽东将其列为整风运动的学习材料,提醒大家,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时要求解放区文艺工作者,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来编演,以使这个历史教训深入人心。后来,郭沫若与毛泽东就《甲申三百年祭》有书信往来,史称“甲申对”。

1945年7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就跳出历史周

期率问题同黄炎培先生进行了著名的“窑洞对”。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只有这样才不会人亡政息。这表明,毛泽东显然已经认识到了监督党和政府的主体力量即人民,找到了实施监督的基本路径即民主。毛泽东是坚定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把人民作为监督主体,依靠人民监督使党跳出历史周期率,是他经过思考和探索做出的必然选择。而发挥人民监督作用,内在地要求实行人民民主。把民主作为使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是毛泽东以人民为中心的监督思想的必然逻辑。

1949年1月,三大战役的战略决战已经结束,中国革命胜利在望。是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谋划筹建新中国大政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告诫全党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随后,中共中央及其所属机构由西柏坡迁往北平,毛泽东将共产党进京执政比喻为“进京赶考”,并在启程时发出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7]470}的深刻警示。

毛泽东深知民主监督对于确保执政的共产党不因滥用权力而腐败的极端重要性,但在谁来监督、怎样监督问题上,毛泽东的思考和探索并未停止。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强调,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在他看来,党和政府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他们之间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问题,需要实行民主制度,让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通过批评党和政府的缺点错误来实施民主监督。此后,毛泽东一再表达同样的观点。他说,无论哪级政府和干部有缺点错误,都应该批评,并且要成为一种习惯,如果党员干部中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在谁来监督的问题上,毛泽东的回答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人民群众。

在如何监督的问题上,毛泽东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认为,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来信来访,就是很好的组织形式。他说,人民政府的一切重要工作都应交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并做出决定。必须使出席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们有充分的发言权,任何压制人民代表发言的行动都是错误的。但是一些情况表明,党执政以后党组织成了领导机构,一些领导干部当官做了老爷,他们不愿接受群众监督,甚至压制人民民主,一些民主监督形式在基层成了摆设,其作用发挥与井冈山时期的士兵委员会相比要差多了。这种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使他回想起当年的士

兵委员会来。他感到实行政治民主,加强群众监督,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还是井冈山时期的士兵委员会更为有效。

三、毛泽东 1965 年重上井冈山重要谈话对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时代价值与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时刻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一再重温“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对党的前途命运始终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他告诫全党同志,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很牢固,但如果作风问题解决不好,也有可能出现“霸王别姬”那样的时刻。我们一定要有危机意识。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关于靠人民监督和制度反腐的重要思想,对于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加强人民群众监督,确保完成使我们党永不变质、永不变色的历史任务,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重要启迪价值。

(一)要对党腐化变质的危险保持高度警惕,切实解决好“要不要监督”的问题

怎样防止党腐化变质,如何确保红色江山不改变颜色,是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谈话的核心议题,也是他从延安时期起就苦苦探索解决的重大历史性课题。直至临终前,他还一再表达对党的前途命运的担忧。这深沉的担忧中,蕴含着毛泽东对党腐化变质危险的高度警觉。正是这种高度警觉,促使他深入思考对党员干部的监督问题。尽管他的警觉和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有脱离实际的估计,但这种精神却是弥足珍贵的,至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重要讲话启示我们,必须对党腐化变质的危险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一刻也不能放松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我们党“赶考”永远在路上。毋庸讳言,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我们党脱离群众的危险不是减少了,而是大大增加了。我们党腐化变质的现实危险依然存在,防止党腐化变质的重大政治任务还远未完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看到,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一些问题还相当严重,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他强调说:“如果任由这些问题蔓延开来,后果不堪设想,那就有可能发生毛泽东同志所形象比喻的‘霸王别姬’了。”^{[8]310,312}这就告诫我们,党越是长期执政,越是发展市场经济,越要注意防止脱离群众,越要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越要加强

(二)要始终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切实解决好“谁来监督”的问题

在依靠谁来监督的问题上,毛泽东历来把依靠人民群众作为重要原则和鲜明指向。从延安“窑洞对”时提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到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重提“士兵委员会”,强调“接受群众监督”,都是对上述原则遵循和沿袭。1941年1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1957年2月,他再次明确指出,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毛泽东关于加强人民监督的思考和探索为我们新时代强化人民监督提供了重要借鉴。新时代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永葆党的先进性和政治本色,必须把基点放在依靠人民群众上。人民群众是监督主体,是确保我们党永不变质变色的决定性力量。要坚定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不遗余力发展基层民主,切实把监督的重心放在基层一线,引导基层群众更广泛更有效地参与民主监督,着力提升基层民主和群众监督的发展质量,不断强化基层群众的民主意识,拓展群众参与监督渠道,增强群众参与监督效能,真正使基层群众人人都能起来监督。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们党永不变质、永不变色。

(三)要加快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切实解决好“用什么监督”的问题

在重上井冈山时的重要谈话中,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群众监督之所以搞得不那么好,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没有形成一种制度”。毛泽东的思考和探索为我们新时代“用什么监督”提供了重要指引。新时代新阶段,要确保我们党永不变质、永不变色,健全和完善民主制度至关重要。民主是监督的制度基础和制度保障。在民主制度缺失或不健全条件下,人民群众无法真正享有各项法定民主权利,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监督,也很难保证我们党在“赶考”中能够考出好成绩。我们党执政以来在民主新路探索中曾经出现的曲折和教训,也从反面为此提供了佐证。在新的“赶考”路上,我们党要考出好成绩,永葆党的先进性和政治本色,必须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作为根本之策、根本之道,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健全民主制度体系,为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做出缜密的制度安排,为党员和群众行使监督权利提供有力保障,切实解决没有制度约束的问题。

(四)要积极探索有效监督路径,切实解决好“能不能监督”的问题

在1965年重上井冈山谈话中,毛泽东振聋发聩地提出了“井冈山之问”。当时,在毛泽东谈到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士兵委员会在监督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时,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刘俊秀请教式地问:“现在工厂都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毛泽东肯定地回答说:“两者不一样。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毛泽东发出的“井冈山之问”,实质上是“能不能监督”的问题,亦即对身居高位的党员领导干部,党内外群众能否监督得了的问题。解决好“能不能监督”尤其是对领导干部的监督问题,仍然是新时代共产党人亟待回答的重大历史性课题。回答“井冈山之问”,核心点是如何完善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根本点是如何保障群众知情权和监督权问题,关键点是如何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强化党内监督的核心”^[9],要进一步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把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有机结合起来,把上级对下级、同级之间,以及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充分调动起来,着力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监察、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同法律监督、民主监督、审计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等协调起来,形成监督合力。要进一步增强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度,增强党务政务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依法保障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切实解决党员和群众监督难的问题。

四、结语

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发表的重要谈话,科学总结了革命战争年代发展党内军内民主、防止党腐化变质的历史经验,深刻揭示了特权思想、官僚作风、贪图享受等脱离群众现象对党的执政地位构成的现实威胁,鲜明提出了依靠民主监督和制度建设防止党员腐化变质的重要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一再重温“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对党的前途命运始终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指出,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战胜风险挑战中壮大,始终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风险意识。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关于靠人民监督和制度反腐的重要思想,对于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推

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加强人民群众监督,切实解决好“要不要”监督,“能不能”监督,“谁来监督”“用什么监督”等问题,确保完成使我们党永不变质、永不变色的历史任务,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重要启迪价值。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2]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3]马社香.“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王卓超回忆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一次谈话[J].党的文献,2006(3).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贺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7]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8]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310.
[9]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03.

(责任编辑 许峻)

Mao Zedong's Important Thought on Democratic Supervision and Institutional Anti - Corruption and Its Value of the Times

— An Investigation Centered on Mao Zedong's Important Talks on Jinggangshan in 1965

LI Lin

(School of Marxism,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Mao Zedong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issu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prevention of corruption, and always remained highly alert to the danger of corruption and degeneration of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In May 1965, he went to Jinggangshan again and made an important speech. The core topic was how to prevent the corruption of party members and ensure that the color of the governance did not change. In this conversation, Mao Zedong scientifically summarized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developing the Party's internal and military democracy and preventing the corruption of the party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war and deeply revealed the real threat posed to the party's ruling position by the phenomenon of privilege, bureaucracy, greed and enjoyment, and clearly put forward the prevention of relying on democratic supervision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Mao Zedong's important thought on relying on democratic supervision and system to fight corruption is the extremely valuable spiritual wealth of our Party, which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the times for the current governance of the Party, the army and the country.

Key words: democratic supervision; institutional anti - corruption; value of the times

“两个结合”视域下延安精神的内涵意蕴与时代价值

黄磊, 黄会奇

(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延安 716000)

摘要:从“两个结合”的新视角出发,探讨延安精神的形成基础、内涵意蕴、时代价值三个方面。就形成基础来看,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哺育中形成的;就内涵意蕴来看,延安精神是对“两个结合”重要论断的实践与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两个结合”重要思想启示我们:延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精神锻造,是增强中华文化自信自强的底气所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

关键词:“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延安精神;中国共产党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4.01.018

中图分类号:D621;D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4)01-0112-06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两个结合”的重要命题,强调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明了方向。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不断坚持“两个结合”的历史。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把马克思主义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坚持立足国情实际,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理论根源。

中共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精心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1]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既是在特殊革命斗争环境中形成的精神结晶,也是“两个结合”的重要产物,“两个结合”的重要思想为全党在新时代传承弘扬延安精神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一、“两个结合”的丰富内涵与内在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2]¹⁷“两个结合”的科学命题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建设、改革的经验总结,是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旺盛生机与活力的根本所在。

“第一个结合”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本质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目的和具体途径。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必须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所指:“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3]³⁷⁶。纵观百年党史,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收稿日期:2023-12-20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科规划项目“习仲勋与陕甘边根据地的土地改革”(2022B057);教育部重点项目“延安时期党中央对党政军民群集中统一领导的研究”(22HSJD-03)

作者简介:黄磊(1999—),男,陕西延安人,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黄会奇(1975—),男,河南开封人,延安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教授。

时代化进行积极探索并日趋成熟。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既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4]继毛泽东之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旗帜,立足中国实际,以改革开放的创新实践“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守正创新,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深刻回答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积极开拓创新,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第二个结合”是一种理论学说与文化形态的结合,本质上是植根于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实现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融合共生、交相辉映。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原本就有的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扎根、开花、结果提供了思想沃土。习近平同志强调:“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5]深刻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进一步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分量。“第二个结合”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推进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总体而言,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对历史经验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总结,对未来理论创新路径的深刻洞悉。“两个结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立足点,分别指向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研究者提出“两个结合”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如刘仓认为“两个结合”是大前提与小前提、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过程,“第一个结合”统领并包含着“第二个结合”,“第二个结合”服务“第一个结合”。^[6]荣开明认为“两个结合”各有侧重,“第一个结合”,侧重于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联;“第二个结合”,侧重于思想文化的内在融通,但“两个结合”从内容、方向、目标和任务上看是基本一致的。^[7]新时代背景下,深入理解并持续推进“两个结合”,既

要科学把握其内涵要义、结合方式,又要正确领悟“两个结合”的内在联系,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强大生命力。

二、从“两个结合”中探寻延安精神的形成基础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精神。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要使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的重要命题。延安精神作为“两个结合”的重要产物,它的形成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必然结果。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延安精神形成的理论基石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延安精神的形成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延安精神的具体内容就是在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产生的。延安精神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灵魂,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生动体现。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为黑暗中的东方带来一丝胜利的曙光。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并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发生过一些偏差,遇到一些磨难和挑战。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还有很多不足,出现过多次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最后付出了惨重代价。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积极主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的革命战争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用新的理论指导革命实践。延安时期,毛泽东相继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论联合政府》等重要著作,注入了“延安窑洞里的马列主义”的印记,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不断发展成熟。1945年,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增强了全党的团结与巩固。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成熟的过程,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就是延安精神产生与形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思想为延安精神提供理论基础和科学指南,延安精神是毛泽东思想的具体运用和生动体现,延安精神的形成过程就是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过程。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是延安精神形成的实践基础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

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708}从这个逻辑来看,延安精神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理论与实践、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以来,就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紧密结合,扎根中国实践和人民生活,注重把党的正确理论送到田间地头。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延安时期是中国革命从低谷走向高潮、从苦难走向辉煌的重要时期。延安精神是党和人民在延安这块红色沃土上,经过13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而形成的崇高革命精神。从1935年10月,中共中央抵达陕北后,延安就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和中国革命的指挥中枢。我们党在这里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切实执行党制定的“十大政策”,推进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权建设,开展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以及“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双拥运动,最终夺取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实现了解放战争的重要转折。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形成了伟大的延安精神。

(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延安精神形成的历史基因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汇集而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观念、道德规范、精神风貌、价值取向、信仰追求、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总体表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程中,十分重视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研究。毛泽东认为,民族新文化应该建立在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深刻研究的基础上。他强调,“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8]708}。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延安精神生成的原生性基因,其所蕴含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与延安精神的精髓要义相互连通、高度契合。另一方面,延安精神扎根于中华大地、脱胎于中华文明,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承和时代表达。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继承“马列老祖宗”的同时,不忘中国自己的老祖宗,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延安精神。但值得注意的是,延安精神虽然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自身的历史文化基础,但它绝不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简单硬套,而是在汲取中华文明优秀成分的同时,结合时代特点与要求,对其进行丰富与升华。

三、从“两个结合”中理解延安精神的内涵意蕴

延安精神的形成是“两个结合”世界观、方法论

的重要体现。延安精神的形成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且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相结合,使中华文明和中国道路始终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

(一) “两个结合”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崇高而坚定的理想信念。政治方向是关于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的重大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的兴衰成败。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五种依次更替的社会形态,并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史上,涌现出“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揭竿而起、反抗暴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团结一心、抵御外侮”“大一统”“和实生物”等优秀政治思想。从逻辑关系上来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例如马克思主义“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揭竿而起、反抗暴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民族精神遥相呼应;马克思所主张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大同社会”“大一统”等传统政治思想如出一辙。

延安时期,中华民族面临千年未有之大浩劫,中国人民饱受日本帝国主义摧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学说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内容,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改造和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政治方针政策。延安时期的政治方向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是实现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人民解放的方向,体现了我们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有机统一。1938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回答“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时,明确指出“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政治方向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向,你们要学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这就是要打日本、怎样打日本、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打倒的正确政治方向”^{[4]116}。回顾延安十三年的光辉历史,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再到后来“推翻国民党反动派”,无一不体现中国共产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视作照亮中国革命前进方向的灯塔,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行。

(二) “两个结合”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

义活的灵魂。一方面,这一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3]134}马克思主义虽然是科学的理论体系,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富有创造性的理论,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8]。另一方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智慧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强调的“辩证法”及其所蕴含的运动、变化、发展的观点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变革精神异曲同工。从《礼记·大学》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到晚清“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解放之新风,都反映了中国古代仁人志士解放思想、善于革新的进步思想观念。从“修学好学,实事求是”的优良品质,到宋明时期“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等思想,都蕴含着古代仁人志士注重实际、唯物求实的精神。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要使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的重要命题。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9]801}赋予“实事求是”新的内涵和外延。1942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开始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并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不正之风,端正对待马列主义的态度。在整党整风过程中,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此,党内很多领导人率先垂范。以张闻天同志为例,他于1942年1月至1943年3月,亲率农村调查团在陕北、晋西北进行了一年多时间的调查研究。在调查过程中,张闻天坚持深入实际,实事求是,认真向地方干部和当地群众学习,并整理出多份调查研究报告。延安时期的成功经验表明,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党才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国家事业发展才能充满希望。

(三)“两个结合”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致力于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彻底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确立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的基本观点。“民本”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领域,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尚书》记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哀公》讲:“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晏子也认为“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为指导,深入中国革命实际,在对党的宗旨认识不断深化的基础上,主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理论层面来看,中国共产党对党性宗旨、人民群众的认识不断深入。毛泽东在1938年5月的《论持久战》一文中说到“兵民是胜利之本”,认为人民群众是革命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力量。1941年1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9]809}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1945年4月,毛泽东又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强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9]1094}在党的七大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被写入党章,并影响至今。从实践层面来看,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在政治上实行民主选举和“三三制”的原则,厉行廉洁政治,保障各民族平等团结等;在经济上,制定“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实行“减租减息”政策,鼓励私有经济,建立合作社,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等;在文化上,积极开展马列主义教育活动、创办各类学校、夜校、识字班、读报组,普及文化教育等;在社会生活上,积极开展灾民难民救济工作,成立延安保育院、医疗合作社等。总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依靠人民群众,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这不仅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识,也是我们克敌制胜的秘密武器。

(四)“两个结合”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政治本色。“自力更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关于内因和外因关系的原理,“艰苦奋斗”则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哲学。在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中,中华民族向来以自强不息、刚健有为、吃苦耐劳、勤劳勇敢、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等美德著称于世。《周易》里记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指天体的运动刚劲强健,君子也应效法于天,追求自我进步,刚健有为。《史记》里也记载:“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

为更生。”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表明,只有自力更生才能把握命运,只有艰苦奋斗才能成就伟业。

陕北地区位于黄土高原腹地,长期以来就偏僻封闭、交通不便、土地贫瘠、物资匮乏。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一边是日军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野蛮的“扫荡”“清乡”“蚕食”和“三光”政策,另一边还要面对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为了克服经济困难,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发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各根据地军民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锄”,依靠“困难有天大,我比天还大”的革命豪情,和“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顽强意志,成功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方针》一文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作自力更生。”^[10]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善于并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在深刻把握历史规律和发展大势的基础上积极进取,敢于作为,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中国革命最恢宏的史诗!

四、从“两个结合”感悟延安精神的时代价值

延安精神跨越时空、辉映未来、历久弥新,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在新的历史发展关键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有强大的文化基础和精神支撑,我们要继续以“两个结合”重要思想为指针,自觉肩负起弘扬伟大延安精神的时代重任。

(一)延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精神锻造

习近平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2]16}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广博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出现水土不服,反而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取得一系列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动将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时代特征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创造的优秀传统文化,使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同过去相比更为复杂和多元化,面临的考验之大前所未有的。基于此,我们必须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时刻以马克思主义审视、理解、把握中国社会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

特点、新需要,坚持守正创新,自觉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自觉学习和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二)延安精神是增强中华文化自信自强的底气所在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延安精神深深扎根中国大地,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延安精神所蕴含的文化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它是无产阶级领导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延安精神作为延安红色革命文化的重要内容,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革命战争时代的思想升华,又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优秀基因。延安精神可以说凝聚了中国共产党最深层的价值追求和文化底蕴,是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11]在当今全球化及多元文化激烈碰撞的社会背景下,有很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缺乏全面了解,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出现信仰缺失、文化自信、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各种社会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原则,成为我们党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方针。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从“两个结合”的角度深入理解延安精神,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摒弃一些极端错误文化的侵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同时,我们还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推进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协同互动,在弘扬伟大延安精神中坚定中华文化自信。

(三)延安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贯穿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最主要、最鲜明的主线,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最美好的夙愿。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来看,延安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在过去,党和人民在延安精神的鼓舞下,相继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成就,创造了人

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事业,需要亿万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需要一代代中国人为之不懈奋斗。迈向新征程,延安精神是我们的传家宝、压舱石、定盘星,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放射出更璀璨的光芒。当前,“两个大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我们要从延安精神中总结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延安精神中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符号,更要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行力量,坚定“四个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勇于担当作为,在新的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98.
- [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

- 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17, 16.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376.
- [4] 毛泽东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534.
- [5]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23: 193.
- [6] 刘仓. “两个结合”的丰富内涵、时代价值和实践路径[J].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2022(4): 12-21.
- [7] 荣开明.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相结合”四个问题的讨论[J]. 江汉论坛, 2022(9): 50-58.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79.
- [9] 毛泽东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801.
- [10] 毛泽东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132.
- [11]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 人民日报, 2023-06-03.

(责任编辑 许峻)

The Connotation and Value of Yan'an Spirit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Two Combinations”

HUANG Lei, HUANG Huiqi

(School of Marxism, Yan'an University, Yan'an, Shaanxi 71600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new perspective of “two combination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foundation of yan'an spirit, the connotation and the contemporary val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undation, Yan'an spirit is form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people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 Leninism and Mao Zedong Thought, and in the practice of long-term revolutionary struggle, as well as in the nurturing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notation, Yan'an spirit is the practi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mportant judgment of “two combinations”. At the new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the important thought of “two combinations” inspires us that the Yan'an spirit is the forging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o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the confidence and self-improvement of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spiritual driving force for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On the whole, the important thought of “two combinations”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Yan'an spirit in the new era and answering the new questionnaire on the way to the exam.

Key words: “two combinations”; the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Marxism; Yan'an spiri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双碳”目标下绿色金融现代产业学院 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孙穗^{a,b}, 曲升刚^{c*}, 杨佳衡^a

(广西财经学院 a. 金融与保险学院 b. 广西金融与经济研究院 c. 国际教育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3)

摘要:在当前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低碳”目标已经成为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而绿色金融作为推动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其人才培养显得尤为重要。在准确把握“碳达峰碳中和”内涵的前提下,基于三螺旋的理论逻辑,聚焦绿色金融人才培养的标准和要求,拟构建“人才需求—培养规格—培养模式—人才供给”的路径,为绿色金融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提供理论依据和行动参照。通过实施人才培养的“双碳”行动,建立动态的“产业—专业—课程”敏捷对接体系,有序衔接“学术论坛—创新项目—毕业论文”,并通过“虚拟教研室+现代产业学院”的教学方法,形成“共建—共验—共享”的绿色金融人才培养模式,聚焦人才培养能力增值研究。

关键词:双碳;绿色金融;现代产业学院;人才培养模式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4.01.019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4)01-0118-05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全世界关注的共同话题。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其对人才素养的要求更全面,既要具有能源和碳减排等相关的理工科专业知识,还要具有金融、法律等专业知识。2022年4月,教育部《加强碳达峰碳中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工作方案》提出,要加强绿色低碳教育,推动专业转型升级,加快急需紧缺人才培养,深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提升人才培养和科技攻关能力,加强师资队伍,推进国际交流与合作,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坚强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2022年8月,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印发的《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2022—2030年)》提出,要着力加强国家科技计划对低碳科技创新的系统部署,推动国家绿色低碳创新基地建设和人才培养,加强项目、基地和

人才协同,提升创新驱动合力和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这些政策文件对加强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以激发高质量发展内在动力提出具体的要求^[1]。

一、理论基础与文献探讨

(一)基于“政府、企业、高校”绿色金融人才培养的三螺旋理论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绿色金融人才培养是一个多方参与的社会性的系统工程,可以用“政府、企业、高校”的三螺旋理论来解释,“政、企、学”三大主体在创新中的作用各不相同(如图1所示)。政府在绿色金融人才培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主要是出台政策法规或者设立专门的基金,为绿色金融人才培养提供支持和指导,并提供平台和机会供企业、高校与政府部门进行交流与合作。企业是绿色金融人才培养的重要参与方,可以与高校合作开展行业实践基地、项目合作等形式,参与制

收稿日期:2023-01-03

基金项目:2023年度广西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双碳’目标下广西绿色金融产业学院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2023JGB344);2023自治区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202311548114);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卓越教师支持计划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孙穗(1987—),女,山东泰安人,博士,广西财经学院金融与保险学院、广西金融与经济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公司金融、绿色金融。

通信作者:曲升刚(1982—),男,辽宁大连人,硕士,广西财经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网络与新媒体。

定课程设置,将实际工作场景融入课堂教学,为学生提供实习和实践机会,使培养的绿色金融人才更具实践能力。高校是绿色金融人才培养的主要场所,可根据市场需求和行业变化,进行资源共享和协同创新,不断优化课程设置,提供适应绿色金融行业发展的专业知识和理论课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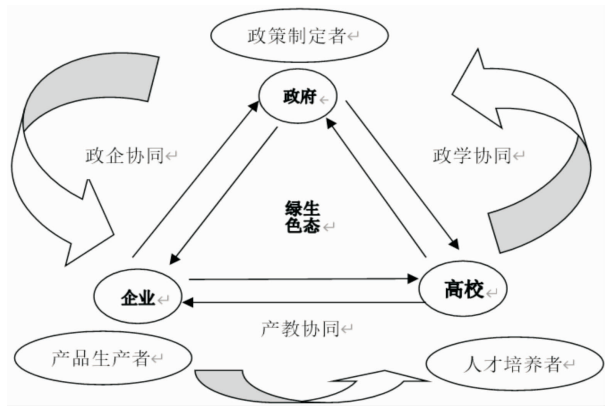


图1 三螺旋理论示意图

(二)关于绿色金融人才培养的文献与实践探讨

国内关于绿色金融人才培养的文献和实践主要集中在发展前景、人才需求以及培养模式等方面,这些探讨对于推动绿色金融人才培养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是对绿色金融人才培养的重要性的关注。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已成为亚太资本市场的重要关注点,各国政府发行绿色激励措施、ESG 融资活动均有所增加,企业(包括金融机构)必须发挥创造性,寻找具备可持续发展技能的合格员工,但是在该领域拥有专业知识的人并不多,因此该领域人才的需求逐年上涨^[2]。在我国,绿色金融人才培养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支撑,未来绿色金融将会成为主流金融形态之一,而绿色金融人才也将成为金融行业的重要力量^[3],上海、广州等城市均已正式将绿色金融人才、转型金融人才列入“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目录”,为应对全球对绿色及可持续金融人才日益增长的需求需要。

二是对绿色金融人才培养模式的探讨。在高等院校、金融机构、认证机构等组织内,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绿色金融人才培养体系已成为学者们的共识^{[2][4-5]}。以实践为导向的绿色金融人才培养模式即通过实践课程和实践项目来培养绿色金融人才成为主流的培养模式,根据绿色金融产学研合作的内容,可以依托现代产业学院,设计关于绿色金融基础知识、政策法规、风险管理、产品设计、市场营销等方面的课程和项目,拓展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培养学

生的综合素质^[6-7]。

三是对已有绿色金融人才培养实践的总结。英国政府继《绿色金融战略》启动后,其绿色金融研究所也启动了“绿色金融教育宪章”,帮助培养具有绿色金融技能的人才;牛津大学为英国政府政策官员开设了短期课程,以学习绿色金融的基础知识;新加坡管理大学与世界银行集团等机构携手,为该地区中高级政府官员制定了能力建设计划,并启动了可持续与绿色金融理学硕士项目,以培养绿色和可持续金融市场运作所必需的技能^[8]。国内的主流高校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也纷纷探索了碳经济、绿色金融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计划,以服务“双碳”目标的实现^[9],在粤港澳大湾区,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已发布《香港绿色及可持续金融人才发展及策略》,并为扩大全球人才库提供了建议,澳门科技大学成立了“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培育绿色金融、能源金融方向高层次人才,这些高校的课程与实践代表了对绿色金融的教育承诺,为“双碳”目标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绿色金融人才培养存在的主要问题

“双碳”目标加速进行,与之相关的资金、技术和人才需求都在激增。新趋势催生了新业态、产生了新专业、新职业(如图2所示)。作为与“双碳”密切相关的绿色金融人才培养要想破局,主要遇到以下问题:

(一)传统的金融教育尚未与绿色金融发展的实际需求相匹配

绿色金融、转型金融成为金融支持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抓手,但是与低碳经济相关的专业一直未完整纳入学科体系建设,一直处于紧缺状态。很多高校在绿色金融方面的教学内容和研究方向还不够完善,无法提供全面系统的绿色金融知识培训。学生往往无法在真实的绿色金融项目中实践,缺乏对实际业务操作和解决问题的经验积累。此外,缺乏绿色金融教师队伍的建设,也限制了人才培养的质量和规模。

(二)原有的教学资源尚不能支持绿色金融人才培养的新场景

由于绿色金融是新兴学科,知识内容多,学科交叉性强,研究的问题比较前沿,绿色金融课程开发不足,在传统金融学课程中增加低碳经济学、碳金融市场交易、碳金融衍生品等内容还需一定时间。绿色金融的学习需要结合实际案例进行分析和讨论,但目前市场上缺乏丰富的绿色金融实践案例。学生很难从教材中直接感受到绿色金融在实际项目中的应

用和效果。与此同时,绿色金融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存在地域差异,有些地区可能资源有限、专业师资匮乏。这导致不同地区的教学资源 and 教学案例的丰富程度存在差异,学生受益程度不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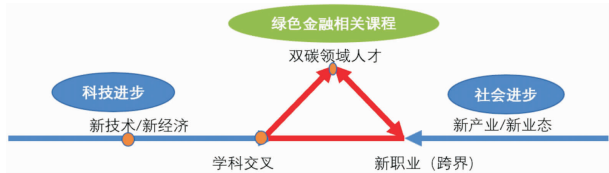


图2 “双碳”背景下金融人才教育范式的基本框架

(三)标准和认证体系方面仍存在不足,缺乏行业认可与机会

目前绿色金融领域在标准和认证体系方面仍存在不足,缺乏权威的行业标准和认证体系,导致相关人才的专业能力很难被准确评估和认可,使得企业

在招聘和选拔人才时难以判断其专业能力。在很多金融机构中并没有明确的绿色金融岗位和职业规划,与传统金融人才相比,绿色金融人才常常处于劣势地位,相关职业发展通道和晋升机会相对较少,限制了人才培养的积极性。

三、绿色金融现代产业学院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绿色金融领域的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缺口,亟须高校等组织加强相关人才培养。笔者基于“双碳”目标的内涵及特征,遵循现代产业学院这一新型办学组织的建设规律,通过“平台开放、内外结合、改革创新、协同育人”的人才培育机制创新^[10],探索构建一个以创新、交叉和开放为基本特点的“绿色金融+”多元协同育人的现代产业学院。具体的思路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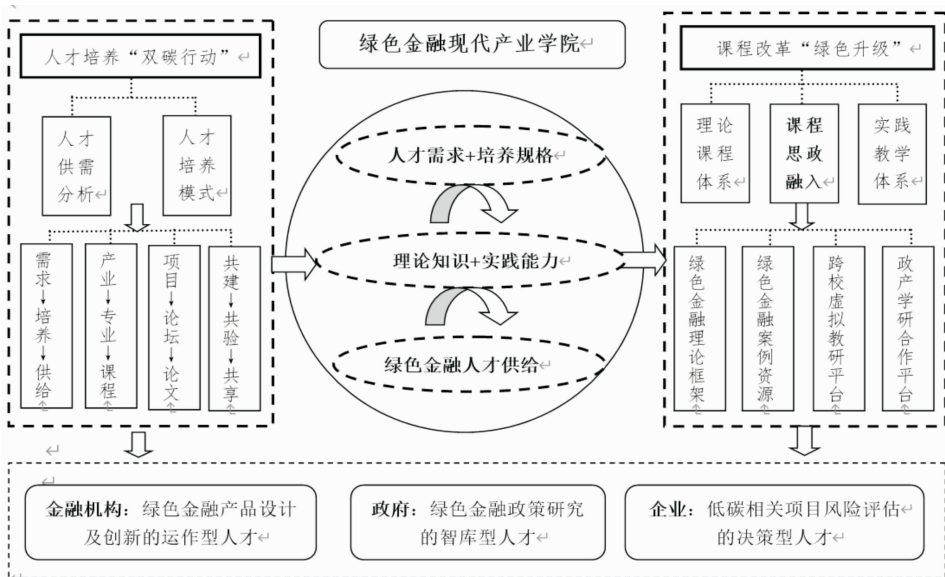


图3 绿色金融现代产业学院人才培养模式

(一)重构人才培养方案,实施绿色金融人才培养“双碳行动”

在教育部《加强碳达峰碳中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工作方案》等相关文件的指导下,注重专业建设内涵是否与“双碳”带来的产业升级发展相适应,开展动态调整专业的调研行动。

1.“需求—培养—供给”动态调整。基于全国和区域金融业发展现状,根据《金融业发展“十四五”规划》《金融标准化“十四五”发展规划》,以及各省市的《重点产业急需紧缺人才目录》等政策文件为依据,分析地方性金融人才培养的可行性与迫切性,确定地方性金融人才需求特点与要求,为高校培养地方性金融人才提供政策依据。走访地方金融监管局、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金融机构以及有碳减排需

求的企业,收集他们急需的岗位人才需求信息,比如知识要求、能力要求和素质要求。根据高校的实际情况和调研情况,组织学院的专业教学骨干和教育专家、外聘行业导师编制绿色金融人才培养方案。

2.“产业—专业—课程”敏捷对接。打破传统静态课程设置体系,结合“双碳”背景绿色产业发展的需求,调整专业方向,提升本领域学生对核心知识的掌握能力,原金融类专业强调的经济、管理和法律等基础课程需要强化,涉及本行业的知识需要进一步整合,探索开发绿色金融系列课程:如《双碳目标下的绿色金融体系》《中国可持续债券市场发展》《绿色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金融机构环境气候风险分析方法与实践》,培养学生面向新对象的分析能力,迅速对接产业迭代需求。

融机构共建金融硕士培养的政产学研协作新模式。

四、启示与未来展望

(一) 预测需求变化趋势,规划战略性功能定位

绿色金融现代产业学院需要对国内外绿色金融市场和产业发展进行深入研究,了解市场和产业的现状、趋势和潜在机会,通过定期发布研究报告或进行专题研究,为学院的战略规划提供决策依据。明晰绿色金融现代产业学院服务地方经济与产业、行业发展的核心能力水平,依托各办学主体单位能提供的技术资源、实验实践资源,结合对合作单位和企业及现代绿色金融市场发展对人才需求的趋势预测,对产业学院人才培养目标进行战略性功能定位。与此同时,加强绿色金融现代产业学院多个办学主体之间的合作,联合组建学院治理专家委员会,负责与产业学院建设密切相关的行业研究、市场调研、决策咨询、办学指导等工作,加强统筹协调,使多元主体达到良性互动,实现可持续和创新发展。

(二) 提升人才集聚效应,获得多层次智力支持

绿色金融现代产业学院应建立开放、竞争、多元的人才引进机制,注重人才的多样性和互补性,以满足不同领域和层次的人才需求。针对金融领军人才,可因地制宜采取市场化与政策性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一对一”定制化引才服务;针对金融骨干人才,要将“人员招聘”与“人才引进”相结合,吸引三年以上从业经历的紧缺型实践型金融人才加入产业学院,加强现代产业学院金融骨干人才队伍建设;与此同时,还要不断扩充金融柔性人才,充分运用学术交流、商务交流、论坛会议、培训等渠道建立长效联系,通过顾问指导、项目建设、课题研究等方式,为产业学院发展和人才培养提供智力支持^[11]。

(三) 吸引多方资本投入,探索多元联合培养项目

绿色金融现代产业学院要获得长久发展的资金来源,必须从吸引多方资本投入入手,形成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产业学院全新办学格局。完善财政风险规避机制,做好规划预算,做到不浪费、科学实施宏观调控,将经费保持在合理区间^[12]。通过实施多元联合培养项目,加强地方高校与国内外金融学科实力较强的高校开展合作,支持金融机构打造“品牌课程”及“金牌讲师”进课堂,组织高校在校人才进金融机构开展课题研究或项目实习,鼓励高校、研究机构与金融机构“结对子”,联合培养金融人才。与此同时,积极推动举办特许金融分析师(CFA)、金融风险管理师(FRM)等专题培训活动,培养绿色金融行业急需的跨境金融、风险管理等实用人才^[13]。

综上所述,绿色金融的发展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

3.“论坛—项目—论文”有序衔接。在第一、二学期理论课程学完后,可以根据课程学习情况,在第四、五学期举办春季、秋季两期学生创新论坛、博士论坛,由教师、学生分别承担组织者、报告人、点评人职责,以此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组织能力,引导学生积极申报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在学生参加论坛、申报创新项目的基础上,导师指导学生在地方金融领域选题,提高学生学术能力,保证毕业论文质量,使人才培养在各个阶段更加可控。

4.“共建—共验—共享”有力保障。探索通过虚拟教研室、虚拟仿真教研平台、智慧教学系统等,为绿色金融人才培养赋能。依托高校现有资源,积极参与主流院校的虚拟教研室,解决绿色金融教学资源共享的问题,为绿色金融师资不足提供保障,以实现教师团队互鉴共建、创新人才培养共验、资源共享共献,充分体现新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内涵。

(二) 创新教学模式与方法,推动绿色金融课程改革“绿色升级”

目前,国内高校在绿色金融人才培养的实践领域取得了诸多创新和突破,但是在高校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却体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在“双碳”目标引领下,可以探索创新绿色金融人才培养的教学模式和方法。

1.“顶层政策解读+基层案例分析”。一方面,将国家层面、省市层面绿色金融政策解读融入金融理论与政策、金融监管专题等课程教学;另一方面,根据区域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经验、绿色金融热点事件提炼素材,形成地方性金融案例,加深学生对现实问题的理解。解读顶层政策,分析基层案例,提升学生知识水平、培养业务能力的同时,使他们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

2.“校内导师教理论+行业导师管实践”。理论课教学与实践教学并重,授课教师要立足地方,采用案例教学、模拟教学、现场教学以及讲授、研讨相结合等多种教学方法开展授课,同时实行校内、校外双导师联合指导培养,校内导师重点培养学生的理论分析能力和学术素质,校外导师重点根据省市的区域特色,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素质,以此提升研究生的理论水平、实践能力、创新能力。

3.“虚拟教研平台+现代产业学院”结合。教师通过在“虚拟教研平台”学习过程中形成的理论、方案和资源,可以在课程教学的实践中转化应用,为学生提供模块化的课程和柔性的学习路径,学院再探索建立“绿色金融现代产业学院”,继续加强与业界联系,主动承担产学研项目,创新与地方政府、地方金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而作为这一进程的关键环节,绿色金融现代产业学院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构建科学、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我们不仅可以培养出具备高度专业知识和技能的金融人才,还可以为我国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深入理解绿色金融的内涵和外延,精准把握市场和产业的实际需求,不断完善和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同时,我们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积极引入先进的理念和技术,以不断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果。

参考文献:

[1]徐政,左晟吉,丁守海.碳达峰、碳中和赋能高质量发展: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J].经济学家,2021(11):62-71.
[2]Ping S, Shah S A A. Green finance, renewable energy, financial development, FDI, and CO2 nexus under the impact of higher education [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2023 (30): 33524.
[3]马骏.中国绿色金融发展与案例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6.
[4]林夕宝,余景波,宋燕.“双碳”目标背景下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研究[J].教育与职业,2022(6):36-42.
[5]陶然.绿色金融驱动绿色技术创新的机理,实践与优化

研究:基于“政企学金”协同发展视角[J].金融理论与实践,2021(12):62-72.
[6]张元宝,杨国兴,毛防华.应用型高校现代产业学院高质量发展:内涵、困境与路径:基于共生理论的视角[J].江苏高教,2023(7):52-59.
[7]黄彬.现代产业学院知识协同生产与课程开发探析[J].教育发展研究,2021(5):14-19.
[8]叶楠.国外高校绿色金融人才培养的实践与启示[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20(8):141-143.
[9]金玉然,朱晓林,王冰,等.新文科碳达峰碳中和人才培养目标研究[J].环境教育,2023(10):57-59.
[10]周继,良吴肖.现代产业学院促进地方本科院校一流学科建设的内在逻辑:基于产业学院组织属性与特征的考察[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2,43(4):185-192.
[11]张海,杜宇玮.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的金融支撑:逻辑机制,国际经验与中国方略[J].现代经济探讨,2023(6):107-115.
[12]李名梁,史静妍.我国现代产业学院:内涵诠释、逻辑路径及研究转向[J].教育与职业,2023,1(9):13-20.
[13]庞嘉俊.广东高校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人才培养“融合式”教学改革探索[J].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2,20(1):51-56.

(责任编辑 许峻)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alent Training Mode of Green Finance Modern Industry College based on the goal of “Dual Carbon”

SUN Sui^{a,b}, QU Shenggang^{c*}, YANG Jiaheng^a

(a. School of Finance and Insurance, Gu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ning, Guangxi 530003, China; b. Guangxi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ning, Guangxi 530003, China; c.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Gu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ning, Guangxi 530003,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current background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the goal of “low carbon” has become a common goal pursued by all countries, and green finance as an important means to promote this goal, the training of talent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On the premise of accurately grasping the connotation of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the triple helix,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tandards and requirements of green financial talent training, and plans to build a path of “talent demand – training specification – training mode – talent supply”. It provides theoretical basis and action reference for the innovation of green financial talent training mode. By implementing the “double carbon” action of talent training, a dynamic “industry – specialty – curriculum” agile docking system can be established. This system can connect “academic forum – innovation project – graduation thesis” in an orderly way. And through the teaching method of “virtu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room + Modern Industrial College”, a green financial talent training mode of “co – construction – joint inspection – sharing” is formed, focusing on the value – added research of talent training ability.

Key words: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green finance; modern industrial college; personnel training mode

双高建设背景下 中医药文化育人价值挖掘和实践探索

罗华丽

(烟台职业学院 食品与生化工程系, 山东 烟台 264670)

摘要: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和精华,以中医药文化涵育人、培养人,有利于提高中医药文化地位。深入挖掘中医药文化的育人价值,探索“一体两翼三全育人”中医药文化育人新机制,以期提升高职药学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关键词: 中医药文化;三全育人;双品育人;创新创业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4.01.020

中图分类号:R-4;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4)01-0123-06

一、中医药文化育人现状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中医药文化育人以中医药文化伦理内涵为基本育人准则,注重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仁、和、精、诚”的传承与弘扬。以中医药文化育人、培养人,有利于提高中医药文化地位,也是在新发展、新形势、新挑战下,发挥中医药文化健康教育价值的重要举措^[1]。

通过互联网开展“高职院校中医药相关专业大学生对中医药文化的认知与认同度”调查,收回有效问卷683份。“对中医药文化非常感兴趣”学生占比30%，“对中医药文化比较感兴趣”学生占比45%，“对中医药文化的兴趣一般”学生占比25%，“对中医药文化不感兴趣”学生占比0.8%。通过互联网开展的“高职院校专业教师对中医药文化的了解状况”调研,收回有效问卷200份。参与调研教师回答“您对中医药文化的了解程度”问卷时,有4.5%的教师选择“非常了解”;有10.1%的教师选择“比较了解”;有17.0%的教师选择“一般了解”;有43.1%的教师选择“了解不多”;有25.3%的教师选择“一点儿也不了解”。由两次问卷调研结果

可见,中医药文化育人实践中存在师资队伍缺乏,知识结构不合理,缺少实践内容,内容欠缺合理化,教学形式传统,教学方式滞后的问题。

通过互联网开展的医药名著知悉度调查问卷统计中,约占30%的大学生表示“没有阅读过《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难经》等中医药名著”。具体调研数据,见表1。

表1 中医药名著知悉度调查统计表

中医药名著	听说过		阅读或部分阅读过	
	被选次数	占被调查者的比例/%	被选次数	占被调查者的比例/%
《伤寒杂病论》	1554	92.34	905	53.77
《神农本草经》	1534	91.15	856	50.86
《黄帝内经》	1469	87.28	847	50.33
《难经》	892	53	425	25.25
以上都没有	25	1.49	499	29.65

在大学生认知和了解中医药文化的渠道方面,调查显示,相关渠道的重要程度依次是书籍、课堂学习、网络、讲座、社会实践和校园文化活动、看病时听医院医生或家乡民族民间医生介绍。

目前,药学专业教育中,中医药文化育人过程中还存在不配合和抵触情绪,不利于中医药文化建设及其育人作用的有效发挥。中医药文化育人需要满

收稿日期:2023-09-17

基金项目:2023年度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一般课题“双高建设背景下中医药文化育人价值挖掘及实践探索”(2023JXY167)

作者简介:罗华丽(1978—),女,四川达州人,硕士,烟台职业学院食品与生化工程系副教授,研究方向:药学教育。

足大学生精神文化需求,但在实践中存在如何利用本土中医药文化资源讲好中医药文化传承发展的故事的问题。需要创新中医药文化,将中医药的整体观、辩证思维等融入课程思政教育,以满足新时代学生的需求。

在校大学生对中医药文化的认同度调查(见表2)中,81.6%的大学生表示“生病时会选择看中医”,18.4%的大学生表示“生病时不会选择看中医”。0.4%的大学生还认为“前景渺茫,将会被取代”。

表2 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认同度调查统计表

价值观	被选次数	占被调查者的比例/%
以人为本	1476	87.70
大医精诚	1467	87.17
医乃仁术	1390	82.59
调和致中	1352	80.33
天人合一	1374	81.64
医道自然	1281	76.11

对中医药文化育人现状调查中,认为“当前学校教育对自己学习中医药文化的贡献度非常大”比例约32.6%,认为“贡献度比较大”占比38.0%的大学生;认为“贡献度一般”占比25.3%;认为“贡献度很小”占比2.7%;其余的认为“几乎没有帮助”。

关于中医药文化相关社会实践活动频次调研中,17.11%的大学生表示“每年参加3次及以上”,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表示“从未参加过”。

由上述调研发现:高职院校学生对学习中医药文化具有积极的主观意愿,但大部分学生还未真正树立自主学习的意识;存在重视不够、缺乏系统谋划、育人逻辑架构模糊、对学生中医药文化需求掌握不足、相关课程开设较少等现实问题。

二、中医药文化育人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中医药文化育人过程中存在无序化、边缘化、单一化等问题,进而导致大学生对中医药文化的认知程度大相径庭,中医药文化无法充分发挥育人优势,无法充分实现其独特价值。目前高职院校普遍存在中医药文化意识重视不足、中医药文化育人机制不顺畅、中医药文化建设缺乏有效互动、中医药文化认同度低等现实状况。同时,由于缺乏高质量的评判标准和强有力的评价成果,加之中医药文化的宣传力度不足,对中医药文化育人成效的评价机制尚不健全^[2]。目前,急需更新中医药文化育人观念,丰富中医药文化育人思路,并广泛吸收教育科学原理,以提升中医药文化育人实践的丰富性;急需发掘中医药文化育人价值,打造中医药文化育人品牌。

中医药文化育人面临中医药知识传承不足、中医药文化认同度不高、中医药教育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具体原因如下:

(一) 中医药文化传承不足

由于中医药知识繁杂无序,导致中医药文化传承不充分。一方面,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降低了人们对中医药的重视程度,从而阻滞了传统知识的传承;另一方面,中医药知识的传承需要长期的积累和实践,由于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和功利导向促使年轻一代对中医药的学习兴趣不高。

(二) 中医药文化认同度不高

现代医学中西医处于优势地位,中医被边缘化,也促使了中医药文化的认同度降低。一些人对中医药持怀疑态度,认为其缺乏科学性和实证支持,从而影响了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三) 中医药文化育人体系不完善

中医药院校的教学质量和教学资源有限,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加之,中医药教育的内容陈旧、方法单一,导致了中医药文化育人体系不健全。

综上所述,中医药文化育人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知识传承不足、文化认同度不高和教育体系不完善等挑战,主要是由于中医药文化育人价值实现的过程存在无序化、边缘化、单一化等原因所致。

三、中医药文化育人的价值挖掘和实践意义

古人提出的整体观、辩证论治、君臣佐使、望闻问切和阴阳平衡等思想蕴含着科学思维理念,值得弘扬光大。中医药医德精神倡导医者仁心、大医精神、生命至上、济世活人、淡泊名利等精神品质,对培育高素质卫生队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3]。

中医药文化“仁、和、精、诚”的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和道德修养^[4]。改进和提升中医药院校中医药文化育人效果,最为关键的是坚持整体规划、分层设计、有机衔接、协同推进的思路,按照有标准、可量化、易实施、能考评的原则,深入挖掘中医药文化价值(表3)。

(一)以“和”为核心,突出价值引领,挖掘思想理念价值

中医药文化价值以“和”为核心,人我相和的处世观;阴阳平和的健康观;调和致中的治疗观等几个层面。将中医药文化素养作为学生的核心素养,着力建设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学文化、中医药文化等课程思政项目,构建系统的中医药文化课程育人体系,提升学生的人文底蕴。中医药文化育人要形成特色鲜明的校风,努力塑造学生“和”的价值取向,增强学生对中医药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强。

表3 中医药文化育人价值挖掘

育人目标	育人内容		育人功能	育人体系	
	哲学意蕴人文精神	核心内涵		精神与行为层面	物质层面
和	天道	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同道谦和的道德观;阴阳平和的健康观;人我相和的社会观;调和致中的治疗观等。	价值引领	思想理念体系	
仁	人道与文道	仁爱与博爱、仁者爱国、仁者爱人、医者仁心、医乃仁术、以人为本、人命至重、敬畏生命、爱护生命、济世活人等。	道德修养	制度与管理	校园环境 形象设计 体系
精	医道	博极医源、精研医道、精湛医术,精勤不倦、业精于勤、精益求精等	行为引导	行为规范体系	
诚		诚信、诚实、真诚,求真、敬业、自律等	知行合一	实践与评价体系	

(二)以“仁”为核心,突出道德修养,挖掘管理体制价值

随着时代的发展,“仁”字的内涵不断丰富,如仁者爱国、仁者爱人、以人为本、人命至重、仁心仁术等,是个人的道德标准和道德追求。在学校管理中,制度是依据一定的价值理念而设计形成的要求全体成员共同遵守的规章或准则,是价值理念与行为规范之间的桥梁。科学的制度体系不仅能引领、规范学校各部门及师生员工的工作方式和工作行为,更能调动部门和个人工作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创新创造和成才的潜能,是师生道德规范的重要手段。因此,中医药文化育人应以“仁”为核心,对各项制度进行全面梳理,将“仁”的道德标准有机融入教育教学、师生日常管理、选人用人、师德师风建设、后勤保障、评优评先等制度体系,充分挖掘和发挥“仁”的育人内涵,教育引导师生厚植爱国、爱校、爱家、爱人、爱己之情。

(三)以“精”为核心,突出行为引导,挖掘行为导向价值

“精”是对医术的要求,也是对医道的要求。学医不仅仅要练就精湛的医术,要“求真学问,练真本领”,还要有精勤进取、勤学苦练的意志。“精”的学风建设要从强化教书育人理想信念教育、完善科学的教师评价机制等方面着手;“精”的学风建设要从严格日常教育管理、激发学生的职业兴趣和就业危机感、强化勤奋意识培育、优化各类课程考核评价、完善评优评先激励机制、创新班主任和辅导员工作等方面进行改善。着力引导学生树立惟精惟一、精益求精的精神,博极医源、博采众长的情怀,业精于勤、勤奋好学的意识和习惯。

(四)以“诚”为核心,突出知行合一,挖掘实践育人价值

“诚”是“仁”的外在体现,“诚”最终要体现在“知”与“行”的关系问题上,首先,中医药育人实践可通过专业实习、文化活动、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等多元载体,广泛开展太极拳、易筋经、八段锦、五禽戏、六字诀等功法锻炼,中医药科普志愿服务活动,

健康保健及药膳美食活动,中医药文化艺术节,中医药企业参观实习及调研活动;打造中医药文化特色学生社团,开展中医药技能竞赛等系列活动,增强学生对中医药文化的体验、理解和认同。

通过中医药文化价值挖掘,努力在中医药文化育人过程中积极凝练中医药文化的教学案例如张仲景励志从医的故事课程思政案例。张仲景出生时,“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时代背景下,张仲景立志从医,帮助百姓摆脱疾病与伤痛的困扰。可以说,是时代成就了张仲景的人生理想,使他将自身所学与社会现实需求联系起来。在坚定崇高信念方面,张仲景更是典范,他在遭遇仇家报复,历经丧妻、丧子之痛,遭受他人非议时,仍在坚持治疗一例例疑难杂症,为后世留下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

综上,中医药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根同源,一脉相承,中医学融汇了多门学科的内容,既包含人体学、生物学,又涉及天文、气象、哲学等内容,还涵盖了心理学、易学、语言文字学方面的知识。从美德方面来看,中医药文化讲究仁爱思想,在价值取向上突出家国意识,注重致中尚和,在人格上追求大医精诚,在行为心理上讲究智圆行方、胆大心细;从中医药思维来看,传统中医的“四诊法”——望、闻、问、切,充分体现出医患之间的互动性、患者病情的系统性。

总之,中医药文化育人价值挖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

第一,有利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中医药文化育人价值挖掘,有助于高职药学生了解和传承中医药文化,增强对中医药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

第二,有利于培养健康生活方式。中医药注重以人为本、防病于未然的理念,强调平衡、和谐和自然的生活方式。通过中医药文化的育人实践,引导人们注重身心健康,提高生活品质。

第三,有利于培养道德伦理和职业素养。通过中医药文化育人,可以培养学生的道德伦理观念,提高职业素养,使其成为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

的医学人才。

第四,有利于中医药文化继承与发扬。中医药文化育人价值挖掘,可以激发学生对中医药的兴趣和热爱,提升医药人才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中医药文化传承和发扬做出贡献。

四、“一体两翼三全育人”中医药文化育人机制研究

一棵小草“拯救”世界、一根银针“链接”中西、一抹药香“穿越”古今。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培养高职药学专业学生中医药文化自信任重道远。我们提出构建“一体两翼三全育人”新机制,探索中医药文化育人模式。

“一体两翼三全育人”中医药文化育人机制是指形成1个中医药文化研究共同体;构建2个育人工程(双品育人、双创技能为中医药文化育人主体框架的左右两翼);开展中医药文化全员、全程、全面三全育人新模式。

(一)形成1个“中医药文化研究共同体”,加强中医药文化育人的顶层设计

构建使命共同体,增强中医药文化育人的引领力(思政课教师和专业课教师应当协同发力。专任教师应当在教授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同时教育引导树立献身中医药学的理想,鼓励他们立大志、守精诚、成仁医,使学生自觉把推进中医药传承的时代使命承担起来、合理地规划人生);构建师生共同体,增强中医药文化育人的聚合性(医学专业课教师要改变以往“重教学、轻育人”的做法,立足课程特点,培养学生科学精神的同时培养他们的人文精神、爱国情怀);构建课堂共同体,增强中医药文化育人的承载力(多渠道讲好中医药故事,培养学生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的高尚医德)^[5]。

(二)形成2个育人工程即双品育人、双创技能为中医药文化育人主体框架的左右两翼

在药品生产专业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如何融合课程思政理念,开展“立诚信人品、做放心药品”的双品育人工程。

1. 双品育人工程

高职药品生产专业“双品育人”工程旨在解决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不平衡的症结,实现德育育人一体化,使“双品育人”策略更好地满足学生成长成才的诉求,填补国家和社会对高质量人才的需求缺口。高职药品生产专业“双品育人”工程以“药德”育人为核心,将“药德”文化与双品育人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相结合,将思政育人与专业培养相结合,将专业知识与工作岗位相结合,发挥第

一课堂主渠道作用,重视第二课堂和社会实践的机会。强调将公共基础课程与专业技术课程相结合,设置国学经典、医药传统等公共基础课程,与药品生产专业课程相呼应,与知名药企绿叶制药有限公司开展深度合作,构建学校与企业二元培养的产业学院人才培养新模式。

推进药品专业课程思政建设首先要树立“立德树人”育人目标,培养能够胜任高技能岗位的有责任有担当的一线技术技能人才,是实现医药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和实现产业提质增效的人力保障。目前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两张皮现象非常严重^[2],药品生产专业理论知识枯燥乏味,开放性、思政性内容设计不足,开展该专业课程思政研究非常必要和紧迫。

针对高职药品专业,凝练中医药文化课程思政素材,融入中华医药优秀案例,强调理想信念、职业素养和思想道德教育,以“溶盐于汤”的方式推进中医药文化育人课程思政建设。通过创建药品专业双品课堂,发掘药物研发史的中国智慧和中医文化典型案例,创新教学组织形式和方法手段,引发学生学习的内生驱动力。以双品课堂思政建设为抓手,打造双品育人品牌工程,发挥课堂共同体的育人潜力。

2. 双创技能工程

中医药知识枯燥乏味,理论知识的讲解比例过高,创新性、开放性的工程实践应用占比较少,教学效果不理想。为此,提出以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和岗位胜任力双创技能工程,依托高职创新大赛和技能大赛两大平台,按照职业岗位和工作过程模块化设计理念,构建药学专业双创技能培养工程。

重构药品专业实践课程培养目标体系,明确以培养学生的岗位胜任力(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等为核心两力(学生具备核心两力),开发实践教学模块和教学资源,加强实践教师队伍建设,深化现代职业教育教学法研究。

具体实施路径:工程实践能力培养可通过开设与中医药相关的实践课程,如中药制剂、中医临床技能等,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组织学生参与中医药科研项目或实践项目,让他们在实际项目中应用所学知识,锻炼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建立实验室和实训基地,提供实践场地和设备,让学生进行实验和实践操作,培养他们的实践技能和创新思维。组织创新创业竞赛和活动,鼓励学生提出创新创业项目,并提供相关支持和指导,帮助他们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建立创新创业孵化器或实践基地,为有创新创业意向的学生提供资源和支持,帮助

他们实现创新项目的落地和发展。

(三)构建中医药文化三全育人模式,打造全员、全程、全面三全育人目标体系

中医药文化全员、全程、全面三全育人新模式是一种综合性的育人模式,旨在培养学生的岗位胜任力(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这一模式强调中医药文化在教育过程中的全员参与、全程贯穿和全面涵盖。全员参与意味着不仅教师和学生,还包括学校管理者、行业专家、社会资源等各方面的参与^[6],全员共同努力,为学生提供全程指导与支持,以期学生的全面发展。全程贯穿意味着中医药文化教育应贯穿于整个中医药文化育人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从课堂教学到实践实训,从学科知识到文化传承,中医药文化都应该贯穿其中,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断感受和体验中医药文化的魅力。全面涵盖意味着中医药文化育人要全面培养学生的能力和素养。

为了实施这一育人模式,可以采取以下策略:设计多样化的中医药文化教育课程,包括理论教学、实践操作和实地考察等,以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和兴趣。建立中医药文化教育的评价体系,通过综合评价学生的知识掌握、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加强学校与行业、社会资源的合作,提供实践实习机会和创新创业平台,让学生能够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和应用所学的中医药文化知识和技能。培养师资队伍的专业素养和教育教学能力,提高教师对中医药文化育人的认识和理解,使其能够有效地引导和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发展。

总之,中医药文化“一体两翼三全育人”是借助“双品育人工程”将中医药文化价值内化于心,通过双创技能工程将中医药文化技能创新外化于行,二者同频共振、协同发力,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核心竞争力。通过全员、全程、全面的中医药文化育人实践,有利于传承和发扬中医药文化的精髓和妙用。

五、“一体两翼三全育人”模式下中医药文化育人策略

2022年,国务院办公厅在《“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文件中明确提出,加强中医药文化研究和传播。“一体两翼三全育人”模式下中医药文化育人策略研究,是中医药文化研究中关于育人实践路径的研究。具体实施策略可选取以下几种:

(一)组建中医药文化研究联合体

通过网络形式,组建中医药文化研究联合体(中医药文化资源库),让中医药文化触手可及,深

入挖掘中医药文化数字资源和育人价值。

(二)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需融入中医药文化育人理念,突出专业实践,加强分类培养。比如可以组织学生参观中医药机构、实习医院,让学生亲身体验中医药的实践应用,了解中医药的疗效和特点,可开展中医药文化体验活动,让学生亲自体验中医药的养生方法和技巧。

(三)创新创业教育

通过开设中医药创新创业课程、组织创新创业比赛等方式,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业精神,激发中医药文化育人潜力。

(四)课程设置

将中医药文化纳入课程设置(微观层面),开设中医药文化课程。通过系统的教学,让学生了解中医药的基本理论、核心价值观和实践经验,培养对中医药文化的认同感和兴趣。

(五)师资培养

加强中医药文化专业教师的培养力度和广度(中观层面),提高他们的教学水平和专业素养,为中医药文化育人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

(六)社会参与

可以与中医药机构、社区组织、文化机构等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开展中医药文化育人活动。通过社会参与,可以丰富中医药文化育人的内容和形式(宏观层面),提高中医药文化育人的社会影响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总之,通过形成1个医药文化研究联合体(一体),2个实践教学和创新创业教育(两翼),课程设置、师资培养和社会参与(三层面)等多种策略的综合运用,鼓励全员参与到中医药文化育人的实践中,鼓励家长、学校和社会三方参与中医药文化育人的全过程,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医药文化传承人,为中医药文化事业的传承和发展保驾护航。

六、“一体两翼三全育人”中医药文化育人实践成效评价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从广义上说,中医药文化是指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创造的中医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称;从狭义上说,是指中医药行业独有的思想观念、行为规范。“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为其核心基础,“崇尚和谐、追求平衡”为其思维方式,“以人为本、大医精诚”为其道德准则,这些均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因此中医药文化育人价值突出。

我院通过积极开展“一体两翼三全育人”中医药文化育人模式改革和实践,育人成效显著提升。

(一)“双师型”师资队伍不断扩大

通过中医药文化育人“双师”团队的培养,已经组建了一支师德高尚、专兼结合的“双师型”中医药文化育人教师队伍,提升了师资队伍的课程思政和专业实践能力。近5年,教学团队成员立项省部级课题近10项,发表论文30余篇。同时,教师带领学生参加各级各类创新创业大赛和技能大赛,获省部级奖项10项。

(二)人才培养质量大幅度提升

通过中医药课程研究共同体的构建,形成完善的中医药文化育人教学资源体系。“一体两翼三全育人”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大幅提升了人才培养质量。近3年,烟台职业学院药学专业学生获省级以上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10余项,成功授权专利5项;学生社会服务能力强,多次作为志愿者参与三下乡活动,学生就业率达99%以上。

七、结论

通过深入挖掘中医药文化的育人价值,探索“一体两翼三全育人”中医药文化育人新机制,即借助“双品育人工程”将中医药文化价值内化于心;通过双创技能工程将中医药文化技能创新外化于行。二者同频共振、协同发力,旨在提升学生的核心竞争力;通过全员、全程、全面的中医药文化育人实践,旨

在传承和发扬中医药文化的精神实质。构建“一体两翼三全育人”人才培养体系,即通过形成1个中医药文化研究联合体(一体),2个实践教学和创新创业教育(两翼),课程设置、师资培养和社会参与(三层)等多种策略的综合运用,鼓励全员参与到中医药文化育人的实践中,鼓励家长、学校和社会三方参与中医药文化育人的全过程,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医药文化传承人,为中医药文化事业的传承和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 [1]杨耀文,杨芳.中医药文化育人策略研究[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1(6):130-136.
- [2]林绿萍.医药类大学生对传统医药文化认知的现状分析与提升路径[J].广东药科大学学报,2020,36(1):108-111.
- [3]王洪龙,李金莹,周艳芬,等.习近平中医药文化观及其思想启示[J].中医药管理杂志,2023,31(16):1-3.
- [4]吴铄涵.从《大医精诚》谈中医药文化的育人功能[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23,21(18):171-174.
- [5]曹猛,牛小斌.新时代高等中医药院校“课程育人”体系构建研究[J].新乡学院学报,2023,40(8):70-72.
- [6]李亚,李海龙.高职院校职业技能与职业精神融合育人路径研究[J].河南教育(高等教育),2023(12).

(责任编辑 许峻)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Valu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in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High Construction

LUO Huali

(Department of Food and Biochemical Engineering, Yantai Vocational College, Yantai, Shandong 264670,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is the core and esse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t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statu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to educate and train people. It is imperative to deeply explore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explore the new mechanism of “one body two wings, and three comprehensiv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educa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pharmacy.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three complete education; dual quality educati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